

耶稣会士徐日升
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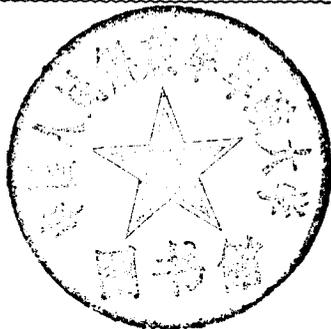
约瑟夫·塞比斯著



耶稣会士徐日升 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约瑟夫·塞比斯著
王立人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3年·北京

Joseph Sebes, 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

Institutum Historicum S. I.

Rome 1961

内 部 读 物

**耶稣会士徐日升
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约瑟夫·塞比斯著

王立人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8^{1/8}印张 200千字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26 定价：0.77元

670651/10

出版说明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导论》为本书作者塞比斯所著，第二部分是徐日升关于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全文。

本书作者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是一名耶稣会士，自1959年起在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任职。他将收藏在罗马耶稣会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徐日升日记》的手抄本译成英文(原文为葡萄牙文)，连同葡萄牙文本在本书中发表，作为本书的第二部分。在这个中译本中，《徐日升日记》是根据塞比斯的英译本转译的。

本书的《导论》概述了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期沙皇俄国向西伯利亚以至黑龙江流域一带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国明、清朝廷对北方疆域的政策以及中、俄之间早期的一些交往和清军对沙俄侵略者的抗击，从而叙述了订立尼布楚条约前一段时期的历史情况。这些材料对于了解早期中俄关系史和阅读《徐日升日记》本文是有帮助的。由于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可能正确阐述历史，甚至有些史实被歪曲；另外，对耶稣会士在历史上的“功绩”及徐日升在尼布楚谈判中的作用，都有过分夸张的地方。读者在阅读时请注意加以分析。

耶稣会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原名托马斯·贝瑞拉(Thomas Pereira)(1645—1708年)，1666年当他二十一岁时被派往印度传教，不久就转到中国澳门，1673年受聘为康熙帝的音乐教师来到北京，从此定居于北京。1689年康熙帝派他和另一名耶稣会士法国人张诚(原名 Francis Gerbillon)以译员身分随同由索额图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尼布楚参加与沙皇俄国的划界谈判。1690年1月，徐日升写了一份向教会汇报此次谈判经过情况的报告。此报告以

日记体写成，因而称为《徐日升神甫的日记》。这部日记对于这次谈判的经过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虽然其中对于他本人在这次谈判中所起的作用有过分夸大的地方，但仍不失为一份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的素材，对于了解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史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书《导论》中的第九章主要是讲解徐日升日记葡萄牙文本排印的体例的，因中译本不刊载葡萄牙文本，故略去。书中的注释附于各章的后面。原书中有一些注释只是罗列了一些名词的不同的外文拼写形式，在翻译过程中已加以删略。

1973年9月

目 录

前言	1
徐日升神甫日记导论	5
第一章 俄国的向东扩张	6
俄国扩张的特点	6
海岸 河流系统 黑貂皮 私人事业	
早期的试验	7
伐来几亚人和诺夫哥罗德人 莫斯科人	
侵入西伯利亚的成功	9
斯特罗哥诺夫家族 西比尔 耶尔马克 扩张的方式	
俄国在西伯利亚扩张的各阶段	13
鄂毕河流域 叶尼塞河流域 勒拿河流域	
黑龙江流域的被侵入	18
从雅库次克派出的远征队 自叶尼塞斯克派出的远征队 雅克萨的建城	
策略的改变	26
向东北 向南 向东	
西伯利亚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状况	28
政府机构 居民 俄国的正教教会 西伯利亚的毛皮贸易	
第二章 中国和“北方地区”的关系	36
中国的传统态度	36
总的原则 中国被“夷狄”完全占领	
明朝的态度	37
明朝的平时军事力量 明朝的战时军事力量 外交关系 明代制度的衰落	

清朝的政策	47
满族势力的崛起 清朝对俄国人的外交	
第三章 1689 年以前中俄之间的使节和军事行动	57
中俄之间的间接接触	57
直接接触的建立	58
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次外交使节 最初的军事交锋	
继续的关系	60
新的外交使节 新的军事冲突 米洛瓦诺夫的出使 尼古赖的出使	
最后的交锋	66
军事准备 新的外交措施	
第四章 耶稣会士在早期中俄关系中的利害关系	75
耶稣会士的参与	75
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接触和交通路线	77
希腊罗马时代 景教派 中世纪 葡萄牙人	
陆地上的路线	85
从欧洲到印度 到中国去的陆路	
穿过西伯利亚的路线	90
南怀仁神甫 法国和波兰的耶稣会士 闵明我神甫	
第五章 耶稣会士在尼布楚的作用	103
第六章 尼布楚条约订立以后	122
中国对蒙古人的政策 中国对黑龙江地区的政策 俄国的政策	
尼布楚条约订立后的耶稣会士	
第七章 徐日升神甫, 他的日记手抄本及关于其内容的泛论	134
徐日升神甫	134
徐日升神甫日记的手抄本	139
葡萄牙文的手抄本 手抄本的拉丁文译本 杜宁·施保的译本	

关于日记内容的泛论	143
第八章 日记中所载的条约文本	147
徐日升神甫的日记	155
提纲	156
日记	159
附录一 十七世纪乌拉尔—阿尔泰区的诸民族	233
附录二 汉英人名译名对照表	240
附录三 汉英地名译名对照表	246

前 言

·当前全世界的注意力,又再度集中于俄国和中国在外交、商务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各国的首脑、新闻界的代表和一般公众,都想知道这些关系的真正性质。可是,专家们似乎也缺乏这种知识。而且,由于俄国和中国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目标和政策也同样令人猜不透的,所以问题就更复杂了。如果说“历史是生活的指导”这句老话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考查一下过去,以求得解决这个谜的线索,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我在本书中将试图研究中俄关系的开始阶段。1689年中俄之间签订中国有史以来和一个欧洲国家订立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这是两国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的划时期事件。通过迪·荷尔德神甫所发表的张诚神甫的日记,和通过一些其他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虽则从来没有全部发表但使用了俄国在尼布楚的谈判代表费要多罗·阿列克塞维奇·戈洛文的正式报告)学术界知道了尼布楚谈判的内幕。直到目前,这些著作是我们关于这个条约产生经过的知识的唯一来源。可是,张诚的同伴和耶稣会同事葡萄牙人徐日升,也对这同一事件写了一本日记,这本日记不但从来未发表过,而且它的存在甚至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在本书中,我将发表并翻译这个有趣的重要文件。张诚是法国人,徐日升是葡萄牙人;因此,应该认为他们是这些交涉的中立的观察者。他们都是西方人,看到这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这种奇特的办交涉的情况是有些惊讶的。不过,徐日升和这些谈判发生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的日记的机密性更大,因此仔细地读一读这本日记可能会为今天

的西方读者了解当前的情况，提供一些启示。即使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给这个本来已难以打破的谜加入了新的复杂因素，然而中国和俄国的谈判者的心理似乎基本上没有改变。

在对《徐日升日记》进行叙述和评价之前，我们必须回答在读者脑子里会发生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中国和俄国来说都是外国人的这两位耶稣会士，怎么会参与了产生这个条约的谈判，参与了两个非天主教国家间订立这个条约？这两位耶稣会士对条约的订立起了什么作用？他们自己对他们的任务是怎样想的？他们怎样去执行这种任务？在谈判中时常提到的“国际法”，对交涉和条约的订立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编史工作忽略了这个重要事件？两个半世纪多以来，关于这件事没有人曾写过论文给以充分的研究。

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一些问题，曾经有过不同的和分歧的回答，而另一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答案。在试图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之前，必须把在巴夫洛夫斯基所称之为“奇异的三方组合”（俄国、中国和耶稣会士）中的三个方面所作的导致尼布楚条约的订立的活动的活动，加以扼要的叙述。因此，本书分为两个部分：提供历史背景的导论和《日记》的葡萄牙文原文及英文译文。

在导论部分，我力图大略地说明，俄国向东扩张的进程，中国对“北方地区”的态度，导致尼布楚谈判的它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和耶稣会士在中俄外交关系中的利益和作用。在这之后，是徐日升的简略传记和对他的日记一些手抄本的技术上的说明，还有一些有关的话是了解这部日记所不可少的细节。关于这个说明历史背景的导论，必须提请读者注意，虽然也用了一些原始资料，但其相当大的部分是根据第二手的资料，因此在我的叙述中不是在每一次使用二手资料时，都用脚注提到这些作者的姓名和他们的著作名称。这种作法是为了减少脚注和避免使这个第一部分太长，以致把日记本身贬到次要地位，而不是为了否认应该承认的来源。

我在每一章或章的每一节的开头，都指明了所使用的著作和要知道更详细的材料时可以使用和参阅的著作，这样就承认了我得到这些著者和他们的著作的帮助。这种办法也许会被认为是自行其是，然而似乎是必要的，因为它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使叙事不致太频繁地被打断，而且也更容易读一些。

第二部分内容是葡萄牙文原文的日记及其英译文，不需要加以特别的说明。只有一点须说明的：脚注是按葡文本而不是按英文本注的。英译文不总是每一句恰恰和葡文本相符，而是有时比葡文本推后几行；因此是有出入的。但是，葡文本既是原始本，似乎应当以它为准。

关于两个附录，也应该说几句。在第一个附录中，正如在全书正文中一样，我对蒙古名字试用现在专家们所用的拼写法。但是，这却不是总能办得到的，因为格雷戈里大学印刷所没有带有所需要的发音符号的字母。这个缺点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唯一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在最后的时刻采用完全不同的拼写法来拼写，而时间却不容许。在汉字的附录*中，我没有把正文中所遇到的汉字和日本字都列入。人们比较熟悉的朝代、皇帝和他们的年号，以及省名、出名的城市、江河等名称，都未列入。

最后，我必须对所有曾帮助使本书能够出版的人，表示感谢。

1961年10月24日于华盛顿乔治敦大学

* 这个附录对中国读者不适用，未照录，其内容一部分并入本书附录(二)、(三)人名、地名汉译对照表中。——译者



徐日升神甫日记

导 论

第一章 俄国的向东扩张

俄国扩张的特点¹

俄国在十六、十七世纪中的扩张,其成功证明是持久的。这种扩张和西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建立帝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它是在陆地上的扩张,而不是向海外的扩张;而且,它受到以下四个因素的支配:

海岸 虽然俄国的周围有一些海——北面有北冰洋和白海,西北有波罗的海、波的尼亚湾、芬兰湾和利沃尼亚湾,南面有里海、亚速海和黑海——但是,这些海的沿岸适宜作为海港的地点很少。在这些海之中,有一些海一年之中只有几个月可以航行;大多数在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 1689—1725年)和叶卡特林娜二世(叶卡特林娜太后 1762—1796年)的时代之前,甚至还不是俄国的永久领土。

河流系统 欧亚草原带北部优良的河流系统和各河流〔伯朝拉河、卡马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以及它们的支流〕之间陆地联运的方便,吸引了对于这种类型的扩张已有经验、而且是素有经验的俄国人。高出海面一千至五千五百英尺的乌拉尔山,和在卡马河—楚索瓦亚河—鄂毕河这一条线上的乌拉尔山的高不过二千英尺的南部山脉,都不是很难越过的。这就便利了俄国的向东扩张,正如欧亚草原带无树林的南部,曾经在十三、十四世纪时有助于蒙古人向西移入欧洲一样。

黑貂皮 从很早年代起,黑貂皮和一般毛皮就是俄国贸易的

商品。确实象一位德国作家所说的：“黑貂促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征服，而且用它的皮子也支付了开发和征服的大部分费用。”²²固然在征服西伯利亚的后来阶段中，农业移植的可能性，还有取得金属宝藏——金、银和宝石——的可能性，给征服西伯利亚添加了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最初的推动力却是由那些产皮动物身上似乎无穷无尽的富源所提供的。当这些兽类在俄国东北部开始减少的时候，西伯利亚在向人们招呼。正是这种同样的情况导致了不断的向东发展。这也说明了关于征服西伯利亚的另一个独特之点，那就是：这件事完成得很迅速。

私人事业 最初的一批哥萨克人（耶尔马克、科尔佐等）在沙皇看来都不过是一些歹徒，他们与西方探险家不一样，西方探险家的事业都是得到这个或那个政府的赞助的。卡马河流域的斯特罗哥诺夫家族，对这些开路先锋给予了鼓励和帮助，而沙皇只是在他们的成就已很明显之后，才给他们奖赏。沙皇由于忙于应付欧洲的事务，对这件事没有积极的兴趣，而结果证明这倒是有好处的。因为作为一种私人事业，这件事甚至在那些大公爵和历朝的沙皇忙于其他地方的事务的时候，甚至在“多事的时代”（1603—1613年）里，仍能继续进行。

早期的试验³

在十六世纪耶尔马克入侵时，俄国人对西伯利亚西部不是完全无知的。

伐来儿亚人(Varagians)和诺夫哥罗德人(Novogorodians)自九世纪以来，伐来儿亚人就开辟了东北的扩张路线。继他们之后是诺夫哥罗德人，他们是这些地区的最初的移殖者。但是，乌拉尔山的北部山脉造成了一些困难。而且，诺夫哥罗德人在有了一

些进展之后，又碰到新的艰难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称为尤格拉斯⁴的土著的不欢迎的态度。这些土著们不懂为什么他们要向这些新来的人纳贡。1032至1187年间，曾经多次派远征队越过乌拉尔山，但都没有取得持久的成就。因此，在诺夫哥罗德，对这一块尤格利亚地方的情况，真正知道得很少。蒙古人统治了这片欧亚草原地带后，俄国人对这些地区的探险和开发便停止了。我们知道，有几位俄国大公们曾到过金帐汗国（钦察汗国）在伏尔加河上的首都沙莱、蒙古的喀喇和林和大汗的朝廷。但是，他们到这些地方去，不是作为土著部落的剥削者去的，而是作为蒙古汗的卑恭的臣民，为他们各自的王国求得承认而去的。

莫斯科人 当蒙古在俄国的统治衰落的时候，莫斯科试图重新打开通往乌拉尔的道路。这些新的尝试大都是在1478年诺夫哥罗德被莫斯科打败之后进行的。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之间的斗争在1471至1478年间达到了最高峰。这场斗争基本上是一场争夺原料——即毛皮、公路、河道系统和水陆联运站的斗争。伊凡三世（大帝）认识到，这件事对莫斯科来说，就意味着俄国的新发展，即成为帝国，否则就是瓦解。因此，莫斯科人在他们胜利之后，立即重新开辟通往乌拉尔的各条道路。这一新的越过乌拉尔山的尝试是由后来被尊为圣者的斯蒂芬主教来筹备的。他是乌斯提卢格地方的人，他在彼尔姆地区建造了一些教堂和寺院。莫斯科在1465至1483年间进行了这些远征。这些出征活动使莫斯科人同乌拉尔山那边的伏格尔人和乌拉尔—阿尔泰血统的其他土著部落发生了接触，并且开辟了贸易的道路，如果任何私人敢于到这些地区去的话。由于这些在彼尔米亚和尤格利亚新开辟的地区受到萨摩吉人和其他乌拉尔—阿尔泰种的土著部落的骚扰，1499年伊凡三世派了由塞密昂·库尔布斯基亲王率领的一支四千多人的军队去对付他们。这支军队一直推进到鄂毕河，征服了后来称为西伯

利亚的西北部，它的四周就是冰海、乌拉尔山、康达河和鄂毕河。在这次战役之后，伊凡三世自称为“尤格利亚王”，他的儿子巴西尔四世又加上了“鄂毕多利亚和康迪米亚王”的称号。⁵

但是，所有这些远征的结果都是可怀疑的，因为征服的领土既不容易保持，而胜利之后要继续推进也是困难的。这些远征的结果肯定地证明了，要想越过乌拉尔山的北部山脉去和乌拉尔山之外的地区建立联系是徒劳的。还得再过一个世纪，才发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线。在殖民的方式中还得加上另一个因素才能导致成功。在这一事业中，斯特罗哥诺夫家族起了重要的作用。

侵入西伯利亚的成功⁶

斯特罗哥诺夫家族 关于斯特罗哥诺夫家族的来源，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某些材料，他们是一个蒙古人的后裔，这个蒙古人由于叛国罪而受到囚禁的辱刑。据另外一些材料，他们的祖先是来自诺夫哥罗德来的商人。不管真相究竟如何，第一个斯特罗哥诺夫家族的人斯皮里迪昂是一个商人，关于他的情况有着文献的证明。他在德维纳河地区和诺夫哥罗德之间往来旅行，把他的货物出售给汉萨的商人或和他们交换。他的儿子科斯马斯继续他的父亲的生意；科斯马斯的生意接着又由他的儿子陆卡继承。斯特罗哥诺夫家族的命运前途就是由陆卡来决定的。他预见到时代的趋势是莫斯科的兴起。他使自己和莫斯科大公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和莫斯科疏远，同时他和诺夫哥罗德也保持良好的关系。陆卡的儿子菲奥多听从他的父亲的建议，把他的家从德维纳河迁移到威切格达河来，在一个后来绝迹了的称为索耳维切戈德斯克的地方附近安顿下来。菲奥多死前把他的土地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斯特罗哥诺夫家里年纪最小的，也是最优异的安尼卡继承了

他的父亲的家园索耳维切戈德斯克周围的地区。他在十七岁时就专心致力于制盐和开设铸造工场，特别致力于和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的毛皮贸易。他好几次派了远征队到那些地方去。这些远征队所走的路线仍是圣人斯蒂芬的路线，从威切格达河到威姆河，从那里到伯朝拉河及其支流，然后再从那里越过乌拉尔山。他对待土著很公正；他们很愿意把毛皮卖给他。大约在这时候，在莫斯科流行着关于这些地区的财富和居民的天花乱坠的传说，这些地区不知出于什么起源而被称为“马格纳塞亚”。伊凡四世(绰号“可怕的”)已经派了一支远征队进入西伯利亚，这支远征队一直达到额尔齐斯河。伏格尔人和奥斯第雅克人承认俄国的宗主权；鞑靼人⁷和西伯利亚诺盖人的酋长“西比尔”王艾狄杰(雅狄嘎)也承认俄国的宗主权。艾狄杰的领土的主要地方，鞑靼人称之为伊斯克尔，位于额尔齐斯河的右岸，在现在托波尔斯克所在地下游十六俄里⁸处。艾狄杰于1555年和1556年向沙皇纳贡。就在这时候，伊凡四世自加了“西比尔大君”的称号。为了防止沙皇对这些地区进行进一步的直接干涉，并为了避免误会，安尼卡·斯特罗哥诺夫于1557年去莫斯科作了一个关于马格纳塞亚的详细报告。沙皇对于他的忠诚的效力，尤其是对于他所带来的礼物，并非不加赏识。因此，当1558年安尼卡的儿子格雷戈里和雅卡(雅可布)请求沙皇把他们在安尼卡指导下已经渗入的沿卡马河的几块土地给予他们的移殖者时，他们获得准许，由他们自己出资去建造城市，发展实业和建立军队。在这个较偏南的地方，乌拉尔山脉不是那么大的障碍；正是从这儿，马克西木·斯特罗哥诺夫于1578年派耶尔马克出征而获得成功。

西比尔 西比尔(西伯利亚的名称由此而来)地区曾经数易主人。在伊凡三世朝代(1462—1505年)，这个地方是由一个奥斯第雅克酋长统治的。六十年之后，它属于艾狄杰。艾狄杰于1555

年、1556年向伊凡四世纳贡，并且一直纳贡到1563年他被库程汗推翻时为止。库程属乌兹别克族，是昔班（术赤的儿子，成吉思汗的孙子）的后裔。这时，昔班的后人统治着花刺子模、基发和布哈拉，而库程汗则将他的统治权扩大及于托波尔—额尔齐斯地区的鞑靼人和巴拉巴草原地带。1569年，他承认了俄国的宗主权，但同时，又挑拨土著反对俄国人，并禁止他们向莫斯科人纳贡。他甚至派了他的侄子马梅特库尔深入到楚索瓦亚河去袭击俄国人（1573年）。为了要摆脱这种骚扰，斯特罗哥诺夫家族得到许可建立军队。他们雇佣了哥萨克人。这些哥萨克人的领袖是瓦西里·提莫费维奇·奥累宁，他的绰号“耶尔马克”（磨石）更为人所熟知。

耶尔马克 哥萨克人在帮助伊凡四世征服了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的蒙古人之后，在伏尔加河一带居留下来。由于这些哥萨克人不时拦劫来往于基发、布哈拉、波斯和莫斯科宫廷间的商队，伊凡于1557年派了他的正规军去对付他们。哥萨克人被击溃了。五个头人在耶尔马克和科尔佐领导下，带了五百四十人，沿卡马河而上，到达了马克西木·斯特罗哥诺夫的居住地奥廖尔镇。他把他们雇用下来，并派他们到西伯利亚去。

1578年耶尔马克的第一次出征并未成功，这一次他和他的部下一直到达了锡尔伐河。所以，第二年他们又出发了。第一个冬天，他们到达了西里班卡河。然后他们沿着塔吉尔河和图腊河前进，遇到了第一批蒙古军队，并将之击败。第二年冬天，他们是在现在秋明所在地的地区度过的。当地土著被迫以食物和毛皮供给耶尔马克和他的部下。然后，这些哥萨克人又推进到托波尔河流入额尔齐斯河处，就是库程汗建造他的住所的那个地方。在这里，耶尔马克于1581年10月23日击败了库程的军队。这一胜利的结果，在库程统治下的伏格尔人和奥斯第雅克人都归顺了他。耶尔马克接受了他们的降服，向他们征收皮毛税。一直到这时候，在沙皇的

眼中，耶尔马克不过是一个匪徒。但是，耶尔马克要进一步取得发展，必须有后援，而这只有沙皇才能提供。于是，他决定派他的助手伊凡·科尔佐带了二千四百张黑貂皮、二十张黑狐皮和五十张海獭皮到莫斯科去，向沙皇报告击败库程汗的胜利，并请求增援以进行进一步的征服。沙皇听到耶尔马克的成功，就赦免了对他的惩罚，并且送给他以贵重的礼物：两套盔甲和相当大的一笔钱。于是，耶尔马克从一个匪徒一变而为一个英雄。第二年，科尔佐回到了西比尔。在此期间，耶尔马克又胜利地击败并俘虏了马梅特库尔，他把马梅特库耳和他新近征收的贡品一齐送往莫斯科(1583年)。同年，伊凡四世答应耶尔马克的请求，派指挥官西密昂·布尔朔弗斯科伊带领五百人前往西伯利亚。但是，情况已经发生恶化。耶尔马克的实力大受损耗的部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在额尔齐斯河的一个岛上，被鞑靼人打败了。耶尔马克本人于1584年在那里阵亡。剩下的哥萨克人，因这些事情的发生而灰心丧气，离开了西比尔和西伯利亚。库程的儿子又占领了这些地方；不过，不久他又被另一个蒙古王子色季得萨克打败了。

耶尔马克在西伯利亚的四年中，使图腊河、托波尔河和额尔齐斯河的所有鞑靼人，以及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一带的奥斯第雅克人和塔夫达河的伏格尔人，都归入俄国统治之下。虽然在耶尔马克死后这些地方又再度失去，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已经发现了，而且入侵和扩张的方式也已经树立了。

扩张的方式 有进取心的斯特罗哥诺夫家族曾经计划占领耶尔马克所进入的地区。沙皇在耶尔马克取得成功之后才认识到眼前有着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显然是由于这个原因，莫斯科给耶尔马克派去了援军，并且在耶尔马克死后，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在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中，俄国人抛弃了袭击的政策，而开始实行以建造城堡的办法，有计划地控制各河流和水陆联运点的政

策。过去所有的冒险行动,不管是诺夫哥罗德人干的,或是莫斯科人干的(1465、1483和1499年),都是采取袭击的方法。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进入土著的地区,向他们征收毛皮和其他从土著处可以获得的東西作为贡品,又强迫他们表示臣服,并作出继续纳贡的诺言,然后撤走。直到耶尔马克打破了库程汗在鄂毕河流域的统治权之后,情况才发生变化。开始时作为斯特罗哥诺夫家族的得到特许的私人事业,现在由沙皇接收过来,而变成国家的冒险事业。搞袭击的时期结束了,开始了对领土的占领,从而为俄国的欧洲部分建立了防止来自亚洲的袭击的防御,同时又是为俄国向亚洲扩张的一个有利的坚固基地。俄国人靠了这种依据他们过去的民族经验的有计划的行动,在耶尔马克死后最初十年之内,占领了鄂毕河沿岸的几乎所有的战略据点,并且征服了这一地区。在这一征服的过程中,奥斯第雅克、伏格尔、萨摩吉和吉尔吉斯土著部落,都被迫以毛皮纳贡。征服的过程就是用城堡控制从伏尔加—卡马河流域到鄂毕河的河流及水陆联运点。同样的办法导致向东的不断发展。这样,就出现了这种成功的扩张方式。在安定被占领地区的方面,俄国正教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建立了教堂和寺院,并保卫土著的利益。¹⁰

俄国在西伯利亚扩张的各阶段¹¹

俄国完成占领西伯利亚的迅速是俄国扩张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十五年之内,西伯利亚西部就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可是,最初的征服进行得那么迅速,以致不可能对这些地方的情况有透彻的了解和记述。所以,现在也不可能对所有历次的征服战役作完整的叙述;第一,因为这些战役是在各个不同的城堡发生的,情况是纷乱的;第二,因为关于这些

战役的记述和报告,大部分都已佚失。现在所能试图说明的,只是进展的主要线索和各个主要阶段。这些阶段可以和各大河流域的征服,以及各坚固的中心城堡的建立并继之以一整个系统的城堡的建立,联系在一起。

鄂毕河流域 耶尔马克之死发生在 1584 年。当时在莫斯科人们还不知道此事。1585 年,沙皇西奥多决定派一个新指挥官伊凡·曼苏罗夫,带领一百人,去接替 1583 年派往西伯利亚的布尔朔弗斯科伊。在此期间,布尔朔弗斯科伊在到达西伯利亚的时候,得悉耶尔马克已死,认识到他的处境困难重重,他于是征收了一些贡税,就决定回莫斯科去。到 1586 年,莫斯科也知道了耶尔马克遭到不幸,于是派出了由两名指挥官瓦西里·舒金和伊凡·马西诺伊带领的三百人的新的援兵去援助曼苏罗夫。但是,等到这些援兵到达时,曼苏罗夫已经离开西伯利亚。舒金和马西诺伊决定自行开始行动。他们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建立一个作战活动的中心,于是在 1586 年他们在图腊河畔建立了秋明,并在图腊河、比斯马河、艾立特河、塔夫达河和托波尔河一带解决了土著部落的一些问题。这些成就推动了沙皇再派五百人去支援秋明。他还下令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立另一个中心。1587 年,在额尔齐斯河和托波尔河汇合处建立了托波尔斯克。库程汗和其他蒙古首领们一再被击败。库程汗逃往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喀尔木克人¹²处。1593 年,在伏格人地区的中心建立了佩利姆;在索斯瓦河的两岸建立了贝雷佐夫,作为控制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沿岸的奥斯第雅克人和萨摩吉人的中心;在鄂毕河的右岸建立了苏尔古特,作为一直伸入到托姆河的地区的中心。1594 年,安德烈·艾莱茨基亲王,奉莫斯科的特令,在托波尔斯克之南建立了塔拉。这是在伊施姆草原和巴拉巴之间的前哨站,其目的在于保护托波尔斯克,防御在伊施姆河地带游弋的哈萨克¹³和诺盖部落,以及防御从巴拉巴草原威胁着

俄国领地的由额尔齐斯河上游和鄂毕河流域的喀尔木克人。1595年,在鄂毕河河口,建立了鄂毕多斯克。1596年,苏尔古特的哥萨克人在克特河和鄂毕河汇合处建立了纳雷姆,控制着盛产黑貂皮而只有很少的奥斯第雅克土著居住的广大地区。1600年,在塔兹河口建立了马格纳塞亚。这是对一个只有很少的萨摩吉人居住的、出产黑貂皮十分丰盛的地区的控制中心。奠定了这些基础之后,后来成为托波尔斯克省的地方就在俄国统治之下了。

在对已占领的地方进行行政的组织的同时,俄国的扩张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向南及东南方和向北及东北方。

即使在托波尔斯克和塔拉城堡建立之后,库程汗的家族仍继续抵抗。他们在巴拉巴草原的蒙古人和喀尔木克人的帮助下,多次对俄国的领土进行袭击。虽然建立了在瓦盖河上的阿巴次基(1633年)和艾立特河上的伊塞次基新城堡,这种袭击仍继续不断。因此,1659年沙皇命令托波尔斯克、秋明和塔拉联合对这些蒙古人进行征伐。在这次征伐之后,就没有再提到库程汗的后代了。但是,其他的蒙古部落的威胁仍然存在。从十六世纪中期起,被正在兴起的达延汗的后代势力赶出蒙古的喀尔木克人,开始向西北扩张,试图对土著部落,以及巴什基尔、哈萨克、吉尔吉斯、诺盖和乌兹别克等部落,建立其宗主权。十六世纪时,土尔扈特人原住在塔尔巴哈台地区,由于受到准噶尔¹⁴新兴势力的威胁,而向西移动。他们于1616年出现在厄姆巴河和伊艾克河沿岸,在1650年左右在伏尔加河一带定居下来。继他们之后而来的,是受到阿尔太恩汗和西喀尔喀人排挤的准噶尔人。西喀尔喀人¹⁵在十六世纪之初就在奥布萨湖附近搭篷居留下来。这些好战的蒙古人,在草原上适得其所,俄国人无法征服他们。因此,俄国朝这一方向的扩张方法必须有所改变。不用入侵和以城堡控制的办法,而采取了派外交使节的办法,以取得这些部落自愿的归顺,同时以沙皇答允

保护他们抗御他们的敌人作为酬答。

与此同时，俄国向东及东北方的扩张继续进行。1604年建立了托木斯克；1618年建立了库兹涅茨克。在这方面，俄国人进入了一个新的河流流域。

叶尼塞河流域 1605年，一些哥萨克人发现了卡希河和锡姆河，这两条河都是叶尼塞河的支流。可是，这个地区的奥斯第雅克居民却不是很容易顺服的。他们向吉尔吉斯人纳贡，而吉尔吉斯人却是喀尔木克和喀尔喀蒙古人的同盟者，他们时常袭击俄国控制下的领土。居住在叶尼塞河以东一直延伸到鄂霍次克海的地区的通古斯族诸部落和贝加尔湖¹⁶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也多次参加了这些袭击。为了平定这些地方，彼得·阿尔比切夫在上通古斯卡河流入叶尼塞河的地方，建立了叶尼塞斯克（1619年）；安德列·杜本斯基建立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1627年）。围绕着这些中心城堡，建造了叶尼塞河流域的城堡系统。但是，这个地区的通古斯人是顽强的，甚至在他们臣服之后，仍时常反叛；布里亚特蒙古人也是如此。为了要平定这种局势，叶尼塞斯克的一个哥萨克头人马克西木·波菲利耶夫试图进入布里亚特地区，但是，在布里亚特人强有力的抵抗下，他的出征失败了。

勒拿河流域 俄国朝着更偏东北方向的扩张，进展得更为顺利。雅库特居民的抵抗较小。1631年建立布拉次克城堡的马克西木·波菲利耶夫，以前就曾发现过在安加拉河和勒拿河之间的地区。叶尼塞斯克当局批准了建立伊利姆斯克城堡（1631年）。彼得·别克托夫带领了一支远征队从这里出发，这支远征队沿勒拿河而下进入雅库特人的地区。他毫无困难地于1632年在勒拿河畔建立了雅库茨克。这时在来自叶尼塞斯克的俄国人和来自马格纳塞亚（归托波尔斯克管辖）也来探查这些地区的俄国人之间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一直继续到1641年一个独立的长官彼得·戈

洛文被派到雅库次克时为止。这时，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已打开了。但是，为了要保卫这些地区及其未来的发展，俄国人不得不再度将他们的目光转移到布里亚特蒙古人身上去。

俄国史籍上初次提到布里亚特蒙古人是在1612年和1622年；但是，直到1627年马克西木·波菲利耶夫来访问他们时，才和他们发生实际的接触。由于他未能使他们降服，1628年他就回到叶尼塞斯克去了。同年，哥萨克队长彼得·别克托夫建造了雷勃诺耶(雷本斯科耶)堡垒，他从这里到居住在奥卡河流域的布里亚特人那里去访问。叶尼塞斯克长官雅可夫·赫利普诺夫也被那些传说布里亚特人拥有许多银子的谣言所吸引。可是，这两次远征都没有获得持久的成果。1631年，俄国人在靠近奥卡河的河口上建造了一座城堡，他们采用了布里亚特的一个土著部落的名称称之为布拉次克。马克西木·波菲利耶夫从这里领导了又一次的对布里亚特人的征伐，为了要给被他们杀害的一个哥萨克人报仇。布里亚特人给了他和他的部下一些礼物，而俄国人却把这些礼物看作是贡品。布里亚特人对此很不高兴，不但拒绝继续纳贡，而且劝说通古斯各部落也停止这种缴付。1635年，布里亚特人杀死了达纳耶夫和组成布拉次克守卫队的五十二个哥萨克人。于是派出了一支讨伐军，最后把他们征服了。1639年，布拉次克控制了从维乔雷夫卡河(安加拉河的一个支流)到乌达河的地区。1647年，乌达河流域的布里亚特人，受到其他蒙古人的威胁，派遣使者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请求俄国人在他们的地区内建立一座城堡。这个城堡后来称为乌丁斯克。但是，等到蒙古人的威胁一消失，他们纳贡的热情也减退了，1652年布卡诺夫不得不再次征服他们。1654年，迪米特里·菲尔索夫在安加拉河畔建立了巴拉甘斯克(以布里亚特一部落名称命名)。1658年，由于巴拉甘斯克长官伊凡·波哈博夫的高压统治，造成了布里亚特人的一次叛乱；他们

迁移到蒙古人那里去了。1659年在巴拉甘斯克几乎征收不到什么贡税了。在此期间，从雅库次克来的俄国人已经到达了贝加尔湖（1643年和1647年）。哥萨克人科列斯尼可夫，在安加拉河流入贝加尔湖的地方建立了上安加尔斯克。1646年，从叶尼塞斯克派出了几次远征队去探查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和（喀尔喀人的）车臣汗的臣民发生了接触，从车臣汗的臣民那里他们才知道，俄国人听人说起的金银都是来自中国的。1648年，伊凡·加尔金建立了巴尔古津。1652年建立了伊尔库次克¹⁷。当对安加拉河和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人的征服在进行中的时候，勒拿河的布里亚特人也正在被征服中。瓦西里·维提塞夫建立了维尔霍梭斯克（1642年）以控制勒拿河流域的布里亚特人。他们多次反叛，但是终于在1655年被平定了。

这样，就为俄国扩张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幕——侵入黑龙江流域作好了准备。俄国人第一次和中国人会面了。

黑龙江流域的被侵入¹⁸

关于黑龙江流域的最初报道，俄国人是从小帮哥萨克人那里得来的，这帮哥萨克人于1636年从托木斯克到阿尔丹河来向通古斯人征收贡物。这些哥萨克人中有一些人由伊凡·莫斯科维丁率领，向东推进，到达了鄂霍次克海，在乌利亚河口附近建造了一座堡垒（1639年）。在这里，这些哥萨克人从乌第河流域的土著处听到了关于黑龙江流域的新闻；再往南去，在结雅河和石勒喀河¹⁹沿岸住着一些部落，他们耕种土地，并和这些土著贸易，以谷物交换黑貂皮。

在同一年，1639年，还有一些哥萨克人由马克西木·波菲利耶夫带领，从叶尼塞斯克来到维提姆河，也听到了关于石勒喀河流

域的同样的报道。他们听说有一个达呼尔王名叫拉夫开，住在乌尔卡河沿岸，他的臣民以养牛和耕地为生。据说在他的领土上有银、铜、铅矿，他们和中国间的贸易很繁盛。

这些报道为雅库次克长官彼得·彼特罗维奇·戈洛文和叶尼塞斯克长官阿法纳赛·巴什可夫听到后，他们都决心要探查黑龙江流域。

从雅库次克派出的远征队 戈洛文派出了第一次远征队，取道维提姆河，结果没有成功，于是他又指派秘书瓦西里·波雅科夫去带领另一支远征队。波雅科夫的远征队由一百三十二人组成，于1643年7月15日自雅库次克出发。波雅科夫溯阿尔丹河及其支流乌乔拉河和戈诺马河而上，九月中他不得不在戈诺马河沿岸搭起过冬的住所。他留下了四十人看守给养，自己带了其余的部下由陆路继续前进。四个星期后，他走到了结雅河的一个支流布里安达河。沿结雅河而下，他遇到了通古斯人；他们有驯鹿和牛。再过十一天到达了第一个达呼尔人的村庄。最初，土著们对待这些俄国人很好。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土著们起来反对他们。俄国人由于得不到食物而饿死了许多人。等到留在戈诺马河沿岸的四十名哥萨克人来到时，已经死了将近五十人。波雅科夫决定不再耽搁，继续前进。又经过好几个达呼尔人的村庄后，他来到了结雅河的河口。这里有更多的达呼尔居民，他们都以耕地为生。三个星期之后，波雅科夫和他的部下到达了松花江口。他派出去侦察的部下二十三人，都被女真人杀了。这些女真人是居住在从结雅河到乌苏里江以东四日路程一带黑龙江沿岸的居民。又过了六个星期，波雅科夫和他的部下到达了黑龙江口。这六个星期中的四个星期，他们是在阿枪人中过的。阿枪人是住在黑龙江下游的一个部落，他们和奇勒尔人一样，对任何外国都不纳贡。波雅科夫在奇勒尔人那里过冬，并且征收了二十八苏洛克（一个苏洛克

是四十件)的黑貂皮。1645年的春天,他乘船由海路到达了乌利亚河口,在那里过冬。第二年年初,他继续前往雅库次克的旅程,于1646年6月12日到达了那里。波雅科夫的报告纠正了对于这些地区的财富的错误印象,并指出了在农业和毛皮贸易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他认为有三百人就足以征服他所到过的所有这些地方。在达呼尔人和女真人的地区里,应该建立三个城堡,每个城堡由五十人守卫;其余的一百五十人作为机动部队,以备发生反抗征收贡物的情况时使用。粮食是很充裕的,而且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反抗发生。

波雅科夫的报告使俄国人对黑龙江地区的兴趣保持不衰。1647年,有些在奥廖克马河沿岸的猎人听说有一条到黑龙江去的比较短而且容易走的路线,于是就采取了一些措施要利用这条路线,派出了哥萨克人到土吉尔河和奥廖克马河的汇合处去建立一个城堡。这些哥萨克人中有一些越过了分水山脉(1648年),到达了乌尔卡河,由乌尔卡河而下到达了黑龙江。关于拉夫开的报道得到了证实。不过,他们这一队人力量不够,他们又回到奥廖克马河来。

第二年,耶罗菲·巴夫洛维奇·哈巴罗夫向新任雅库次克长官迪米特里·安德列维奇·特兰斯别可夫建议使这些地区归服。哈巴罗夫的职业是商人,他请求准许他自己负担费用进行这一远征。他答应向雅库次克送交贡税。长官同意了。哈巴罗夫于是于1649年出发。他在土吉尔河度过了第一个冬天,于1650年1月继续乘雪橇向黑龙江进发。土著们记得波雅科夫的种种暴行,都纷纷奔逃。哈巴罗夫和他的部下发现拉夫开有五座堡垒而不是一座,其中大多数都已放弃。哈巴罗夫把其他的堡垒毁了以后,回到了第一座堡垒。这座堡垒最为坚固,并且提供了和土吉尔斯克取得联系的最大便利。在这里,这些哥萨克人还发现了许多储藏谷物的

大坑。哈巴罗夫对他的成就很满意，于是带了几个人回到雅库次克去了。他于1650年3月到达了雅库次克。雅库次克长官很好地接待了他，并且又拨给了他二十人，还准许他征募尽可能多的猎手和捕兽的猎人。哈巴罗夫赶回到黑龙江去，打算探查一直到江口的黑龙江全部河流。哈巴罗夫于1651年6月毁了拉夫开的堡垒，乘船出发，沿黑龙江而下。他们走过了好几个达呼尔人的村庄，来到了有着一座有三重防御的堡垒的村子。这座堡垒的防卫得到了顺治皇帝派来征集贡物的五十名满洲骑兵的支援。俄国人夺下了这座堡垒，击退了退出堡垒去召集援兵的满洲人的进攻。俄国人派出了一些俘虏作为传信人到邻近的一些土王那里去，命令他们向沙皇呈递降书。这些接到投降命令的土王中有一个叫阿尔巴扎²⁰。7月，哈巴罗夫和他的部下继续沿黑龙江乘船而下。大多数的达呼尔人的村庄都已无人迹；那些仍留有居民被俄国人占领的村庄，居民们后来也都逃跑了。松花江口一带地方居住着戈古尔人，松花江下游住着女真人。这两个部族都以耕地和养牛为生。沿松花江而下，走了几天之后，他们进入阿枪人的地区。阿枪人主要是靠打鱼为生。9月，哈巴罗夫来到了阿枪人的一个大村庄，他决定在那里过冬，建造了阿枪斯克城堡。在一个比较小的村庄里，增加了二百人的口，尤其是因为这些人不愿出钱买他们的食物，这就足够成为土著方面采取敌对行动的理由。女真人和阿枪人也请求满洲人保护他们。顺治皇帝下令驻宁古塔章京海色进兵征伐俄国人，并尽可能生擒他们。海色带了二千零二十名骑兵，配有弓箭、小铳和六门铁炮，于1652年3月24日向俄国人进攻，但被击败。

阿枪斯克一带地方的土地并不肥沃。哈巴罗夫怕满人再进攻，决定重新沿黑龙江而上。1652年4月，他离开了他的过冬的营地。在松花江口上，他遇到了六千满洲人和女真人，但终于设法避开了他们。过了布列亚山脉，他遇到了从雅库次克派来支援他们的一

百一十八名哥萨克人和猎手。这些人是由特瑞提亚克·耶莫拉耶维奇·切齐金和阿提美·菲利波维奇·彼特里洛夫斯基率领的。

这些人是在 1651 年夏天哈巴罗夫第二次出发旅行后不久离开雅库次克的。9 月，他们到达了黑龙江，但因冬季即将到来，他们只得在库马拉河附近停留下来。1652 年 5 月，派了纳吉巴去通知哈巴罗夫这批援兵开到了，但是他未能和哈巴罗夫取得联系。纳吉巴和他的部下屡次遭到土著的攻击，7 月间到达了黑龙江江口。由于考虑到从原路回去办不到，纳吉巴决定照波雅可夫的办法，取道鄂霍次克海回到雅库次克去。1653 年 9 月，他到达了雅库次克。

哈巴罗夫得到了援兵，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在黑龙江立足。他又溯黑龙江而上，从土著处征集贡物。当他正要在结雅河对岸建立一座堡垒时，他的队伍里发生了兵变。在三百四十八人之中，有一百三十六人在波利亚可夫、伊凡诺夫和瓦西利耶夫的率领下开了小差，乘船自黑龙江而下。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回来了，其他的人可能被土人杀害了，或投降了中国人。8 月初，哈巴罗夫派人到雅库次克去求援。他认为有六千人就足以抵御四万名满洲兵。当时在西伯利亚没有这样一支军队可供调遣。雅库次克长官派人到莫斯科去送信。在莫斯科，对征服黑龙江地区之事已经考虑了一些时候。哈巴罗夫在派人去求援后，似乎在 1652 年曾沿黑龙江而上到达了库马拉河河口，在那里他在对着库马拉河口的一个岛上建立了库马斯克城堡。

关于俄国人越界的报告甚至传到了莫斯科。于是决定派一支三千人的军队去更有效地占领这些新开辟的地区。伊凡·伊凡诺维奇·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亲王被指派统率这次的远征队，同时还派了迪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西莫菲奥夫带领一支小部队先行开路。后者于 1652 年 3 月离开莫斯科，在秋末到达了勒拿河。1653 年春，他继续向奥廖克马河前进，到雅库次克去和该地长官

会商。然后又立即继续前进，于8月在结雅河和哈巴罗夫及其部下会合。哈巴罗夫和他的部下得到了沙皇授予他们的金质小奖章，以奖赏他们的功绩。西莫菲奥夫然后即执行他从莫斯科带来的训令：要哈巴罗夫亲自到莫斯科去报告关于这些新领土的情况；在黑龙江地区的所有俄国军队都交给奥努弗赖·斯捷帕诺夫指挥；特瑞提亚克·切齐金带四个人领导一个使团去北京；建造三座堡垒，一座在结雅河口，一座在阿尔巴萨的村址，另一座在额尔古纳河口；土地应予耕种，并应征收足敷六千人的军队一年的给养的粮食。赴北京的使团出发了，但是切齐金和他的同伴在路上被他们的向导女真人所杀害。西莫菲奥夫和哈巴罗夫一道离去。哈巴罗夫到莫斯科后受到沙皇的奖赏，封为贵族，并被派回到西伯利亚去，勒拿河流域的所有村庄从乌斯特—库特到琴斯克通道都归他管。他从未再回到黑龙江去。后来，哈巴罗夫斯克城（即伯力）才以他的名字命名。

但是，斯捷帕诺夫没有执行西莫菲奥夫的命令。他不去建造那些堡垒，却顺黑龙江而下，到达了松花江口，在那里过冬。1654年，他又到松花江去，但以粮尽而退。当他再度上溯黑龙江时，他遇到脱离了他们的首领别克托夫的三十名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人，后来又遇见了别克托夫本人。他决定在库马拉河口上过冬。哈巴罗夫以前建造的堡垒已被毁了，于是他又把堡垒重建起来。俄国的守卫队共有五百人。1655年春天，中国大军一万多人，带了炮和火铳围攻堡垒三个星期，但未能攻下。斯捷帕诺夫离开他的过冬营地之前，把所征收的贡物直接送往莫斯科，而不送到雅库次克长官处。在此期间，费奥多·普什金奉派带了五十名哥萨克人从雅库次克到额尔古纳河斯捷帕诺夫应在那里建立一座城堡的地方（1654年）。在松花江口上，他和斯捷帕诺夫会合了，他们一起溯江而上，征收了一年的给养。然后，他们的船沿黑龙江下驶，在奇勒

尔人的地区建造了一座城堡，称之为科索吉尔斯基。在那年冬季里，征收了一百二十多苏洛克的黑貂皮和其他毛皮。1656年春天，斯捷帕诺夫又上溯黑龙江，但他发现土著的村庄已无人迹。他又上溯松花江，发现这里的村庄也无人迹。他得悉，中国人下令所有居民迁往松花江上游，到那里去定居。这样，斯捷帕诺夫既征收不到供养，他的粮食开始不够了。7月间，他派普什金和别克托夫带了贡品到莫斯科去。看来他是在库马斯克度过1657—1658年的冬天的。当他再上溯黑龙江时，他在松花江下游遇到了中国的由四十艘战船组成的一支舰队。他的部下有的未战先逃，他和其余的部下或则被杀，或则被俘。五十苏洛克的黑貂皮落入战胜者的手中。由于原来计划由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亲王率领的远征，因西伯利亚西部发生骚乱而放弃了，所以只给斯捷帕诺夫送去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沙皇对他的特别恩惠，要求他对待土著须宽大，警告他不要和中国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但是这封信到达太迟了。于是，自雅库次克发动的对黑龙江的入侵就宣告结束。

自叶尼塞斯克派出的远征队 当雅库次克对黑龙江的探查在进行中的时候，有些跨过贝加尔湖，越过雅布洛诺伊山脉的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人，带回给叶尼塞斯克能干的长官巴什可夫关于富饶的黑龙江地区的新闻(1652年)。巴什可夫于是进行组织一支自己的远征队。这支远征队交给别克托夫率领。1652年6月，别克托夫带了一百名哥萨克人自叶尼塞斯克出发。到了布拉次克后，他派了马克西莫夫带了二十人先到伊尔根湖去征收贡物，并为来年夏天越过雅布洛诺伊山脉做准备。别克托夫在色楞格河口过冬。1653年6月，他上溯色楞格河在启儿活河上遇到了马克西莫夫。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城堡，并征得二十五个苏洛克的黑貂皮，送往叶尼塞斯克。1654年春天，他们沿音果达河和石勒喀河而下，到达了涅尔查河，他们开始在那里建造一座城堡。有一段时期，俄国人

和当地达呼尔人及他们的酋长根特木尔的关系很友好。但是，不久根特木尔感到不满，带了他的人民离去。留下的通古斯的诸部落对俄国人不时袭击，俄国人的粮食将耗尽了。别克托夫的部下三十人离开了他，到黑龙江下游去了。别克托夫只得随从他们之后。这时，他遇到了斯捷帕诺夫和他会了师。

巴什可夫不因别克托夫出征的一无成就而裹足不前，他向莫斯科建议在石勒喀河上建立一个城镇。他的建议被批准了，而且他被任命为黑龙江上所有俄军的总司令。出征所需的弹药由托波尔斯克供应，给养由伊利姆斯克供应。1656年7月，巴什可夫带了五百六十六人自叶尼塞斯克出发。他在布拉次克度过冬天。1657年夏，他已到达伊尔根湖，第二年春天，他继续向石勒喀河前进。在石勒喀河沿岸涅尔查河口上，他建立了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城。弹药和给养都将耗尽，于是他派波达波夫带了三十人下黑龙江，将新的情况通知斯捷帕诺夫，并命令他派一百人到尼布楚来。但是，他们已经晚了，因为斯捷帕诺夫已在松花江上的战役中阵亡。斯捷帕诺夫手下只有十七人于1661年和他们会合了。当时，俄国人在黑龙江上已无军队。巴什可夫把他的司令部移到伊尔根斯克去了，在尼布楚只留下一小队人守卫。1662年，他回到了叶尼塞斯克。后来，拉里昂·托尔布辛当了尼布楚的长官。在他和丹尼尔·阿尔钦斯基的能干的指挥下，尼布楚日渐成为重要的地方了。

雅克萨的建城²¹ 1669年雅克萨的建城开始了俄国在黑龙江上的新时代。尼基福·车尼高夫斯基于1665年杀了伊利姆斯克长官拉弗兰提·奥布科夫后，带了八十四名其他罪犯，逃到了黑龙江。他在阿尔巴萨村安顿下来，这里的城堡就称为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在雅克萨的这些亡命之徒后来又加上了其他的几股人的力量。他们按期将贡物送往尼布楚。1671年，尼布楚派了伊凡·奥柯尔科夫来担任雅克萨的最高指挥官。1672年，有些农民来到

此地耕种。这时这些罪犯们向莫斯科申请赦罪，他们以前的判刑获得了减免。给他们传递申请书的人回到了雅克萨，带来了沙皇的许多赏赐。于是，他们对当地人民继续压榨。1676年，建造了雅什诺伊冬营以便在结雅河上游征收贡物。1678年，在那里另建了一座城堡，称为塞斯克。1679年，在色楞巴河上建立了色楞宾斯克，在多隆萨河上建立了多隆斯克。但是，这些都是小码头，所以尼布楚长官费多尔·德美谢维奇·伏伊可夫命令伊格纳提·米洛瓦诺夫去结雅河和色楞巴河探查。1682年，米洛瓦诺夫在他的报告（附有一张地图）中建议在结雅河口上或在额尔古纳河邻近之处建立一座城，这些地点都很适合同中国进行贸易。但是，政府决定加强已有的据点，命令米洛瓦诺夫在色楞宾斯克树立其权力，并征收贡物。在1682年结束时，俄国在黑龙江及其支流上的居留地有：雅克萨及其附近的若干村庄；以各河流同样的名字命名的诺沃塞斯克、色楞宾斯克、多隆斯克；以及流入鄂霍次克海的小河流上的土吉尔斯克和乌得斯克。

但是，中国人于1683年向黑龙江上的俄国人发动了一次有力的进攻。在这次战役结束时，所有的俄国人的居留地都被摧毁了，只有雅克萨一处尚存。所以中国人在后来就集中他们的力量对付雅克萨。关于这些战役的经过情况，在以后一章中将加以论述。

策略的改变

俄国的扩张在西伯利亚西部取得初步的成功后，又向三个方向发展：

向东北 在这条路线上，俄国人遇到了文化水平较低、属于比较原始的文明的一些部族。他们的军事组织是脆弱的，政治上是没有保护的。因此，俄国的行之已很有效的扩张方式得到了成功。

俄国人对这些地区进行袭击，征收贡物，强迫它们表示降服并承诺继续纳贡，然后撤退，直到他们用建立城堡的办法，树立了对各河流系统和各码头系统的有计划的控制。这就是在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流域殖民的方式和方法，这种方式和方法是成功的。

向南 但是，当俄国人在西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地区向南移动时，他们遇到了草原的游牧民族。这些部族，尤其是蒙古人，是更为善战的，军事的组织也较强。他们在草原上这个对他们最有利的环境中，能够进行坚强得多的抵抗。他们也结成联盟。他们之中有些部落直接或间接地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对付这些民族，实行了一种新的降服办法，那就是派遣外交使节的办法。

向东 俄国在探查黑龙江的最初几年，使用了在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流域所使用的同样方法。当地的土著大部分是通古斯部族，文明程度不高，而且没有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他们是中国的藩部，向中国的满清皇帝求助。由于俄国最初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时候，中国的满清政府为内部事务所牵掣，无力派遣足够的军队和输送足够的军需，他们于是采取了“焦土政策”，试图使入侵者的供应发生问题，以阻止他们前进。他们建议土著们毁坏他们的谷物，离开他们的土地。俄国人初到黑龙江时，土著们都种地和养牛。十年之后，田野都已荒废。这个过去输出粮食的地区甚至不能养活人口大减的本地居民。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策略。由于这个策略，俄国人面临着须为他们的前进部队自备供应的问题。西西伯利亚太远了；而供养一支规模齐全的入侵部队的运输问题是太困难了，以致无法解决。但是，问题又必须解决，于是明显的出路只有移垦。可是，这还不能就实行，因为移垦所需要的人还没有。而且，在中国的局势平定之后，满洲人就有力量来发动对俄国人的战役，而俄国人对这样的军事行动却尚无准备。因此，俄国人不得不暂时谋求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

西伯利亚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状况²²

政府机构 这个庞大新帝国的中央机构，随着时间过去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一直到 1599 年，西伯利亚是归外务部管的。自 1599 年到 1637 年，这些地区的中央政权交给了管东部地区的喀山事务部。1637 年，设立了西伯利亚事务部。

至于地方机构，各殖民区的行政长官就是军事指挥官。他们统带着沙皇交给他们的部队。这种军事权力使他们的地位居于所有其他的人之上，甚至在哥萨克头人之上。此外，他们还有最高的民政权力；在被兼并的地区内，这种权力使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总督。在司法方面，长官审判一切民事和刑事案件，只有涉及死刑的案件必须请示莫斯科。这些长官驻扎在重要地点，他们对俄国人和土著行使的权力是沒有限制的。他是执行西伯利亚事务部命令的人。但是，在各长官之间，时常发生对于尚未探查的地区争执。这种冲突如要在遥远的莫斯科解决需要太长的时间，所以，为了防止这种冲突，在 1629 年指定了托波尔斯克和托木斯克为西伯利亚的两个主要地方，或省会，两地都由莫斯科派去基干人员。这些基干人员包括一位长官、一位副长官、两三个顾问或秘书（他们的任务是，除协助长官外，并监督长官的活动），以及一些文书（其地位低于顾问或秘书，但职权相同）。其他凡有长官驻在的地方都称为军区，其组织相似但略简单些（长官、副长官、秘书一人，文书一人）。各军区的权限比两个省会小一些；在某些事情上（例如，带领远征队到尚未探查的地区去），它们须听从两个省会的命令，在另一些问题，它们直接听命于莫斯科。但是，冲突和混乱的情况仍继续存在，特别是在关于探查黑龙江地区的问题上。这种情况一直到 1708 年没有切实纠正。1708 年是彼得大帝实行

行政改革的时候,那时托波尔斯克成了八个省政府的省会之一,同时伊尔库次克军事指挥官改称副总督,但实际上却具有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一切性质。

这些大小官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征税。中央政府宣布了一种宽大的政策;沙皇命令他的手下人员要体恤行事。纲领是好的,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这是和莫斯科王国的整个行政制度有关的。它的官员们没有薪俸,只取得向人民征来的供养费。由于他们很随便地接受贿赂,他们把自己供养得很好。这个制度后来废除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消灭,特别是在边远的省份。在西伯利亚实行的赋税是完全任所欲为的;当地官员比沙皇的财库从征税中得到的好处更大。许多官员都是腐败透顶。西伯利亚的土著被迫交纳毛皮实物税。即使没有对官吏的贿赂来加重它,这项税本身就够重了,例如对已婚的男子要征税十五张黑貂皮,对未婚的男子征收十张黑貂皮。

犯有这些榨取罪行的还不仅限于官吏,每一个俄国殖民者都要分脏。正是在这方面,外国的入侵造成最大的骚扰。新来的人当然都是单身汉,需要女人;而他们只能从土人那里强夺得来。这种称为“雅西尔(*iassy*)”的征服权利使他们既得到了妻子,也得到了他们可以并且确实随意出卖的奴隶。这种贸易如此普遍,以致六张狐皮就可以买到一个通古斯姑娘。土著们十分激烈地反抗这种做法。西伯利亚历史学家奥格洛布林说,“雅西尔”的做法是十七世纪中许多次土人起义的主要原因。十八世纪中情况有了好转,当时政府力图取缔各种不当行为,禁止了以任何根据使人为奴,并且对毛皮实物税也有了规定。

居民 俄国的殖民计划,至少在初期是由私人事业也就是商人和哥萨克人的私人事业来实现的。那些商人是一些向来经营北方贸易的有钱的俄国贸易公司的代理人,他们代表这一征服事业

中的民事方面，而分享盈利的哥萨克人则代表军事方面。这样的组织或安排称为征募。在中央政府插手进来之后，征服工作的军事方面，由于加入了常备军（“可怕的”伊凡所建立的最早的俄国正规军）而加强了。同时因为来了些猎手、捕兽的猎人、工匠、农民和流犯，平民人口也有增加。早在 1586 年，就从俄国遣送农民来开垦，并供给了他们马、牛和耕犁。除此之外，私人移民也开始川流不息，吸引了许多逃亡的佃奴、冒险家等等。第一批流犯在 1653 年到达西伯利亚。年复一年新的移民一批批地到来。1753 年伊丽莎白女皇废止死刑后，流犯的人数有显著的增加。由于这批人的流入，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口增加得很快。在俄国扩张的各个阶段，西伯利亚俄国人口的大约数字为：1662 年，七万人；1709 年左右，十五万人至二十五万人；1824 年，一百七十七万人；1851 年，三百六十万。²³在俄国统治下的土著人口：1622 年，十七万三千人；1662 年，二十八万八千人；1709 年，二十万人。²⁴

为了确保和西伯利亚的联系，采取了各项措施。1601 年，在秋明开办了定期的骑马传送信件的邮政，并建造了道路和驿站。到 1710 年，这项工作中已有信差七千人。树立了里程碑；测量了一直到雅库次克的路程距离。按照两年以后通过的一项法律，道路必须宽二十一呎。1682 年，一封普通信寄往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邮费是三十戈比（约为一角五分美金），寄往六千俄里之外的尼布楚是四十戈比。这些邮资和甚至一百年之后英国和法国的邮资比起来，也是便宜的。

俄国的正教教会 关于俄国教会在西伯利亚殖民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必须也稍说一说。自从耶尔马克时代起，教会在西伯利亚的新来的人中就有了它的代表。对于这些大部分是私人事业的最初的殖民尝试，迈克尔·罗曼诺夫就给以组织。由于他的父亲帕特里阿奇·菲拉雷·罗曼诺夫的坚决主张，他任命了诺夫哥罗德的一

个僧人西普里安为托波尔斯基的第一个大主教。从此以后，在西伯利亚的教会就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和帮助。教堂和寺院都建立起来了。²⁵ 对俄国居民来说，这些教士和僧侣的工作，主要就是保持他们的信仰的纯洁，不受正教分裂派的影响。这些异端分子为了逃避在欧洲俄国的迫害，大批来到西伯利亚。就道德方面来说，教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约束它的信徒不要干出坏事。他们举行各种圣礼，在星期天和神的节日执行各种宗教职务。但是，他们的工作不仅限于俄国居民。只要能够做到，他们就向土人讲道，使他们皈依。在蒙古人之中，他们遇到了困难，因为蒙古人不是伊斯兰教徒，就是属于喇嘛教的。西伯利亚西部的蒙古部落是伊斯兰教徒；布里亚特蒙古人是喇嘛教徒。俄国政府知道他们是要极力反抗的，因此让这些蒙古人享有宗教自由。这样，这些传教士们的工作虽没有受到阻挠，但他们在这些地区里就得不到国家的支持。保护土人不受税吏的勒索也是教士工作的一部分；同时，尽可能地教育这些粗野的土人也是他们的工作的一部分。

俄罗斯正教传教团在中国的工作是在尼布楚条约之后开始的，因此不能在这里详加论述。可是，它所做的工作中有一项必须予以说明。从 1716 年第一个俄罗斯正教传教团到达北京时起直到 1858 年，它是俄国在中国仅有的代表。作为一个观察机构，它的作用特别是在甚至连贸易关系也中断的时候，对俄罗斯国家来说是极为可贵的。由于这个原因，这个传教团归西伯利亚事务部管辖。只是在 1858 年(天津条约)之后，俄国人才得建立一个分立的政治使团，从那时起，这个正教传教团就由宗教会议管辖了。

西伯利亚的毛皮贸易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必须稍谈一谈毛皮贸易。如我们所已经看到，西伯利亚的打开和占领是由黑貂皮引起的，而且打开和占领西伯利亚所花的费用也大部分由西伯利亚所产的黑貂皮偿付了。毛皮对俄国探索者来说，就如黄金对拉

丁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一样。的确，从西伯利亚各部族取得的毛皮都专供政府建立巴赫鲁欣教授所称的“金基金”。在西伯利亚的毛皮贸易中有一定地位的产毛皮的动物是：黑貂、树貂鼠、滨貂鼠或石貂鼠、山猫、北极猫或臭猫、獾、海龙、狼、狐、北极狐、熊、海豹、熊海豹、松鼠、海狸、野兔和驯鹿。

关于西伯利亚的探查和开发，可以分为两个有显著区别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这是向未开发的地区扩张的时期；第二个时期从十八世纪起，可称为殖民时期。

在毛皮中，应分为两类：高贵的或贵重的毛皮（黑貂、海龙、黑狐），和普通毛皮（大部分是灰皮和野兔）。在前一类中，至少一直到十七世纪末，黑貂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海龙只是在将近十七世纪末征服堪察加之后才成为重要的毛皮。另一类中，松鼠是最重要的项目。

因为没有记录，无法确定所获得的毛皮数量；至少在第一个时期中所获得的毛皮的数量是无法确定的。不过，我们根据零散的数字也可以作一个估计。耶尔马克在第一次出征后，送了六十苏洛克（一个苏洛克为四十件）黑貂皮至莫斯科。十七世纪下半叶，从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年内出口的黑貂计皮二万九千一百六十件，尾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二件。在这个第一段时期内，灰皮的出口数量也很可观；我们知道在 1594 年有三十三万七千九百五十件付给了奥地利。从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年之内出口的灰皮接近三十五万六千件（大部分是松鼠皮）。

由于在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的初期这些毛皮的数量似乎是无穷尽的，而欧洲的市场又是很有限的，所以毛皮的价格不很高。黑貂皮一件约值七十戈比（约为现在的五十戈比或半个卢布），一张松鼠皮约为二十戈比。

俄国人取得这些毛皮首先是靠征收实物税。其次的办法是：

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奥斯特罗诺夫耶和阿纳得尔以及在彼尔姆省的伊尔比特每年的集市上,以土著所珍视的其他货物(瓶罐、刀子、衣服、烟草、伏特加酒等)来和他们交换,以及猎取与捕捉。等到产毛皮的动物越来越稀少了,于是就成立了公司(如俄美公司)来猎捕。国家从猎人和捕兽者以及商人那里对最好的毛皮征收百分之十的税。国家对商人手中的所有毛皮如要收购,有优先收购权。

欧洲和中国成为两个主要的主顾。同中国的贸易在恰克图进行;在欧洲,来比锡是毛皮贸易的大中心。由于国家垄断这项和外国贸易,它成为俄国国家税收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注 释

1 详细材料见: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第1卷;陈复光:《1689年以来的中俄外交关系》(*Sino-Rus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since 1689*),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10期(1926年);噶邦福:《俄国在黑龙江上的扩张》(Gapanovich,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Amur*),载《中国学报》(*The China Journal*),第15期(1931年);克纳尔:《向海推进》(Kerner, *The Urge to the Sea*),这本书是对俄国发展的这一阶段的优秀研究作品;克兰:《西伯利亚毛皮贸易及其对征服西伯利亚的意义》(Klein, *Der sibirische Pelzhandel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Eroberung Sibiriens*);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Lobanov-Rostovsky, *Russia and Asia*)。早在十七世纪,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已看到俄国扩张的特点。参阅《耶稣会罗马档案》(*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日本——中国,102 ff. 41v—43r。

2 克兰:前书,第5,116页。

3 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除注1中所提到的著作外,可参阅古朗:《西伯利亚铁路兴建前俄国殖民地的西伯利亚》(*Courant, La Sibérie colonie russe jusqu'à la construction du Transsibérien*);帕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Pavlovsky,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西米奥诺夫:《自九世纪至十九世纪西伯利亚的征服》(*Semionov, La Conquête de la Sibérie du IX^e au XIX^e siècle*);特瑞德古尔德:《向西伯利亚的大移民》(Treadgold, *The Great Siberian Migration*)。

4 尤格利亚(Ugrian)血统的土著。关于这些土著和此后所提到的其他乌拉尔—阿尔泰部族,参阅附录(一)。

5 特瑞德古尔德:前书,第17页。

6 除注1和3中所举的著作外,参阅巴索尔德(董斯基译):《中亚土耳其人的历史》(Barthold, [transl. Donskis], *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巴索尔

德(米诺斯基译):《关于中亚历史的研究论文四篇》(Barthold [transl. V. and T. Minorsky],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第1卷;格鲁赛:《草原帝国》(Grou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7 “鞑靼”一词,自中世纪以来,泛指蒙古和土耳其血统的乌拉尔—阿尔泰各部族。

8 一俄里等于0.6629英里,或1.067公里。

9 英译名为 Qirghiz 或 Kirghiz。

10 各城堡、教堂和寺院的全部名单,见克纳尔:前书,第177—190页。

11 除注1、3和6所举的著作外,参阅郝窝思:《自九世纪至十九世纪蒙古人的历史》(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共四卷;亨梅尔:《清代中国人名录》(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共两卷。

12 西蒙古人称为喀尔木克人或厄鲁特人,以别于东蒙古人。厄鲁特人包括和硕特、土尔扈特和绰罗斯等部族,而绰罗斯部族又包括了准噶尔、杜尔伯特和辉特等部落。和硕特、土尔扈特、准噶尔和杜尔伯特为西蒙古人的四大部落。他们的联盟称为卫拉特或四卫拉特,明代中国人称之为瓦剌或卫剌。蒙古族的另一大分支为东蒙古人。在达延汗的时候和紧接着其后的时期,东蒙古人分为三个东(左)“土绵”(万户)和三个西(右)“土绵”。这些“土绵”又分为左、右“翼”(Patrols)。东部三“土绵”直接受可汗(大汗)的统治,而西部三“土绵”则由济农(此字借自中国的“郡王”)代表可汗治理。西部三“土绵”为鄂尔多斯、十二土默特和一个包括永西耶布(Yüngsiyebü)、阿苏特(Asud)和喀喇沁的组合。东部三“土绵”为察哈尔、喀尔喀和乌梁海(Uriangran)。后来,特别在没有强大的可汗时,这些单位趋向分解。到十七世纪当察哈尔的林丹汗再度想把它们统一起来时,他们之中有一些宁愿向清朝投降。到1600年,鄂尔多斯已分裂为四十二股;在它们向清朝投降(1635年)后,在1649—1650年左右,它们组成了六个“旗”,1736年又加上一个“旗”。在十二土默特地区内,除称为东、西“翼”的两大分支外,还有四个小分支,都以部落命名:巴亚乌得(Baya'ud)、乌乌沁(Üüsin)、乌喇特(Urud)和巴林。在他们归顺清朝(1628年)后,1635年成立了土默特旗,后来又分为两旗。据说,喀喇沁地区及阿苏特地区在明朝晚年是在宣府和大同附近。喀喇沁据说成为在永西耶布控制下的一股,明末分为三股:黑、黄、褐喀喇沁。清朝以同一“喀喇沁”之名命名热河省南部的一个旗。热河的喀喇沁人可能来自张家口以北地区。后来,共有三个喀喇沁旗。察哈尔是可汗的领地;十六世纪末,他们居住在近代的热河省西喇木伦河(辽河上游)以北。在1550年以前,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更偏西。察哈尔部落分为五大营。在林丹汗登位(1604—1634年)以前,他们没有闹事或压迫其他蒙古人。在林丹汗死去和察哈尔部落被击败后,林丹的儿子于1635年投降满清。林丹汗的后代统治察哈尔直到1675年蒙古可汗世系断绝为止。自此以后,察哈尔由清朝通过一个驻办大臣治理,他直接对北京政府负责。喀尔喀部落分十二支,一直到阿尔楚—博洛德(Alču-Bolod)从他们之中分离出来,他自己成为五支喀尔喀人的统治者。后来这五支喀尔喀人组成了内蒙古四十九旗的一部分。外蒙古的其他七支喀尔喀人,分为土谢图汗、三音诺颜汗、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的喀尔喀艾玛克(旗之上的部或盟——译

者)。1691年，这七支喀尔喀人的残余向清朝投降后，那四个艾玛克又分为八十七个旗。蒙古西北部的乌梁海部落也归喀尔喀治理。关于蒙古各部落的更详细的列表，见本注中上引各书和附录(一)。

13 这个名称的其他拼写法是：Qazakh 或 Kazakh。

14 参阅注 12。

15 参阅注 12 和附录(一)。

16 蒙古语为贝伊加尔。

17 据有些作者说，伊尔库次克之名源自中古景教徒后裔伊尔库得(Erke'üd)蒙古人。参阅塞柔斯(Serruys)：前书，第 123—124 页。

18 除注 1、3、6 和 11 中所举的著作外，参阅沙比尔：《黑龙江》(Sabir: *Le Fleuve Amour*)；杜锦：《俄国和中国宗教、政治和商务关系史略》(Dudgeo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cclesiastic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刘选民：《尼布楚条约前的中俄关系》，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 23 期(1940 年)；克劳斯：《俄国在亚洲》(A. Krausse: *Russia in Asia*)；弗拉第米尔：《太平洋和西伯利亚铁路上的俄国》(Vladimir [Zenone Volpicelli]: *Russia on the Pacific and the Siberian Railway*)；莱特：《亚洲的俄国》(G. E. Wright: *Asiatic Russia*)；雅可夫列娃：《1689 年中俄第一个条约》(Yakovleva: *Pervii Russko-Kitaiskii Dogovor 1689 goda*)。

19 石勒喀是黑龙江在和颉尔古纳河汇合前上游一段的名称。

20 达呼尔人的一个酋长，阿尔巴津城后来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21 有关雅克萨建城的著作书目，见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 176 页，注 216。

22 除注 1、3、6、11 和 18 中所列举的著作外，参阅兰采夫：《俄国的殖民地行政》(Lantzeff: *Russian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23 这些数字取自古朗：前书，第 65 页；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前书，第 48 页。

24 特瑞德古尔德：前书，第 32 页。

25 这些教堂和寺院的全部名单，见克纳尔：前书，第 177—184 页。

第二章 中国和“北方地区”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态度¹

总的原则 中国一般对其四周民族、特别对“北狄”所采取的政策或态度，其重要性从这个事实可以设想：在它的历史上二千年的帝国时期中，有七百多年，它曾部分或全部受从北方渗入或侵入的王朝的统治。这个政策，特别是在异族的入侵记忆犹新的时候，就是向“北狄”的地区拓张。但是，大部时期，尤其是在较长的和平繁盛或衰落的各段时期里，这个政策是，或者其目的是，要取得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中国的这种态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以“中国”为“天下”和以中国皇帝为“天子”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中国历史上整个帝国时期中对于兵士和商人的轻视态度。因此就产生了中国传统的政策和俄国的政策间的根本区别。俄国的政策在任何时候总是以扩张和贸易为目的；而中国人则把商队看做是贡使，前来承认他们对“天子”的臣服的。这个总政策按不同时代和不同情况的需要，在实践上表现为不同的策略。

中国被“夷狄”完全占领² 如果说，由于中国的这种态度，在清朝建立之前的全部历史中，中国人的确从来未有一个时期征服过、或者即便是控制过蒙古的全部，那么在蒙古人侵入和建立元朝之前，草原上的蒙古人或其他游牧民族也的确从来未能占领或控制整个中国。在历史上，北方蛮族入侵中国的成功，首先须在这些蛮族自己之间的斗争中获胜。酝酿着这种入侵的时期的特点是中

国内部的衰弱。在这样的时期中，关外的各民族在政治上对中国毫无所惧，不过在经济上他们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他们的首领们不能按期得到补助，他们的人民不能享受到廉价的中国货物的贸易，不能买到供他们冬季给养的谷物。在这些时期中，导向征服的初期战争从来不是这些蛮族和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征服也不是靠某一蒙古领袖抢掠中国的能力，因为在这种时候抢掠向来是很普通的事情；而是要靠在征服完成后有保持占领和看守掠夺物的能力。为了要建立这个条件和赢得一批可靠的追随者，这个领袖不是要对中国人而是要对其他可能的入侵者证明他的才能。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一条规律：在成功地侵入中国之前，在中国以北一定有几场各部落间的战争，而这些战斗在军事上说比后来真正入侵时所发生的战斗更重要得多。这说明了为什么蒙古人那么容易在他们自己各部落之间进行最激烈的战斗，因为他们深信，任何能战胜其他蒙古人的蒙古汗国，便能战胜世界上的任何人。如果这场序幕战的结果是若干部落旗鼓相当，那么就不会对中国实行入侵，或者只有局部的入侵。但是，如果这场序幕战的结果出现了一个具有真正天才的领袖，能把其他部落都征服了，那么对中国的征服就将是全面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就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所领导的蒙古人的征服中国。

明朝的态度³

追述一番明朝在和蒙古人的关系上运用这些原则的详细情况是饶有兴趣的事。但是，这将使我们离题太远，因此我们只得限于简短扼要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中国对北方蛮族的传统政策，要求维持强大的军队。由于蒙古人在元朝覆灭之后仍能保持相当的军事力量，而且由于他们之

统治中国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所以中国人就更必须小心地注意他们自己的武装部队的状况。现在必须考察一番这种作战力量在平时是如何保持的，在战时是如何使用的。

明朝的平时军事力量 明朝的开国皇帝洪武帝保持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时兵士的人数超过一百万。

明朝的兵制称为卫所制，和唐朝的府兵制相似。在卫所制下，在一郡设立的军区称为“所”，“所”有士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两个郡组成的军区称为“卫”，有士兵五千六百人。军区的首要宗旨是加强边疆防御侵略，其分布则是按照地区的重要性。当然北方边疆是最重要地区之一。各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是都指挥使，几个军区合在一起受都指挥使的指挥。在都指挥使之上有五军都督府，管辖所有的军区，并掌管全国的兵册。最高的军事机构为兵部，兵部只在战时将指挥军队的权力委之于五军都督府。

这种兵制在明朝初期运用得很成功，因为它和屯田制是结合在一起的。洪武帝了解到维持和供养一支庞大军队的困难，采取了这种古老的屯垦制度。这种国家经营的屯垦地分为三类：军屯、民屯和商屯。第一类和第三类在明朝的北疆政策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军事屯垦地初成立于汉代。明初只在边疆有军事屯垦地，但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洪武对屯垦政策十分重视。这些军事屯垦地由“屯官”管理。由于屯官是重要的官职，贪污的危险总是存在的，所以要经常视察。这些军事屯垦地的官员的薪俸由屯垦地的地租中支给，以米支付，每月十二担。军事屯垦地也分成“卫”和“所”。每一个兵士所分得的土地，按土地的肥瘠和人口的稀密而不同。一般每人可分得四十至五十亩。能自备农耕用具的自备，否则由政府供应。屯垦地的分田事由称为“屯田司”的专设机构管理。屯田司是工部的部门之一。兵士们在这些屯垦区的活动按每个屯垦区

的具体的需要来规定。通例是百分之三十的人员执行边防任务，百分之七十的人员在地里干活。有些地方的比例是二十对八十。有些地方，年轻力壮的担任军事任务，年纪较大的在地里工作。这些屯垦地在建立后三年之内免交地租。此后，地租仍很低，以促进屯垦区的建立。通常地租为每亩一斗。地租以实物付给，按各区的出产而不同。自弘治朝(1488—1505年)后，才以银计租。如我们所说，这些屯垦区最初在边疆地区设立，然后在各省设立，推行得非常积极。创建这个制度是有着有利的条件的，因为元朝末年许多田地都荒废了，甚至象山东和河南这些省份人口也很稀少。然而，在屯垦区设立了一百年之后，可以看得出这个制度在衰落了。固然直到嘉靖朝(1522—1566年)，还有新的屯垦区成立，但是由于管理不善，这些新的屯垦区是不够标准的。在万历朝(1573—1619年)时，辽东各屯垦区的税收只有十七万担，而在洪武朝时曾达七十万担。屯垦区管理得好，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边疆的军队得到了供养；军需的运输问题获得了解决；在边疆地区获得了新的农田；最后各垦区所交的地租扩大了政府的财源。从这些好处，人们也可估量屯垦区的衰落所带来的危险，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屯垦区的衰落对中国和它的北方邻居间的关系是极关重要的。

另一项指定为供养军队之用的重要税源是政府向商人出售食盐。盐是由国家垄断的，而且长期以来一向如此。这个制度称为“开中”，始于1369年，作为边疆地区军事屯垦制度的一项辅助措施。有些边区，由于土地贫瘠，出产不了所期望的数量的谷物；这些地方必须由政府来供应。因此，政府和盐商之间订立了合同，规定后者将拨给这些边区的谷物运去，由政府发给这些商人票子——“盐引”，作为这项服务的酬劳。商人拿了这些票子从政府的产盐机关领取食盐，出售给人民。这项交易对商人是有利可图的，许多商人都和政府订立了合同。为了避免将谷物运到边疆地

区去的麻烦,这些商人们想出了如下的办法:他们雇了工人耕种沿这些边疆地区一带的土地,用这些土地的出产来交货,以免从内地把这些产品运去。这个制度称为“商屯”,商人和政府对此都十分满意。这个制度直到弘治朝(1488—1505年)仍盛行不衰。从那时起,商人对盐券须付规定的款额,这当然促使屯垦区衰落。在嘉靖年间(1522—1566年),曾力图对此种情势加以挽救,但是没有成功。

另一个保护帝国边疆地区防御外族和反叛者进攻的方法是:洪武帝曾把他的儿子分置在各省为王,或当将军,并给他们配备了大军,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例如,为了保护帝国防御蒙古人,在蒙古的边界上驻扎了九位王爷,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永乐帝。他们拥有极为重要的军事地位;他们的军队有的达八万人之众;他们的地位仅次于皇帝。但是,他们虽位尊权重,却没有领土。人民是由派来的文官治理的,因此王爷们对这些官员无权管辖。王爷们的薪俸以米支給,他们还得到皇帝的其他赏赐。永乐朝以后,甚至他们的军权也大受限制。永乐帝以武力篡夺了他的侄子的帝位后,认识到一个王子如拥有强大军权能做出什么事来。因此,为了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后代,他限制了这些王爷们的权力。为了弥补边防上的这种损失,他把京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并领导了五次对蒙古人的征伐,以消弭这一危险。

明朝的战时军事力量 中国人有了强有力的军事制度和军队,就能在必要时对蒙古人进行讨伐。在洪武帝统治时期,曾进行了九次讨伐,两次是由后来成为永乐帝的燕王棣进行的。

1368年,忽必烈的后人在中国战败后,逃往他们的家乡蒙古去了。最后的可汗妥欢贴睦尔于1370年死去。中国人对此仍不满足,继续对蒙古人进迫和追逐。蒙古人所受到的损失使忽必烈王朝名声扫地,于是蒙古各部落都恢复自治。第一个否认忽必烈王

朝可汗阿尔贝克的宗主权的是鬼力赤⁴。他于1399年打败并击毙了阿尔贝克，篡夺了对一些其他部落的统治权。

永乐帝除率领了五次对蒙古人的征伐外，还对他们采取了中国人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他承认了鬼力赤征服的成就，以便进一步削弱忽必烈王朝。可是，鬼力赤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不久他又被两个反叛的部落的酋长亚兰部族的阿鲁台⁵和瓦剌部族的一个酋长马哈木⁶打败。他们为了确保自己不受其他蒙古的野心家的统治，向明朝皇帝表示归服。在此期间，阿尔贝克的一个儿子，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本雅失里（梵文的僧名），重建了可汗的大权（1403—1404年）。阿鲁台和本雅失里联合在一起。在永乐帝要和他达成友好谅解的一切企图失败之后，特别是在本雅失里把永乐派去送礼物的使臣处死后，军事冲突便无法避免了。由于一些瓦剌和其他蒙古酋长们害怕新兴的本雅失里的势力，自愿作为中国的藩属，中国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的机会增加了。瓦剌人的最高首领马哈木被封为顺宁王，其他的首领们也都受到永乐帝的敕封。永乐帝这样获致了瓦剌人的中立保证后，就派了丘福大将军征讨本雅失里和他的盟友（1409年秋天）。可是，丘福在鄂努和地区的克鲁伦河下游地带被完全击败。永乐帝接到这个战败的消息后，立即开始准备亲征（1410年）。本雅失里被击败于敖嫩河岸。虽然他向西逃走了，但不久即为马哈木所杀。阿鲁台听到明军开到的消息，就已和本雅失里分手，但也为永乐帝打败。

本雅失里和阿鲁台的战败，巩固了马哈木的地位。这时，他已成为蒙古的事实上的统治者，他利用了本雅失里的儿子答里巴充当傀儡。在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后，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加强了，就改变了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这时，阿鲁台又再度请求永乐的保护，1413年他被封为和宁王。1414年，永乐帝二次亲征蒙古，败瓦剌人于图拉河岸。答里巴、马哈木及他们的同盟者虽得脱逃，但是力

量大为削弱，他们派使至北京请降。

经过这些事情之后，特别是在马哈木死后（1416年），阿鲁台也再度改变了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自1421年起，他成为中国北部的威胁；因此，永乐帝于1422、1423和1424年三次亲征讨伐。虽然取得了局部战果：阿鲁台的同盟者被打败了，其中之一马哈木的儿子和继承人脱欢于1423年被俘（脱欢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地位，被封为忠宁王），但是阿鲁台脱逃了。永乐帝的这些出征，就其主要目的来说，是失败了。永乐帝本人在最后一次出征中死去（1424年）。

迪·荷尔德神甫在描述古代艾康城的废墟时，提到了洪武朝的军事征讨和永乐年间最初几次的出征。迪·荷尔德神甫说⁷：“在北边⁸，约十三里之遙⁹，即有古代艾康城的废墟。这座城是大明¹⁰皇室最初的几位皇帝建造的。由于时运惊人的转变，西鞑鞑人即蒙古鞑子¹¹不但被他们曾统治了这么多年的中国人赶走了，而且在他们自己的乡土上也受到猛烈的进攻，以致在到退无可退之时，不得不决心死守，建造了一些堡垒工事。有些堡垒的废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即令如此，他们仍无法长久抵御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的猛烈攻势，而不得不越过黑龙江。艾康城就在这时候在永乐年间建造的，以便把他们限制在那里。”

永乐帝后来的征伐的结果，可以用迪·荷尔德神甫的话总结如下：“由是可见，他对蒙古人的追击，并没有把他们赶过了克鲁伦河，而只把他们赶出了长城和帝国的真正的界限之外就算了。”¹²

因此，可以看出，洪武帝的征伐和永乐帝最初的几次征伐与永乐帝后来的几次征伐，其间有一种显著的改变。最初的一系列征伐都把蒙古人赶过了黑龙江，而后来的征伐就满足于或不得不只限于不让他们过克鲁伦河而已。

总而言之，永乐帝的旨在消除蒙古人的威胁的战争政策是失

败了，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成果。迪·荷尔德神甫说：¹³“这位皇帝¹⁴也曾出塞三次，出长城之外约二百里格*去追击他们，想要把他们完全歼灭，但是他的宏图失败了，因为他在第三次出征的归途中死去，而未能如愿以偿。”

关于永乐死后那段时期的情况，迪·荷尔德神甫写道：¹⁵“他（永乐）的继承者既不再去干扰他们，于是他们开始又从他们的沙漠向四方散开，而成吉思汗王室的主要王子们，都各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人民，夺得一块地区，形成了各个部落，后来变成许许多多的小朝廷。”

在另一处，他对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¹⁶“看来艾康城曾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因为鞑靼人于二十年后，才重新进入他们的乡土，企图向北部各省实行突然的入侵，来对中国人实行报仇。虽则他们后来被明宣宗¹⁷的庞大军队打败了或者不如说是压倒了，但是他们仍然保有他们的乡土。中国的将军们要么是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一如此巨大的胜利，要么就是不愿意利用这一胜利，来迫使他们再次渡过黑龙江，并重建艾康城。”

外交关系 强大的军事体系和积极进取的表现，使得中国人能在蒙古人之间维持一种均势，并使得蒙古的王公们感到与其跟这样强大的帝国作对，不如投降和请求他们保护，对自己更为有利。就连帖木儿也出于一种提高自己的权势的狡猾的外交动机，承认自己是洪武帝的藩属，这样就取得了中国对他的进一步征服其他部落的认可，虽则他的最终目的却是要灭亡中国。其他蒙古王公也相率效尤。他们都每年遣使到明廷来。这些使节起先是外交性质的，以表示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后来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衰微，他们前来只是为了享受中国朝廷的出名的款待。

* 里格 (League) 一种长度名称，相等于 2.4 至 4.6 哩，随时代和国家而不同，在英语国家约等于 3 哩。——译者

关于蒙古事务的这些比较和平的方面，是由“蒙古衙门”办理的。蒙古衙门后来改为“理藩院”，理藩院是满洲人于1683年在奉天建立的。直到1861年，俄国事务——俄国从北方到中国来，因此也归在“北方蛮族”之列——也由理藩院掌管，不过这个理藩院原来是为处理蒙古和朝鲜事务而设的。至少就俄国事务而言，理藩院后来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所替代。总理衙门是根据上谕成立于1861年1月31日，后来在1901年又改为“外务部”。¹⁸

明代制度的衰落 当防范“北方蛮族”的各项保卫措施都实行得很好的时候，帝国是很安全的。但是，一旦这些保卫措施，特别是“卫所制”开始衰落之后，问题就出现了。《明史》上对这种情况载述如下：“文皇（永乐）北迁，一遵太祖之制，然内臣观兵履霜伊始。洪（1425年）宣（1426—1435年）以后，狃于治平，故未久遂有土木之难（1449年英宗被蒙古人所俘）……宪（1465—1487年）孝（1488—1505年）武（1506—1521年）世（1522—1566年）四朝营制屡更，而威益不振。……驯至末造，尺籍久虚，行伍衰耗，流盗蜂起，海内土崩，宦竖降于关门，禁军溃于城下，而国遂以亡。”¹⁹

“土木之变”就标志着这种衰落的开始。永乐死后，阿鲁台于1434年被喀尔木克*部酋长脱欢打败和杀死，脱欢因此深得中国人的欢心。1439年，脱欢被他的儿子也先所杀，也先继其位，称号虽只是“台吉”，²⁰但却拥有无上大权，合法的可汗脱脱不花的权力日减，比以前更只是拥有徒有其名的主权。喀尔木克部这时发展得十分强大，使中国感到必须一战。也先征服哈密，并扰朝鲜边地。他的一切作为都自称是代表中国而为之的，而且他的力量每增加一分，就要求中国给予报酬和供应，甚至于要求中国的一个公主嫁给他。中国政府最后忍无可忍。1446年，在中国政府拒绝了也

* 中国史书上称为瓦剌。

先的最近的要求之后，他调集了大军，于1449年分多路向中国进攻，占领了从辽东到甘州的关外的领土。明军对这样大的战斗毫无准备，但太监王振不顾所有大臣的劝告，力促他的不幸的君主率领军队去对付这个侵略者。这支仓卒调集、装备不良的军队，在北征途中，由于不知来自何处的虚报诸传，而更陷于混乱。《明史》告诉我们说：“……至宣府，大风雨，复有谏者，振益愾怒。成国公朱勇等白事，咸膝行进。尚书邝埜、王佐忤振意，罚跪草中……”²¹王振后来知道了蒙古人的实际力量，也畏缩了，他劝皇帝回师。但在混乱的撤退中，明军被追上了。他们的水源被敌人切断，他们钻地二十尺也得不到滴水。到这时候，中国军队人心涣散，蒙古人向他们进攻，他们几乎无招架之功。伤亡约近十万之众，王振被杀，皇帝被战胜的敌人当作战俘掳走。但是，也先答应了温和的讲和条件，送回皇帝，并承认自己为他的儿子（即藩属）。大概因为他自己在蒙古的地位不太稳固。

继喀尔木克人之后，又来了东蒙古人，特别在达延汗（中国史册上称为“小王子”）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之后。1497年至1505年间，他对自辽东至西藏的中国领土进行了多次成功的袭击。达延汗的继位人博狄拉赫可汗和他的两个堂兄弟充弼里克和俺答汗（尤其是后者）都是很能干的领袖。同时，明朝更进一步衰落了；在1529年至1570年间，蒙古人多次侵扰中国。中国在蒙古人面前这种衰落不振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军事纪律的进一步败坏。在京城和边疆，太监和官吏们都用兵士充当他们的仆役。兵役的工作被忽视了，军屯和商屯都在没落中，因此军队的粮食供应也无着落了。在嘉靖朝（1522—1566年）的最后二十五年，皇帝沉湎于道教，恶名昭著的严嵩当权，俺答汗带领

了蒙古人就在这时候向中国进攻。1550年，当京城被俺答包围，俺答的军队纵火焚烧四郊的时候，兵部尚书只有五、六万军队可供调遣。这些兵士都不愿出城应战，以至于不得不用武力强迫。出城之后，下令进攻，他们都抗命不前，这使指挥官们大为恐慌。但是，由于俺答不能使蒙古其他诸部就范，他就同中国讲和了(1571年)。²²

1573年，万历帝(1573—1619年)以十岁幼龄登位之后，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张居正掌理国政。在他的励精图治之下，军事纪律有了加强，沿边界的蒙古人再度对明廷表示顺服。但是，这种情况维持不久。各省发生了叛乱，在布苏赫图—京昂等领导下的蒙古人又卷土重来进犯(1592年)²³。同时在北疆上满族日益强大。甚至在明朝灭亡之前，许多蒙古部落都已转向满族效顺。

所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明朝初期中国的力量虽大有起色，但终未能根本改变长城以北的蒙古局势。明代的皇帝和将军固然曾出征塞外，但是这些出征从来没有做到征服，因为蒙古人始终是独立的。从这些出征战役的情况和结果来看，可以这样说，它们只是支持了蒙古的一个部落来反对其他的部落，而不是真正的入侵。蒙古人之被逐出中国，首先大部分是由于皇位继承的纷争，这些纷争继续了三个世纪，结果使满族得露头角。明朝远远未能做到粉碎蒙古的力量，所以中国仍多次遭到蒙古人新的入侵的威胁。

在满洲，中国的直接统治力量只及于“柳条边”之内的地区。在这一带，中国人已定居下来数百年了，不过他们不时受到蛮族征服者的统治。明代中国对北方的通古斯各部族采取了给某些酋长

们以封号和金帛的补助并支持他们去对付可能成为劲敌的其他部族的老办法。这些受到补助的酋长们就被列为朝贡者。

十七世纪中满族的崛起也证明了在中国这段强盛时期中，蒙古人和其他部族的领土和部族的分立情况，大致保持不变。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和后来对满族的兴起证明是极关重要的变化，都不是由于明朝的干预而发生的。这些变化发生在嫩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在那里外围地区的蒙古人开始和通古斯族结合在一起，这样就建立了后来所称的达呼尔部。另一个变化发生在森林和中央平原交界的吉林省。由于这一合并，出现了通常称为叶赫纳喇的部族。²⁴

清朝的政策²⁵

清朝当权后，在这个已经成为老问题的对付蒙古人的问题中又加入了新的因素。满人自己就是来自北方蛮族地区的，所以他们了解，仅仅继续执行中国的传统政策，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在蒙古维持一种均势局面，是不够的。他们从和蒙古人打交道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还必须对这个地区实行和保持军事的控制。由于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的出现，必须进一步推行这个自古以来已被采用的政策，因为清朝在这里如表现软弱，他们就将招致对更南的地方的侵入。既然满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还不稳固，他们无法同时对付这两个敌人——俄国人和蒙古人——；他们看到聪明的办法是和一个订约，以便专心对付另一个。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们无须另行设计筹划，因为在一切方面都有旧例可循。

满人在他们的崛起中，如何亲身和蒙古人结识，如何对付俄国人，这就是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满族势力的崛起 满族势力的崛起，开始是由一些分布很广

的、属于同一血统的部族溶合在一起。这些部族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差别很大,从象“老满族”那样定居的部族到象“野满族”或“新满族”那样的半游牧民和猎鹿为生的游牧民。叶赫纳喇部反抗满族的统一最为顽强。这时候,满族只是几个可能谋取统治中国的权力的部族之一。蒙古西部和内蒙古的蒙古人之间所进行的战斗,加速了满族势力的兴起。蒙古人中产生了一些杰出的领袖:巴图尔珲台吉²⁶,噶尔丹²⁷,顾实汗²⁸,达赖汗²⁹,林丹汗³⁰。他们是别的蒙古人和任何其他人都征服不了的,因此这些首领之中没有一个能使自己成为全蒙古的统一者。满洲人也没有力量能征服蒙古人,虽然蒙古人之间的相持不下的情况有助于满人去征服中国。居住在东面是满人,西面是察哈尔蒙古人之间的最东边的蒙古人,在和察哈尔蒙古人进行激烈战斗时,努尔哈赤带了满军曾和他们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在这几次战斗中满军获胜。察哈尔部是在噶尔丹的统治下,噶尔丹是忽必烈的后裔,他的野心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蒙古帝国。所以最东部的蒙古人,怕察哈尔部更甚于怕满洲人;他们不愿受噶尔丹的统治,于是就 and 满人联合起来。³¹这个联盟,比满人对蒙古人的几次胜利,对于满族的崛起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在此期间,满人取得了对辽东的控制。这也是靠征服和结盟合用的办法而做到的。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汉人军队,成立了汉旗,从而加强了满人的力量基础,这就帮助他们去征服中国。辽东汉人在这个同盟中的重要性,可从吴三桂³²所起的作用来看。吴三桂在经过谈判后,让满人进入中国,以消灭“流寇”篡位者。吴三桂是辽东人。从他的官阶和地位来看,他必定在满洲既有个人利益,又和在满洲已为满人服务的汉人有私人联系。他显然决定要自己干一番,而不愿在满人、蒙古人和满洲的汉人的区域联盟中,接受那个由于他和满洲间的关系所取得的地位。他的后来的经历

表明，他甚至可能会希望最后排除作为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的满人。但是，无论如何满人对这种可能性已有防备，因为他们虽给他以官爵和权力，但却使他远处在长城边界之外。最后，他感到满人对他的安排不合意，就起来反对清朝，实行造反。

这些就是当满人正准备闯入关内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帝国时，在满洲地区存在着的各种力量。这个地区的蒙古王公们，因为他们和满人早已结盟，并与满洲公主结婚。这种蒙满统治阶级王族之间的亲戚关系，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因此，蒙古人从来不自认为是被征服的臣民，而自认为自由的同盟者。最近在一些古老的蒙古文件中发现了一件 1636 年的文件。根据这一文件，蒙古首领们承认满人的宗主地位，但有这一规定：如果清朝被推翻，在 1636 年以前存在的一切法律都应恢复其效力。³³

在 1644 年左右，满人在降服内蒙古和入侵中国之后，面临着四个问题：(1) 在中国内部，他们必须恢复明朝末年的混乱中遭到破坏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统一；(2) 他们必须维持和扩大他们对长城沿线的军事控制。他们在完成对中国的行政控制中，需要蒙古的军队，但是他们也需要完成他们对内蒙古的军事控制；(3) 蒙古北部和西部诸部族还未被征服，满人特别害怕西部蒙古人会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和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对抗；(4) 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的出现。

这四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因此，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最初几年中，他们极力使明末内战中所荒废的田地恢复耕作。他们还忙于镇压叛乱。北京以北和西北沿长城一带的土地，大都分给参加满人征服中国战争的那些人们。这样就沿着长城建立了一层屏障，保证了边境的蒙古段实际由满人而不由蒙古人控制。为了防止在内蒙古的蒙古人中不致产生一个强大的领袖，满清开始制止产生蒙古部落的那种特有的过程：把它们打散，然后又

把它们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些伟大的领袖并发生征服的事情。在这件事上，满清主要依靠的办法是，在“旗”的制度的形式下，给每个部族，或者毋宁说是给每一个由一个土王统治的部落单位，划定明确的边界。

正当这件工作在进行的时候，噶尔丹领导下的准噶尔的力量在西部以一种惊人的程度发展起来了，而俄国人在西伯利亚的进展在毫无阻拦地进行着。俄国人已经和西部喀尔喀蒙古人发生接触。喀尔喀的汗俄国人称之为阿勒坦汗。由于满人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和喀尔喀的邻居土谢图汗已建立了联系，通过他获致了一个协议，规定所有蒙古各汗每年应向满人象征性地进贡“九白”，即八匹白马，一头白骆驼。这样，受双方拉拢的阿勒坦汗，在1638年便神气活现起来，在双方之间进行挑拨离间。有好几年，他一直忠实遵守他和俄国人之间的协定，维持和俄国人的商业关系。但在1656年，他派了他的一个儿子到北京去，向顺治皇帝进贡。他的另一个儿子洛布德桑突然带领大军进攻俄国的吉尔吉斯人。俄国的城镇托木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库兹涅次克的守军力量很弱。正当它们处在危急中的时候，传来了阿勒坦汗去世的消息。洛布德桑回到奥布萨湖去，以确保自己的继承权。可是洛布德桑的统治为时不久。1661年，在一场他和扎萨克图汗的争吵中，他杀死了后者。接着他被另一个喀尔喀部所打败，在被俘后交给达赖喇嘛看管。1691年张诚神甫在喀尔喀王公会议上遇到了他，他还活着。洛布德桑失败后，重心向更东转移即朝着土谢图汗的领域转移。土谢图汗的兄弟不久之后成为呼图克图，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土谢图艾玛克的威望。

清朝对俄国人的外交 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在蒙古的紧张关系和斗争就不能不有所增加。在北京，顺治帝于1661年死了，他的继位者康熙帝还未成年，摄政的人忙于镇压华南的叛乱。多年

来，满人对付俄国人的唯一的武器就是宣传。他们从来没有一次不要俄国的使节或信使在皇帝面前行叩头礼，我们以后将要说到这些事。所有关于俄国的谕旨，开头总是这句话“鄂罗斯僻处西北”。但是，俄国人却并不是在十分远的地方，因为他们在降服了色楞格斯克地区的布里亚特人之后，正在日益接近土谢图汗的边界。俄国的哥萨克人向着黑龙江推进，而清朝的军队却无力阻止他们。与哥萨克人的供应基地尼布楚进行贸易的蒙古人，对于情况知道得很清楚。土谢图汗正在与扎萨克图汗及他的同盟者噶尔丹进行斗争，他不能孤立无援。他想找一个强大的保护者；他在中国和俄国之间犹豫不决。

1682年，康熙帝打败了华南的反叛者之后，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北方。这里有两个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俄国在黑龙江上的推进。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外蒙的局势而提出的：在外蒙古，各蒙古领袖之间仍纷争不已，同时在西面出现了噶尔丹的威胁，看来噶尔丹和俄国人的关系十分融洽。面临着这些问题，康熙帝决定采取一种各个击破的策略。他要派一支强大的军队去对付俄国人，同时设法用外交来控制外蒙和西蒙的局势，以待对付了俄国人之后，他能专心对付蒙古。所以，在康熙发动对黑龙江上的俄国人的战役的同一年——1682年，一个中国使团带着丰盛的礼物被派到喀尔喀部去。这个使团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至今不明，因为这时对蒙古的外交活动由于战事而不为人所注意。看来除在土谢图汗和扎萨克图汗之间促成他们的和解外——为此康熙还曾力图获得达赖喇嘛的调停，一定也订立了某种有关俄国人的协议。事实上，《清实录》透露了，负有完成对黑龙江上的俄国人的经济封锁以切断他们的供应的任务的清朝官员玛喇，建议蒙古人和尼布楚的贸易应予停止。“臣请敕喀尔喀彻臣汗收其所部附近尼布潮者，兼禁止贸易。”皇帝命令将玛喇的报告转给蒙古诸汗知悉。

由于同样原因，康熙召集了 1686 年的会议，希望促成喀尔喀部诸汗之间的和解。但是，康熙帝知道噶尔丹和准噶尔部有意利用喀尔喀人之间的不团结，不得不把他的政策倒转过来。现在他想以外交手段来解决和俄国人的冲突，准备用他的军队来对付准噶尔的威胁。这样，就在 1688 年开始了和俄国人的谈判，并选定色楞格斯克为双方代表会议地点。

1688 年，在即将和俄国人举行会议的前夕，康熙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去库伦。^{*}中国史册述这一次库伦会议如下：“以我军经行喀尔喀之地，恐惊其众，差阿喇尼往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处，令晓谕喀尔喀等照常安居贸易。”³⁴

看来不大可能理藩院的首长竟会穿越戈壁，去办一桩这样简单的事。马耶尔的解释似乎更近情理。他说，1688 年在喀尔喀诸王的会议上，有人建议各王应接受俄国的保护。由于各王之间意见不一，他们去见呼图克图。呼图克图表示反对这个计划。他肯定认为，如果那样，“黄教”（即喇嘛教）是不会得到保护的。喀尔喀人因此决定接受中国的保护。呼图克图的话决定了这个问题，而阿喇尼就是被派到呼图克图那里去的。

虽然俄国人这时在喀尔喀也很活跃，中国的外交家却比他们更为成功。土谢图汗听说戈洛文的全部军队只有五百士兵，就派了一支四千人的蒙古军队，由他的兄弟巴图尔指挥，去对付俄国人。蒙古人带着中国人供给他们的步枪和火炮。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都被包围了，戈洛文的处境日益危急。这时巴图尔突然撤围，带领军队赶回蒙古，因为噶尔丹已在那里开始了出名的对喀尔喀的入侵。

1688 年，土谢图汗因为扎萨克图汗的军队联合了噶尔丹的军

^{*} 《朔方备乘》《喀尔喀内属述略》记载，阿喇尼于康熙二十五年奉派前往库伦。据此应为 1686 年而不是 1688 年。——译者

队而把扎萨克图汗杀了；他又杀了噶尔丹的兄弟因为他从事抢掠。噶尔丹迅速出动他的军队来报复。这次入侵发生在正当中国代表团去往色楞格斯克（最初选定的中俄谈判地点）的途中。中国代表料想由于喀尔喀人所造成的麻烦，戈洛文的处境当是危急和困难的。而现在他们自己反倒因准噶尔的侵入喀尔喀，被迫折返。喀尔喀诸王联合一致在一个称为敖鲁龟的地方向噶尔丹挑战。在一场进行了三天的恶战之后，噶尔丹得胜了。他的对手都纷纷逃奔，有的向南逃往内蒙，有的向北逃入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土谢图汗和他的兄弟呼图克图，经康熙帝准许，在内蒙古避难。与此同时，噶尔丹向东推进到了克鲁伦河，要求将这两个人交出作为与喀尔喀人议和的条件。由于康熙帝已收留这两个逃亡者为他的臣民，他拒绝把他们交出，但是他承认他们对发动战争是负有责任的。

逃到外贝加尔的喀尔喀蒙古人，不知道在色楞格斯克，后来在尼布楚即将开始谈判，向已经到达色楞格斯克的俄国代表戈洛文进攻。这是对多年来俄国人对蒙古人及其他西伯利亚的部族——例如和喀尔喀人在种族关系上、文化上和宗教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布里亚特人——的残暴敌对行为的自发的报复。戈洛文从色楞格斯克突围出来；六个月之后，经过相当的军事准备后，在色楞格河的一个支流启儿活河的岸上，向蒙古人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把他们打败了，并迫使他们在1689年3月12日签订的一项条约中，承认了俄国的宗主地位。

这就是当双方最后在尼布楚会面时，促使他们更为和好的政治、外交的形势和气氛。康熙帝之急于和俄国人订立和约，是可以理解的。他之所以要和俄国人缔结和约，一部分是由于希望俄国人不去帮助过去和他们有过贸易和外交关系的噶尔丹。在此期间，皇帝请达赖喇嘛和他一起再召开一次和平会议，试图解决喀尔喀

人和噶尔丹之间的纷争。但是，这位喇嘛在 1682 年已经死了，不过第巴（世俗的执政官）把他的死一直保守秘密。康熙帝要赢得时间，以便完成平定整个蒙古。喀尔喀人实际上在各方面都已经承认中国的宗主地位，所以，须加以提防的只剩下厄鲁特蒙古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康熙帝在和俄国缔结和约的同时，还要解决蒙古边界问题的理由。可是，在尼布楚，中国人仅仅取得了对东蒙边界的划定。俄国人还要拖延。如果在这个时候，当中国代表团的耶稣会教士顾问有着能保卫中国利益的地理知识和影响的时候，就把两国间的边界划定了，那么此后的中俄外交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

从这个简短扼要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甚至清朝的力量扩张到蒙古境内，也不是单靠征服来做到的。他们依靠了中国人的老办法来保持他们的控制权和一种均势的局面。他们在内蒙古靠了结盟和军事的胜利已建立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就利用他们在内蒙古的地位作为基础，由此而把他们的统治权推入外蒙古。满人在外蒙古就是以支持喀尔喀人反对厄鲁特人的办法而把他们的权力伸展到那个地区去的。此后，又借支持厄鲁特人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而完成了他们的扩张，取得了对新疆的控制权。

所以，明清两朝极其关心北方地区，这是很明显的。

注 释

1 关于中国的传统态度，参阅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Lattimore: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第 15—16、54—58 页；魏特福杰尔与冯家昇（译音）：《辽代中国社会史》（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Liao*），第 24—25 页；杨联陞：《中国历史专题》（Yang Lien-Sheng: *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第 1 页。

2 关于这个问题，最好的研究作品是拉铁摩尔前书和他的其他著作。

3 详细的资料，参阅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第 1 卷；布伦纳与哈杰斯特鲁姆：《当前中国的政治机构》（Brunnert and Hagelstrom: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荷尔德:《中国通史》(1736年英译本 Hald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第4卷; 弗兰克:《永乐帝对蒙古的远征》(W. Franke: *Yunglo's Mongolei Feldzüge*)载《汉学论丛》(*Sinologische Arbeiten*), 第3期(1945年), 第1—54页; 福克斯:《康熙朝耶稣会地图》(W.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shi-Zeit*); 格鲁赛:前书,《明史》九十(第11册);《明史稿》(敬慎堂版)八十六,(第22册); 里格:《明代财政农业史 1368—1643年》(Rieger: *Zur Finanz und Agrargeschichte der Ming Dynastie 1368—1643*), 载《中国》(*Sinica*), 第12期(1937年), 第130—143, 235—252页; 清水泰次:《中国近世社会经济史》。

4 据格鲁赛:前书,鬼力赤是吉尔吉斯人;据巴索尔德:前书,他是卫拉特人;据古朗:《十七、十八世纪的中亚》(*Courant: L'Asie Central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第11页,他是土尔扈特部的一个酋长。

5 弗兰克:前书,第4页;格鲁赛:前书,第581页;巴索尔德:前书,第1卷,第144页。

6 参阅第一章注12。

7 荷尔德:前书,第4卷,第111—112页。

8 在黑龙江之北岸。

9 即离黑龙江城十三里。

10 “大明”指明朝。

11 西鞑靼人,即“西鞑子”或“蒙古鞑子”。关于他们分支的详细情况,参阅荷尔德:前书,第4卷,第139、150页。当时耶稣会士和俄国的报告,都把乌拉尔—阿尔泰民族的土耳其和蒙古支系称为鞑靼人。“鞑靼”的名称是中世纪传下来的。参阅第一章,注7。

12 荷尔德:前书,第4卷,第139、150页。

13 荷尔德:前书,第145—146页。

14 指永乐帝。

15 荷尔德:前书,第4卷,第145—146页。

16 荷尔德:前书,第4卷,第111—112页。

17 宣帝(1426—1435年)。

18 布伦纳与哈杰斯特鲁姆:前书。

19 《明史》,八十九(第11册),第1页。

20 意为“贵族”。

21 《明史》,三百〇四(第36册),第4页。

22 塞柔斯:《达延汗后裔世系表》(Serruys: *Genealogical Tables of the Descendants of Dayanqan*), 第89, 103, 107, 116, 120—121页。

23 萨冈·彻辰:《额尔德尼·因·托卜赤—蒙古编年史》(即《蒙古源流》), 田清波写的“导论”, 柯立甫刊本, 第一编, 页8—9。(Sarang Sečen [Critical Introduction by Mostaert, Edit. Cleaves], *Erdeni-yin Tobči Mongolian Chronicle*, Part I.)。

24 拉铁摩尔:前书,第50—51页。

25 除注 1 和 3 中所举的著作外,参阅班提什—卡门斯基:《俄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间外交问题汇编, 1619—1792》(俄文版 Bantysh-Kamensky: *Collection of Diplomatic Matters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from 1619—1792*), 第 55 页;《康熙实录》115,第 20 页(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1684 年 7 月 1 日)及 134,第 3 页(二十七年三月三日——1688 年 4 月 3 日);拉铁摩尔:《中国在亚洲内陆的边疆》(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第 132—133 页;马雅:《中国政府》(W. F. May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平定罗刹方略》(见《朔方备乘》,第 1 卷);《东华录》(顺治朝,制度,第 25 节)。

26 巴图尔琿台吉是准噶尔部的一个酋长。

27 噶尔丹是巴图尔琿台吉的儿子。

28 顾实汗属蒙古和硕特部。

29 达赖汗是顾实汗的孙子。

30 林丹汗属蒙古察哈尔部。

31 关于林丹汗要统一蒙古的企图,参阅萨冈·彻辰:前书,第 16—19 页;塞柔斯:前书,第 20, 26—27 页;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第 58—59 页。

32 亨梅尔:前书,第 2 卷,第 877—880 页。

33 拉铁摩尔:前书,第 60—61 页。

34 《康熙实录》,134,第 3 页(二十七年三月三日——1688 年 4 月 3 日)。

第三章 1689 年以前中俄 之间的使节和军事行动

我们已经看到中俄两国怎样在亚洲西北部建立了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现在我们可以来研究这两大帝国最初间接地通过蒙古人，然后在黑龙江地区开始面对面地发生实际接触和继续发生接触的情况。这些接触在有可能使用外交手段时，就是外交的；在必须使用军事手段时，就是军事的。

中俄之间的间接接触¹

关于哥萨克人的最早的记述，现在没有俄文本；在俄国档案中，也没有记载。这些记录内容的保全，应归功于艾萨克·马沙。这位意大利血统的荷兰人，于 1587 年出生于哈勒姆，在 1600 年左右被派往莫斯科。他在俄国呆了八年，学习丝业，后来又作为荷兰议会的代表，回到俄国，来来往往先后有好几年。在他的著作《鞑靼萨莫耶德地方志》（阿姆斯特丹，1612 年），马沙写了一章关于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旱路和水路情况的“简短报道”。在那一章中，他描写了俄国人如何从俄国去到叶尼塞河及以东的地方。在这篇报告中初次提到了中国。

在布里亚特、吉尔吉斯和通古斯民族的后方，俄国人遇到了喀尔喀血统和厄鲁特血统的蒙古人。从他们那里，俄国人得知，在这些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的后面，有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文化的稳固的大帝国。这一情况在托木斯克长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

奇·伏林斯基 1608 年送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了出来。这样,俄国扩张的界限就开始出现了;从此以后,必须考虑到中华帝国的存在,而蒙古人就成为建立中俄之间最早的接触的桥梁。在十七世纪上半叶,俄国接连派出了使节到蒙古去。

1616 年托米尔科·彼特罗夫和伊凡·库尼津被派出使到喀尔木克部的台吉那里。同年,又派瓦西里·图美涅次和伊凡·彼特罗夫到西喀尔喀的阿勒坦汗处。1617 年派遣了伊凡·萨韦列夫到喀尔木克部。1634—1635 年,派了雅可夫·图哈切夫斯基出使到阿勒坦汗处。我们知道格雷察宁在 1636—1637 年间也在阿勒坦汗的营里。1638—1640 年,瓦西里·斯塔可夫和斯蒂芬·聂韦罗夫来到了这个阿勒坦汗处。1649 年扎巴洛茨基带领了一个使团来到喀尔喀部的车臣汗处。

这些蒙古王爷们,对沙皇的使节每每表示服从,答应帮助沙皇去反对他的敌人,并且答应缴付贡税。但是,他们同样也时常带着他们的武装队伍侵入俄国领土,威胁它的藩属和它的各处堡垒。这些反复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和蒙古人间关系的变化。这些蒙古汗在对莫斯科答应效忠的同时,有时是北京的同盟者,有时是北京的敌人。

直接接触的建立²

俄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次外交使节 派往蒙古人处去的这些使节的报告,增加了俄国对中国的知识。1618—1619 年,托波尔斯克长官伊凡·西蒙诺维奇·库拉金亲王派了伊凡·佩特林和昂德鲁什卡·蒙多夫去中国。他们取道蒙古沙漠和张家口到达了北京。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带来礼物,不能见到万历皇帝。于是,给了他们一封信³,把他们打发走了。这封信的摘要现在仍保存在莫斯

科的档案里。这次使团的报告，说中国盛产金、银、玉、丝，引起了很大轰动。万历帝的这封信虽有一些中国皇帝不可能和不会说的话，但使人们对两大帝国所抱有的不同目的能有所了解。莫斯科热切希望，如果它不能象对其他亚洲地区那样征收贡税来剥削中国，能从中国获得贸易的权利。俄国在对中国的关系中所抱的目的，是国家管制的贸易。另一方面，中国却从恰恰相反的观点看待它和这些北方蛮族的关系——俄国人来自北方也被看作是“北狄”。它所关心的不是贸易，因为那只是私人的事情，而是政治上的臣服和对中国宗主地位的承认。正如万历帝的信中所说，中国的商人不惯于到国外去贸易，中国的使臣们也不惯于到外国去。到中国来的使臣就是贡使，而中国则不对任何人进贡。外国使臣带了贡物，才准许他们来。斐特林和蒙多夫因为没有带贡物来，所以拿了一封信就被遣送回去了。那封信告诉俄国人，中国所感兴趣的只是贡物和贡物所代表的政治上的臣服。

这次出使似乎还起了一种作用，它首次给了中国人一些有关俄国的具体知识。

最初的军事交锋 我们在前两章中已看到，俄国人在叶尼塞河流域遇到了通古斯人的一些反抗，在贝加尔湖附近遇到了布里亚特蒙古人更强烈的反抗。但是在他们进入黑龙江地区和中国发生接触之前，他们还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顽强的抵抗。黑龙江地区的达呼尔土著居民是归服中国并向中国皇帝纳贡的。这时候，俄国人已在外兴安岭以北的河谷中定居下来。那里的气候严寒，土地不生产东西。随着俄国人的增加，粮食的供应成为严重的问题。据报道，这些大山的南边的平原，气候温暖，盛产粮食。雅库次克长官彼得·彼特罗维奇·戈洛文深为这些报道所打动，于是决定派一个远征队去探查这个地区。

在俄国人所率领的最初的几次远征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前

面已看到的，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所率领的远征，满人正忙于征服中国，对于边境的骚扰很少或者没有给以注意。但是，当帝国渐渐稳固之后，北京朝廷开始采取激烈措施来对付俄国人。顺治九年（1652年），中国朝廷命令宁古塔章京海色进攻俄人。俄国人虽获得胜利，但受到了阻遏，1652年4月开始向黑龙江上游撤退。哈巴罗夫为斯捷帕诺夫所代替。斯捷帕诺夫在上溯松花江时，遇到满兵三千。他向满兵进攻，并把他们打败了，但是他被迫退到库马拉河口，在那里建立一座城堡称为库马斯克（中国人称为和玛）。在明安达礼率领下的一支满军跟踪而来，并于1655年3月围攻这座新城堡。满军轰击了三个星期，最后由于缺粮而撤退。但在同时，他们命令当地土著弃家毁田，迁入内地。1658年春，斯捷帕诺夫再顺黑龙江而下，在松花江口遇到沙尔虎达率领的四十五艘武装驳船组成的舰队。他的部下有些人弃阵而逃，有一些和斯捷帕诺夫一起在接战中阵亡，只有四十七个人得以脱逃。

继续的关系⁴

新的外交使节 当黑龙江上发生这件事的时候，莫斯科又派出了两次使节到北京去⁵。第一次使节代表西奥多·伊萨可维奇·巴伊科夫⁶是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亲自任命的。巴伊科夫于1654年2月2日接到正式训令，11日奉到致中国皇帝的信一件。他所接到的训令要他亲自递交这封信，拒绝叩头或作任何可能包含沙皇的地位低于中国皇帝的意思的行为，保证欢迎任何中国使臣或商人到莫斯科来，密探中国的军事实力和进入中国的所有路线，熟悉中国接待使臣的礼节，获取关于中国的习俗、人民、财政情况和经济富源的情报。巴伊科夫奉到这些指示后，立即派塞特库尔·阿布林去北京通知他将到来。中国人把这个先遣代表

误当作是大使，因为《东华全录》上说，1654年一位俄国使臣到达北京，但因既未带信件，也未带礼物，朝廷未予接见。巴伊科夫走的路线是通过甘肃，他于1656年3月3日到达北京。理藩院派官员去迎接，并要求他立即向皇帝呈献“贡物”。但是，巴伊科夫回答说，按照西方的惯例，皇帝必须首先接见来使，使臣于被接见时呈递国书，只有在举行了这番仪式之后，才进呈礼物。这些官员们说，这虽是俄国的惯例，但不是中国的规矩，于是他们就用强力夺取了礼物。过了两天，他们又来要国书，但是巴伊科夫拒绝了。他说，他是沙皇派来见中国皇帝的，所以他不愿和这些官员们打交道。8月12日，俄使被邀携带着沙皇的信到部里去，在那里要教他如何在皇帝面前叩头。巴伊科夫拒绝了，于是官员们警告他说，如果继续违抗圣旨，皇帝将下令杀他的头。可是，巴伊科夫不为所动。他说：“纵令皇帝要下令将我肢解，我也决不到部里去……也决不将沙皇的御书交给你们。”这个答复激怒了中国的宫廷。于是将礼物退还，并下令着巴伊科夫离开北京。这样，这次来使便一无结果。巴伊科夫回到俄国，于1658年7月19日到达莫斯科。

在巴伊科夫回到莫斯科之前，沙皇听从了阿布林的建议，另派伊凡·波菲利耶夫出使中国。1658年2月，波菲利耶夫和阿布林启程来华，于1660年5月到达北京。但是，中国朝廷认为沙皇来信语多不恭，将俄使遣回。

新的军事冲突 俄国人在被中国人击败和斯捷帕诺夫于1658年死去之后，放弃了黑龙江下游。不过，到1665年，他们又在那里安顿下来。

1652年，叶尼塞斯克长官巴什可夫命令他的一些部下考察石勒喀河地区，以便在黑龙江上游建立一个据点。然后，他向莫斯科政府建议，在石勒喀河上建立一个城镇，以更便于降服周围的地区。他的建议得到批准。1656年他带了五百人离开叶尼塞斯克，

在涅尔查河口建立了一所城堡，后来称为涅尔琴斯克。

1665年一个波兰流亡者尼基福·罗曼诺夫·车尼哥夫斯基，因杀害了伊利姆斯克长官奥布科夫为官厅所通缉，同八十四个逃犯逃到了黑龙江地区，在黑龙江的北岸建造了阿尔巴津城堡。这些人继续扩张他们的领地，建造了一连串的城堡。他们还向达呼尔人勒索贡物。1669年，他们请求沙皇撤销他们的罪名，表示愿意服从沙皇的统治。沙皇于是赦免了他们过去的罪。

俄国人的再度出现于黑龙江上，立即引起了中国的注意。不但如此，根特木尔⁷的国籍问题又是火上加油。根特木尔是通古斯族的一个土王，曾在涅尔查河地区定居。俄国人来到这个地区时，他不甘心作俄国人的臣属，带了他的部族的人撤退到额尔古纳河的右岸去了。1655年，他参加了在库马斯克对俄国人作战的战役，但是1666—1667年，他又背弃了中国，投降俄国。中国朝廷坚持根特木尔是中国的逃犯，要求引渡，但俄国人拒绝了这个要求。根特木尔的国籍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就在于：他倾向于哪一边就会大大影响附近的通古斯各部族的态度。

米洛瓦诺夫的出使⁸ 由于俄国人一再侵扰黑龙江地区，他们又拒绝将根特木尔交出来，康熙帝于1670年发出最后通牒。尼布楚长官丹尼尔·阿尔钦斯基在接到这个最后通牒后，派了一个名叫伊格纳提·米洛瓦诺夫的目不识丁的哥萨克人带了一件对抗的最后通牒书到北京去，要求康熙皇帝承认俄国为宗主国。

这后一文件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把一切国家都看作是皇帝朝贡国。象中国宫廷这样自高自大的宫廷怎么会泰然收下一个召降书呢？从尼古赖出使中国后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解释是礼部侍郎玛喇在讲到关于康熙帝前致阿尔钦斯基的最后通牒事时，通过南怀仁神甫说给他听的。玛喇说：“……在过去，当巴伊科夫、阿

布林和达鲁廷⁹及其他人等来到这里时，正是哥萨克人在黑龙江上下游弋，劫掠我国臣民的时候。我们和巴伊科夫谈到此事，向他埋怨说，一方面哥萨克人在制造战争，一方面他却以大使身份前来。他回答说，哥萨克人只是匪徒，他们不是奉沙皇的命令行事的。因此我们称他们为‘罗刹’¹⁰，意思就是强盗，并且奉博第汗¹¹之命，从这里派了军队对他们实行水陆进攻，把他们全部歼灭。在此以后，可汗的一个臣民根特木尔率其部族逃往尼布楚。皇上在得悉这群匪徒已在石勒喀河上的尼布楚立足，就命令我（这位侍郎¹²，当时只是一个笔帖式¹³）带领六千人和十门炮，去讨伐他们。于是，我和纳盖一帖木儿¹⁴调集了六千军队和十门炮，自北京出发到璦恩，然后从那里到尼布楚。我们派了一个达呼尔农民先去见根特木尔，以查明他藏身于什么样的人之处。根特木尔把那个人带到阿尔钦斯基长官那里。他和根特木尔都对这个送信人说，（在尼布楚的）他们不是“罗刹”，而是俄国白人大皇帝¹⁵的臣民。他们奉俄国大皇帝之命，在尼布楚和雅克萨建造了两座堡垒。又说，沙皇希望和博第汗亲爱友好地相处，在两国之间应建立贸易。于是，这个农民回来了，在离开尼布楚不到两天的路程上的温达河上会到了我和我的军队。当我听说这些人不是匪徒，而是白人沙皇的臣民，而且他们以友好的方式遣返了这个送信人，我就派人向博第汗报告，建议与其和这些人作战，不如维持和平，因为他们自称是沙皇的臣民，服从他的命令，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行如土匪。博第汗于是命令我……派人到尼布楚去，从那里找一个哥萨克人来，以便皇上能派他去传送一封信给沙皇，以明究竟。因此，他们从尼布楚派了十个人来。我把他们……带到（北京），引见于博第汗。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沙皇，不但为了根特木尔的事，而且尤其为了要查明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效忠于哪位君主……”。

但是，如果米洛瓦诺夫是被邀请到北京来领取一封给沙皇的

信的，那么赋予他此行向中国皇帝提出俄国愿予以保护的使命这个主意是从何而来的呢？阿尔钦斯基长官在这件事上的作为，莫斯科事先并无所知。莫斯科从他的报告中得悉了这件事之后，将他撤职。从这位倒霉的长官的报告中看得出，他完全知道他是逾越自己的权力范围的，因为他无权在沒有奉到莫斯科的训令的情况下和中国办外交。不过，康熙帝通过宁古塔章京发出的最后通牒，以及关于派人到北京领取一封给沙皇的信的请求，对他来说都是突如其来。他不敢拒绝这个请求，因为他知道中国军队就在离开尼布楚不远的地方；另一方面，他要有莫斯科的授权作为自己的依据，如他自己所说，要按照沙皇的谕旨办事。而他手中唯一似乎给予他这种特权的文件，是沙皇给阿尔钦斯基的前任巴什科夫长官的一道老训令。在这一套训令中，除其他的内容外，有对达呼尔、女真和奇勒尔等部族的酋长们应讲的话。阿尔钦斯基长官既无其他正式训令，于是就毫不迟疑地将这些讲话的内容插入给米洛瓦诺夫的指示中去，作为他对中国皇帝应说的话。因此产生了1670年的这个奇特的文件，要求中国皇帝接受俄国为宗主国。

但是，这个奇怪的文件并不反映莫斯科对中国的政策，也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的結果，而只是尼布楚长官所干的一件大错事。为什么阿尔钦斯基的错误沒有为米洛瓦诺夫产生麻烦的后果，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昭代丛书》里可以找到。在《昭代丛书》中有张玉书写的《外国记》，其中有一段说：“（康熙）九年四月，俄罗斯遣使奉表投诚。表文字尽不可识，字体自下而上，类道家符篆。因召其来使译文以进。”

因此，一定是米洛瓦诺夫考虑周到，编造了一个译本，不但把这个危险的一段删去了，而且把全文变成为一个“表”，作为归顺的表示上呈。米洛瓦诺夫一定是具有办外交的机敏的。看来他的才干很快得到赏识，因为此后各次的使团中都一再使用了他。1676

年他被派在尼古赖的使团里，在尼古赖之先到北京去宣布大使的到来；后来带着大使给沙皇的第一次报告回到莫斯科去的也是他。

这里，我们对以后发生的事情可先提一笔。阿尔钦斯基的错误似乎后来终于使俄国人受到影响，看来这就是尼古赖出使时中国人的态度突然改变的原因。

尼古赖的出使¹⁶ 米洛瓦诺夫传递的康熙帝的信到达莫斯科后，俄国朝廷决定派另一使团到北京去。1675年2月20日，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任命尼古赖·加弗里洛维奇·斯帕法里为赴中国的使节。他奉命考察此后两国之间能否友好和平交往，并寻找到中国去的最短而且最安全的路线。尼古赖于1676年5月15日到达北京。北京的清廷官员们设法要说服他将国书和礼品送交理藩院。但是，尼古赖断然加以拒绝。最后准许他亲自向康熙帝呈递国书。6月8日，尼古赖在回答理藩院的一个官员问他有没有要预先口头传达的话时，提出了他所奉到的训令十二款的摘要：(1)所有过去以中国文字写给俄国朝廷的信都应译出；(2)今后来往信件应商定用一种文字；(3)关于使用沙皇和中国皇帝的名字和尊号，彼此应有一个协议，应按照商定的标准书信格式；(4)中国皇帝应派一位大使至俄国；(5)应允许中俄两国商人在彼此国内自由行动；(6)如有俄国俘虏，应予释放；(7)中国每年应以价值四万卢布的银子送往俄国交换俄国的货物；(8)如中国有宝石，同样也可用以交换货物；(9)俄国可借用中国造桥工匠；(10)允许俄国在中国购办货物，中国对此项货物不得征收关税；(11)将最方便的路线——最好是水路——用图画出，货物即由此途径载运；(12)最后，对这些条款应本相互尊敬和友好的态度予以接受。

6月14日，理藩院通知尼古赖，第二天皇帝将予接见，但他须照中国习俗叩头。这件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于是觐见之事延期了。最后取消了叩头，6月19日皇帝接见了尼古赖。在接见时，

只是问了一些关于沙皇和大使本人的话。8月13日，中国人要尼古赖代表沙皇领受皇帝的礼物，他们告诉尼古赖必须跪着领收，尼古赖拒绝了。8月29日，康熙帝在谕旨中宣告，因为尼古赖抗不从命，而且因为回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引渡根特木尔，而以前同样的要求既被置之不理，这个要求看来也是徒劳的，因此他对沙皇的信将不作复。

理藩院还通知尼古赖，今后只有遵守下列三个条件，中国朝廷才接受俄国的来使、来信或商人：根特木尔必须引渡，并由一位使臣伴送来京；俄国使臣必须是一位愿意遵从中国宫廷要求的通情达理的人；沿边的俄人应停止扰乱治安。但是，尼古赖请求给沙皇一封信，他说否则他不敢回国去。他既得不到清廷的信，于是就由南怀仁写了一封信给沙皇，打算作为对俄使完成其使命的情况的证明书。这似乎是当时俄国宫廷的惯例，因为巴伊科夫在同样的处境下也曾请当时在北京的荷兰使团写了一封同样的信。第二天，清廷在给尼古赖的一封信中，又加了三项条件，按照这三项条件，俄国就得承认它自己低于中国和它是中国的藩属的地位。9月18日，清廷决定要尼古赖离开北京。尼古赖在回莫斯科途中途经尼布楚，他按照中国的要求力图劝说该地和雅克萨的俄国人，在黑龙江沿岸不要再从事任何强暴行为。

最后的交锋

到这时候，康熙帝认识到，单凭外交不能阻止俄国人侵略黑龙江地区，必须以武力来强迫他们。但是，由于中国正忙于应付华南局势，这个局势已演成为“三藩之乱”（1673—1680年），所以至少一直到1681年，没有作征伐的准备。俄国人这时已占领了几乎所有黑龙江的支流，对当地居民施加了各种残酷的剥削。康熙帝充

分估计到俄国人的战斗能力，因此极为仔细地认真地准备全部的征讨事宜。鉴于 1655 年因缺乏给养而未能在库马斯克击败俄国人，所以对这件事以及交通运输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军事准备 1681 年派副都统郎坦和彭春到雅克萨附近详细研究形势并调查自宁古塔至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路。皇帝亲授郎坦指示说：“罗刹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前发兵进讨，未获翦除，历年已久，近闻蔓延益甚……尔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参领侍卫护军外……率科尔沁¹⁷兵百人宁古塔兵八十人，至达呼尔索伦，一面遣人赴尼布楚，谕以捕鹿之故，一面详视陆路近远，沿黑龙江行围，径薄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情形，度罗刹断不敢出战。若以食物来餽，其受而量答之。万一出战，姑勿交锋，但率众引退，朕别有区画。尔等还时，须详视自黑龙江至额苏里舟行水路，及已至额苏里其路直通宁古塔者。”¹⁸

1682 年，又派另一队人去测量辽河水量，同年即利用调查所得结果建造联接辽河和松花江的一条运河。三年之后，在吉林和瑗琿之间设立了十九个兵站。这样，两条交通线，一条水路，一条旱路，都建立起来了。¹⁹

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准备。1680 年，已派了二百五十艘运输船到辽河、伊通河和松花江，为当地军队输送粮食；又另派了一百三十艘运输船至黑龙江。1682 年，在辽河上游设立了粮仓四处。1684—1685 年间，在瑗琿实行了军屯制度；并禁止从满洲运米出口。这些准备在郎坦呈报完成了上述的调查之后康熙帝于 1681 年 12 月下的谕旨中都曾提到。

在 1676 年俄国人恢复其活动后不久，宁古塔将军移至吉林。吉林位于松花江主要的航道，最靠近辽河，在战略上地位更为重要。1683 年，派黑龙江将军驻在瑗琿，瑗琿位于结雅河流入黑龙江之处。中国政府知道，没有舰队不能把俄国人赶走，因此 1676

年在吉林建造了一个海军船坞，制造了许多船，并来自南方各省的流犯中选拔了水兵数万名。

当最后这些准备都已完成后，康熙皇帝仍希望不必经过一场全面战争而能解决这个争端。由于中国人对俄国人的居留地进行了有计划的袭击，到了1683年，黑龙江下游及其支流上已无俄人占领的痕迹，只剩下防务巩固、屯粮充足的雅克萨还待攻占。1683年，康熙派了两个俄国俘虏带了一道谕旨到雅克萨去。在那道谕旨中，又列举了中国所不满的事情（根特木尔和俄国的侵略），并威胁说，如不消除不和的原因，将行进攻。康熙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即发动征讨。1685年6月13日，由陆路和水路分头到来的中国军队，为数在两千至五千人之间，在郎坦的统率下，出现于雅克萨城下。俄国守军在勇猛而富有经验的托尔布辛指挥下，共有四百五十人，有三门炮和三百支枪。副都统彭春发出了一封用满文、俄文和波兰文写的招降书，答应给予最宽大的待遇。没有得到回答，于是15日就开始了袭击。在最初几天之内，俄国人损失了一百人。俄国一位牧师列昂捷夫认为死守无益，请求总督与中国人讲和，自动撤退到尼布楚去。托尔布辛同意了，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军营去商谈投降条件。中国人答应让俄国守军撤离，但是守军中有四十人宁愿向中国人投降。这些人可能是曾经主张投降，害怕遭到报复。中国人于是毁了雅克萨，回到瑗琿去了。

中国人刚撤走，托尔布辛带了一个德国人拜顿所率领的新开到的援军再度进入雅克萨，并在这个城堡重新设防。守军人数共三百三十六人，有大量的给养。俄军重新占领雅克萨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立即又派军出征黑龙江，仍由郎坦指挥。1686年7月7日，中国军队在一支由松花江开下来的舰队的协助下，对雅克萨进行了围攻。俄国人拚死抵御，托尔布辛战死，由拜顿接替。由于坏血病，守军人数减到一百五十人。围城进行了三个多月。²⁰

新的外交措施 当这个第二次战役在进行中的时候，康熙又写了一封信给俄国宫廷，托前来北京的荷兰使节带去。这封信的原文在中国和俄国史书中都无记载。但康熙在给他的的大臣的一道谕旨中，说明了他的理由，这些理由与他以前写给俄国人而一直未得到答复的那些信中所说的一样，就是过去的一些不满之事和雅克萨的情况。康熙还要求作复，派一位使臣送来，或托荷兰人送来。

雅克萨被围的报道，使莫斯科深感到，在黑龙江流域那里的人不象西伯利亚的游牧民那样容易对付。俄国朝廷对远东的地理情况既不了解，无法出师远征；而且它此时又正忙于波罗的海的军事。因此，俄国朝廷准备和中国人谈判，停止黑龙江地区的战斗。1685年11月15日，莫斯科收到了清廷1683年给雅克萨守军的谕旨，这道谕旨表现了一种和解态度。俄国立即行动。到11月26日已经决定马上派一个使团前往中国。第二天，就派出了两位信使尼基福·魏牛高和伊凡·法沃罗夫去北京。他们于1686年9月到达那里，这是在康熙托荷兰使团带给沙皇的信之后几个月。魏牛高和法沃罗夫宣告一位俄国全权代表不久即将到来，请求解除对雅克萨的围攻。康熙帝答应了这个请求，下令围攻的中国军队后退三俄里，以放松对雅克萨的包围圈，但完全解围须待俄国全权使臣到达之后。指示中国军队撤离雅克萨回到瑷珲去的命令于1687年8月到达。俄国的信使带了两封信回去，一封是蒙古文写的，寥寥数语，表示收到了沙皇的来信；另一封用拉丁文写的，日期是1686年11月21日，其中详列中国对俄国人不满的事项。

与此同时，俄国朝廷任命费要多罗·阿列克塞维奇·戈洛文为全权专使²¹和中国代表会谈，并以伊凡·符拉索夫和西蒙·科尔尼次柯伊为他的主要的随员。大约在1686年初发给戈洛文的最初训令中列有商务和政治方面的指示。他奉命提出以黑龙江整

条河流为界；如果这个方案被拒绝了，他应略作让步以黑龙江和比斯特拉河为界；如果这个让步方案也被拒绝了，可以更向北移，以黑龙江及其支流结雅河为界。关于商务的指示特别重要。大使应搜集关于通往中国的水路的资料，请求正式规定两国间的进出口的贸易，并劝告中国皇帝派一使团到莫斯科来。还应要求中国人把他们的丝、宝石和其他货物卖给俄国。又命令他和那些对他的外交任务或能有所帮助的蒙古王公取得联系。

1686年1月26日，戈洛文和他的使团人员带了卫队，离开莫斯科开始长途跋涉。他在西伯利亚各地化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这是第一次派出这样一位高级的官员来考察过去数十年内所兼并的新领土。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他接到了魏牛高和法沃罗夫报道的好消息，说康熙帝得悉俄国的和平意向，已下令解除对雅克萨的围攻。这一初步的成就使戈洛文很高兴。

1687年7月17日莫斯科收到了魏牛高和法沃罗夫转来的康熙的信。但是，俄国政府甚至在收到这些信之前，就已经作出决定：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赢得中国的好感。1687年7月24日，对戈洛文发出了新的秘密训令。他可割让雅克萨，以换得满意的商务关系；他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流血冲突；如果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他应请求准许在适当时候另派一个使团到北京来。看来这两位刚刚回来的俄国代表魏牛高和法沃罗夫起了一部分作用，使他们的政府认识到，这些所谓让步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因为雅克萨是中国领土，而且眼看就将被占领。因此，俄国政府决定赋予戈洛文以新的权力，使他在中国皇帝决定要举行的任何会议中能代表俄国政府行事。这个官方文件的日期是1687年10月29日。戈洛文奉到命令不要离开西伯利亚，先派带给他这些新训令的伊凡·洛吉诺夫前往北京，把这些训令的副本给康熙看，以证明俄国的好意。还指示戈洛文，如有可能，取得呼图克图的帮助，作为中俄之

间的一种外交的联络人。戈洛文自 1686 年底就力图获得呼图克图的好感，但是很少成就。俄国后来的措施也同样没有成功。1687 年戈洛文派了瓦西里·波菲利耶夫带了信件和礼物去到库伦。从 1687 年底到 1688 年初，戈洛文所派的另一个使者斯蒂芬·科罗文也在那里。这一切都没有获得成功。呼图克图对俄国的友好表示心存疑虑。他知道跟俄国人来往过密是会使中国皇帝不高兴的。

当这些长途跋涉在进行中的时候，尼布楚总督兼戈洛文的顾问伊凡·符拉索夫于 1687 年 10 月接到了雅克萨解围和战事已经终止的消息。

戈洛文派往中国的代表科罗文于 1688 年 3 月 14 日到达北京，直到 4 月 17 日才离去。他带回了中国皇帝的一封信，提议以色楞格斯克为拟议中的两国代表会议的地点。中国政府也进行任命它的全权代表。中国代表在离开北京之前，向康熙上了一个奏章，其中包括了他们所建议的同戈洛文议和的条件。奏文如下：“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²²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伦、达呼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额尔古纳）、牛满（比斯特拉）等江，及净溪里江（结雅河），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俄乐春、奇勒尔、毕喇儿等民人及赫真、费雅喀所居之地。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又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划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²³

这个奏章和它的强硬条件经皇帝于 1688 年 5 月 10 日批准。

代表团带了八百名卫队于5月29日自北京出发，取道外蒙古前往色楞格斯克。²⁴

订立和约的这些条件都是以当时的政治形势为基础的。中国在黑龙江上已击败了俄国，它已和喀尔喀人达成协议，喀尔喀人得到了中国人所供应的武器，对戈洛文本人正在进攻。因此，中国人在赴色楞格斯克的途中，料想戈洛文的处境当很困窘，他们满怀获得他们所要求的一切的希望。但是，发生了没有预见到的事情：噶尔丹进攻和侵入了喀尔喀。因此，中国代表团在通知戈洛文之后，被迫折回北京。会议不得不展期到第二年。戈洛文派了他的信使伊凡·洛吉诺夫送他的回信。洛吉诺夫于1689年5月13日到达北京。戈洛文请中国皇帝另行指定会议地点。5月16日，康熙在给俄国信使的信中指定尼布楚为会议地点，并说中国全权代表将于6月中自北京出发。

厄鲁特对喀尔喀的入侵造成了一种新的情势，削弱了中国的有利地位。现在出现了厄鲁特人所追求的俄国和厄鲁特的联盟的危险。因此，对中国来说，至少在他们能够对付厄鲁特的威胁之前，就更需要取得和平的解决。所以，康熙决定赶快促使谈判开始。在代表团第二次离开北京的前夕，康熙发出了如下的指示：“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鄂罗斯，则彼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²⁵

因此，尼布楚会议的召开已诸事具备。中国仍比俄国居于更有利的交涉地位。尼布楚四周的土著是反对俄国人的，而中国代表团带了一万大军前来，就有了以实力为后盾进行谈判的基础。不但如此，俄国的国库因国内的军事开支和经济萧条而枯竭；如能同中国有良好的贸易关系，是会有所裨益的。俄国代表团既有这种想法因而就准备作出让步。

注 释

- 1 详见巴德雷:前书,第2卷,第1—29页;雅可夫列娃:前书,第71—80页。
- 2 巴德雷:前书,第2卷,第1—29页;加恩(里奇译):《早期中俄关系史》(Cahen [transl. Ridge]: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第4—5页;《平定罗刹方略》(载《中华边防舆地丛书》,1903年上海版),第1页;雅可夫列娃:前书,第80—126页。
- 3 此信全文至今没有发现。
- 4 除注1和2中列举的著作外,参阅王先谦:《东华全录》(1898—1900年北京版,共八十八卷)顺治朝,三十四,第8页。
- 5 俄国此时的外交代表可分三类:外交事务官(如佩特林、蒙多夫、巴伊科夫、波菲利耶夫和阿布林);外交使臣(如尼古赖),有时也负有重要使命;大使(戈洛文即具有这种官阶)。参阅加恩:前书,第2页。
- 6 关于巴伊科夫的出使事,参阅《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02f,42r;巴德雷:前书,第2卷,第131—166页;雅可夫列娃:前书,第91—100页。
- 7 亨梅尔:前书,第1卷,第269页。
- 8 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127—144页;雅可夫列娃:前书,第107—110页。
- 9 这是指和阿布林一起伴同巴伊科夫前来的彼得·亚里什金。亚里什金和阿布林先巴伊科夫回到莫斯科。由于阿布林的建议,沙皇派了波菲利耶夫到中国去。参阅雅可夫列娃:前书,第99页。
- 10 关于“罗刹”和“俄罗斯”之间的区别,参阅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135—136页。
- 11 指中国皇帝。荷尔德:前书(英译本),第4卷,第146页上说:“……莫斯科人称满洲人为博克达,他们的首领就是中国皇帝。”
- 12 尼古赖重述玛喇的话。玛喇事实上是礼部侍郎。
- 13 即秘书。
- 14 经查明是1669年的宁古塔章京。参阅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101页。
- 15 俄国沙皇。
- 16 关于尼古赖出使事,最好的研究著作是:毕考:《关于沙皇亚历克赛·米哈伊洛维奇派往中国的大使尼古赖的传略和书目志》(Picot: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Nicolas Spathar Milescu, Ambassadeur du Tsar Alexis Mihajlovic en Chine*),载《东方杂文集》(*Mélanges Orientaux*)(1883年第六次国际会议),第430—492页;巴德雷:前书,第2卷,第204—422页;特别是巴乃台斯哥:《尼古赖》(Panaitescu: *Nicolas Spathar Milescu*),载《法国罗马学院杂文集》(*Mélanges d'École Roumaine en France*),第1页(1925年);又参阅《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02f. 42v;日本—中国,103ff. 179r—180v;和日本—中国,104ff. 302v—304v。
- 17 关于这里所提到的蒙古各部落,参阅附录(一)。
- 18 《清史稿》(郎坦列传)153,第12—13页。(按《清史稿》中这一段话较英译文

为简短。此处系录自《平定罗刹方略》，见《朔方备乘》，卷首五，页二。——译者)

19 《平定罗刹方略》，载前引书第4，21页。

20 关于此次战役的准备情况和战役本身，除上述著作外，参阅《大清会典事例》(1899年版，共一百二十卷)，九三五；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八，第2页；徐宗亮：《黑龙江述略》(见《满蒙丛书》第五卷)，第10页；杜锦：前书，第2编，第1—5页。

21 加恩：前书，第9—12页。关于魏牛高和法沃罗夫出使事，参阅《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05 I ff., 96v—103v。在 ff. 100v—101r 上，关于自俄国至中国的陆上路线，有详细的说明。

22 关于这个部落，参阅附录(一)。

23 《平定罗刹方略》，第27—28页。

24 关于1688年之行，参阅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载《满蒙丛书》第2卷)；钱良择：《出塞记略》(载同上书)；荷尔德：前书(法文原版)，第4卷中的张诚日记。

25 《平定罗刹方略》，第28—29页。

第四章 耶稣会士在早期 中俄关系中的利害关系

耶稣会士的参与¹

耶稣会士之参与早期的中俄外交关系，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历史现象。一小群欧洲人，对俄国和中国来说都是外国人，又是属于在中俄两国如不受迫害也是几乎得不到宽容的一种宗教的传教士，竟会在两大帝国之间极为重要的外交事务上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这的确是一桩有点异乎寻常的事。

这个奇怪的“三方结合”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中国和俄国要找耶稣会士帮忙呢？这些耶稣会士对他们的难以应付的而且有时是很危险的这些职务是怎样想法和怎样去执行呢？

中国当时的史料很少提到耶稣会人员。他们固然在京城是有官职的，然而他们总还是在中国官场的外缘。他们的工作毋宁说是皇帝的教师和私人顾问；皇帝在宫内私下会见他们，或在出行时带他们同行，但是总是设法使他们不太为人所注意。在一般公众的眼里，他们和所有其他西方人一样，总还是“西方的蛮夷”。

俄国史料中的资料略较丰富，但是，在俄国史料中，俄国代表也必须十分谨慎，因为“拉丁派”在宗教中正如在政治中一样是可疑的。在尼布楚会议时，耶稣会士以更为正式的身份办事，因此也较显著地受到公众的注意。

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最丰富的来源是那些耶稣会士自己编的、译的或写的信札、私人回忆录和文件。张诚神甫的日记²，南怀

仁神甫的信札³，连同一些其他零散的文件，都已出版并为汉学家们所利用。这些汉学家们的研究著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说明这些文件能够揭示些什么。所以，现在就有可能初步作出这样的一个论断：这些神甫们以他们的中间人的身份所执行的任务，关系到真正的外交更多于涉及简单的翻译。但是，对这个问题能有所阐明的大部分文件还未发表。这些文件之一，徐日升神甫关于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将在本书中初次发表。但是，其他的文件还得等待以后发表。

由于这种情况，历史学家们对于评价耶稣会士在中俄谈判中的作用的真正性质问题，意见不一，就不足为奇了。有些历史学家低估了他们的贡献，把他们看做是单纯的翻译。另一些历史学家走到另一极端，相信他们是真正的调解人和政治行动的策动者。第三派历史学家，采取中间道路，把耶稣会士的活动和作用，说成是科学的记录者和对中俄两国提供知识的人。按照这类意见，对俄国来说，他们是当汉学几乎还不存在的时候最早的东方专家和汉学家；对中国来说，他们是当中国人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最初的西方专家。

根据这样不完全的证据，有些俄国史学家鉴于俄国后来的成就，认为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外交的失败，而力图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这些耶稣会士的有害的影响和阴谋。⁴这看来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尼布楚俄国的主要谈判人戈洛文，对这些耶稣会士的工作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并答应替他们在沙皇面前说好话。

在中国，耶稣会士对尼布楚条约的贡献，博得了康熙帝第一次发布容许基督徒传教的谕旨。尼布楚条约第一次把仍在流徙中的亚洲广大的各民族分成为两大帝国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利益在这个条约有效的一百五十年内，得到了保障。只是在耶稣会士

和他们的地理知识的影响消失之后，俄国人通过 1858 年的璦琿条约，才达到了兼并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其面积几乎等于法国加上德国）的目的。俄国之所以得到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对于黑龙江以北地区情况可悲的无知。他们知道，这个地区寒冷，不生产东西，只有少数猎人居住。⁵只是在将这地区割让之后，中国政府才认识到它的被荒废的情况。

在 1676 年尼古赖出使期间，耶稣会士第一次积极参与了中俄之间的外交交涉。如我们在前面所已看到，两国的关系已有长期的历史。从两国在 1676 年前已有许多接触这一点来看，很清楚两国都并非绝对需要耶稣会士的帮忙。如果说有一些方便的理由因此需要耶稣会士参与，那么由于他们在中俄两国的地位，他们的参与其事也有很大的不方便。然而，南怀仁神甫却建立了这个奇异的“三方结合”，因为他知道有可能和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实现他的教会最为憧憬的计划之一：越过俄国的领土建立一条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和陆上路线。

但是，耶稣会士为什么要建立一条从欧洲到中国的陆上路线？要对这个谜找到一个说明，我们必须回溯一下很早以前的历史。

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接触和交通路线

希腊罗马时代⁶的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插曲，不是持久性的，也没有深入到表面以下。在罗马人看来，中国就是丝；在地理上，它是在情况不明的世界东端的一个庞大体。罗马人对于发现远离地中海的新土地并无兴趣；他们对远东的知识来自在东方贸易中充当中间人的波斯人和斯基泰人。他们所具有的一点由于地理探险所发现的知识，连同其各种错误，都收集和表现在推罗*的马里努

* 推罗(Tyre)是古代腓尼基文化中心地，即今黎巴嫩的苏尔(Sur)。——译者

斯的地图和托勒密(公元二世纪)的地图上。这些地图就是此后数世纪中西方对远东的知识的依据。罗马帝国倾覆之后,欧洲甚至把罗马古作家所搜集的那一点知识也忘记了。在此期间,东西方间的交通线是陆路的。

景教派 不久一种新的精神势力基督教兴起了,并向东方扩张。⁷635年,僧人阿罗本在中国建立了基督教。⁸这样,东西文化再度会合了。但是,这一细微的联系不久就被切断了。从七世纪起,基督教的敌人伊斯兰教伸入到整个近东,“象一个宽阔的新月,一头伸越直布罗陀海峡到西班牙,另一头越过高加索山把西方国家和远东分开”⁹。在远东的基督教虽和它的西方中心割断了联系,但仍然存在着。蒙古的最老的和最文明的民族维吾尔土耳其人,当他们在八、九世纪中是蒙古的统治民族时,就皈依了摩尼教。他们成为一个定居的民族。但是,这种类型的和平文化在外蒙古不能立足,维吾尔人被迫退到吐鲁番和哈密的绿洲上。在中古时代他们就一直留在那里。但是,他们把他们的文化传统传给了在外蒙古的他们的继承者克烈部和奈曼部。这些部族又对更不开化的蒙古人施加了使他们趋向文明的影响。因此,这个基督教版图的边远领域,在蒙古统治时期,曾有过短短的一段复兴和扩张的时期。这不仅是因为蒙古人对宗教一般采取宽容政策,而且更因为蒙古人决心要消灭伊斯兰教的世俗权力,他们认为这是对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理想的主要障碍。

中世纪¹⁰ 在中世纪,西方国家在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导下结成了一个国际共同体,这个国际共同体不久就从事于反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战役。因此,在西方和蒙古人之间有着接近的共同基础,不久之后就导致双方互派代表。不过,关于蒙古人到达了西方的最早的消息却是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极其出人意料的方面。那就是叙利亚的伊思马因派(Ismailians)(伊斯兰教

的施伊特派)——他们更为人们所熟悉的名称是阿萨辛派 (Assassins)——的使节。他们在 1238 年 (在蒙古人最初两次对俄战役后) 携带了基督教界和回教徒结成大同盟反对共同的敌人蒙古人的方案来见法国和英国国王。他们得到很冷淡的反应。西方在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它的态度就如温契斯特主教对亨利三世所表示的: “让这些狗相互残杀, 彻底被消灭了, 然后将看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起全球的天主教会, 那时将有统一的教堂和统一的牧师。”但是, 尽管如此, 在西方, 人们普遍感到不安; 因为在同一年即 1238 年, 巴黎的马太记载说, 在雅默斯青鱼充斥, 因为德国贩鱼商人由于害怕鞑靼人而待在本国没有出来。在此后的几年内, 关于向西已深入到匈牙利的蒙古人的征战的最近消息, 以及基督教徒和他们的乔治亚和加里西亚的统治者拼死的呼吁, 唤起了西方对局势的严重性的注意。不幸, 这时西方基督教界因腓特烈二世和教廷的战争而分裂。只是由于窝阔台可汗之死 (1241 年 12 月) 和继位之争, 才拯救了西方。拔都汗仍驻军在伏尔加河上。基督教的俄国已成为金帐汗统治下蒙古帝国的一个省份。一旦蒙古内部的继位问题得到解决, 便没有什么可阻止对西方的一场新的进攻。由于这一点和由于认识到有反对伊斯兰教的共同利益, 东西方又恢复了接触; 使节、教士和商人往返于东西方之间。普拉诺·加比尼的高僧约翰和他的同伴波兰人高僧班涅狄克特, 郎久莫的高僧安德鲁, 卢布鲁克的高僧威廉, 波罗一家人, 波尔德诺内的高僧翰朵里, 蒙的考维诺的高僧约翰及他的后继人, 马里格诺利的约翰及其他人等, 都是从西方去到东方的。派到西方去的东方使者为数也很众多。1248 年, 有几个蒙古使者随同派往小亚细亚的土尔内的高僧阿塞林和西蒙来到罗马。他们是可汗派至拜朱的使臣艾尔杰吉台派来的。他们来是为了和西方建立关系。同时, 艾尔杰吉台进行和已出发征讨埃及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建

立友好关系。艾尔杰吉台的使者大维和马克在塞浦路斯会见了路易，并呈递了一封信，信中说可汗愿保护所有基督徒：拉丁的、希腊的、亚美尼亚的和景教的，并且答应帮助他们反抗萨拉森人，收复耶路撒冷。波斯的蒙古汗（伊儿汗）特别把西方的基督教徒看做是他们反对伊斯兰教的同盟者。尽管他们屡次没有合作成，蒙古人仍继续进行同盟的谈判。1274年，波斯汗阿巴哈派使者到里昂会议去参加东西方教会的联合。1277年，他派了六个使臣到英国去，对于当英国国王在巴勒斯坦时未能给予足够的支援表示歉意。最后，在1286年，他的儿子阿鲁浑派出了由拉班·骚马带领的蒙古派至西方的使团中最重要的一个使团。西方当时正致力于西西里之争。虽有爱德华一世的不倦的热诚，也组不成一支十字军。1291年，基督教在巴勒斯坦最后的堡垒阿克陷落。到这时候，阿鲁浑已死，曾以教皇尼古拉四世之名接受洗礼取名为尼古拉的他的儿子完泽笃，变成了一个伊斯兰教徒。所以，在阿鲁浑的时候，东西方之间达到了最密切的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再度被切断了。在中国，蒙古人的权力已衰落，他们已被明朝推翻。明朝建立了严格的边防制度，越来越倾向和外界隔绝。在欧洲，教会的大分裂和大瘟疫，使西方基督教失去了活跃能力。中亚细亚的基督教和景教的东方领地都被帖木儿破坏了。帖木儿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而是一位东方文明的君主，他的宫廷的华丽使克拉维约甚为羡慕。然而，他是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破坏者。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中东使奥斯曼或奥土土耳其人皈依了它，从而获得了新的势力。这时西方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和东方脱离得更远了。从这一阶段的接触中产生的唯一的持久的影响，就是使者、教士和商人们关于震旦（当时人们称中国为震旦）以及关于亚洲有一个在传说的“普来斯特·约翰”国王治理下的基督教国家的报道。这样，对伊斯兰教的继续斗争和

同东方据说存在着的基督教徒结成同盟的可能，把东西方之间这段接触时期和下一段接触时期联结起来。下一段时期的接触全部或局部是靠陆地交通线建立起来的。

葡萄牙人¹¹ 这时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教各国的国王逐渐迫使回教徒后退；1415年，葡萄牙人在约翰一世（大帝）的领导下，攻克了伊斯兰教在非洲毛里塔尼亚最强大的堡垒休达。约翰的一个儿子，亨利亲王别号航海家，使葡萄牙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和一个探险者的国家。正如中世纪的历任教皇和各国君主派遣了高僧出去和蒙古人缔结反伊斯兰教的联盟一样，这位航海家也怀着环绕非洲航行以便和普莱斯特·约翰结成反伊斯兰教的联盟的计划。这位亲王研究了马可波罗，更加强了对他的计划的信心。作为一支强大的十字军军队的基督教会的大君主，他的轻快的帆船越来越向南伸进，在1445年左右，到达了赤道。历任教皇赞助这番努力，宣告所有迄今尚未被占有的领土都是葡萄牙王室不可侵犯的财产，并给予葡萄牙人在这些地方垄断贸易的权利。1460年亨利死后，他的侄子约翰二世继承了这项任务。不久，这一天终于到来，巴索洛缪夫·狄亚斯绕过了非洲的南端，面对着富饶的东方。世界贸易的基础改变了，里斯本代替了威尼斯成为东方贸易的中心。

但是，在葡萄牙巩固它的势力之前，它的对手西班牙在哥伦布的领导下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哥伦布没有如他当初所打算那样发现了亚洲，但是他却发现了美洲。当时人们把美洲当做印度，所以最初称之为西印度。这件事使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这两个国家几乎发生战争，因为葡萄牙认为它的垄断地位受到了损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出面调停。1493年5月4日，他规定了一条分界线，限定了双方的利益范围。第二年，这条线在托得西拉斯条约中又予以修订。由于亚历山大六世的仲裁，在亚速尔岛以西三百七十

哩的地方划定了一条子午线，规定了这条线以西所有土地应属西班牙，以东之地属于葡萄牙。两国都保证在它们的保护地传布基督教，并为当地人民的精神需要建立宗教组织。从这些权利、特权和义务，就产生了西班牙的“国王的教区”和葡萄牙的“宗教保护权”。

葡萄牙这时又作了一番新的努力，以便在裁定给它的领土上建立稳固的统治。继冒险者之后来了征服者。跟在卡布拉尔和狄亚斯之后的是伐斯哥·达·伽马和阿尔方斯·得·阿尔布奎克。1498年3月1日，伐斯哥·达·伽马在莫三鼻给第一次遇到了装载印度货物的阿拉伯船只。5月20日，他的舰队进入印度的加尔各答海港。克服了非洲的阻障，到达了印度，但是还必须保卫这个成就，以抵御当时正是在鼎盛时期的伊斯兰教。在欧洲，伊斯兰教正在沿着多瑙河胜利前进。在非洲，最后剩下的一个基督教国家阿比西尼亚看来就要被回教徒征服。在马拉巴尔海岸上的利润优厚的香料贸易已掌握在阿拉伯商人手中。印度的北部和中部都处在伊斯兰教的信从者大蒙兀儿人统治之下。印度和印度支那的贸易中心马六甲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阿拉伯人通过了埃及的马梅路克苏丹，靠了这项东方贸易而致富，所以他们不愿不经过一番斗争就放弃这项贸易。但是无法阻止葡萄牙人前来。1507年，和东方贸易的两条主要的老路线红海和波斯湾都被封锁了：在索科特拉和霍木兹建立了两个主要的要塞。这两个地方都是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下的。1509年，伊斯兰教徒的舰队被葡萄牙人在第乌击败，伊斯兰教的抵抗主力被粉碎了。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了果阿，果阿成为后来的殖民帝国的首府。1511年，马六甲落入他们的手里，不久以后在特纳底群岛的香料岛建立了一个葡萄牙要塞。1514年，一个贸易队去到中国；第二年，拉斐尔·斐来斯特罗乘了一只中国帆船到达华南。贝雷斯·得·安刺德于1517年沿河

而上驶到广州。1520年，第一个葡萄牙专使托美·比留斯到达北京。1542年，有三个葡萄牙人在海上遇到暴风雨，迷失航程，到达了一个陌生的岛上。这样，就发现了日本。几十年后，伊斯兰的战线被迂迴包抄了，它的后方交通线被割断了。东方再度和西方有了直接的接触。欧洲已经发现了非洲和亚洲。

为了忠实于历史的报道，而不是为了要贬低葡萄牙人的成就的伟大，这里就必须插进以下的事实。远在葡萄牙完成发现非洲的惊人的伟绩之前，中国在那里已比它先走了一步。在永乐帝的统治时期，从1405年以后，曾有过七次远征队，带了五十只或更多的帆船和大约二万七千人，向西航行一直到达了非洲。

葡萄牙人的殖民方法不同于其他国家。葡萄牙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一个海上强国。它在各地只要求紧紧抓住重要的海港和贸易中心地，并建立一连串的居留地。

这些居留地，在非洲就是圣多美和莫三鼻给，在印度洋上是索科特拉，霍木兹，果阿，科伦坡和马六甲，在中国海上是澳门和长崎自由港。把这些中心地和近代英国海军基地弗里敦，开普敦，达累斯萨拉姆，亚丁，本达—阿巴西港，孟买，科伦坡，新加坡和香港对比一下，它们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所有这些基地都是位于紧靠着过去葡萄牙的中心地的附近地区。但是，葡萄牙人除保卫他们的殖民帝国之外，还有另一项须完成的任务，那就是使当地人民皈依基督教并在亚洲建立教会。传教活动只能按照殖民的布局，因为传教士的安全要依靠葡萄牙人的中心地的保护。贸易中心地和传教站都靠国王的赞助而得到保护。里斯本担起了在它的殖民地上促进教会利益的责任，起初对执行这一任务很为热心。一连串的据点建立后，跟着就是建立教区和传道会。继探险家和征服者之后而来的就是传教士。最初是圣芳济会和黑袍教团的修道士，他们担起了中世纪他们的前人留下的所未竟的艰巨任务；然后是

耶稣会士。

里斯本成为远东的入口，葡萄牙国王掌握着这些地方一切世俗和宗教大权的关键。除了葡萄牙王家印度舰队的轻快帆船和大商船外，任何船只都不能在非洲和亚洲的海面上航行。没有葡萄牙国王的许可，任何传教士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甚至在葡萄牙的商业垄断受到抗争，越来越多的荷兰、英国、法国和丹麦的船只进入印度洋之后，里斯本仍认为它享有古老的特许的保护权。随着它的军事力量的衰落，它对它的宗教特权越来越不愿放弃。甚至在1580至1620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和他的后继者统治葡萄牙的期间，西班牙的传教士除极少数的例外，也都遭到严格的排斥。法国人大多数也不受欢迎。另一方面，从各教皇国及其附属的大公国派来的意大利人，以及从比利时、瑞士、来因区、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和奥地利来的传教士，却都为他们所接受。

在十七世纪中，教廷已失去的宗教权力和威信恢复了不少，它又有了能力来履行它的传教责任。为了统一传教工作，1622年成立了“布教圣会”。另一方面，葡萄牙感到越来越不容易对它统治下的广大地区供应传教士，但它又不愿让别的传教士进入这些地区，除非他们服从葡萄牙的管制，并愿取得里斯本对前往这些地区的批准。不但如此，葡萄牙还提出要把它的保护权扩大到中国，虽然中国从来未曾被葡萄牙国王侵入或受过他的统治。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罗马和里斯本之间的分歧，而在这些地区的传教士则夹在争执的两方之间。这就是1666年南怀仁神甫¹²在汤若望神甫死后接管在中国的耶稣会的领导职务时的情况。南怀仁自从到中国之初，就被两种难以调和的思想所困扰：一方面，他承认葡萄牙对耶稣会和基督教事业有很大功绩，因此所有传教士似乎都应对葡萄牙的利益采取同情态度；另一方面，为了宗教的利益，他也认识到完全依靠葡萄牙是不可能的。这两种思想都反映在南怀仁

的行动中。他保卫了澳门的利益，从而对葡萄牙做出了永久性的贡献，但他又感到应该履行他对罗马教皇和对他所领导的传道会的责任。他曾写了好几封信到欧洲要求派出传教士。其中一封信通过路易十四世的听忏悔的牧师谢斯神甫传到路易十四世的手中。路易想使自己扬名远东，接受了这个请求。法国皇家科学院也支持这个请求，它希望获取对远方的国家尽多的知识。于是，就决定派一队耶稣会士作为“皇家数学家”到中国去。但是，路易十四世决不愿让他的使者接受“葡萄牙的保护权”，因此必须找一条新的交通路线。这就使古代东西方借以建立关系的陆地交通线又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了。同时，耶稣会士之所以企图找一条陆地交通线还有另一项原因。

陆地上的路线¹³

自从利玛窦神甫(1610年去世)的时候以来，找一条陆上的路线就一直是耶稣教派教长们的一件大心事。海上的航程太危险了；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程既遥远又危险，而且十分艰苦；从那里到中国 and 以东其他地方，则更为危险；人¹⁴、时间和精力损失都是很大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寻找另一条到远东去的路线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是不是走陆路能更快和更安全地到达印度，或者甚至中国呢？

从欧洲到印度 从欧洲到印度的陆上路线的最大障碍是伊斯兰教，它在近东仍保持着它的旧有的势力。从摩洛哥到乌拉尔山对基督教欧洲的包围圈在南面固然已被包抄了，但是在东面还未被突破。传教士们要试从欧洲到达果阿，有三条可能的陆路：渡过红海；幼发拉底河路线，和从霍木兹经过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到土麦拿或阿勒颇的波斯的商队道路。派往阿比西尼亚的耶稣会士

的经验已经证明，要安全渡过红海是不可能的。亚丁，达法，苏瓦金和马萨纳的统治者都是基督教界的狂热的反对者。巴格达和巴斯拉的土耳其人也不比他们好，而且他们指责基督教徒损害了他们和印度的有利的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又经常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这样，幼发拉底河一路实际上也被封闭了。所以，剩下来唯一的路就是波斯的商队的道路。这条路上经常有商队来往。波斯国王阿巴斯在十七世纪初即位，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了波斯的一段最幸福的时期。他在这条路上建造了坚固的队商宿站，作为防御匪盗的一种保障。他不愿看到他的贸易政策受到宗教迫害的干扰。他让数千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徒在他的新京城伊斯法罕附近居留下来。他甚至允许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他的国家。但是，就连这条欧洲和果阿之间最有发展前途的路线也并未产生所希望的结果。里高第，德·罗兹，斯多雷·劳斯诸神甫和其他教派的传教士的经验证明，这条路虽走得通，但却是很艰难的，而且比海道所化的时间更长。在罗马的教长们已经在计算他们的人死去的人数。1654年和1655年，在德·罗兹神甫的怂恿下派往东方的法国耶稣会士，五个人走的是通过波斯的陆路，但是只有三个人到达了苏拉特。

显然到印度去的传教士对这条路没有什么很多可指望的了。但是，不久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到中国去的陆路情况如何？

到中国去的陆路 从波斯来的旅行者，不管他们是从海路或陆路到达波斯的，能不能找到通过中亚细亚到达北京的联结的道路呢？那样就可能省时间，也可能少吃些苦。但是，在这方面有一项巨大的困难须待克服；一个大谜须待解决。这个谜就是在这茫茫的亚洲大陆的中心有着什么，因为白人探险家常常受到沙漠、大山和敌对的部族的阻挡，到达不了这个地区。一直到斯文赫定的时候，事实上一直到现在，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高原地带是世界上人们

对之知道得最少的地方。马可波罗，普拉诺加比尼的约翰、卢布鲁克的威廉、蒙的考维诺的约翰和马里格诺利的约翰这些人在蒙古人称霸时期所走过的路线，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十六世纪时的地理学，非但比中世纪没有进步，而且反而倒退了几百年。所留下来的知识只是中世纪旅行家们所曾提到的神秘的震旦，那里有着一大群信仰基督教的人民。¹⁵ 虽然在北京的利玛窦神甫认为没有问题震旦就是中国，并且告诉了在印度的他的同事们，但是他们认为不是一回事，因为在中国并无基督教徒。根据从阿格拉来的他们认为可靠的报道，在震旦有基督教徒。显然，第一步要做的事是解决这个震旦之谜。

1602年，派出了会友本多·得·果斯，越过世界的屋脊，作一次划时代的远征，确定地证明了震旦就是中国。¹⁶ 尽管有果斯会友的调查结果，在印度仍然流传着关于大山的那一边有基督教徒的社会的谣言。这就引起一连串绕喜马拉雅山前往西藏的探险队。其中最出名的是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神甫和喜波利多·狄西得里¹⁷ 神甫的探险队。但是，所有这些跋涉都没有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更短的和更安全的路。本多·得·果斯会友临死的遗言是：“他的旅程是十分辽远、十分吃力，而且危险重重。所以，耶稣兄弟会的任何会友都不可试图仿效他的榜样。”

但是，随着荷兰在印度洋和中国海上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寻找一条通往中国的更短更安全的陆路就变得更为迫切了。1622年荷兰人袭击了澳门，1623年他们封锁了果阿。汤若望神甫在西安传教时（1627—1630年），曾经在1622年协助保卫澳门防御荷兰人，他对这个陆地交通线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无疑地，他是奉到他的上司之命，大概就是耶稣会会长本人之命，而注意这个问题。从他所作的调查的精确和他在1629年所写的详细报告，这是可以推想得到的。这个报告的两份缩写本至今仍存在罗马耶稣会

的档案中¹⁸。很难说这个报告对此后要开辟一条陆路的种种尝试究竟有什么影响。人们作出了一些新的努力，并且决定了把波斯作为第一个停歇地点。相当时期以来，法国在近东的势力已经在增长中，所以最初就挑选法国传教士来执行这一任务。他们从他们在叙利亚的传教前进站能更好地办理此事。1652年谢司神甫就是从叙利亚来到了伊斯法罕，奠定了耶稣会士居留地的基础。1654年，亚力山大·德罗兹神甫做了耶稣传道会会长，在他的领导下，耶稣传道会的事业开始欣欣向荣。于是，他就有余力可移其注意力于东方：“我认为，我们对于发现一条到中国去的陆路不应蹉跎；因为这是罗马十分希望的事。”的确这是罗马的愿望。新派了两个人来实现这一愿望：伯纳德·迪斯台尔神甫和约翰·格鲁白神甫。

1656年2月18日，耶稣会会长戈斯文·尼克尔向这两位探险者发出训令，¹⁹他们从墨西拿出发，在1656年圣诞节前不久，到达了伊斯法罕。但是，由于波斯国王和撒马尔罕统治者之间正将发生战争，他们不可能沿着“北方的路线”继续他们的旅程。于是，他们就向果阿前进。在到果阿之前，他们在1657年4月到达了苏拉特，在那里他们得悉果阿刚被荷兰人封锁了。等了十个月之后，一位友好的英国船长，让他们和另外四个耶稣会士免费搭乘他的船，他们于1658年到了澳门。汤若望神甫和顺治皇帝说好了，邀请这些旅行家去到北京宫廷。1660年9月，迪斯台尔神甫身故。对格鲁白来说，会长所给的探查一条到中国去的陆路的命令仍然有效，而且在中国的耶稣会教长们都对他说，他应该服从这个命令。多维尔神甫被派为他的新伙伴。这两位旅行家在完成了他们的准备后，于1661年4月13日离开北京。²⁰他们的旅程第一阶段是沿着“丝绸之路”的东段从北京到兰州（经过太原和西安）。汤若望对这条“丝绸之路”是熟悉的，因为他在报告中曾对这条路作了描述，而且也一定告诉了格鲁白。在兰州，格鲁白突然决定离开

这条“丝绸之路”，而走那条比较不熟悉的通过西藏的路（这条路汤若望只会简略地提到过）。6月底，他们到达了西宁，然后绕过了青海的北岸，于7月13日穿过了长城。他们越过了喀尔木克鞑靼人的沙漠、唐古拉山脉（高五千公尺）和外喜马拉雅山脉*，于10月8日到达了拉萨。从这里，他们又通过日喀则，高里三卡山峰附近的高山山道和加德满都，在1662年3月底到达了阿格拉。在这里，多维尔死去，罗斯神甫接替了他的职务。格鲁白由于害怕葡萄牙人，避开了苏拉特，因为葡萄牙人是不同意他的旅行的。这些探险者从拉合尔乘船沿印度河而下到达了近代的卡拉奇港口附近的塔塔，然后通过霍木兹海峡，到达了本达—阿巴斯港。从这里，他们沿着波斯的商队的路线经过舍拉子和伊斯法罕，到达了士麦拿。从士麦拿，他们乘船到墨西哥，于1664年2月20日进入罗马。格鲁白向耶稣会总会转递了在华传教士的信札和报告，并写了一份关于他的远征结果的备忘录。他推荐他所走的路线是最好的路线，并且说应该在尼泊尔和西宁建立传教会。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建立一连串的基地：在士麦拿或阿勒颇，然后在伊斯法罕、苏拉特、阿格拉、尼泊尔、西宁、西安。²¹但是，在亚洲的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代表为了葡萄牙国王的保护权的利益而提出反对。同一年，即1664年3月，在省区教长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采用旧的海上路线，但是准许这两位旅行家从陆路回到他们的传教会去。²²格鲁白的旅行没有象人人所希望的那样顺利，他化了三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次旅程，这就不能说明他所走的路线是好的。在此期间，格鲁白和罗斯想出了一个新计划：取道大俄罗斯和里海到波斯去，这样就可以躲开土耳其，因为那时土耳其正和波斯有发生战争的危险。这两位旅行家在分手后，又在维也纳会合。在维

* 外喜马拉雅山脉原文为 Trans-Himalayas, 可能指念青唐古拉山脉一带。——译者

也纳，利奥波德一世两次接见了他们。这位皇帝深为他们的报告所打动，决定赞助他们要找一条通往中国的“更好的和更安全的路线”的计划。他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了耶稣会会长（1664年9月17日），实际上就是说斐迪南三世每年给予在中国的耶稣传教会的一千金币津贴，应不再送往里斯本，而应用之于发现一条陆上路线。他还表示打算写信给教皇请求消除其他的障碍。但是，罗马对这些计划的反应很冷淡。教皇已经收到葡萄牙国王的一封信，对这种计划表示抗议，因为这些计划将使他的国家的既得利益受到侵犯。必须考虑到葡萄牙的敏感；它的殖民帝国正在崩溃；在荷兰人的猛攻下，它的军事地位削弱了；同时由于“布道圣会”的成立（1622年）和名誉主教的任命（1661—1663年），而这些主教大多是从法国由陆路通过波斯潜入葡萄牙保护权下的地方的，它在远东的宗教和政治影响已经衰落。现在，耶稣会士也想要脱离葡萄牙。耶稣会会长欧利瓦，为了不激怒曾经对耶稣会士有过很大好处的葡萄牙国王，给了利奥波德一世一个委婉的答复，说他不能以一条安全的海路来换一条不安全的陆路。在此期间，格鲁白和罗斯，带了利奥波德的委任书，经布拉格前往德国北部，他们希望取道莫斯科和波斯前往远东。但是，在米坦（里加附近），他们听说伏尔加河下游的鞑靼人和波兰人结成联盟，正在准备着对罗曼诺夫王朝的战争，因此从莫斯科到阿斯特拉罕的道路已经不通了。他们只得折回。1665年，他们和奥地利大使一起到君士坦丁堡。格鲁白病倒了，永远回不到东方去了。罗斯经波斯和苏拉特到达了阿格拉，1668年死在那里。

穿过西伯利亚的路线²³

1673年12月的教皇诏书准许所有传教士不经过里斯本从陆

路前往印度。因为葡萄牙的固执已使海路不能通行，教皇克力门十世打算靠陆路来保持和远东的“交通线”的畅通。但是，过了相当时候，耶稣会士才利用了这个特许的权利。他们仍希望与葡萄牙维持良好的关系；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这条陆上的路线不太有把握。横越波斯到印度去的旅程跟海上旅程一样远。人们不再考虑从印度越过西藏去到中国的道路，因为这条路没有什么胜过海道的可取之处。因此，如果必须利用陆上的路线，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仍待解决：喜马拉雅山以北有没有一条路？从这时起，耶稣会的首领们心中最主要的念头就是这条路可能是完全穿过俄国领土的。

南怀仁神甫 看来南怀仁神甫是第一个想到在西伯利亚寻找这条路线的人。格鲁白和罗斯都曾打算到莫斯科去，但他们只是为了要去波斯。汤若望死后(1666年)，南怀仁不久成为耶稣传教会在中国的杰出领袖。俄国尼古赖使团1676年之来中国，提供了南怀仁所需要的机会。他和尼古赖接洽，并和他建立了友好关系。为了取得尼古赖的支持和在沙皇面前代为说项，南怀仁帮了尼古赖很大的忙。尼古赖离北京时，南怀仁给了他一封上沙皇的信。在信中他不但证明尼古赖曾到北京(中国政府拒绝给尼古赖这样一封信)，而且还表示他自己和耶稣会在中国的其他传教士都愿为俄国政府效劳。在此期间，沙皇阿列克赛去世了。沙皇西奥多继位；尼古赖失宠。尼古赖从俄国既无信来，而康熙帝对俄人又很不满意，看来这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这是1678年的情况。但是南怀仁仍不放弃尝试。1680年，南怀仁派他的本国人库普雷神甫到罗马和巴黎去，为他的传教会获得生力军。如前所说，巴黎当局答应派一些法国耶稣会士，其中大多数都搭乘一艘法国船取道暹罗前往中国(1686年)。同时，有几个经过特别挑选的人将再度试探那条陆上路线的可能性。

1684年，从中欧来的耶稣会士在查理·毛里斯·伏塔神甫的帮助下取得成功，于是乐观的情绪更为高涨。伏塔是一位意大利耶稣会士，波兰国王约翰·苏必斯基的听忏悔的牧师。他和自中欧来的耶稣会士一起在莫斯科开设了耶稣会士的居留所，这个居留所一直存在到1689年。这是朝着可能开辟一条经过西伯利亚的陆上路线的巨大的一步。通过这一可贵的前哨站，可以对在罗马和北京为一条陆上路线所作的努力，加以估量和配合，并可直接对克里姆林宫进行敦促。

法国和波兰的耶稣会士 路易十四世应南怀仁神甫的吁请，决定派一队耶稣会士到中国去。他们之中的两人，一个是自1680年就在亚美尼亚的路易·巴纳布，另一个是腓力·阿夫瑞尔，这两人将经西伯利亚走陆路。阿夫瑞尔神甫在库白雷到法国后会和他会见，库白雷一定把海路的困难告诉了他。迄今派往中国的六百名传教士，只有大约一百人到达了该国；“所有其余的人不是由于船沉、疾病、被害而丧命，便是被海盗或其他盗匪所掳走。这位年轻的探险家，深为这些灾难的统计数字所感动，立誓要竭尽全力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安全的道路，以减少宝贵生命的损失。1686年初，阿夫瑞尔在波斯的埃里温与巴纳布会合；1686年4月23日，他们开始走上他们的旅程。经过了许多冒险和艰苦，他们于1687年1月到达了莫斯科。在这里，他们与那两位德国耶稣会士一起住在那个新近设立的耶稣会会所。沙皇的大臣们对他们很少表示同情。这两位耶稣会士不得不担受在北京的他们的会友据说做了许多错事的后果。1685年9月，中国人送来了他们的和平方案时，在中文本之外还有一个拉丁文译本。俄国人认为这个译本本身就出卖了西方的利益。从这时起，俄国人就不断重复这个指责。1686年，维尔那的马毛斯神甫也把俄国的这种指责向罗马报告，²⁴ 马毛斯是波兰方面和俄国订约的首席谈判代表马丁·欧金斯基的牧

师。由于他的上司的坚决要求，他曾力促欧金斯基取得俄国人的
一项让步，让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得取道俄国和西伯利亚。俄国即
根据上述的指责加以拒绝，马毛斯把这个指责转告罗马。他们的
确抱着极严重的怀疑，把这些耶稣会士们看做是可能的政治间谍。
不但如此，俄国人那时正在西伯利亚殖民，以管理和发展毛皮贸
易，不愿有外人来刺探他们的事情。巴纳布神甫到俄国宫廷去请
求发给必要的旅行准许证时，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验。那位权势
显赫的加利津亲王说了些对耶稣会士恭维的话，说完了之后，就把
这两位耶稣会士打发到大法官处去了。在那里，他们“好象因杀人
罪被捕的犯人一样，受了四小时的盘诘；三、四张纸上涂满了无休
止的一连串的问答”。当他们要求发给旅行准许证的申请书在作
公文旅行的时候，这两位探险家多方想找到他们以为是在城里的
所谓中国使团，实际上这个所谓中国使团只是几个蒙古商人而已。
这两个耶稣会士希望能在这个商队回去时跟他们一起走；但是，他
们还得等待他们的官方证件批下来。在此期间，阿夫瑞尔尽力收
集一切有关联接中国和外界的陆地路线的情报。最后，他给在罗
马的他的教派总会仔细地写了一份备忘录，后来他又用了从波兰
特务机关所掌握的文件中所取得的报道，加以补充。他把陆上路
线分为两类，一类是北方线，另一类是南方线。他的南方线同果斯
和格鲁白的报告比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他对西伯利亚路
线的说明比较好。

阿夫瑞尔和巴纳布都没有得到把他们的理论付之于实验的许
可，这使他们感到十分难过。俄国政府引用了一条法律的规定，按
照这项规定，任何人未经首先提供身份良好的证明，不得经过西伯
利亚前往中国。所以，他们作为法国的公民，必须从巴黎取得这种
必要的证件。他们离开了莫斯科，于1867年3月12日到达华沙。
巴纳布赶往但泽，从那里搭船到法国去。

与此同时，阿夫瑞尔继续筹划西伯利亚之行，那个时刻看来是很有希望的。在前一年，即1686年12月，苏必斯基在利沃夫元老院的会议上批准了和俄国所订的条约。这个条约称为《格齐莫尔托斯基条约》。三十二条款中的一条，即第二十八条，直接提到了这个陆上路线。曾任波兰方面首席谈判代表的立陶宛大宰相马丁·欧金斯基的牧师尼古拉·马毛斯神甫极力坚持按照耶稣会会长德·诺瓦叶神甫的训令，在条约中必须专列一款，明确保证“福音的传道者得自由通过莫斯科帝国的领土前往中国”。俄国人表示这样的一个专款是不必要的，因为另一款（即第二十八款）已经对一切持有波兰国王所发的护照旅行的人，保证了这一权利。²⁵阿夫瑞尔也获得了苏必斯基的接见。苏必斯基即将去莫斯科和沙皇谈判。苏必斯基答应向沙皇进说，并从他的谍报机关的档案中提供阿夫瑞尔以宝贵的情报。

法国耶稣会士准备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远征中国的消息传至波兰后，波兰耶稣会士纷纷向罗马耶稣会申请参加这个远征队。²⁶因为阿夫瑞尔本人曾恳请耶稣会总会长派波兰人做他的同伴，于是就挑选了萨波尔斯基和特皮洛斯基两位神甫担任这项任务。同时，巴纳布在巴黎也获得同样的成功。路易十四世的牧师拉·谢斯神甫对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这从他给南怀仁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南怀仁曾写了好几封信到巴黎去，要求派几位神甫经大鞑靼到中国来。结果，法国国王请求有关的教会长老再给他增派两位法国神甫和两位波兰神甫，于是就加上了薄贤士和聂伐神甫。这时，又产生了新的困难。这些人刚出发去到在波兰的会合地点，不幸的事就接连发生。薄贤士在卢昂误了船，结果他倒是幸运，因为这只船在波罗的海上沉没了，巴纳布和聂伐都在这只船上。然后，又来了新的战争威胁；在巴黎和维也纳、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人们都在武装起来。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阿夫瑞尔再度向

他的波兰保护人求助，并且去到了格罗德诺的议会。在法国大使之外，他在这里还发现在波斯代表着好几个欧洲国家驻波斯宫廷的特命大使康士坦丁·苏来曼·叙里·齐哥尔斯基伯爵是一位新朋友。他正以这个身份道经莫斯科前往伊斯法罕。阿夫瑞尔准备跟他一起走，一直到波斯；而且如果这位伯爵愿意到中国去当法国国王的大使的话，他甚至准备跟他一起到中国去。²⁷伯爵同意了。当这些事在进行中的时候，薄贤士带了应由巴纳布携带的文件的抄本到了华沙。²⁸对陆路计划极感兴趣的耶稣会会长听说法国神甫的计划有了改变，就向立陶宛省区的大主教传达了希望，即盼另有一些立陶宛或波兰神甫继续尝试从西伯利亚前往。²⁹

法国和波兰人员在波兰和俄国边界集合的日期定为1688年9月。这一次一切似乎都很妥贴。但是，罗马总会会长和他的佐理人员并不这样乐观。耶稣会的秘书吉尔·艾斯特里克斯，在给南怀仁的一封信中，坦率地表露了他的怀疑。他在信末提出一个很实在的建议：南怀仁能否从中国皇帝那里取得一个文件，向俄国政府介绍这些旅行家？³⁰他的顾虑证明是有道理的。当法国和波兰的这批人准备出发时，一位波兰神甫失踪了，阿夫瑞尔赶回到维尔那去。叙里·齐哥尔斯基伯爵不肯等候他就出发了。阿夫瑞尔到达俄国边界时，斯摩棱斯克长官下令予以逮捕。俄国人有意把他和他的保护人拆散，以便更容易地阻止他去进行他打算经过俄国的旅行。阿夫瑞尔总算侥幸，正在这个时候波兰驻俄大使雷施辛斯基路过这个城，阿夫瑞尔设法使自己被任命为他的牧师。这样，他就到了莫斯科。在这里，他得悉薄贤士、萨波尔斯基和特皮洛斯基已去伊斯法罕。波兰人依据格齐莫尔托斯基条约第二十八款，宣称他们有在俄国领土上任何地方旅行的权利，因为他们的护照是波兰国王发给的。他们在警察调查表上签了字之后，就出发前往伊斯法罕。加利津亲王同意让这些波兰人通过西伯利亚前

往。但是，在他们出发去伊斯法罕后，他改变了主意，并托辞说，他不能让他们去冒在西伯利亚旅行的危险，因为他不能担保他们的生命安全。后来，彼得大帝也多次用这同一个借口。³¹ 薄贤士遭到了断然拒绝，他依俄国政府明白表示的愿望，已去阿斯特拉罕。他们也要求阿夫瑞尔立即离开俄国。阿夫瑞尔作了最后的努力，提醒俄国政府以前它曾表示，如果他从巴黎取得必要的证件，可以同意，而现在这些证件他已取得了。但他还是遭到拒绝。1689年春天，阿夫瑞尔和薄贤士回到了华沙。他们决定到亚美尼亚去，从那里再试试看。他们打算取道伊斯坦布尔到波斯去，并在叙里伯爵的帮助之下，达到他们的目的。有鉴于土耳其和俄国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他们带了波兰的通行证，经过卢布林、兰柏克、雅西、加拉兹而到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阿夫瑞尔病倒了，不得不回到巴黎去。同时，莫斯科耶稣会士居留所的所长乔治·大维神甫把这些事情都通知了总会会长，并且说，他听说萨波尔斯基打算回到莫斯科再度试图取得越过西伯利亚的许可。会长听到这个消息，命令大维说，如果萨波尔斯基真的回到莫斯科，就把他留下，并且说他的这个命令是有重要理由的。³² 这些重要理由，或者至少这些重要理由之一，可能是闵明我神甫即将到达。

闵明我神甫 罗马总会不顾他们到这时为止所遇到的不好的运气，坚持不懈地努力寻找一条陆上的路线。在中国，南怀仁神甫也是如此。在北京和罗马，他们都对闵明我神甫寄以很大的希望，认为他是最有条件能对陆路计划作出永久性的成就的人。1686年闵明我神甫奉令游欧。康熙皇帝派他为驻罗马和莫斯科的私人大使，南怀仁派他为代办。这样，他就负有两项任务。北京朝廷多年来一直在等候沙皇对满洲边界争端的决定，闵明我须取得一个答复；作为传教会的代办，他须获得经过西伯利亚旅行的许可。³³ 闵明我在欧洲和许多杰出的学者，首先是莱布尼茨重温旧

谊。彼得大帝赞赏莱布尼茨；冈明我希望有了莱布尼茨的一封信介绍信能获得有利的接待。但是，沙皇仍然拒绝了。

与此同时，在北京，南怀仁为了同一目的继续努力。1686年，到北京来向中国朝廷宣告议和全权代表即将到来的俄使魏牛高和法沃罗夫离开北京时，除带有官方公文外，还有南怀仁给尼古赖的一封信。在这封1686年11月29日的信中，南怀仁表示了他和徐日升神甫对俄国的忠诚。他又说，魏牛高只能讲俄语或西鞑鞑语，不能说很多话，应以另一个懂得其他语文的大使来代替他，或者再派一个能说拉丁文的人参加他们的代表团。南怀仁接着说，中国皇帝托正在赴罗马途中的冈明我神甫带了一封信给沙皇，所谈的是他一直未得到答复的以前的信中所谈的同一问题。南怀仁请尼古赖尽力协助冈明我，如果冈明我路过沙皇的领土的话。³⁴

南怀仁这样做了还觉得不够，他继续作一切努力使耶稣会士在即将举行的和平谈判中的工作有助于俄国。如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南怀仁希望双方都将感谢耶稣会士的功劳，而俄国最后会对耶稣会士开放西伯利亚这条道路。这件事他自己已无去完成的希望，他已年老，而且在一次坠马后，1687年全年都在疗养中度过。所以，他把他的希望寄在他向皇帝推荐的徐日升神甫身上。1687年，他写了一封信给耶稣会会长。在信中，除谈到其他事情外，他描述了穿过西伯利亚的路线。会长在接到这封信后，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大维神甫，要知道关于这条路线更详细的情况。大维会见了尼古赖，在他的报告中，向罗马转达了尼古赖的回答。关于耶稣会士究竟有无希望终能取得通过西伯利亚的自由，尼古赖认为取得这项自由最有把握的途径是请俄国人所十分敬重的德国皇帝说项。他认为，俄国人在和中国获致协议之前，可能是不会同意的，虽则商人们说战争并不影响他们的来往。尼古赖还指出了最短的路线。南怀仁终于做到了使徐日升被委派在中国代表团内。中国

代表团在 1688 年空劳往返的色楞格斯克之行以后，于 1689 年在尼布楚和俄国人会面了。徐日升的同伴就是张诚神甫。

注 释

1 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 99—127 页；费赖之：《关于旧时在中国传道的耶稣会士的传略和书目志，1552—1773 年》(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la Chine, 1552—1773*)，共两卷，参阅全书有关部分。

2 荷尔德：《中国和蒙古地理、历史、政治和地形详志》(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共四卷。

3 卓松与威拉尔特：《耶稣会南怀仁通讯集》(Josson et Willaert: *Corresponde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4 加恩：前书，第 7—8 页；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 100—101, 123 页。

5 《光绪会典事例》(1889 年)一六七，第 6—7 页。

6 关于希腊罗马和中国及远东的关系，详见柯德斯：《希腊和拉丁作家关于远东的册籍》(Coedes: *Textes des 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 l'Extrême Orient*)；夏德：《中国与罗马的东方》(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赫德逊：《欧洲与中国从古代至 1880 年关系的考察》(Hudson: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800*)；台夏特：《罗马与中国》(Teggart: *Rome and China*)。

7 关于传说的圣托马斯使徒远东之行，参阅劳波丹：《传教士和清朝官府》(Rowbotham: *Missionary and Mandarin*)，第 3—4 页；达尔曼：《关于托马斯的传说》(Dahlman: *Die Thomas-Legende*)；布朗：《圣托马斯的印度基督徒》(Brown: *The Indian Christians of St. Thomas*)。

8 关于景教徒，参阅明加纳：《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的早期传布》(Mingan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载《约翰莱兰图书馆馆刊》(*Bulletin of John Rylands Library*)，第九期(1925 年)，第 297—371 页，翻印本；穆尔：《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A. C. Moule: *Christianity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塞基：《景教在中国的文件和遗迹》(Saeki: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劳波丹：前书，第 6—9 页关于在西安的景教碑，参阅卡柔斯：《景教碑》(Carus: *The Nestorian Monument*)；哈弗瑞：《西安府的景教碑》(Havret: *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gnan-fou*)；黑勒：《西安府的景教碑》(Heller: *Das nestorianische Denkmal in Singanfu*)；鲍梯埃：《西安府的叙利亚文和汉文的碑文》(Pauthier: *L'Inscription syro-chinoise de Si-gnan-fou*)；塞基：《中国的景教碑》(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9 普拉特纳：《耶稣会士走向海洋——到东方去之路》(Plattner: *Jesuiten zur See. Der Weg nach Osten*)，英译本《耶稣会士到东方去》(*Jesuits Go East*)，第 10 页。

10 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著作有：布勒伊埃：《中古世纪的教会与东方》（Brehier：*L'Église et l'Orient au Moyen Âge*）；克路盖第：《与马可波罗同时的圣芳济会修士》（Glougherty：*The Franciscan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载《辅仁大学学报》，第5期（1928年），第37—60页；考第埃：《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和中亚的基督教》（H. Cordier：*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et en Asie Centrale sous les Mongols*），载《通报》，第18期（1917年）；昂比斯：《马可波罗对世界的记述》（Hambis：*La Description du Monde de Marco Polo*）；孔罗夫：《与马可波罗同时代的一些人》（Komroff：*Some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穆尔德瑞：《天主教在中国、朝鲜和西藏的教阶组织》（Moldrey：*La Hiérarchie catholique en Chine, Corée et en Tibet*）；道森编：《蒙古传道会，十三、十四世纪在蒙古和中国的圣芳济会传教士的记述和信件》（Dawson [Edit.]：*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弗纳特斯基：《蒙古人与俄国》（Vernadsky：*The Mongols and Russia*）；穆尔：《关于十三、十四世纪派往中国传道的小修道士的文件》（A. C. Moule：*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Mission of the Minor Friars to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1914年）（*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533—599页；穆尔与伯希和：《马可波罗对世界的描写》（A. C. Moule and Pelliot：*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共两卷；欧吐尔：《关于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杂记》（O'Toole：*Random Notes on Early Christianity in China*），载《辅仁大学学报》，第3期（1927年），第31—39页；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Pelliot：*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4年）（*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瓦丁：《圣芳济会传教士文献》里昂1654年版，八卷本；罗马1731—45年版，十九卷本，（Wadding：*Annales Minorum* [Lyons] 1654, 8 vols., Rome 1731—45, 19 vols.）；旺·丹·温加尔特：《中国的圣芳济会》第一卷，《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圣芳济会传教士的旅行杂记和报告》（Van Den Wyngaert：*Sinica Franciscana, Vol. I: Itinera et Relationes Fratrum Minorum saec. XIII et XIV*）；玉尔与考第埃：《中国与到中国之路》（Yule and Cordier：*China and the Way Thither*），共四卷；毕尔曼：《近代黑袍教团在华传教会的发轫》（Biermann：*Die Anfänge der neueren Dominikanermission in China*）；玛斯：《近代圣芳济教会在中国的活动》（Maas：*Die Wiedereröffnung der Franciskanermission in China in der Neuzeit*）；毕斯雷：《约翰·德·普拉诺·卡皮尼和威廉·鲁布勒克的文本》（C. R. Beazley：*The Texts and Versions of John de Plano Carpini and William Rubruck*）；劳克喜尔：《威廉·鲁布勒克……及皮安·得·卡平的约翰早期旅行的两个记述》（Rockhill：*The Journey of William Rubruck ... with two Accounts of the Earlier Journey of John of Pian de Carpinc*）；里施：《普拉诺加比尼的约翰所写的蒙古民族史和蒙古见闻记》（Risch：*Johann de Plano Carpini,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und Reisebericht*）；里施：《威廉·冯·鲁布勒克：蒙古之行》（Risch：*Wilhelm von Rubruck: Reise zu den Mongolen 1253—1255*）；考第埃：《十四世纪幸福的鄂多立克·得·包得农教兄几次亚洲之行》（Cordier：*Les Voyages en Asie au XIV^e siècle*

du bienheureux Frère Odoric de Pordenone); 温加尔特:《让·得·蒙的考文,第一个驻北京的主教,1247—1328年》(Van den Wingaert: *Jean de Monte Corvin, O. F. M., Premier évêque de Khanbalig, 1247—1328*); 勃琪:《忽必烈汗的高僧:拉班·骚马和马克斯的一生和游历》(Budge: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Life and Travels of Rabban Sawma and Markos*); 沙伯特:《雅巴拉哈三世大主教和拉班·骚马高僧的历史》(Chabot: *Histoire du patriarche Mar Jabalaha III, et du moine Rabban Cauma*); 蒙哥马利:《景教派大主教雅巴拉哈三世和他的代理主教、十三世纪末蒙古大使骚马的历史》(Montgomery: *The History of Yaballaha III, Nestorian Patriarch and of his Vicar Bar Sauma, Mongol Ambassador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马罕:《克拉维约出使至撒马尔罕铁木儿宫廷记,1403—1406年》(Markham: *Narratives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kand, A. D. 1403—1406*)。

11 毕斯雷:《航海家亨利亲王》(C. R. Beazley: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毕斯雷:《近代地理学的发轫》(C. R. Beazley: *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 共三卷; 本素德:《航海发现历史中的空白和错误》(Bensaude: *Lacunes et surprises de l'histoire des découvertes maritimes*, 第一编; (Bensaude: *A Cruzada do Infante D. Henrique*; 本素德:《德国关于葡萄牙人地理发现的传说》(Bensaude: *Les Légendes allemandes sur l'histoire des découvertes portugaises*), 第1卷; 本素德:《东印度计划的起源》(Bensaude: *Origine du plan des Indes*); 勃克色:《十六世纪的华南》(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杨恩:《自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天主教传教会的组织和葡萄牙的保护权》(Jann: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in Indien, China und Japan. Ihre Organization und das Portugiesische Patronat vom 15. bis ins 18. Jahrhundert*); 瑞戈:《关于葡萄牙在东方的宗教保护权》(Silva Rego: *O Padroado Portugueso do Oriente*); Cortesão,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12 鲍斯曼:《南怀仁与俄国宫廷的关系问题》(Bosmans: *Le problème des relations de Verbiest avec la cour de Russie*), 载《佛兰德古物和历史研究促进会年刊》(*Annales de la Société d'émulation pour l'étude de l'histoire et des antiquités de la Flandre*)第63期(1913年),第192—233页,第64期(1914年),第98—101页。又参阅鲍斯曼:《关于南怀仁的文件》(Bosmans: *Documents relatifs à F. Verbiest*); 《耶稣会中国副省区各年度通信》(*Les Lettres annuelles de la vice-province S. J. en Chine*), 载《促进会年刊》,第62期(1912年),第15—61页; 鲍斯曼:《北京钦天监监正南怀仁》(Bosmans: *F. Verbiest,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éking*), 载《科学问题评论》(*Revue des questions scientifiques*), 第3卷,第21期(1912年),第195—273, 375—464页; 鲍斯曼:《南怀仁秘书托马斯关于南怀仁逝世的报告》(Bosmans: *La notice nécrologique de Ferd. Verbiest par son secrétaire Ant. Thomas de Namur*), 载《促进会年刊》,第64期(1914年),第102—133页; 米尔:《出色的清朝官员耶稣会士南怀仁》(Van den Meale: *De blanke mandarijn. De jezuit Ferdinand Verbiest*); 费赖之:前书,第316页,《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05, I ff, 141r—

13 除已提到的著作外,参阅华尔达克:《耶稣会(比利时)马林人腓力·古伯烈神甫》(Waldack: *Le Père Philippe Couplet, Malinois, S. J.*),载《比利时宗教史文集》(*Analec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 la Belgique*),第9期(1872年);杜非:《毁灭与帝国》(Duffy: *Shipwreck and Empire*); F. de Sousa: *Oriente Conquistado*; Franco: *Synopsis Annalium Societatis Jesu in Lusitania*; Streit: *Bibliotheca Missionum* III p. 559 and V p. 476; Wessels: *Iets over het Briefverkeer in de XVI^e en XVII^e eeuw in 't bijzonder met Missiegebieden in Ost-Indie en China*, in *Studien*, 116 (1931) 221—233.

14 详细数字见费赖之:前书,第329页;普拉特勒:前书,第190页;《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05 I ff, 92r—96v.

15 关于这些基督徒是些什么人,参阅劳波丹:前书,第9—15页。

16 伯纳德:《本多·得·果斯教兄与中亚回教徒,1603—1607年》(Bernard: *Le Frère Bento de Goes chez les musulmans de la Haute Asie, 1603—1607*); Brazão: *Em Demanda do Cataio; A Viagem de Bento de Goes a China (1603—1607)*; 西拉斯:《在阿富汗的耶稣会士》(Heras: *The Jesuits in Afghanistan*),载《新评论》(*New Review*),第1期(加尔各答,1935年),第62—74,139—153页;斯瑞尼伐山:《本多·得·果斯,中国探险者》(Srinivasan: *Explorer of Cathay. Bento de Goes*),载《新评论》,第3期(1936年),第70—79页;魏赛尔:《中亚细亚的早期耶稣会旅行家,1603—1721年》(Wessels: *Early Jesuit Travelers in Central Asia 1603—1721*),第1—24页;魏赛尔:《耶稣会本多·得·果斯教兄之墓》(Wessels: *The Grave of Brother Bento de Goes S. J.*),载《耶稣会历史档案》(*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Jesu [AHSI]*),第4期(1935年),第337—338页;D'Ella: *Fonti Ricciane*; 加拉赫:《十六世纪的中国》(Gallaghe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 102 ff. 149v—151v. 杜文达克:《中国之发现非洲》(Duyvendak: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巴斯脱:《教皇史》(英译本)(Pastor: *The History of the Popes*),第28卷,第129—153页。

17 得·腓利比:《西藏记》(De Filippi: *An Account of Tibet*); Petech: *Ippolito Desideri, S. J.* (In Series *Il Nuovo Ramusio II,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巴斯台尔:《一个伟大的传教人物:耶稣会士:喜波来·狄西得里,(1684—1733)》(Bastaire: *Une grande figure missionnaire: Hippolyte Desideri S. J.*),载《研究集》(*Études*),第288期(1956),第337—353页。

18 《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43 ff. 2r—7r 和 9r—19v.

19 《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24 ff. 245ss.

20 关于此行详细情况,参阅魏赛尔:《中亚细亚早期耶稣会士旅行家,1603—1721年》,第164—202页;Kircher: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 Illustrata* (这本书根据格鲁白所提供的资料);克鲁格:《耶稣会士格鲁白中国和西藏旅行记》(Klug: *P. Johannes Grueber S. J. Die Reise eines Linzer in China und Tibet 1661—1664*),载《祖国》(*Heimatland*),第12期(1935年),第98—103页;魏赛尔:《关于格鲁白旅行的新文件》(Wessels: *New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Journey of Fr. John Grueber), 载《耶稣会历史档案》, 第9期(1940年), 第281—302页; 齐梅尔:《约翰·格鲁白在拉萨》(Zimmel: *Johann Grueber in Lhasa*), 载 *Biblos*, 2 (1953) 127—145; 鲍斯曼:《关于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布鲁塞尔的多维尔的文件》(Bosmans: *Documents sur A. Dorville de Bruxelles, missionnaire S. J. au XVII^e siècle*), 载《比利时宗教史文集》, 第3卷, 第7期(1911年), 第329—383, 470—497页; 西拉斯:《阿尔伯·多维尔神甫的坟墓》(Heras: *The Tomb of Father Albert d'Orville S. I.*), 载《耶稣会历史档案》, 第2期(1933年), 第17—24页。

21 这些旅行者实际上写了三个备忘录, 日期都是1664年3月18日。《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 124 ff., 第242—244页。

22 鲁洛:《耶稣会的第一个中国牧师伊曼纽·得·西凯拉, 1633—1673年》(Rouleau: *The First Chinese Priest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Emmanuel de Siqueira 1633—1673*), 载《耶稣会历史档案》, 第27期(1959年), 第20—22页。还可参阅:《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 162 ff. 207—209, 105 I f. 136r。

23 鲍斯曼:前书中《南怀仁和俄国宫廷的关系问题》; 皮尔林:《俄国与教廷》(Pierling: *La Russie et le Saint Siège*), 第4卷; 阿夫瑞尔:《欧洲各国之行》(Avril: *Voyages en diverses états d'Europe*); 克西斯考斯基:《耶稣会萨波尔斯基神甫自华沙至伊斯法罕途中记》(Krzyszowski: *Entre Varsovie et Ispahan. Le P. Ignace-François Zapolsky S. J.*), 载《耶稣会历史档案》, 第18期(1949年), 第85—177页。

24 《耶稣会罗马档案》pol. 79 f. 166v。

25 同上书, f. 167。

26 同上书, f. 169 ss。

27 谢弗尔(Scheffer)从外交部档案发表了一个文件《(路易十四世)为叙里伯爵及前往中国的在波斯的耶稣会士致波斯国王的介绍信》, 载杜·曼斯神甫:《1660年波斯情况》(Du Mans: *L'État de la Perse en 1660*)的一个附录, 第538—539页。

28 关于薄贤士, 参阅勒崩:《耶稣会薄贤士神甫(1657—1708年)一位伟大的徒步旅行家, 从陆上自法国至中国》(Lebon: *Un grand marcheur. De France en Chine par terre. Le P. Antoine Beauvillier, S. J. [1657—1708]*), 载《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第9期(1936年北京), 第604—622页; 布罗:《近东传教士侧写: 一位伟大的徒步旅行家在上帝之前: 薄贤士神甫(1657—1708年)》, 载《教会史评论》(*Revue d'histoire des missions*), 第13期(1936年), 第261—282页; 费赖之: 前书, 第538—539页。

29 《耶稣会罗马档案》欧洲 NN 25 f. 105。

30 同上书, 63v。又参阅克西斯考斯基: 前文, 第95页。

31 皮尔林: 前书, 第4卷, 第109页。Florovský: *Čeští Jesuité na Rusi*, 第4页上重述莫斯科耶稣会会所所长乔治·大维神甫在他的 *Status Modernus Moschoviae* 中所提供的详细情况, 这本书中有一章题为“De Patribus Societatis Jesu petentibus per Moscoviam transitum in Chinam”。又参阅 Florovský: *Ruská mluvnice českého Jesuity z. r 1690*, 载 *Slovo a slovesnost* 4 (Praha 1938) 239—245。

32 《耶稣会罗马档案》欧洲 NN. 25 f. 114v。

33 同上书, f. 123, 日本—中国 105 I ff. 89—90v。日本—中国 102 ff. 43r—43v。

34 巴德雷: 前书, 第2卷, 第436页。

第五章 耶稣会士在尼布楚的作用

耶稣会士在尼布楚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些著述家把他们的作用看做是单纯译员的作用;另一些著述家认为,他们是办交涉的人、调解人和政治行动的策动者;第三类的著述家则以为,这些耶稣会士前两者都不是,而是两国的科学的文书记录者、文件的校对者和提供知识的人。对俄国来说,他们是在汉学还几乎不存在的时代的最早的东方专家和汉学家;对中国来说,他们是在中国人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的时代的最早的西方专家。除了这种意见分歧之外,这里还应指出另一项分歧。有些作者,特别是某些俄国史学家,看到俄国后来的成就,于是认为尼布楚条约是俄国外交的失败,而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耶稣会士的有害影响和他们的阴谋。¹人们必须把这些不同的意见加以考虑,对这些意见的是非加以研究,因为正是在耶稣会士的作用的问题上,徐日升的日记有新的阐明,并且以新的事实增加了我们对尼布楚条约的知识。

葛斯顿·加恩说:“据张诚说,中国方面表现得非常急切而且条件苛刻,以致会谈很快便中断了,后来是由于两位耶稣会译员从中斡旋,才又恢复谈判。但是俄国使团的官方报告却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耶稣会教士偏袒中国人并给俄国制造困难;俄国使臣想直接与中国人用蒙语交谈,而耶稣会教士则反对用蒙语谈判,理由是他们自己是官方译员,因此只有他们可以执行居间传达的任务,同时用蒙语翻译是不恰当的。俄国人自己还是用蒙语和中国人交谈了,中国使臣回答他们说,耶稣会教士把给他们的指令说得太过

分了。于是满人又参加进来用满洲语替两方面翻译，并且不许耶稣会教士从中作梗。另一方面，俄国人又以优待耶稣会等诺言来取悦这两位耶稣会译员，但是他们不肯背叛中国皇帝，因此不愿意太表示好感。耶稣会教士一方面支持中国，一方面又压制俄国人，但又不到造成谈判决裂的程度。总之，就是要使这次和平谈判的条约有利于中国。事实上，他们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朝廷由于谈判成功当然会很感激他们，而俄国方面对于能够和平解决自然也不会不高兴。因此这样一来，耶稣会教士就可以一举而博得一方乃至双方的好感。”加恩还引了俄国官方日志说：“……在此次谈判中，沙皇陛下的使团见到耶稣会教士煽起各种对抗的意见，并阻止中国使臣表示接受永久和约的意愿，因而命令安德列·贝洛波茨基与耶稣会教士进行秘密谈判，并允许给以沙皇陛下的恩典和赏赐……”²²人们只能抱憾不能看到戈洛文的报告的全文。加恩只从报告中摘录了一页有关耶稣会士的作用。如果能更全面地加以研究并把它同徐日升和张诚的日记对照一番，可能会有收获。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即戈洛文对耶稣会士的活动所描绘的情景是不好的。在戈洛文知道新即位的沙皇彼得大帝对这个条约的反应之前，他的官方报告可能就是如此。彼得大帝是在1689年戈洛文在尼布楚时候接掌了政权成为唯一的统治者。在尼古赖出使中国期间，也曾发生过同样的变化，结果是这位使臣回来后就失宠了。把可能使沙皇不悦的事情归罪于耶稣会士，这已不是第一次了。1685年，莫斯科接到了康熙皇帝的几封信，信的内容是一些不满的话和新的和平建议。在中文本之外还附有一个拉丁文译本。这件事本身就被俄国人认为是耶稣会士所干的对西方利益的叛卖行为，莫斯科的人们当时知道在北京有耶稣会士。从这时起，俄国人不断一再指责耶稣会士挑拨中国人反对他们，说他们以火器供给中国人并教授中国人作战的技术。³所以，戈洛文归

罪耶稣会士的那些话和大家都知道的莫斯科的调子完全一致。照这样看来，我们必须把那种暗示俄国人以贿赂收买了耶稣会士替他们做事的说法置诸脑后。张诚在他的日记（8月24日的记事）中说：“我们知道，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曾提出放弃色楞加（色楞格斯克）给俄国人。他们是通过一位蒙古翻译作此建议的，看来他们不完全信任我们，因为俄国全权使臣表现了对我们的信任……”²⁴不但如此，耶稣会士要是接受了贿赂，这就很难瞒得过中国人，而耶稣会士的处境本来已经够难应付、够危险的了，如果接受了贿赂那就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加难以应付，更加危险。

虽然如此，这无疑也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戈洛文曾对两位耶稣会士感谢他们的帮忙，对他们优渥有加，并答应在沙皇面前为他们说话。⁵还值得知道的一件事是：戈洛文从尼布楚回去后，得到了官方的表扬，被封为贵族，当上了西伯利亚总督，后来充任了俄国和欧洲许多国家订约的主要谈判代表。⁶还必须说一句对戈洛文公道的话，他的正式报告里的那些不利的话，对彼得大帝所采取的反对耶稣会士的方针，并无影响。在戈洛文回到莫斯科之前，彼得大帝就封闭了莫斯科耶稣会的教堂和居所，把耶稣会士从他的统治地区驱逐出去（1689年10月）。⁷

这些考虑也就把认为耶稣会士只不过是单纯译员的那种意见给排除了。如果仅仅是译员，他们怎么能够产生那种包含在所谓他们的“阴谋”中的影响呢？而且，徐日升在他的日记中明确地说：“……我们并未授有译员的职衔。”⁸

有些人认为在尼布楚耶稣会士“与其说是作为译员或政治行动的策动者，毋宁说是作为科学的文件核对者而完成了他们在中俄关系方面的真正历史使命”。这些人的论点所根据的是这个事实：“双方代表团来到尼布楚所携带的训令，在措辞上表明早在会议之前它们之间实际上已有协议。”按照这种意见，在耶稣会士参

与其事之前，早就奠定了“不仅对于划定边界，而且关于中俄关系总问题”的协议基础。“最后取得胜利，并且使两国尽管其思想意识似乎无法调和而终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会议和谈判的真正建设性的意见，是来自提供文件证明的工作，而在这项工作中，克里桑尼奇、尼古赖和南怀仁曾进行了合作。”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对双方在尼布楚发生的分歧是这样来说明的：“双方的思想中已取得一致，这一事实自然并无碍于按照东方的做法来进行会议：双方都提出过分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到第二天就撤回了；用军事示威企图进行恫吓；故作决裂的姿态；以及作出要离开的准备。”⁹徐日升和张诚：“作了调解人。他们时常渡河来往转达一方对另一方的新要求 and 新的异议；有时他们能把所发生的心理障碍扫除，但是他们也拿不出自己的建设性的意见来。”“双方代表心中的主意，无疑必须要用能为双方接受的话来加以确切的陈述，但是在会议的这个方面，张诚和徐日升所起的作用看来并不比例如拉丁文—俄文译员安德列·贝洛波茨基所起的作用更大。张诚新到中国，他不可能熟谙汉文或满文。至于徐日升，张诚自己告诉我们说，他是看不懂满文的。中国的全权代表都是满人，而协定的第一次草稿，如华尔特·福克斯最近所证明，是用满文写的。”¹⁰

只要读一读徐日升的日记，就足以使我们相信，这种意见是把历史事实过分简单化了。固然，徐日升的日记到现在才为人所知；而单看张诚的日记，人们也会同意：“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张诚在尼布楚谈判中所起的作用（徐日升几乎没有参与其事），看来并不象他的话要使人们相信的那么重要。”¹¹但是，如我们所已看到，正是在这方面，徐日升日记对尼布楚条约有新的说明。读了徐日升日记之后，人们很难同意：“早在会议之前，它们（俄国和中国）实际上已取得一致”，正如人们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一堆石头和砖头实际上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1690年阴历元旦，康熙帝

对他的大臣谈到尼布楚条约时说：“……平定鄂罗斯之事，满汉诸臣咸谓，彼距中国道远，难以成功。朕谓此事断不可终止，即遣大臣前往，遵指示而行，鄂罗斯遂即款服……”¹² 这些话证明，成功并非早已是定论。尽管有两国统治者训令作为协议的基础，双方几经交涉才同意了必要的妥协。谈判中断了四次，有一次实际上已经宣战。¹³ 把这些分歧的澄清称之为“扫除心理障碍”是把事情说得过分简单了。徐日升在他的许多次的谈话和劝说之中，可能没有拿出什么独到的意见，因为他必须记住康熙皇帝的意图，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他劝告中国代表相信，俄国人不是野蛮人而是文明人；按照国际法，应该信任他们。这些话看来与那种说法是矛盾的：“最后取得胜利，并且终能使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举行会议和谈判的真正的建设性的意见，是来自提供文件证明的工作，而在这项工作中，克里桑尼奇、尼古赖和南怀仁曾进行了合作。”如果中国代表团充满着平等的思想，那就会省了徐日升很多的麻烦。而且，这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一个西伯利亚流放犯克里桑尼奇、失宠的尼古赖和一个比利时耶稣会士的意见，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在莫斯科竟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更不用说在北京了，因为在北京他们和古老的成见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从徐日升和尼古赖本人的话里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徐日升有一次劝告中国钦差大臣说：“只有信任他们（俄国人），我们才能相信他们的同意是可靠的。我们不应该不给予他们甚至一个野蛮人都应该享有的信任，而这一类人中并不包括俄国人。”¹⁴ 乔治·大维神甫向泰尔苏斯·冈萨雷斯会长报告尼古赖有一次和他的谈话时说：“这位先生相信和约即将成立。如果俄国人象中国人一样文明，和约早已订立。他对中国人极为颂扬。”¹⁵

把两位耶稣会士在起草条约中所起的作用和安德列·贝洛波茨基的作用相比较，也是把事情说得过分简单化了。不管第一次

草案是用什么语文写的——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可以论说，这些耶稣会士和他们的地理知识的影响比贝洛波茨基的影响，在条约上留下了更为久远的标记。这只要读一读徐日升日记就会看出来。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他们的活动限于收集资料，这些资料对中国和俄国都有好处，两国的外交史将为这些资料而感念南怀仁、张诚、徐日升、巴多明等这些人的名字（后三人曾当选为莫斯科科学院通讯院士）¹⁶。但是，在尼布楚条约订立之后他们的活动只限于收集资料，这个事实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们在尼布楚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在尼布楚条约订立后最初几十年内，康熙和他的继位者忙于平定喀尔喀人和厄鲁特蒙古人，用不上耶稣会士的外交才能。等到能再用得上这种才能时，耶稣会士和基督教由于那个不幸的礼仪之争*，在北京已经失宠。尼布楚订约事是他们的势力的最高峰，这从颁布第一次容许基督教传教的谕旨以酬答他们的功绩这件事可以说明。

但是，如果说他们的作用超出了官方的文书记录者和译员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剩下的唯一说法：他们是调停者和政治行动的参与者。这的确就是他们所扮的角色，不过须加上某些条件。是的，当时中国的史册中很少提到耶稣会人员。1688年去和俄国人在色楞格斯克会面的中国代表团，带有两个中国秘书，他们的名字在官方文件中都正式有记载，而两位耶稣会士徐日升和张诚则未被提到，虽则他们之去尼布楚被认为是必要的。1689年的第二次代表团也带了他们，但却没有那两位中国秘书，因为这两个人并未随同代表团去尼布楚。他们作为必要的重要成员而属于使团，但却不具有中国政府官制中所承认的任何公职地位。虽然徐日升是由上谕公开正式委派的，可是上谕中没有明确说明他的

* 十七、十八世纪中，天主教会对中国教徒尊孔祭祖的礼仪，认为有背天主教义，因而有应否禁止教徒遵行这种礼仪的争论。——译者

地位。他和他的同伴都被托给作为钦差大臣之一的皇帝的舅舅照顾，给以如同皇帝本人所得的待遇；皇帝以自己的衣服赏赐给他，并为张诚特制了一袭，还给了他们其他的恩遇。但是，他们所居的官职最多只能从反面来加以界说：人们只能断定他们不是什么。他们的地位既从未正面地加以说明，他们始终是在中国官场的边缘。徐日升毋宁是代表皇帝的私人交涉者和监督者。皇帝在深宫中授给他种种指示，为的是不让他太为人所注意，而只为人注意到能使他执行皇帝的意旨的程度。在除了有关的人之外的一般公众的眼里，徐日升和他的同事们总还是“西方蛮夷”。中国的钦差大臣们听取徐日升的意见，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代表皇帝行事的。中国钦差大臣们在最初一个阶段不管他们的意见而行事之后，认识到了他们自己的错误，在此后的各阶段里，在采取任何步骤时都要同徐日升商量的了。俄国人注意到中国钦差大臣对他们这种很大的尊重，因而厌恶这些耶稣会士的势力，因为他们觉得，要是能和比较无知的钦差大臣们直接交涉，比通过这些知识丰富的耶稣会士办交涉，对他们会更为有利。张诚和徐日升的日记都证明，中国钦差大臣们态度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而并不是像俄国官方报告中所说的，是耶稣会士阴谋诡计的结果。俄国人注意到这种转变，而不明了这些耶稣会士的地位如何，就把这种转变归咎于他们。但是，这种转变之促成，是由于中国钦差大臣们认识到，听取徐日升的意见，并承认康熙皇帝选派徐日升为他的私人监督是明智的，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在谈判成功的结束之后，中国钦差大臣们，跟皇帝本人一样，都乐意公开承认这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尼布楚耶稣会士在谈判中起了保证实现康熙的意图的私人监督者的作用，并且他们是根据公开的正式谕旨被派充这个职位的。

对耶稣会士的作用，可以从以下的考虑中，得出更为确切的评

价。在本书的前言中，曾提到过由徐日升日记而产生的另一个有兴趣的问题：国际法在订立这个条约中起了什么作用？

徐日升日记中多次提到国际法。提到已经成为国际法的要素的那些原则的次数更多：如平等和互惠，在谈判中平等和互惠的必要，以及中国代表团在这方面的缺陷；人们在国际事务中应该具有的诚信，而中国代表则没有这种诚信；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观念等等。¹⁸ 除此之外，还可加上谈判的整个进行方式、条约的订立（会谈，会议，签字，宣誓等等），以至于那些小的细节，诸如对两国全权代表给以阁下的称呼，和用拉丁文作为外交语言。就算这些东西都已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内容，但是它们是否已贯彻于缔约国双方，即俄国和中国？如果是的话，又贯彻到什么程度？作为缔约双方之间的调停人的耶稣会士，对此又知道多少？

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无需追溯国际法在俄国和中国的全部历史中的发展。对这个问题，读者可参阅关于国际法历史的标准著作，例如：亚瑟·勒斯保写的《国际法简史》（纽约，1954年版），¹⁹ 以及其他同类著作。有关系的是要研究尼布楚条约订立时人们所承认的国际法，所以就必须要关于国际法起源和发展的争论撇开，而专研究当时已经确立和应用的基本原理。

有两件历史上的重要大事对于国际法的建立和实践是有贡献的：雨果·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的出版（1624年）和《维斯特法利亚和约》（1648年）。勒斯保说：“《战争与和平法》在国际法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事实上，它首创了近代国际法的原则，我们已看到这个原则必然是非宗教性的和没有歧视的。所以，认为格老秀斯是国际法的‘创立者’或‘鼻祖’，是正当的。”“至少有一个世纪，维斯特法利亚和约成为欧洲政治组织的体制。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于国际法历史的重要著作都以维斯特法利亚和约作为起点。事实上这个和约有时还被说成是欧洲国际法的起始。虽然这

种意见是不得当的，但是这个和约在国际法的发展上是一个划时期的事件。”“西欧国家的政治地位由于这个和约而发生很大变化。”“西欧的结构形态在此时期中基本上保持如维斯特法利亚和约所描画出来的样式。正如在格老秀斯的著作和维斯特法利亚和约之间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在教皇对格老秀斯的谴责（这部论著1626年被列入于禁书目录内，不过加上一个‘须待修改’的和缓的保留，到1899年才从禁书目录内除去）和这个和约之间也有着一种同样的联系。教皇英诺森十世，在《热爱天国》教令中，宣告构成和约的核心的宗教上的容忍异端和其他宗教条款‘作废、无效、不公平、非正义、应予谴责、轻浮、不生效力’——这个作废的声明也适用于根据条约所作的誓言。”“在订立维斯特法利亚和约之后，他（格老秀斯）的著作，用李维叶的话来说，成为‘欧洲国际法法典’，而且它的名声不仅限于欧洲。”“最后应该提到附加于该和约的法令。这个法令要求永远忘记和宽恕过去所作的敌对行为，因此所有根据这类行为而提出的赔偿要求都应‘埋葬’——这些话以后在其他条约中被一再重复。”²⁰

“到十七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俄国已熟悉订立维斯特法利亚条约时所采取的原则和程序。不过，这可能也是事实，直到1822年，情况对于国际法的研究，是特别不利的，因为俄国没有参加国际法起源的宗教和哲学运动。在对外关系上俄国的看法仍以拜占廷的传统占优势，到十八世纪及以后，才和西方的思想渐渐接近起来，在沙皇统治的最后几十年接近得就更快了。但是，整个说来，关于国际法问题的学问，水平是很低的，而且在俄国人思想中是不受到重视的。在俄国，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除了在二十世纪中曾印行一些节录外，从未出版。一直到1880年，有关国际法的唯一系统的俄文论著就是克卢白的书；一直到大约这同一时候，俄国作家在这方面只有一些不重要的研究著作。”²¹ 就国际法的研

究来说,虽则如此,但是关于国际法的实践,情况却大不相同。“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2—1727年),俄国加入了设置常驻使节的制度。”在同一统治者之下,俄国由于《奴斯达*条约》成为欧洲的一个大国,这个条约和在此以前的其他条约一样,是根据国际法订立的。不但如此,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格老秀斯的著作也有了一个翻译稿,这个翻译稿看来是为他的儿子阿列克赛而准备的。因此,俄国政府至少是知道格老秀斯的著作和在维斯特法利亚所建立的那些惯例的。

俄国在它的历史上和欧洲国家始终是有关系的,而且这种接触在维斯特法利亚和约订立之后有了扩大,然而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尼布楚条约订立之前,欧洲人曾到过中国,基督教也渗入了中国,但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却没有订立过国际协定。“只有葡萄牙人于1557年在澳门建立了一个居留地,这个居留地在高度的自治之下,证明是一个伟大的和持久的成就。在中国人看来,这个居留地只是由于他们的容忍才得以存在,他们一再声明他们对澳门享有主权和管辖权。直到十九世纪以前,没有订立过一个中葡条约。”²² 帝国时期的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自开始到1689年,自1689年到1842年和1842年以后。

在第一时期内,“中国抗拒和外国发生接触,所采取的方式是傲慢自大和令人屈辱的要求。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优越的,或者不如说任何其他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要求外国谈判代表在皇帝或皇帝的代表面前要磕一定数的头,磕头和他们所期望的礼物或贡物连在一起,就被中国人认为是中国宗主地位的证明。中国人的这种固执不化的态度到十九世纪才被打破。”²³ 徐日升对中国人的这种态度作了如下的说明:“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在帝国里从未接待过贡使以外的外国人。鞑靼人(即在四十六年以前

* 今芬兰乌西考蓬基。——译者

的 1644 年占领了中国的满洲人) 对于世界情况一无所知, 但却有着和中国人一样的自大感, 把其他民族都看做像他们的四邻民族一样的牧民。他们以为一切都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高傲地把中国称为‘天下’, 好像除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²⁴ 因此, 凡不愿遵从中国习俗的大使或使节就被打发走了。

从 1842 年开始的时期被称为“不平等条约时期”。“中国的闭关自守首先被中英《南京条约》(1842 年) 所侵犯。这个条约开放了五处中国口岸准许外国进行贸易, 并且确立了同级中英官员之间的平等地位。接着和其他国家也订立了同样的条约……”但是, 这种平等地位只是昙花一现; 西方列强的作为以及中国人的态度否定了这种平等地位。“这个世纪中所产生的中国和欧洲各国间的条约, 仿照近东的‘领事裁判权条约’具有不利于中国的显著的不平等的特点。这些条约多少都是以武力强加之于中国的, 其目的是为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获得特权, 而不给予中国人以互惠的让予。结果是, 中国的独立受到了严重的损害。”²⁵ 另一方面, 中国人虽被迫对比他们强的西方列强作出了让步, 但仍认为他们的文明胜于所有其他文明, 不肯承认西方国家是和他们平等的。直到“七十年代后期, 中国政府才在伦敦、华盛顿和西方的几个首都设立公使馆……这样就接受了在国际平等的基础上的外交来往。”“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只是在经过长时的拖延后才勉强由皇帝接见, 而且就在接见时, 又用了巧妙的保持面子的办法, 使中国人认为中国位在所有各国之上的传统信念, 得到一些安慰。直到 1894 年在对日战争中开头吃了几次败仗后, 才按照完全使西方世界各国公使满意的礼仪举行了一次觐见。”²⁶

这两个时期都可以把同近东的“领事裁判权条约”看齐作为其特点:²⁷ 在第一时期中, 中国所让与的一切, 都出于单方面的赐予或特许的形式, 这种形式满足了皇帝根据中国文化优越而产生的

气派宏伟感；在第二时期中，中国所让与的一切，由于中国的衰弱，都出于强加于它的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就是中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和俄国订立两个条约的时候。这两个条约就是《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这两个条约都一直有效到大约十九世纪中叶。²⁸ 这篇论文只限讨论尼布楚条约，所以无需把这两个条约作一番详细的比较，而只要研究一下为什么1689年中国放弃了它的传统态度，并且在国际法所确立的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和俄国发生了条约关系。导致尼布楚条约的订立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在本书头三章中已经叙述过了。康熙皇帝要和俄国讲和，以便可以无牵掣地去对付准噶尔蒙古人。不但如此，他要求有一个尽可能严格约束俄国人的条约。他情愿至少暂时牺牲传统的中国态度和优越感，以达到这个目的。看来接受当时已深入俄国的国际法的原则和办法，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恰当的手段。但是康熙皇帝怎么会知道国际法？知道多少？二十多年来，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俄外交交涉中曾充任中间人；而且，他们又是皇帝的关于西方科学技术的顾问和老师。从他们的报告中，人们知道，皇帝对西方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十分感兴趣。但是，耶稣会士自己对于国际法的情况又知道多少？在北京的传教士远离欧洲，而交通情况又不是象现在这样。姑且假定，格老秀斯的贡献和著作既列入禁书目录，他们是无法把它拿到手来实际运用的；但是，在维斯特法利亚和约和后来的条约中所用的格老秀斯著作中的原则，他们一定看到过的。再说，即使格老秀斯对制定近代国际法的贡献是杰出的，然而他也不是这一行中独一无二的人。维多利亚和苏阿瑞兹的贡献也很重要，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是知道他们的著作的，特别是苏阿瑞兹的著作。这些耶稣会士之中有些人曾在科因布拉大学学习，而苏阿瑞兹就在那里教书。不但如此，在1648年左右，马丁·马提尼神甫曾开始将苏阿瑞兹的著作

译成中文。²⁹

除了这些推论的理由可以证明国际法对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和订立可能有影响之外，还有一些正面的迹象。第一个迹象就是康熙皇帝愿意派一个议和代表团到帝国境外去这件事。甚至象他这样一位权力很大的皇帝，也不可能在北京和俄国在平等条件下进行谈判，而不致惹起公众的反对。然而，既要订立一个对俄国人具有最大约束力的条约，那么就必须按照国际法来订立，也就是说，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来订立。他情愿舍弃传统的中国态度和中国办法。他希望这样做而不致触犯中国的舆论，所以派他的代表到帝国的境外去，在那里谈判将不会受到公众的注视。徐日升在叙述葡萄牙使臣曼纽尔·萨尔丹哈出使北京时说：“但是，事情的真相是，如果其他欧洲人来了，我想，除非他们像荷兰人那样接受藩属地位的耻辱，否则就不会允许他们前来。我听说荷兰人甚至非常屈辱地每年进贡，以取得他们所十分希望得到的贸易的许可。但是，即令作了这样的屈服，他们仍未得到这个许可。”谈论到俄国人在尼布楚所占的便宜，徐日升说：“不过，这位俄国使臣如果到中国去，就决不会有这样有利的地位，因为在中国他们将会迫使他，正如他们迫使以前到中国来的那些人一样，要么服从中国的习俗，要么就不能缔结和约而回国。由于他不愿去中国的朝廷，他就迫使他们离开本国，在所谓的边界上谈判和平，从而使他获得体面和平等。”³⁰ 在最后一段里，“迫使他们”这些字眼太强烈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俄国要求在中国境外举行和平会议，并提出在色楞格斯克举行。但是，俄国仍“认为中国可能要求在其本国领土上举行外交会谈。为了应付这种情况，1687年10月26日向戈洛文发出了一道新训令……”³¹ 这时中国的地位比俄国的地位更为有利；如果中国坚持会议必须在中国领土上举行，俄国就不得不同意。但是，康熙自有其理由接受了俄方的建议，选定了色楞格斯克作为会

议地点。但是，即令同意和俄国人在中国境外举行会谈，康熙还是要保持一种能使他凭实力来谈判的地位。这从伴同派往色楞格斯克(1688年)后派往尼布楚(1689年)的代表团的军队人数和实力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但如此，康熙皇帝对进行谈判的方式所作的让步也只是专对这一次谈判，并不打算以此作为以后谈判的先例。

另一件说明康熙皇帝要求一切按照国际法办事的事，就是他派徐日升和张诚同他的代表一道去。徐日升本人告诉我们说，他和张诚不仅是译员，派他们去也不是为了刺探各钦差大臣的作为向皇帝报告。只要读一读徐日升日记便可看得出，他的任务就是务必要使一切都按照国际法原则办事，也就是说，排除中国人对俄国人的猜疑，提供中国人所需要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没有这一个条件就不能在平等基础上达成协议。为了使徐日升能完成这一任务，康熙曾对他和张诚优渥有加。皇帝自己说：“我以给予你们所随同前往交涉重要事务的大员们同样的尊荣来对待你们。”

康熙要在每一细节上都遵守国际法的意愿，从这一件事上也可以证明：他的代表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而他却命令他们宣誓，使这个条约按照天主教的原则宣告成立。他们为此预备好了一套话。俄国人提出异议，他们担心这套话会引起中国人方面的迷信。俄国人要求双方都作一种规定尽可能最严格的义务的誓言。最后，中国人采用了俄国人的誓文。

在其他每一细节上：即条约的写作、签署、盖印和互换，都严格遵守了国际惯例，以至于在条约中加入法令，这是自维斯特法利亚和约以来条约中都会使用的办法。条约的正式文本使用了拉丁文，又是另一证明。

最后，必须对这个重要问题说两句：为什么像《尼布楚条约》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前从来没有详细的专门论著研究过？围

绕着这个条约的产生的情况和进行订立这个条约所采取的办法，使人可以猜想为什么这个条约在中国史书中受到忽视。康熙皇帝之所以出之以空前的创举，愿意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境外去订立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条约，其原因也说明他之所以不愿这个条约在中国受到注意。公布这个条约及其订立的情况，就会产生恰恰是皇帝所要避免的结果，那就是为人所周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象 1689 年这样庞大烜赫的代表团竟没有设置中国秘书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任何史料竟丝毫没有提到这个条约的文本。甚至《实录》中也只有碑文。康熙的让步只是为了这一次的事情，而不是为创立一个中国对外国人的新态度的先例。在雍正和乾隆朝时期，文字之防不是放松而是加紧了。康熙以后几乎一直到清朝末年的历朝皇帝，都坚持中国的传统态度。清朝灭亡后，西方对中国主权的侵略及当时的其他迫切问题，受到了中国史学家的注意。但是，由于方才所说的原因，近代学者发现要从中国史料中得到关于这一时期的资料是很困难的。

由于俄国人后来的种种成功，所以在他们看来，尼布楚条约是外交上的失败，少谈为妙。等到这个耻辱为十九世纪俄国外交上的胜利所洗刷之后，俄国史学家们又忙于研究当时的其他问题。甚至和这个条约关系最密切的文件——戈洛文的正式报告，也一直未发表过，到 1912 年才被葛斯顿·加恩在莫斯科外交部档案中发现，但至今仍未发表。

自从 1958 年写了以上各段后，在苏联出版了一本有关尼布楚条约的书。这是普拉斯科维亚·季卓诺夫娜·雅可夫列娃的作品，书名《1689 年的第一个俄中条约》。这本书于 1958 年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名义，由该院的出版社出版。在绪言（第 3—13 页）之后的第一章《中俄关系的起始》（第 14—126 页）中，雅可夫列娃（在第一节，第 14—80 页上）论述俄国向太平洋沿岸的推

进和沙皇政府对东西伯利亚的政策。她讨论了十七世纪黑龙江流域的居民(第 16—60 页),叙述了俄国人怎样熟悉了外贝加尔湖和黑龙江地区(第 40—51 页),他们怎样伸入达呼尔地区(第 51—71 页)以及他们和各蒙古汗的关系(第 71—80 页)。然后(在第二节,第 80—126 页上),她概述了中俄贸易和外交关系的开始以及这些关系中的突出的问题:俄国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团(第 91—111 页),十七世纪的中俄贸易(第 112—114 页)和 1638 年至 1689 年间清军和俄国哥萨克人在黑龙江流域的冲突(第 115—126 页)。在第二章《尼布楚条约的准备工作 and 它的订立》(第 127—209 页)中,讨论了以下的题目:

1. 双方使臣会议的准备,双方代表团的组成以及它们的权力和所奉到的训令(第一节,第 127—162 页),其中详述了关于俄国代表团的情况(第 127—136 页)和戈洛文在会议的筹备中的活动(第 136—151 页);中国代表团(第 151—155 页)及其 1688 年自北京启程(第 155—162 页)。
2. 中俄在尼布楚的谈判(第二节,第 162—189 页),叙述了 1689 年 8 月 12 日双方使臣的初次会议(第 162—166 页),第二次会议和因卫队问题引起的会议的中断(第 167—171 页),中国军队对尼布楚的包围(第 171—185 页)和 1689 年 8 月 27 日双方使臣的第三次会议(第 185—189 页)。
3. 尼布楚条约的关系所在及其历史意义(第三节,第 189—210 页)。然后,在简短的结论之后,雅可夫列娃在三个附录中,提供了条约的(俄文)文本(第 214—216 页),戈洛文的旅行命令(第 217—218 页)和他所奉到的证书(第 217—220 页)。书末有一个参考书目(第 221—224 页),人名索引(第 225—231 页)和地名索引(第 231—234 页)。

雅可夫列娃虽用了俄国档案中的未经发表的材料(第 6—10 页),但这些材料葛斯顿·加恩和约翰·巴德雷都已用过,因此没

有给我们的知识增加什么新的东西。除了在附录中的三个短文件外，她没有发表什么文件。在她的三页半的参考书目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占了整整一页；书目中没有一本俄文之外的书，虽然荷尔德的书和福克斯的文章在书里都曾提到过。福克斯被说成是一个天主教传教士，而徐日升则被说成是一个西班牙人。加恩、巴德雷和其他论述尼布楚条约的切题的著作完全被忽略了。这本书没有给我们的知识增加什么新的材料，而是代表了苏联官方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声调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态度。

这些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其他国家的史学家的兴趣。

注 释

- 1 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 100—101, 123 页。
- 2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华关系史，1689—1730 年》（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le-Grand [1689—1730]*），第 VII—IX，47—48 页。又参阅此书英文节译本李治译：《早期中俄关系史》（*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第 31 页。
- 3 《耶稣会罗马档案》，Pol. 79 f. 166v。
- 4 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92 页。
- 5 徐日升：《日记》，第 55—57 节。
- 6 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 123 页。
- 7 皮尔林：《俄国与教廷》，第 4 卷。《耶稣会罗马档案》，Lith. 42, II ff. 431ar—431cv，有关于此项驱逐事的详细报告。
- 8 徐日升：《日记》，第 21 节。
- 9 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 124—125 页。
- 10 同上书。关于克里桑尼奇的更详细的情况，参阅：皮尔林：前书，第 4 卷，第 1—39 页；关于尼古赖，参阅巴乃台斯科：《尼古赖》（Panaitezcu: *Nicolas Spathar Milesco*），载《法国罗马学院文集》，第一编；关于南怀仁，参阅费赖之：前书，第 338—363 页及鲍斯曼的一些文章。
- 11 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 123 页。
- 12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 508 页。
- 13 徐日升：《日记》，第 23、30、39、45 节。
- 14 同上书，第 40 节。
- 15 1689 年 3 月 30 日信。鲍斯曼：《南怀仁与俄国宫廷的关系问题》，第 218—222

页。拉丁原文,见《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 164 ff. 148—149。

16 费赖之:前书,第 501—517,667—693,890—902 页;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 126 页。

17 费赖之:前书,第 382—383 页。

18 徐日升:《日记》,散见全书。

19 勒斯保:《国际法简史》(Nussbaum: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第 3—4, 49—51, 58—60, 65—66, 123 页。

20 同上书,第 113—117 页。据巴斯脱:《教皇史》(英译本),第 30 卷,第 130 页上说:“在瑞典人开始自德国撤退后,由于下令执行 1650 年 6 月 26 日在纽伦堡公布的和约,教皇于 8 月 20 日发出命令,把教皇对和约的抗议发给所有教廷驻外使节,以便他们将教廷的意见公布。但是,所采取的方式不是如最初所打算的用教谕来发表,而只是用了教书。这个教书的日期推前到 1648 年 11 月 26 日,它对于和约本身未加谴责,也没有谴责和约的全部条款,而只是谴责了那些损害教会的条款。”同上书,第 4 页上:“经常有人这样说——最近的例子就是莫勃特(Mirbt: *Quellen*, 202)——英诺森十世曾用教谕提出抗议,这是错误的,那个文件是一个教书……”

21 勒斯保:前书,第 248 页。

22 同上书,第 65—66, 125, 348 页注 120。

23 同上书,第 123 页。

24 徐日升:《日记》,第 14 节。

25 勒斯保:前书,第 194—195 页。

26 拉都瑞特:《中国近代史》(Latourette: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第 74, 81 页。

27 关于这些领事裁判权条约的性质,参阅勒斯保:前书,第 55 页。

28 关于这两个条约和它们在两国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勒斯保(前书,第 123—4 页)用以下的话来加以说明:“但是,俄国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曾取得有限的协定,当时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已使它和中国北方的疆土发生直接的接触和冲突。1689 年,在尼布楚(靠近满洲边境)订立了一个中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在互惠的基础上,开放了中俄边界进行贸易。又对引渡问题订出了详细规则……1727 年,经过一场剑拔弩张的斗争后,尼布楚条约又代之以恰克图(在贝加尔湖以南)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关于边界的规定外,都仿照以前的协定。不过,允许了俄国人可以常川驻使,又让正教教会的四个僧人前来,并且准许了正教奉行其信仰。前几年对在天主教的教士所下的驱逐令,使这个协议显得突出。1733 年,北京派了一个使团去莫斯科——这在亚洲外交上是一桩非常的事件,也是一件令人十分惊异的事情。和西方国家就没有建立这样的联系;但是,同俄国的关系也仍是很有限制的。总的说来,在整个这一时期中一直仍是闭关自守。”对于这一段话,我想作如下的评论: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都是正式的条约;恰克图条约并没有代替而是补充了尼布楚条约。参阅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前书,第 139—140, 190 页;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 25 页;吴蔼宸:《中国与苏联》(A. K. Wu: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第 60—61 页。中国并未在 1733 年派使去莫斯科,但在 1729 年派过一次使节,1731 年又派过一次使节,1712 年图理琛的

出使土尔扈特部不算。参阅曼考尔：《中国派往俄国的第一次使团，1729—1731年》(Mancall: *China's First Mission to Russia, 1729—1731*)，载《东亚地区研究讨论会有关中国的论文集》(*Papers on China from the East Asia Regional Studies Seminar*，哈佛大学的地区研究委员会东亚组不公开发行的誉印本)，第9号(1955年)，第75—110页；费赖之：前书，第507页。

29 费赖之：前书，第262页，注13。

30 徐日升：《日记》，第16、27节。

31 加恩(李治译)：前书，第11页。

第六章 尼布楚条约订立以后¹

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以后，中俄两国彼此相待的政策仍和以前一样的不同。这种差别是基于双方所信奉的政治理论的分歧。指导俄国的理论是由彼得大帝提出的，他认为俄国在远东只有两种可能：“打仗或贸易”。因为他在欧洲所进行的战争使他忙不过来在远东再打仗，所以他就选择了贸易。另一方面，中国对它和俄国的关系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它既不要贸易，也不要战争。它只要求把它认为属于它的宗主权之下的地方与俄国的影响隔绝，以便使这些地方安谧无事。它的主要目的是将蒙古和黑龙江地区封闭，不让俄国人进入，并将这些地区变成一个由中国完全控制的缓冲地带。它同意等到它完成了这些地区的绥靖工作后，再进行贸易。

中国对蒙古人的政策 甚至在外蒙古摆脱噶尔丹的侵略之前(1697年)，康熙皇帝为了表示中国和在内蒙古避难的喀尔喀人的亲近，在1691—1698年间，曾数次出行关外，而且总是带着排场很大的随从人员，以炫耀于喀尔喀的王公。²这样就加强了中国在外蒙古的势力；外蒙古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这些地方内部的管理仍掌握在蒙古人手中，中国的保护权只不过是加于既有的制度之上的上层建筑。中国的保护权所及，倒不是那些领土，而是其人民和各“盟”的组合。中国既不企图发展这个第二流的草原地，也不想通过殖民来增加其人口。相反地，北京政府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止殖民。《理藩院则例》(载有所有自建立保护权以来所采行的规章，最初于1696年由康熙颁布，经1789年在乾隆时和1815年

在嘉庆时修订,其中的重要规定甚至在十九世纪时仍然有效)禁止中国人越过蒙古边界,在那里耕地或和蒙女结婚。中国要在它自己的边区之外有一个封闭的战略上的缓冲国家,其人口越少越好。由于从西伯利亚到北京最短的商队路线通过外蒙古,所以外蒙古有一段时期仍是开放的。但是,渐渐采取了一些倾向于使外蒙和外界隔绝的措施。喀尔喀的首领们被禁止和外国发生关系,在边界上对外国商人和信使的管理也加强了。这种管理权从蒙古人手里转移到了驻库伦清朝官员的手中。但是,只要俄蒙边界未经划定,所有这些措施的效果都是很小的。尼布楚条约对这条一千八百公里的边界线仍然未予确定。俄国并不急于建立一条固定的边界,因为那就会等于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而俄国自认为基于1634年阿勒坦汗的归服,它在外蒙古也享有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康熙帝的坚持,俄国只得同意达成一个解决办法,这由恰克图条约(1727年签订)完成了。外蒙古就这样对俄国人关了门。官方的商队仍可通过外蒙古到北京去,但一般说来俄国贸易只限在边界地带,主要是在恰克图,而派往北京的官方商队的次数减少了。从尼布楚条约(1689年)到恰克图条约(1727年)期间,俄国共派了十二次官方商队到北京去。在恰克图条约之后,它所能派的商队只不过六次,到1762年,各种困难迫使它完全放弃派遣商队前往中国。从此以后,只剩下了在恰克图的贸易,而这项贸易在1762—1792年三十年间,也被中国总共停止过二十年。征伐准噶尔给内、外蒙古带来很重的负担,在此期间,喀尔喀王公们曾有几(特别是在1756年)向俄国人接洽,请求俄国的保护。但是,乾隆终于平定了叛乱,确立了他的权威。这样,外蒙古便被隔离了。俄国人只留有在北京的“宗教使团”,而这个“宗教使团”在十九世纪之前仅有科学上的意义而已。³

外蒙古平定后,中国集中其注意力于厄鲁特蒙古人。噶尔丹

在 1688 年侵入外蒙古之后，回到了科布多，在那里和他的侄子僧格的儿子策旺阿拉布坦发生了纠纷。1690 年，他再度侵入外蒙古，七月中在色耶尔希山南面击败了清军和蒙军的外卫。1696 年，他又侵入外蒙古。这一次，康熙亲率中国军队，打败了噶尔丹。⁴ 噶尔丹死于 1697 年，这样便结束了平定蒙古厄鲁特部的第一阶段。继噶尔丹之位的是策旺阿拉布坦。策旺不久将他的统治扩大到西伯利亚、蒙古西部和东土耳其斯坦的某些部分。自 1698 年以后，他把他的宗主权向西扩张到巴尔喀什湖。1704 年，他打败了阿玉奇的一个儿子，并将一万多名土尔扈特人并入他的军队。1715 年后，他侵入哈密和西藏。1720 年，康熙派两支远征军去收复西藏，策旺才从西藏撤退。

虽然中国取得了这些胜利，但是由于 1722 年康熙去世前后关于帝位继承问题的宫廷政治关系，蒙古的事情也停顿下来。在此期间，策旺阿拉布坦向西和向北扩张，因此和正在迫近东土耳其斯坦的在前进中的俄国人发生了冲突。俄国人两次兵败，一次在加缪谢夫斯基附近(1715 年)，另一次在斋桑湖附近(1720 年)。在此以后，俄国人暂时放弃了要征服土耳其斯坦的计划；两国间的贸易欣向荣达三十年。策旺阿拉布坦死于 1727 年，他的继位者噶尔丹策零继续对中国的战争。他感到在蒙古不能取得进展，于是便同意与中国订约，规定以阿尔泰山为准噶尔控制地区和中国之间的分界线。这样，平定蒙古厄鲁特部的第二阶段便告一段落。

1750 年至 1757 年为最后第三阶段，这时准噶尔部队由喇嘛达尔扎、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率领。这一阶段以 1757 年中国侵入伊犁而告结束。因为东哈萨克已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地位，阿睦尔撒纳只得逃往西伯利亚，在那里死去。已经迁移到里海并且康熙帝曾派图理琛于 1712—1715 年前往出使的土尔扈特部，听说蒙古准噶尔部已被消灭，于是在 1771—1772 年间慢慢地迁移回来。在

经过长途跋涉后仍生存着的人，分得了科布多西南的草原地。

这样，中国的宗主权便扩大深入到中亚，新疆北部和外蒙西部（1727年恰克图条约已确定其边界）的边界线沿额尔齐斯河下游向斋桑湖以北扩展了约一百哩。这是中国和俄国两国间的西北疆界。平定了的地区并入了在理藩院管辖下的中国的殖民体系之内。

中国对黑龙江地区的政策 清朝皇帝和朝廷，因为忙于平定蒙古喀尔喀部和厄鲁特部，没有对黑龙江地区给以很多注意。为了要保持这些地方作为一个缓冲地带，实行了不准汉人移殖到这地区的政策。满洲本来人口就很稀少；而为了要防止满人被汉人同化，为了使当地人保有人参的利润，以及为了要保护皇室的御猎场，满清朝廷就有意保持这种人口稀少的状况。1740年、1750年、1762年、1811年和1847年都曾发布了这样的谕旨。为了便于执行这些谕旨，中国的清朝政府仿照造“边墙”的模样（边墙为明朝所造，自长城横越南满直达鸭绿江）建造了“柳条边”，防止汉人移民进入北满和黑龙江以北的地区。不仅汉人被禁止进入北满，而且连满人也被禁止到松花江上游的三姓城以北。为了执行这些规定，还设置了岗哨。与黑龙江上的本地居民进行贸易的特权专给予十个商人，他们为此须从北京取得执照。所以，在黑龙江的左岸几乎没有中国居民。1756年富僧阿将军在巡察（仅有的一次这种巡察）这个地区后报告说，这里全无人迹，因为这块地方天气太冷，甚至兽类和植物都无法生存。黑龙江将军奕山于1850年报告称，黑龙江以外的地区是一片荒地，只有寥寥无几的满族猎人在结雅河口与赫尔摩辛村之间的黑龙江岸上搭篷居住。十九世纪的西方旅行家米登道夫于1844年、维瑙尔特⁵于1850年、阿克特⁶于1852年和科林斯⁷于1852年后数年，都曾注意到这里实际上没有中国人。

俄国的政策 紧接着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国对华关系政策的目标是扩大贸易关系。这就是后来历次派遣外交使节——艾弗拉德·伊兹布兰德·艾杰斯(1692—1695年),列昂·瓦西里耶维奇·伊兹玛依洛夫(1719—1722年)和萨瓦·符拉迪斯拉维奇·拉古辛斯基伯爵(1725—1727年)——的主要目的。这也是洛伦茨·兰格(三次)留在北京的目的。从1696年到1721年,俄国人派出了十二次商队前往北京。但是,在确定蒙古边界和引渡西伯利亚的蒙古逃犯问题上,发生了新的纠纷。就在康熙死去之前,局势已达到一个紧急阶段。最后,恰克图条约解决了这些问题。尽管俄国答应了这些条件并且遵守在恰克图所规定的关于蒙古边界的章程,以及在尼布楚条约中所规定的关于黑龙江地区的章程,它还是不能扩大它的对华贸易关系。1727年以后,只有几次商队来到北京,此后贸易就移到恰克图去了。

为什么尽管有这种情况俄国人仍坚持和平与不干涉的政策呢?

自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关于俄国在亚洲的政策,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积极的”“有力的”和“扩张的”政策,以十八世纪的兰格、缪勒、米亚特莱夫(西伯利亚总督)和雅可比(色楞格斯克司令官),十九世纪的涅维尔斯科依和穆拉维约夫,以及二十世纪的科尔萨科夫、科罗斯托维茨等人代表。“保守的”和比较谨慎的一派是:十八世纪的萨瓦·符拉迪斯拉维奇·拉古辛斯基伯爵(在恰克图举行的谈判的代表,“维持现状”政策的制定者)、奥斯特曼(外交大臣)、巴宁首相和喀德琳二世,十九世纪的尼塞罗罗德和伏龙可夫,以及二十世纪的威特、萨扎诺夫等人。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保守派占上风。从长远来看,这个政策证明是能使俄国获得最大利益的。

俄国也从中国的政策中获得很大好处:俄国在西伯利亚人口

稀少和防御薄弱的领地，因而得以保全；重要的殖民事务得以推行无阻。平定外蒙古和新疆之事使中国人和蒙古人都受到牵掣，这就使俄国得以放手进行其殖民活动。不仅如此，中国的军事征伐（单是伊犁和新疆之役就花费了约二千三百万两银子）到乾隆的后继者嘉庆年代（1796—1820年），开始感到其影响；库存枯竭，税收减少。中国的隔离政策和沿边界设立缓冲地带的做法，结果也都是对俄国有利的。到十九世纪中叶，黑龙江地区人口不到一万一千土著居民，而乌苏里江地区人口则不到二千人。

这些因素，再加上耶稣会士的影响及他们的地理知识的消失，就为从俄国历史上的沙皇时代和共产党时代一直到中国在共产党集团内是俄国的“弟弟”或“小伙伴”的现在的俄国的侵略开辟了道路。

尼布楚条约订立后的耶稣会士 由于他们在尼布楚为中国做了事，耶稣会教士取得了他们长时以来所希望和所致力以求的容许基督教传教的谕旨（1692年）。所以，就中国来说，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从莫斯科却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为俄国人帮了忙的报酬；他们还是没有那条陆上的路线。甚至在俄国代表团从尼布楚回来之前，莫斯科的耶稣会士的居所在1689年10月就被封闭了。⁸这就取消了他们在俄国中心地的前哨站。对于这个前哨站，他们会寄以很大希望，以实现他们所向往的西伯利亚路线计划。在他们的莫斯科居所被封的坏消息到达之前和以后，他们在罗马和北京仍继续为这个目的而努力。这个消息到1694年才传到北京。⁹

在法国和波兰的耶稣会士和闵我神甫在莫斯科一再未能取得取道西伯利亚陆路的许可之后，罗马总会又再度转移其注意力于亚美尼亚。他们决定筹办一个较大的远征队，并且要更有计划地完成这次行程。不要再因为一个人生病或死亡而使整个远征

队垮台。新的计划是：第一，以闵明我神甫为教长，并以当时在伊斯坦布尔的薄贤士神甫为向导，派出以十个或十二个教士组成的一队至亚美尼亚；第二，在亚美尼亚的传教会应予加强，对年轻教士应授以当地语言和风俗的教育；第三，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应设前进站，将来可能向中国推进；第四，每年须组成新的传教士队，经伊斯坦布尔、特拉布松和埃尔祖鲁姆前往亚美尼亚，以替代那里的传教士，让他们能继续东行的旅程，他们在东方在甘肃的回教区能应用他们所学到的语言知识。按照这个计划，1691年秋季，以闵明我神甫为首的十二个耶稣会士进入了伊斯坦布尔。薄贤士在那里已经等候了两年，他的旅程因为叙里伯爵在波斯被害事而受到阻滞。在伊斯坦布尔留下了两位牧师，其他的人于12月8日乘船去特拉布松，再从特拉布松由陆路到达土属亚美尼亚的首府埃尔祖鲁姆。他们于1692年2月6日到达，维洛特神甫和另两个耶稣会士在这里迎接他们。从这里，他们去到伊斯法罕，在伊斯法罕他们改变了原来的计划。闵明我神甫认识到，走陆路他就不能很快地到达北京。他选定了舒赫、得·贝斯和阿尚博三神甫随同他去霍木兹和印度。这两位法国人，得·贝斯和阿尚博，在到达中国后，将西去和薄贤士建立联系。与此同时，薄贤士将和两个同伴向东前进。维洛特神甫在埃尔祖鲁姆应重建最近在宗教迫害中被毁的居所。舒赫死于波斯，闵明我只得单独从果阿继续前往中国的旅程，因为葡萄牙当局不准那两位法国人继续往前走。这两个人不久都死了。与此同时，薄贤士神甫也已自波斯启行，但是遭到失败。1694年，他和三个同伴开始折回到叙利亚去的旅程；他们打算去罗马取得新的训令和供应。他们之中两人到欧洲去，而薄贤士和布列夫登特则在阿勒颇等候。1695年9月，罗马的训令到了。布列夫登特须去埃及，而薄贤士则被派往印度西北海岸上的苏拉特。薄贤士在苏拉特一直待到1699年。

薄贤士在苏拉特时，有一天一位陌生的客人名叫劳伦斯·凡·杜因的来见他。他对薄贤士说明，他是一个佛来米族的耶稣会士，原名杰拉得·阿诺德·莱许卫尔特。他是从莫斯科来的。1696年，总会会长密令他试图越过西伯利亚而派他到莫斯科去。尽管他严密地不露真名，克里姆林宫也予以拒绝。他于是来到波斯，要找一条通过撒马尔罕到甘肃去的路线。他已经等了整整一年以执行他的计划，但最后他只得决定由海上前往果阿。在赴果阿途中，他来访问薄贤士。为了结束他的冒险事业，他对巴塞姆的葡萄牙官厅说出了他的原名。他们强迫他往北回到波斯去。1700年，他再度在伊斯法罕等待了漫长的四个月，仍然指望由陆路前往中国，但是又失败了。这时，他才经过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回到他的本国去。薄贤士神甫在苏拉特待了数年，最后于1699年11月搭了一条英国船前往中国。这样就结束了法国耶稣会士要找一条到中国去的陆上路线的戏剧性的奋斗。

这一切虽引起很大的失望，但并不出乎意料。在罗马，总会长和他的左右人员对能否取得俄国许可一直是怀疑的；同时在北京，葡萄牙人对陆上路线的反对使这事的实现也成为问题。安东尼·托马斯神甫¹⁰，在1690年9月6日写信给总会长报告说，北京收到了那四个要通过西伯利亚旅行的耶稣会士从莫斯科的来信，要求他们的北京同事们的帮助。托马斯神甫以为这四位神甫已在来北京的途中，他和在北京的其他人想将此事告诉康熙皇帝，请他帮助。但是，由于徐日升神甫和其他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坚决主张，副大主教多明尼克·加比亚尼神甫命令他们不要这样做。副大主教并禁止张诚神甫向康熙提出愿自陆路赴莫斯科一行，即令此行可促成一条陆上路线的开辟，而开辟了陆上路线将使耶稣会能为两国做一些大事。托马斯神甫接着说，虽然他已送去了一张地图，和同冈明我神甫“经过莫斯科”情况的说明，但因为他获得了新的情

报,所以他现在又送一份更详细的地图和更准确的资料,而且还要继续这样做。他还说,康熙皇帝对此计划很感兴趣,只有葡萄牙人是反对这个计划的。如果冈明我神甫取道西伯利亚回去,他将使皇帝大为高兴。¹¹但是,冈明我神甫未能取得彼得大帝对他所计划的由陆路旅行的许可。当时,其他耶稣会士也都未获得许可,不过他们都不放弃努力。在1696年9月24日发出的另一报告中,托马斯神甫叙述了1692年所发生的事情。他说,那一年1月里,张诚神甫秘密地向皇帝表示愿作一次陆路旅行。¹²1688年南怀仁神甫去世,而南怀仁神甫是双方都尊敬的,因此对双方都能施加一种约束的影响。他死后,在中国的法国和葡萄牙的耶稣会士之间的冲突便表面化了。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是属于政治性质的。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力图保卫葡萄牙的宗教保护权的既得利益,而法国的耶稣会士则要想执行路易十四世所批准的寻找一条陆上路线的计划。

伊斯布兰德·艾杰斯到北京后,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发现,对陆上路线有一个比葡萄牙人更大的障碍,那就是彼得大帝,因为他们刚刚得悉关于他们在莫斯科的居所被封闭之事。托马斯神甫用下面的话来表示他对这个令人惊愕的消息的感想:“我们今后对莫斯科的人可不要信任啊,我们为他们做了好事,他们却以侮辱来报答我们。”¹³虽然莫斯科居所被封的坏消息于1694年8月冈明我神甫回到北京时得到了证实,但是1700年11月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接到了总会长(于1699年1月)写的一封信,将过去几年内欧洲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因而使他们再度引起了希望。在1689年(耶稣会士从俄国被赶出来)到1709年(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大败瑞典人)之间,欧洲的耶稣会士非常活跃。彼得大帝对西方和教廷作了许多友好的表示;博里斯·切列梅捷夫的出使(1698年)和彼得大帝的访问维也纳(1698年下半年),使西方的许多人都希望罗

马和莫斯科能重新统一。如果这种希望竟得实现，象开辟陆上路线之类的小问题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可惜，这些希望永未实现，在波尔塔瓦大捷之后，彼得大帝的态度变了。

但是，在罗马和北京，他们依旧为同一目的而努力；仍在波斯工作的维洛特神甫充当了中间人。在流亡于西班牙时加入了基督教的一位鞑靼王子凯马其，请求维洛特神甫帮助他回到他的本国去取得他的合法的统治者的地位，并在他的本国推广基督教。这位王子在旅行中改名“唐·卡罗斯”。但是，波斯人使他的计划归于失败，他又回到了西班牙。

在罗马的教廷这时认识到，陆上路线的那个想法必须干脆放弃。况且，这时候，由海上前往中国的传教士觉得在法国船上和英国船上有了较好的旅行条件。另一方面，到中国去的传教士的人数也迅速减少了，因为在康熙以后历朝，中国的大门又再度对传教士关闭了。

只有在北京清朝宫廷的耶稣会士仍坚持不懈地要找一找陆上路线。他们对于寻找一条陆上路线有更多一层的兴趣，因为如果有需要时，他们随时可用它来传递信件。十八世纪初，为绘制中国大地图而进行测量工作的教士深入了蒙古和新疆。从这些地方，不难探查一下越过捷烈克隘口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丝绸之路”。但是，俄国也向南扩张了它的领域，对这方面的宝贵的秘密也唯恐为人所知。但是，1721年它很恼火地被迫把门打开让一位耶稣会士进来。这是因为康熙皇帝在伊兹玛依洛夫来使时，明确表示希望喜大教¹⁴神甫能随同沙皇的使臣前往莫斯科。康熙说，他有几封紧急的信交给喜大教神甫带给教皇。这一次，俄国人为了不使他们的使团失败不能不答应。这样，喜大教于1721年3月21日跟伊兹玛依洛夫使团一起离开了北京。沙皇尽量使他在莫斯科大公国的边境上等候很久，才准许他继续他的旅程。1722年

10月，他到达了罗马。他是唯一曾获得这种许可的人。

在中世纪“蒙古主宰世界”时期，修道士和其他旅行家曾经更快地、更安全地完成他们的陆上旅行。当时，从顿河到黄河有定期的邮件传递。蒙古人很自豪地说：“一个年轻的女郎，带着一袋子的黄金，能够单独地从帝国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而不致受到丝毫的伤害。”蒙古帝国崩溃后，由于伊斯兰教的胜利和俄国的保密态度，联系东西方之间的这条大路给堵塞了。直到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才有几个耶稣会士（本书作者是其一）经这条穿过西伯利亚的路线到达中国，不过还是有很大困难，而且要绝对不公开他们的身分和真名。

注 释

1 详阅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华关系史，1689—1730年》（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le-Grand [1689—1730]*），第55—73, 75—113, 153—169, 171—244页；《嘉庆会典事例》（1818年，北京），一三四，第13—17页；《清高宗纯皇帝实录》（1937年，伪满洲国版），七四三，第4页及一〇二三，第8—9页；杜锦：前书；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252—422页；亨梅尔：前书，第1卷，第9—11, 267, 370页及第2卷，第758—759页；稻叶岩吉：《满洲发达史》，第322—343页；《光绪会典事例》（1899年，北京），一六七，第6—7页；巴夫洛夫斯基：前书；普拉特勒：前书；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Ravenst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弗拉第米尔：前书；吴蔼宸：《中国与苏联》；程天放：《中俄关系史》（Ch'eng T'ien-fong: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2 关于这几次出巡，详阅荷尔德：前书，第4卷，第252—422页。

3 杜锦：前书；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22—23, 32—34页。

4 《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49 ff. 619r—647v上，对于这次战争有饶有趣味的描述，篇名：《康熙皇帝率清军对鞑靼王公之战（1697年）》。又参阅同书，日本—中国，105 II ff. 319v—355v。

5 拉文斯坦：前书，第100—101, 102页。

6 弗拉第米尔：前书，第196页。

7 科林斯：《航行黑龙江记》（Collins: *A Voyage down the Amur*），第199页以下。

8 皮尔林：前书，第4卷，第110—123页。

9 《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49 ff. 530—547。

10 关于托马斯，参阅《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05 I ff. 48r—70r；勒非

布弗:《托马斯》(Lefebvre: *Thomas* [*Antoine*]), 载《比利时民族名人录》(Biog. Nat. de Belgique), 第 25 卷, fasc. 1 col. 42—86; 费赖之: 前书, 第 403—410 页。

11 《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 148 ff. 157—160。

12 见注 9。

13 同上。

14 费赖之: 前书, 第 642 页。

第七章 徐日升神甫,他的日记 手抄本及关于其内容的泛论

徐日升神甫¹

徐日升(原名托马斯·贝瑞拉——译者)于1645年出生于葡萄牙布腊加省圣马丁。他是哥斯达—贝瑞拉望族的后裔。在通常的小学教育之后,他在布腊加耶稣学院读了中学,随后于1663年进入了科英布拉的耶稣会。1666年,他在二十一岁时去印度,在印度居留不久后,来到澳门。1672年,他自澳门被调到北京,于1673年到达北京,此后毕生就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直到1708年12月24日死去。

他的罕有的音乐天才是1672年被康熙皇帝召往北京清朝宫廷的主要原因。他这次从澳门到北京,由中国官员带路,受到很大的荣誉。²他很威风地进入了北京。从那一天起到1708年他去世时,他一直用他的道德品质和秉赋以及他的知识、技能和稀有的音乐天才,为促进教会的利益而工作。³“他具有敏于处事的非凡的能力,超出一般程度的德性和谨慎;他谦虚、热诚,乐于贫穷,爱好服从,但是性格也略严酷。”这就是1700年和1703年北京给罗马的正式报告中形容他的话。⁴这些品质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也为他自己的教派长老们所赏识。

康熙召徐日升来京后,任命他为音乐教师。使康熙帝最为惊讶的是,他能够在初次听到一个调子的时候,就把乐谱写下来,听过一遍后就能把这个调子奏出来。要是看到象当时耶稣会一些报

告中所描写的那样,⁵ 这位中国大皇帝康熙和卑微的耶稣会士并肩坐在古琴之旁弹一个曲子, 那一定是一幅很有意思的景象。康熙这种要学习欧洲音乐艺术和乐理的愿望, 就是 1685 年他到鞑靼地方去狩猎带了徐日升同行的原因。⁶ 1688 年, 徐日升随同中国议和代表团前往色楞格斯克, 结果没有到达目的地而返。翌年, 1689 年, 他又参加了去尼布楚的中国代表团, 在尼布楚缔结了中俄第一次和约。1696 年, 徐日升神甫再一次伴随康熙皇帝去鞑靼地方。正是他, 以在北京的所有耶稣会传教士的名义, 上了那个奏章, 结果取得了 1692 年出名的容许基督教传教的上谕, 以酬答他和张诚神甫在尼布楚谈判中的功劳。又是徐日升, 以在京的所有耶稣会传教士的名义, 对这个异常的恩典向康熙皇帝致谢。⁷ 据路入祿神甫说, 1688 年南怀仁神甫死后, 康熙皇帝曾派徐日升神甫接任钦天监监正。但是徐日升辞谢了这个职务, 他和著名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和数学家安东尼·托马斯一致推荐闵明我神甫担任此职。由于闵明我神甫当时在欧洲, 徐日升神甫和托马斯神甫在闵明我神甫回来以前, 暂时共同担任此职。⁸

他的才能也为耶稣教派的长老们所承认和赏识。1687 年, 耶稣会中国—日本省区教务巡阅西苗·马丁任命徐日升神甫为中国副省区北京区教务副巡阅。弗兰西斯科·腓力浦齐神甫于 1688 年 1 月 6 日接任中国—日本省区教务巡阅后, 取消了这一任命, 但他的继任者弗兰西斯科·诺格拉神甫于 1691 年 1 月又重新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⁹ 1688 至 1691 年之间, 徐日升神甫还当了北京耶稣会院院长。¹⁰ 自 1692 年 6 月 29 日至 1695 年 6 月 29 日, 他又是耶稣会中国副省区会长。

他在重建汤若望神甫于 1650 年最初建造的教堂这件事上, 表现了他的技术能力和在建筑学方面的才能。

所以, 他的才能、办事之敏捷、他的道德品质和谨慎细心、他的

谦虚和热诚，他的贫穷和服从性，都被他自己的教派以及康熙皇帝好好地利用了。上文中所引的正式报告里所提到的他的性格的严酷，也有几次表现。

一次是在法国耶稣会士到达中国时。这些人到中国来的起由以及经过情况，在本书第四章中已予说明。葡萄牙籍的耶稣会士竭力要阻止这些法国人进来，他们认为这些法国人是不速之客，因为他们是违抗葡萄牙的宗教保护权而来的。他们到达中国后，葡萄牙籍的耶稣会士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他们赶走。徐日升神甫在这件事上的特别积极是得到承认的，因为 1687 年他被任命为中国教会北京区的教务副巡阅，他的权力限于对付法国“侵入者”。在同一时候，为了同一个目的还任命了另外两个副巡阅：维达尔神甫被派至华南区，波萨特里神甫被派至华中区。徐日升竭力去完成他的上司所交给他的任务。他没有成功，但不是由于他缺少民族主义的热忱。有趣的是，在这一斗争中，他的主要对手之一，就是后来在 1689 年成为他到尼布楚去的同伴的那个人——张诚¹¹。这个斗争进行了十多年没有松懈，一直到教皇的使节铎罗到达中国之后，葡萄牙籍和法国籍的耶稣会士才把他们的分歧丢开，以保卫他们的共同利益。

在铎罗来使中国期间，徐日升的严酷性格似乎再度表现出来，因他成为铎罗发脾气的主要对象。据骆入祿神甫说：铎罗来使的结果是徐日升最后得病并于 1708 年 12 月 24 日死去的主要原因。骆入祿神甫说：“他看到，在铎罗来使中国期间，三十五年来他所致力的教会事业有被毁的危险；他看到耶稣会的名声遭到了危害；他看到自己的名誉和品德被诬蔑为口是心非和背叛。皇帝本人就认为徐日升之所以得病以致他的健康受到损害的原因，是铎罗对这个著有功绩、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太严酷了。他对徐日升作了许多敬重和友好的表示，甚至在徐日升死后还给了他许多特别的荣誉，

一方面赐以厚葬，一方面在墓志铭上给以表扬。正如当代一位教士所说，这个墓志铭配得上它的作者的身分，而且它所要纪念的那位杰出的葡萄牙人是当之无愧的。”¹²

徐日升一生事业中的最高峰，无疑是他在尼布楚谈判中对中俄第一次和约的订立所起的作用。然而，他之参加这些谈判是十分出乎人们的意料和极其令人惊讶的事。如在前面一章中所看到的¹³，他是南怀仁神甫推荐而被派前往，为的是要对俄国人作出有价值的效力，这样来博得他们的感激和信任，然后可以诱使他们允许他的耶稣会士同事们在西伯利亚过路。这是许多年来南怀仁在北京所致力目标。这也是在罗马历任的四个总会长的愿望；¹⁴也是在莫斯科开设耶稣会士居所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是，再没有比派徐日升去完成这件事更肯定无误地会使这个目的达不到的了。甚至在去尼布楚之前，他和其他葡萄牙教士一样，就是一个坚决反对横越西伯利亚的路线的人。正如在违抗葡萄牙国王的特权——宗教保护权而来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的问题上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把徐日升看作是葡萄牙利益的代言人。甚至在尼布楚条约订立之后，他还是对陆上路线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¹⁵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徐日升在尼布楚既为俄国人效劳，并使俄国人如此感激以致戈洛文以他自己和沙皇的名义表示深深感谢，而对陆上路线的问题却从来连提也不提。有一点还没有得到解释的是：既然如此，竟然又挑选徐日升去担任这个使命。为什么南怀仁神甫要推荐他？难道是因为他不知道徐日升反对陆上路线吗？是的，这似乎是唯一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南怀仁是知道徐日升反对法国耶稣会士来中国的，而反对这件事和他反对横越西伯利亚的路线所根据的总的原则是一样的。是不是南怀仁虽知道徐日升的反对立场，但希望他会把教派和传教会的利益置于葡萄牙的宗教保护权的利益之前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南怀仁神甫的这

种非非之想就没有得到实现。或者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在关于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的争端发生以前，在较早的时候，南怀仁虽曾推荐过徐日升担任同样的任务，但是他在1688年并未作过这种推荐，因为南怀仁当时已病了一些时候，并在那年年初即去世（1688年1月28日）。事实是，徐日升之所以成为议和代表团理所当然的候选人，是因为他在宫廷中有长时期的经历，以及康熙帝对他的尊敬，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促进南怀仁所希望的利益。要作出最后的结论和判断还缺乏充分的证据，但是有一些迹象似乎是指向这个方向的。仔细读一读他的日记，就可看出一些不安的表示：他频频强调中国钦差大臣多疑的性格和形势的危殆，尤其是当谈判陷于僵局的时候。对这些方面，他记述得不厌其烦，而且写得逼真，他时常还提到他的教会不准他过问纯政治性的事务。看来这是他想力图为自己没有请求戈洛文在沙皇面前替陆上路线问题说好话而打掩护。人们怎么能够接受这些与他要求陆上路线之事并无关系的借口呢？尤其是最后一个借口，说他必须不问政治；因为他之所以被康熙派在议和代表团里的主要理由正是政治性的，他自己也说派他去并非只是去当译员。而且，他的日记全部语气明显地证明派他去是做顾问和做监督的，以监督代表团做到遵从康熙的意旨和保卫中国的利益。他要是说，他本该不问政治，也就是说，首先不该参加代表团，那倒是对的。而且，他的教会的这项规定事实上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要从此类事务中退出来就得严重地得罪于宗教的祸福所仰赖的那些大人物的话，那么是可以破例行事的。如果说他不能拒绝听从康熙的请求，要他随同中国代表团去尼布楚作为代表团的顾问的话，难道他如果要求那件事，而这件事他的上司们可能认为可以成为不适用他的教会的上述规定的主要理由，就这样大有关系吗？不，不会有什么关系。何况，驻澳门的教务巡阅弗兰西斯·腓力浦齐神甫严厉地批评了徐日升和张

诚的外交活动,认为这是违背了教会的规定,并且命令中国副省区会长多明尼克·加比亚尼神甫禁止他们再承担这类事务。¹⁶

使情况更为奇异的是,张诚是徐日升在尼布楚的同伴。张诚后来成为法国耶稣会士的代言人,正如徐日升是葡萄牙集团的代言人一样。在1689年,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对立甚至在中国代表团内部似乎都有其影响。在尼布楚之行中,张诚拉拢了索额图,索额图后来好像成为法国集团利益的“保护者”,而佟国纲似乎是徐日升所亲近的人。

总之,最好不要忘记,徐日升是葡萄牙人,是一个在葡萄牙宗教保护权之下的传教士。在他身上发生了两种忠诚之间的冲突:对他自己所属的教会的利益以及对力图保障这种利益的他的上司的忠诚和对葡萄牙国王和葡萄牙既得利益的忠诚。如果我们想到在南怀仁神甫的灵魂中,也有同样的矛盾,而南怀仁是比利时人,对葡萄牙国王还不须像徐日升那样效忠,就不会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了。徐日升似乎是这样来解决这个矛盾的:他相信为葡萄牙的利益服务就是为他的教派和基督徒在中国的利益服务的最好办法。

徐日升神甫日记的手抄本

徐日升神甫关于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发出的日期是1690年1月10日,这是在他从那里回来约三个月之后。在罗马耶稣会的档案中,这个日记有两个葡萄牙文抄本和一个拉丁文的节译本。徐日升日记还有第三个葡萄牙文抄本,载在里斯本的阿朱达图书馆《在亚洲的耶稣会士》集的稿本里49-V-20(ff. 400r-432r)。仔细研究了 this 抄本后,证明这不是抄自徐日升日记原稿就是抄自一个抄本。它的内容和罗马的两个抄本一样,只有在某些字的拼法上和那两个抄本有所不同。而且,因为这是后来制作的(在十八世纪中

叶左右),在评注中把这些不同拼法完全列出来似无必要,也没有用处。¹⁷除这些之外,必须提到托马斯·伊格那秀斯·杜宁·施保神甫所编的一个长的和一个短的译本。杜宁·施保的译本不能认为是拉丁文的节译本,而必须称为编译本,因为这两个译本是以第三人称来叙事的,而不像那两个葡文抄本和拉丁文节译本是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不但如此,杜宁·施保有时还对原文加以意译。

葡萄牙文的手抄本 这两个葡萄牙文抄本第一个存在耶稣会的罗马档案中,载在面上写着«日本—中国 128»的稿本中,标题是«关系与文件 1686—1802年»,自 f5r 至 f19r。纸墨(中国的黑色)都是中国制的;纸张的大小是 310×210 毫米;写得很整齐,字体细直而清楚;每一页的左边有匀齐的空白。在这个抄本末尾的一单页上,有另一个人的笔迹写的拉丁文的注,内容如下:“中国的一 1690 年。关于中国代表在往返中俄边境之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旅行报告。1689 年,中国皇帝派了这些代表,同徐日升神甫和白晋(原文如此)神甫一起去和莫斯科代表谈判两国之间的和约。这个报告也谈到由于上述两位神甫的工作和忠告和约的缔结获得成功。这个旅行报告是由该徐日升神甫写的,于 1690 年 1 月 10 日寄给我们尊敬的总会长神甫。第一抄本。”¹⁸在另一页上,又有不同笔迹的另一个注,内容如下:“自 1689 年至 1690 年。徐日升神甫记述中俄两国间所订立的和约。”

徐日升日记的第二个葡文抄本,其笔迹不同于第一个抄本,现存于罗马耶稣会档案同一稿本集«日本—中国 128»ff21r—37r。纸和墨也和第一个抄本一样是中国制的;纸张的大小是 315×215 毫米。同第一个抄本一样,字写得细直而清楚,虽然如上所说,是另一个人写的。在每一页的左边也有匀齐的空白。这个第二抄本,在日记之外的两页上有三个拉丁文的注,在书名页上有一个短注。这四个注是出于三个人的笔迹,都是在罗马写的。第一个注和日记

第一抄本末尾的第一注是同一个人写的,内容是:“中国的—1690年。关于中国代表在往返中俄边境之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旅行报告。1689年,中国皇帝派了这些代表,同徐日升神甫和白晋(原文如此)神甫一起去和莫斯科代表谈判两国之间的和约。这个报告也谈到由于上述两位神甫的工作和忠告和约的缔结获得成功。这个旅行报告是由该徐日升神甫写的,于1690年1月10日寄给我们尊敬的总会长神甫。第二抄本。我们尊敬的总会长神甫还有一个拉丁文本。”¹⁹日记的这个第二抄本之末的第二个注是和第一个注在同一页上,但是出于另一个人的笔迹,内容如下:“关于被派和中国皇帝的代表一起去同俄国人订立和约的我们的神甫的旅行情况。”在另一页上,第三个注是由另一个人写的,但笔迹同于第一抄本末第二注的笔迹,其内容是:“1689年:派往俄国人处的中国使团和中国与……订立的和约。”这个第二抄本书名页边上的注,和这个抄本的第三个注出于同一个人的笔迹,内容是:“1689年至1690年。第二号。”

这两个葡萄牙文本都不是徐日升神甫原来亲笔写的,这一点在把两个文本的笔迹和确定无疑是徐日升神甫写的文件加以比较之后,是可以肯定的。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徐日升日记原来的亲笔稿本在耶稣会的罗马档案中或其他广泛地收集了耶稣会文件的档案中都找不到,于是就产生了关于这两个抄本的来源的种种臆说。最有可能性的假设是,原来有一个徐日升的亲笔稿本,这两个抄本是在北京或澳门根据原本抄制的。纸墨(中国的黑色)都是中国制的,而且在纸张折叠处字迹都弄污了,说明是经过长途传递的,像从中国寄到欧洲的类似的文件都有这种情形。由此可见,这两个葡文本都是在中国抄写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两个抄本末尾的拉丁文的附注,显然都是在罗马写的,和日记的正文迥然不同,墨是褐色的(欧洲制造的),笔迹也不一样。

根据弗兰西斯·鲁洛神甫的意见，这两个抄本大概是在澳门照徐日升的原稿抄制的，正如对大多数的年度报告和其他文件也都是这样做的。²⁰

不论真相究竟如何，徐日升日记原来的亲笔稿是不在了，而且在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或任何其他重要的收集耶稣会文件的地方都找不到。但是，这两个抄本是由徐日升而来的，也是肯定无疑的事。第一和第二抄本之间的差别的性质，只有由它们是出于同一来源才能说明。

手抄本的拉丁文译本 这是收在耶稣会罗马档案同一稿本集《日本—中国》128 ff 45r—62r 中的。纸张大小是 270×195 毫米，纸墨都是欧洲制的。这个拉丁文译本，和两个葡文本不同，是一份草稿，修改之处很多。它和两个葡文本大体上相符。但是，严格地说，不能称之为一个译本，甚至不能称之为那两个葡文本的灵活的译文，因为它删去了很多段落。我在编译葡文本时，遇有疑难或者几乎令人不懂的段落时，就试图从拉丁文本中求得解决。我的这种努力总是徒劳，因为这些段落在这个拉丁文本中无例外地被删去了。单从这些删略情况，就可以断定这个拉丁文本不是徐日升原来的亲笔稿。这个译本大概是为了给总会长神甫看在罗马译出的，因为第二个葡文本末尾的一个附注似乎可以证明：“……我们的尊敬的总会长神甫还有一个拉丁文本”，同时也是为了给不懂葡萄牙文而对主要的情况感到兴趣的人看的，例如杜宁·施保神甫就曾广泛地利用了这个日记。

杜宁·施保的译本 杜宁·施保较短的那个译本，收在包括两个葡文本和上述拉丁文本的同一稿本集《日本—中国 128》中的 f40r 至 f43r。纸张大小是 270×195 毫米。这只是一个摘要，记录了徐日升日记中的要点，如它的标题所说明的：“关于中国派至俄国人处的使团，和由于我们的神甫的艰辛努力而缔结的两国的和

约;摘自徐日升神甫的日记。作者:在罗马的听忏悔的波兰牧师托马斯·伊格那秀斯·施保神甫,1695年。²¹这个译本以第三人称而不是以第一人称叙事。

杜宁·施保的较长的那个译本收在他的《中国历史文集》内,这本书的手稿仍保存在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05号I》ff.160v—165r和170v—191r。在f.170v上开始的第二节,标题是:“中国使臣至俄境尼布楚城之行。议和的会议和交涉,以及由于我们的神甫的努力而缔订的中俄和约。”这与《日本—中国,128号》45r—62r上的拉丁文本大体相同。它是以第三人称叙事的,并对某些段落作了意译,因此严格地说不能算是译本。

因此,编译徐日升神甫的日记就得依靠两个葡文本了。

关于日记内容的泛论

关于可以作为评价徐日升日记内容的指导原则的一些话,所根据的是徐日升日记与张诚神甫的日记的对照比较。张诚神甫的日记是唯一的另一个可以看到的关于这同一事情的文件。²²这两个文件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写作的动机不同。张诚是法国科学院所赞助的、由路易十四世派往中国作为“皇家数学家”的那一群法国耶稣会士中的一员。除了传教工作之外,他还在地理学、天文学和考古学方面作了一些研究工作。他对尼布楚之行的报告,正如他的其他报告一样²³,具有一个专家对其他专家报告的性质,其中有许多地理和天文方面的详细材料。例如,他常常把他们所经过的每一地方的确切地理位置以经纬度记下来。另一方面,徐日升神甫,根据康熙和他的教会上司的意图,是两人中的领导者,因此他有责任向他的上司报告他们的活动情况。他的报告,虽是写给中国传教会的耶稣会士或他的耶稣会一般同事们的,但是他也

寄给了罗马的总会长两份，因此可以算是他的正式报告。他们写作目的的这种差异，说明他们对各项事情有不同的偏重。张诚是写一个科学的报告，偏重于科学上的细节。他必须避免说一些可能为中国人方面或俄国人方面认为有所贬损的话，因为双方都是极其敏感的，因为他的报告是写给一般公众看的。如果任何一方发现了有任何这类的话，就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麻烦，像阿夫瑞尔神甫的一些话曾引起和彼得大帝的麻烦那样。另一方面，徐日升是写给他的耶稣会同事和上司的，因此可以不妨较随便地透露一些对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是恭维的详情细节，因为他可以相信这些人是不会说出去的。他的报告根本不是为了给一般公众看的，所以直到今天仍未发表。

两位作者所怀的意图不同，也说明了他们的日记的另一不同之处。单看张诚的日记，人们就会同福克斯一样，认为在这两位耶稣会士中，张诚在尼布楚起了主导作用。²⁴ 而单看徐日升的日记，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两人之中的主要人物，这种印象之深以致罗马的一位档案保管者，在读了徐日升日记后，竟记不得徐日升的同伴是谁，而以白晋神甫代替了张诚。这种彼此不提到对方的情况，除了由于某种程度的内部矛盾外，主要是因为他们写日记的动机不同。路易十四世和法国科学院对于一个葡萄牙人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但是对于他们的一个臣民或成员的贡献和成就，却十分有兴趣。张诚的唯一罪过（如果能够称之为罪过的话）是疏漏。那就是说，他没有提到，每当谈判陷于僵局，徐日升为使双方头脑更清醒一些所作的努力；他对他单独去俄国人处劝他们让步唯一的那一次却大事宣扬。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在徐日升对中国钦差大臣进行规劝的时候，他常常是不在场的。另一方面，徐日升无须详细提到张诚的活动，因为张诚是受徐日升指挥的，而不是独立行事的。徐日升是两人中的领导者，只须对他自己的活动有

所交代。他的确提到了张诚单独去见俄国人之事。负有责任把事情经过向康熙报告的人是徐日升；对他们的教派和上司作报告的也是他。因此，他们的报告写得有这样的出入，就不能以不诚实或有意欺蒙来解释。他们所报告的都是真实的；应该认为他们的报告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破坏的。鉴于徐日升的报告对于订立条约的内情有新的揭露，最重要的问题是报告在这方面是不是真实的。考虑到他的报告的性质和对象，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有一切办法去查明真相。

不过，徐日升的报告里贯穿着一种偏向，这虽不减损他的报告的真实性，却使他过分强调了某些偶然事件。如我们所已看到的，这就是他企图为自己没有向俄国人要求允许通过俄国境内的陆路作为他和张诚帮了俄国人的忙的报酬之事打掩护。这种偏向虽把某些事情说得言过其实，但就关于主要的事实的报道来说，并没有破坏了他的诚实性。

注 释

1 费赖之：前书，第381—385页；骆入禄：《在中国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天文学家》(Rodrigues: *Jesuitas Portugueses Astrónomos na China 1583—1805*)，第16—20页。

2 杜宁·施保：《中华帝国史》(Thomas I. Dunin Szpot: *Historia Sinarum Imperii*)，《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03, ff. 165r—165v, 200r—200v 上的手稿；同著者：《中国历史文集》(*Collectanea Historiae Sinensis*)，日本—中国，104 ff. 256r—257v, 301v—302r。杜宁·施保这两个著作都是取材于《1672年日本省区年度报告》(*Litterae Annuae Provinciae Japoniae for 1672*)日本—中国，48 ff. 120—121。

3 骆入禄：前书，第16页。

4 同上。

5 见注2。

6 参阅《日记》，第5节。

7 骆入禄：前书，第17—18页。

8 同上书，第19页。

9 我是从耶稣会士鲁洛(Francis Rouleau)神甫处得知此事的。

10 1688年的三年大事记中称：“docuit hum. litt. an. 2, creatus magister

artium, in missione an. 16”, 见《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 134 f. 570 v. 1691年的大事记中记载,徐日升为教务副巡阅。同上书 f. 375r。第二年,1692年的三年大事记,有如下的记载:“... fuit rector coll. Pekinensis, Visitator et Vice-Provincialis”, 见同上书 f. 376r。所以在1688年至1691年间,他一定是北京耶稣会院院长。

11 张诚神甫于1654年7月11日出生于法国凡尔登。1670年10月6日,他进了南锡的耶稣会香槟省修道士学习所。1687年7月,他跟路易十四世所派的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康熙皇帝对他十分器重,多次派他到鞑靼地方去。他于1707年3月25日死于北京。要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参阅费赖之:前书,第443—451页。关于张诚1689年的旅行日记,见荷尔德:前书,第4卷,第163—251页,题为:“1689年中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神甫奉中国皇帝之命所作的第二次旅行。”

12 骆入禄:前书,第19—20页。

13 参阅第四章。

14 戈斯文·尼克尔(1652—1664年),约翰·保罗·欧利瓦(1664—1681年),查理·德·诺瓦叶(1682—1686年),泰尔苏斯·冈萨雷斯(1687—1705年)。

15 《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 105 I, ff. 76v—78r, 136r; 及日本—中国 148 ff. 157v—160v。

16 同上书,164 f. 236。

17 关于《在亚洲的耶稣会士》集的详细说明和研究,以及其起源和内容,应参考布拉加的文章《在亚洲的耶稣会士》(Braga: *Jesuitas na Ásia*), 载1955年1月后的《澳门主教管区教会公报》(*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舒哈美尔:《澳门和北京耶稣会档案》(Schurhammer: *Die Schätze der Jesuitenarchive in Makao und Peking*), 载《天主教传教会会刊》(*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第57期(1929年), 第224—229页; 及谢特:《澳门档案的发现》(Schütte: *Wiederentdeckung des Makao-Archivs*) 载《耶稣会历史档案》, 第30期(1961年), 第90—124页。

18 用白晋神甫的名字,显然是档案管理员弄错了。徐日升的同伴是张诚,不是白晋。“我们的尊敬的神甫”是耶稣会总会长的称号,当时的总会长是西班牙人泰尔苏斯·冈萨雷斯。

19 在这个注中,白晋神甫的名字显然又是写本注的人弄错了。

20 私人传送的。

21 杜宁·施保大约在1633年左右出生于波多利亚。他参加了耶稣会立陶宛省区工作。他所任的职务之一是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波兰语的听忏悔牧师。他对中国传教会表现非常关心。由于他能看到耶稣会的档案,他写了好几篇著作,其手稿还存在。参阅费赖之:前书,第63—64页。

22 戈洛文的正式报告书,虽然加恩和雅可夫列娃都曾用过,但是从未全文发表过,而我却无法看到这个报告。

23 荷尔德:前书,第4卷。这本书原来的法文版中,对张诚九次去鞑靼地方的经过都有描述。

24 福克斯:《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W. Fuchs: *Der Russisch-Chinesische Vertrag von Nerchinsk vom Jahre 1689*), 载《中国大事记》(*Monumenta Serica*), 第4期(1939—40年), 第546—593页。

第八章 日记中所载的条约文本

还有一个有兴味的问题必须提到，那就是徐日升日记里的条约的拉丁文文本。如对条约的不同文本加以彻底的精密的探究，这就要越出本书的宗旨范围；而且，这个工作已由福克斯在一篇渊博透彻的文章中做过了。¹不过，在有些方面，徐日升神甫的日记对这个问题有新的阐明。例如，福克斯说，他自己对条约各种文本的鉴定探究，不可避免地有这样的缺陷，那就是只能根据已经知道的那些文本，而没有什么新的文件可作依据，因为在中国方面，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里或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事实。²虽然徐日升所提供的条约拉丁文本，并不代表为俄国代表团所写的交给中国人的那份条约，但是它是新的材料，对于澄清某些问题是有帮助的。

条约文本曾以多种语文发表过：拉丁文、俄文、满文、汉文、法文、日文、蒙古文、英文等等，而且有许多说法。以下的几点考虑也许有助于把这种杂乱的情况整理出一些头绪来。

两个拉丁文本，一个是为中国代表团写了交给俄国人的，一个是俄国代表团写了交给中国人的，都经两国代表签字盖印，是条约的两份正式文本。俄国人用俄文写了交给中国人的那个文本，和中国人所写的交给俄国人的满文本（都未经签字盖印），可以看做是条约的半正式文本。除这些正式的和半正式的文本外，特别应该提到汉文的文本，因为在起草条约的最初阶段，汉文起了主要作用。张诚是在1687年到达中国的，也就是说在订约前仅两年，所以他对满文或汉文都还不熟谙。徐日升懂得汉文，也许能讲一

些满语,但即使到后来也还看不懂康熙用满文写的便条。这样,似乎就有理由设想,在中国方面内部是以汉文作为沟通拉丁文和满文的语文。因此,我们确实可以同福克斯一样得出这个结论:拉丁文本虽是权威本,因而必须作为一切比较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它又是以满文或汉文本为依据的。³由以上列举的事实,所依据的还是汉文本而不是满文本。而各种不同的汉文本都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载在《黑龙江外纪》上的⁴;另一种是载在《康熙实录》上的。⁵但是,这后一种以及由之而来的所有译本,仔细加以研究就可发现,都不是条约文本,而是碑文。⁶条约的第六段载有如下条款:“……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这些上面刻有条约的简略文本(碑文)的界碑于1690年竖立。另一方面,《黑龙江外纪》的文本(及所有以其为依据的文本),是条约的文本,这是由西清发现和发表的。⁷

另一方面,为中国代表团写的交给俄国人的正式拉丁文本,是在俄国档案中发现的,发表于《俄国对华条约集》。⁸可是,为俄国代表团写的交给中国人的正式拉丁文本,在中国档案中还没有发现。因此,无法将这两个正式拉丁文本加以比较。我们不能根据第一手的考察来说这两个拉丁文本是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事情并不是毫无希望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两位见证人的作证。张诚⁹和徐日升都肯定这两个拉丁文本是基本上相同的,并且着重指出某些小的出入。例如,徐日升说:“俄国人所写的条约文本,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情况之外,是(和为中国人所写的那份文本)相同的。关于立碑纪念和约事的最后那部分,是(被俄国人)这样改了:‘中国皇帝……亦可任便办理。’”¹⁰

可惜,如我们所说,这两位见证人的证言不能以对照正式的拉丁文文件来加以证实。也不能把为中国人写的交给俄国人的正式拉丁文本,和交给中国人的半正式的俄文本(被认为是和拉丁文本

完全一样的)来加以对照,因为这个俄文本也还未发现。因此,无法对双方彼此所写的正式或半正式的文本加以任何的对照比较。

但是,要进一步探究双方的正式和半正式的文本是否大体上相同,依然还有两种可能:(1)如果人们能找到一份俄方的正式或非正式文本的草稿,并证明它与最后的文本大体一致;或者(2)能确定上述两位证人关于条约文本的话是真实的。

这两种可能的办法中的第一种,与对照原来的正式文本有同样的困难,那就是,为俄国人写的交给中国人的文本尚未发现。草稿是否真实只有和正式的最后定本对照了才能确定。

因此,余下的可能就是确定这两位证人是值得信赖的。要确定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外部推论来证明没有确实的理由来怀疑张诚和徐日升所说这两个正式文本基本上是相同的。俄国人所写的交给中国人的条约的草稿,也必定同中国人写的交给俄国人的正式文本,和为俄国人写的交给中国人的正式文本,基本上相同。

在作进一步的讨论之前,必须看一看俄国人所写的交给中国人的正式或半正式的文本是否有一个草稿。怎样才能使读者确定这一点呢?照徐日升所说,在这样的草稿上,沙皇和他的使臣的名字将是列在中国皇帝和他的使臣的名字之前的,同时关于石碑的那一段也会有所不同。确实有一个文本符合这些条件,这就是《条约集》(第1—6页)中所载的俄文本,其德文译本见缪勒《俄国历史汇编》第2卷,第434—439页。¹¹

现在只须证明张诚和徐日升所说条约的两个正式拉丁文本是相同的证言是确实的。如果我们能证明下列几点,便可确定这一点:(1)张诚和徐日升对必须知道的事是知道的,那就是说,他们曾看到那两份正式文本;(2)不说实话对他们并无好处;(3)并没有合谋欺骗人;(4)在其他关于条约的话里,都说了实话。

他们会看到条约的最后两份正式文本,这一点从现在已知的

签约前的事情和情况,可以确定。

不说实话对他们并无好处,这一点只要研究一下他们写报告的目的,便可肯定。

他们并没有合谋骗人,可以从他们相互的关系来证明。虽然他们属于同一教派,都是在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却代表着不同的、有冲突的利益。徐日升是葡萄牙人,是葡萄牙宗教保护权下的传教士。另一方面,张诚是由路易十四世违反了葡萄牙的保护权而派来中国的。自从法国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以来,在这两派之间有不小的摩擦。¹²

他们对于条约文本的其他话都是真实的,这一点审查了这些话之后,可以证明。除了说这两个拉丁文文本完全相同(两位作者都指出了小的出入)之外,他们都说在他们的日记中所抄录下来的与正式拉丁文本基本上一样。如果这后一说法是真的话,而这是可以审查的,那就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前一说法。

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遇到了一些困难。据福克斯说,张诚的法文译本(他不知道有徐日升的拉丁文本),从对照文本来看,和《条约集》中所载的正式拉丁文本不完全相同。¹³在对照了条约文本的各个不同的文本和译本后,福克斯进一步发现,在各段的次序和内容上,它们都有不同之处。¹⁴研究一下不同文本的纲要,就可以看出在各段的次序上的差异。¹⁵

在对这些不同之处作出我们的结论之前,必须指出以下各点:

下一页上的五种文本,其中四种是代表为中国代表团写的交给俄国人的文本,只有一种是俄国人写的交给中国人的。这一点可以从双方皇帝和使臣的名字先后次序,以及关于在边界竖立石碑的那一款来证明。

关于那唯一代表俄国人写的交给中国人的文本的译文,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它是和半正式的俄文本相同的,因为后者还未在中

《条约集》中的半正式 的满文本	《条约集》中的正式 拉丁文本	徐日升日记中的拉丁文本	张诚日记中的法文本	《条约集》中的俄文本
序文： 中国人 俄日 会议目的	序文： 中国人 俄日 会议目的	序文： 中国人 俄日 会议目的	序文： 中国人 俄日 会议目的	序文： 中国人 会议目的
1. 格 尔必 齐河 乌第 河	1. 格 尔必 齐河 乌第 河	1. 格 尔必 齐河 乌第 河	1. 格 尔必 齐河 乌第 河	1. 格 尔必 齐河 乌第 河
2. 额 尔古 纳河	额 尔古 纳河	额 尔古 纳河	额 尔古 纳河	2. 额 尔古 纳河
3. 雅 克萨	2. 雅 克萨	2. 雅 克萨	2. 雅 克萨	3. 阿 尔巴 津
4. 越 境	越 界者	越 界者	越 界者	4. 越 界者
5. 旧 事不 议 中国 现有 之俄 罗斯 人及 俄罗 斯国 人免 其互 相索 还， 着即 存留。	3. 以 前所 有一 切事 情永 不作 罢论 嗣后 有逃 亡者 4. 现 在俄 民之 在俄 国者 ，悉 听如 旧。	3. 以 前所 有一 切事 情永 不作 罢论 嗣后 有逃 亡者 4. 现 在俄 民之 在俄 国者 ，悉 听如 旧。	3. 以 前所 有一 切事 情永 不作 罢论 嗣后 有逃 亡者 4. 现 在俄 民之 在俄 国者 ，悉 听如 旧。	
6. 路 票	5. 护 照	5. 护 照	5. 护 照	5. 护 照
7. 逃 亡者	6. 倘 各严 守约 章， 争端 无自 而起。	6. 倘 各严 守约 章， 争端 无自 而起。	6. 倘 各严 守约 章， 争端 无自 而起。	6. 越 界者
8. 遵 守条 约文 本盖 印满 文、 俄文 、拉 丁文 刊之 于石	约 文签 押盖 章华 、俄 、拉 丁 诸文 刊之 于石	约 文签 押盖 章华 、俄 、拉 丁 诸文 刊之 于石	约 文签 押盖 章华 、俄 、拉 丁 诸文 刊之 于石	如 中 国 皇 帝 欲 立 碑， 可 以 立 碑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日 期

国档案中发现,因此无从加以对照。

那四种表现为中国人写的交给俄国人的文本的本子,可以归类如下:(甲)《条约集》中所载的中国人写的、交给俄国人的正式拉丁文本;(乙)也是载在《条约集》中的中国人所写的、交给俄国人的半正式的满文本;(丙)其他(徐日升的和张诚的)代表最后文本起草的不同阶段。不能想像,珍贵的正式文本或半正式文本,一旦互换后,私人还能看得到。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些不同的文本。张诚和徐日升所抄录的文本,其不同之处如下:徐日升所记的序文是缩短了;第四、五、六段中材料的分列不同;以及张诚加上了满文的碑文。这些不同之处可以这样来解释,他们每人抄录条约文本所用的是不同的稿本。既然徐日升的译本和《条约集》中正式拉丁文本更为接近,大概它表现了较后阶段的草稿。满文碑文大概是张诚加上去的,张诚的日记写得较晚,那时他已知道约文将以满文刊于碑石,虽然在正式文本中并无此项规定。徐日升的缩短了序文,可从他写日记的目的得到解释。对他的耶稣会同事们来说,列举两国代表团的人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在张诚和徐日升写他们的日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能使用两个最后的拉丁文本中的任何一个。张诚所写的经两国代表团签字盖印的那份最后的拉丁文文本,他们未能使用,因为若不是这个文本已在莫斯科,那就是正在送往莫斯科途中。俄国人所写的交给中国人的那一份最后文本,他们也未能使用,因为不可想像,这样一个珍贵的文件任何私人可以使用。因此,他们都只好使用草本,即在最后的文本完成前他们的工作所依据的那些文本,这些文本在有些细节方面(分段和措词)和最后的文本,有所不同。这就足以说明福克斯所指出的那些差异之处。从精研文本的观点来看,福克斯所说两个文本不完全一样,是对的。但是,我们所关心的主

要是内容，而在这方面的差别既不是形式上的，也不是实质上的。

同样的理论，也说明了半正式的满文本（载《条约集》）与正式的拉丁文本（也载《条约集》）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主要是在条约的分段（半正式的满文本有八段，而正式的拉丁文本有六段）。大概在起草之初，分段不同，最后没有时间把满文本和正式拉丁文本弄得完全一致，因为当时要把即将由双方签字盖印的正式拉丁文本预备好都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

最后，我们来看唯一表现俄国人所写的、交给中国人的文本的那个约文，即《条约集》中的俄文本。除了双方皇帝和代表的排列的次序以及关于立碑事那一款外，它与正式拉丁文本间的差异，主要在分段，这一点又可这样来充分说明：假定俄文本是草稿本，与最后的拉丁文本比起来，代表较早阶段的作品。

于是，按这个办法，所有的差异之处都得到了圆满的解释。我们认为，张诚和徐日升所说他们的条约文本与最后的拉丁文本大体相同是确实的。因此，没有理由怀疑他们说两个正式的拉丁文本完全相同也是实话。

注 释

- 1 福克斯：前书。
- 2 同上书，第 550 页。
- 3 同上书，第 554 页。
- 4 同上书，第 564 页。
- 5 同上书，第 563 页。
- 6 同上书，第 563—564 页。
- 7 详见同上书，第 563—566 页。
- 8 全文翻印见同上书，第 577—582 页。
- 9 荷尔德：前书，第 4 卷，第 200 页。
- 10 徐日升：《日记》，第 54 节。
- 11 福克斯：前书，第 573—591 页。
- 12 费赖之：前书，第 424、428 页；并参阅第七章。
- 13 福克斯：前书，第 553 页。
- 14 同上书，第 569 页。
- 15 各种文本的全文，见同上书，第 573—593 页。

徐日升神甫的日记

提 纲

1. 中国皇帝命令徐日升神甫和张诚神甫随同中国使团前往并协助各使臣与俄国订立条约。 2. 康熙赐予两个耶稣会士的优待。中国使团经过戈壁和蒙古的旅程。 3. 第一次使团的组成人员。这次旅程由于厄鲁特和喀尔喀蒙古人间发生战争而中断。 4. 中国使团出发前往尼布楚。与一些蒙古头人的会见。 5. 达尔湖、长白山和荒废的宝塔。遇见又一个蒙古头人和一个喇嘛。 6. 喀尔喀蒙古人的一名头人。 7. 猎取黄羊和野骡子的方法。 8. 克鲁伦河和蚊子充斥之乡。 9. 波尔契河和渡河中所遇到的困难。 10. 大黄和水獭。苏克台河和图里格河。 11. 波里河和温达河。 12. 尼布楚总督派使者来访问中国营地。溯黑龙江而上到达尼布楚的九十只中国船所造成的事件。 13. 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黑龙江沿江两岸的森林和森林中产毛皮的野兽。 14. 尼布楚河和以尼布楚河命名的尼布楚城。 15. 中俄使团会议之前历史上的事件。巴伊科夫的出使和尼古赖使团。 16. 葡萄牙派往北京的大使曼纽尔·德·萨尔丹哈。中国军队对雅克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围攻，一个俄国代表来到北京。 17. 雅克萨的解围和尼布楚条约谈判的开始。中国使团出发前往色楞格斯克。由于厄鲁特蒙古人向喀尔喀人进攻，中国使团未到达色楞格斯克而折返。俄国的一个新使臣到达北京。 18. 这个俄国使臣在北京的活动。 19. 康熙选定尼布楚为议和地点。中国使团出发前往尼布楚。 20. 8月1日至17日期间两国代表团之间的来往。中国人猜疑俄国人。 21. 中国代表请俄国大使迅速前来的信件。俄国特使方面对于中国人为了订立和

约带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并在离城如此近处扎营,表示诧异。中国人为他们的做法辩护。俄国人要求撤退一些离尼布楚城太近的中国船只。俄国特使的到达。中俄双方营地的代表互相拜访。 22. 关于开会期间军队的布置的协议。中国人的猜疑,他们不愿按照协议办理。两名耶稣会士访问俄营,寻求新的协议。俄国人所作的新的让步未能使中国人满意。 23. 徐日升说服了中国的钦差大臣们。 24. 戈洛文的帐篷及其摆设。 25. 中国使团的帐篷及其摆设。 26. 两国代表团来到会场的情况。 27. 两国使团进入作为会场的帐篷。 28. 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最初引起的争论。徐日升解决了这些争论。 29. 俄国特使的阔绰排场。中国第一次提案为俄国人所拒绝和戈洛文的反提案。第一次会议休会。 30. 两国使团的第二次会议又以陷于僵局而结束。中国人猜疑之深,使战争危机迫于眉睫。中国钦差大臣们因未与徐日升商议,仓促作出此项决定而感到不安。 31. 中国钦差大臣们坚持不信任俄国人,直到徐日升做到了使他们的猜疑消除。 32. 谈判第二次得到挽救,免于破裂。双方营地间的互访:徐日升和张诚代表中国使团访问俄营,戈洛文的拉丁文翻译员访问华营。讨论的主题是两国之间将建立的边界。 33. 中国以雅克萨为边界的提案为俄国人所拒绝。这一次是俄国人坚持不让。 34. 俄国人坚持不让的原因和中国人所采取的对策。只有徐日升未放弃圆满解决希望。 35. 俄国人要求再举行一次会议。 36. 徐日升的劝告帮助中国钦差大臣们解决了他们面对着的进退维谷的困难。 37. 中国使团渡过黑龙江。俄国人仍迟迟不提出他们的方案。 38. 拉丁文翻译员最后带来了新的方案。中国钦差大臣们解释他们渡河的原因。俄国人请求派两个耶稣会士到他们的营地去。 39. 中国钦差大臣们不愿让两个耶稣会士都去,最后决定张诚一人去。 40. 徐日升力图说服中国人必须信任俄国人。他和索额图打赌。 41. 张诚带了俄方提案的纲要回

来，这些提案是作为和约的条件的。 42. 有些起义反抗俄国统治者的喀尔喀人要向中国人投诚，但徐日升劝告不要接受他们的投诚。 43. 俄国人的拉丁文翻译员带来了关于今后两国外交关系中应遵守的礼节的新提案。由于中国主张以诺兹山为两国边界的新提案而产生的新的纠葛。 44. 俄国人致中国人的抗议书。 45. 依照徐日升的建议，两个耶稣会士被派往俄国营地。他们劝俄国人作些新的让步，但无结果。 46. 在9月3日至7日期间，俄国提出新提案，中国提出了反提案。 47. 9月7日签约前发生的事情。俄国人最后的犹豫。 48. 两个耶稣会士，尤其是徐日升敦促俄国特使下决心。 49. 徐日升劝中国钦差大臣们再忍耐一些时候。 50. 关于签订条约的最后的安排。 51. 中国人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及其解决。条约文本的宣读和签押。 52. 盖印和宣誓。 53. 条约本文。 54. 俄国人和中国人所写的条约本文间的出入。签约后的庆祝活动。 55. 戈洛文力劝中国人停留几天。戈洛文赠给中国人的礼物。 56. 两个耶稣会士最后一次访问俄营。中国人赠给戈洛文的礼物。 57. 戈洛文释放一些俘虏的宽大态度。 58. 中国使团启程回去。 59. 中国钦差大臣们赞扬两个耶稣会士的工作。 60. 从乌姆杜河到皇上在长白山的狩猎处的旅程。 61. 两个耶稣会士在这里见了皇帝，皇帝回到北京后，他们又去朝见。 62. 徐日升对在北京全体耶稣会士的演说。 63. 结论。

以下是关于中国钦差大臣佟国纲¹、索额图²赴尼布楚城³缔结一六八九年经由各钦差大臣⁴分别签署的中俄两国和约的逐日报告，其中载有有关人士所要知道的一切详细情况⁵

1. 去年，我在一些信件中曾向各位大师们⁶报告，皇帝如何在一道公开谕旨中巧妙地指派我伴随他的钦差大臣们。他的想法是在一项书面公文中宣布的，朝廷立即把这件公文的抄本送给我，我在去年已将那个抄本送上。这里，我只想记一记它的内容，因为这对我们的教会来说是有重大关系的，而且也是很大的荣誉。皇帝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特令徐日升⁷（我的中国名字）随尔前往俄国。”⁸这样，他就对所有欧洲人的忠诚，给予了无可置疑的证明（所用的赞扬的话，我个人是当之无愧的），抵销了他的臣民过去的诬蔑和恶意的攻讦⁹。这件公文公布后，皇帝派他的侍从赵昌¹⁰来见我。赵对基督教向来是友好的，我们会通过他向皇帝办理过我们的事务。如我所说，他派此人来我们的住处，通知我可携带同伴一人。我选定了张诚神甫¹¹，因为他最能干。皇帝又颁布了其他通告，赞扬我们。但是，我在这里不重复这些通告了，因为这些都已公布，为众所周知。¹²除这一切之外，他还把自己的服装赐给我，其中袍子是用极贵重的皮子制成的，式样极为优美，穿着此衣，人们立即能看出其人的高贵。皇帝还给我的同伴另制了一袭贵重的袍子。¹³

2. 他以这些和其他荣誉赐加于我们。因为这些都是公开的，所以我只想提一件事：他把我们介绍给钦差大臣之一的他的舅舅¹⁴，要他招待我们和他一起吃、住，尊敬如皇帝本人一样。这种尊敬我是决配不上的。但是，这样的照顾，并不足以使我们免受许多的苦，例如受那些荒凉干涸的土地的影响的苦。在这些土地上，我们生活了四个多月，忍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和饥渴。我们受苦不是因为缺少粮食，我们的粮食是吃不完的，而是因为缺乏烹调。因为这些人吃什么东西都习惯于几乎不加烹调，或者完全生吃，这是我多次亲眼目睹的——这种办法对我们的肚子来说，只是起了不致饿死的作用。这些地区都是荒地，几乎全部为沙所覆盖，没有居民。三数十里内每每只见到几个看管牛、羊、马的牧人的帐篷，他们就靠牛奶取得一点赖以生活的食物。这块地方没有任何类型的农业，几乎没有任何程度的文化。为数很少的这一些人就靠着牧场生活，他们连面包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也不知道米饭。我们每天必须挖井取水。由于这些不毛的沙漠布满了烈性的硝石，所以挖出来的水是咸味的，而且气味难闻。但是，那些可怜的骆驼、羊、马却趋之若鹜。我们扎营后，这些牲畜一见到我们开始在挖井，就本能地跑过来，希望能有水出来，让它们解解渴。它们是那样地饮个不休，以致每天必须开凿许多井来供跟随我们的两万多口牲畜饮水。¹⁵

3. 我们这一帮六千人的遭遇是相同的。由于炎热，不得不喝热开水，因为冷的生水是不卫生的。因此，我这个以好饮水而出名的人，虽在炎暑中也不得不严加节制，以免自己遇到危险。我虽躲避了一个危险，却逃不了另一面的那个危险，因为缺水和未加烹调的食物过多，使我生了胃病。我的体重减轻很多，回到家里时，就象

一个皮包骨的痲病患者，虽然渐见恢复，但却化了相当的时间。当我们在这些沙漠里旅行的那几个月里，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可以用来做烧柴的一根木头或一棵树。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一股气味，那就是烧马粪的气味。我们不得不使用马粪，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可供燃烧的东西以维持生活。这件事的后果是我所不愿细说的。我们最好的美食是一种干面粉和水混成的东西，尽管有死水的臭味，我们仍觉得很好吃。我们的忍耐是唯一的缓和剂，那些不能忍耐的人，给自己带来了不能忍受的敌人，徒然增加了自己的痛苦。在我们到达我们将和俄国专使议和地点的色楞格斯克¹⁶前数天，我们接到厄鲁特人已向喀尔喀人进攻¹⁷的消息，而我们正是在喀尔喀人的领土上旅行。我听说，喀尔喀部的首领无耻地号称皇帝。¹⁸但是，在我看来，他甚至不配称为牧羊人。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经过一番匆忙而不是慎重的商量后，转身折回。几天以后，我们的皇帝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就批准了这个决定。我们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生命和健康的损失之后，没有打开我们曾用了很大力气去敲击的门，又回到了这儿的宫廷。我们为这些钦差大臣们所作出的不适当的决定付出了代价。我们的失败不能归罪于任何别的人，这是读者自己可以判断的。皇帝在我们到达后发出命令，我们将幸运地于第二年再作一次同样的娱乐身心的旅行，不过是通过不同的但是相似的地区。这个第二次旅行唯一不同之处，是由于有充沛的雨水的结果。在沙漠中，代替以前的完全干旱，我们到处将遇到许多泥泞的沼地。这些沼地将使我们不致渴死，不过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些沼地已经干涸了。关于那个既无结果又很艰苦的第一次旅行的其余的事，我将省略不谈，以便把时间更有益地化在写第二次的旅行上。¹⁹

4. 1689年6月13日在神奇的圣安东尼节日²⁰，我们离开了

宫廷,带了比前一年还要多的人,更多的马匹、羊、牛和骆驼,因为我们必须在这个旅行队里带着够五个月用的一切给养。在26日以前,我们朝北走,略微偏东。²¹ 在那一天,我们到达了一个地方,位在许多沙土的矮山中的一块平原之上。这里住着一个一小群搭帐篷的居留民的酋长。鞑靼人把他和地位与他相似的头人都称为台吉²²,意思是皇族的人。这些西鞑靼人²³,过去曾统治中国六十多年²⁴,为了帝国的安全而被送到这些沙漠地区来。在这些被流放者之外,又加上许多其他的人,包括被前明朝²⁵ 废黜和赶走的鞑靼皇帝和显贵。由于他们缺乏训练,同时由于环境所限,他们被迫过着我所说的那种方式的生活。但是,我不想扯到这些在历史书上已有论述的事情上去。这些地区和北京的海拔高度比起来,是很高的。空气十分寒冷,我们发现附近的一些泉水有的已结冰。你们可以相信,我比任何人更多地利用冰块;在炎热的时候,我用它作为饮水。这种炎热虽然在夜间消退,但在中午却是灼人的。

5. 27日,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达尔湖²⁶ 的美丽的湖泊。这里离开皇帝通常在春秋季节猎鹿的出名的长白山²⁷ 两天多一点的旅程。我在写信说到因为皇帝要学习我们的音乐艺术和学理要我陪同他去的那次狩猎旅行时,对此已有报告。²⁸ 达尔湖周围十六“里格”^{*},位置自西南向东北。²⁹ 湖内产鱼奇多,全湖好象就是一大群沙丁鱼一样。我们只抛了几次网(这些渔网是皇帝给我们正是为了在这种场合使用的;皇帝还给了两只小船,以备不时之需),就捕获了足够供全体人员食用的鱼。我们的人本着渔猎家的风度,不愿再多打鱼了,因为我们既吃不了,也无法把它们保存起来留着以后再吃。每一网里的鱼都是满满地象蚂蚁堆一样,因为太重了,不可能把网拉上岸来。由于钦差大臣们以身作则,人人都不得不走

* “里格”(League),一种长度单位,在各国不同,约为2.4至3哩。——译者

进水里去。每个人都脱了鞋子，在水里捞鱼，决没有捞不到鱼的情况。因为鱼多得很，任何人只要把手放在水里就能捉到一些。我必须说，没有看见这件事的人是难以相信，或者甚至难以想象有这样的事情的。有四条河的水流入达尔湖³⁰，这个湖也可能在地下与海相通。湖水有盐味，据说也有涨潮的现象。但是，我没有遇到过潮水，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问题留待读者来判断。我只讲我所见到的。在离开这个湖不远处，我们来到一座宝塔的废墟。这座塔是四百年前西鞑靼人统治时期一位内阁官员建造的。在一块美丽的大理石上精刻的汉文还保存着对这个人的纪念。³¹ 在神像的面前，有几大卷他的写作，但已都破损不堪。我们从其中挑选了一些看来是用藏文写的，我们把那毫无价值的神像毁了³²，把那几大卷书带回北京，作为纪念品。供奉神像的人总是愿意留在能够让他们得借以饱食的地方，但是，后来他们在这里竟不能办到这一点。现在，甚至纪念他们的东西也没有了，那座宝塔只成为寻找蔽身之处的燕子和其他的鸟类的的一个窝了。

6. 从此处起，我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了几天，因为我们不得不根据什么地方能取得水来安排我们的旅程。在这个地方，甚至泥泞的沼泽都好似是清澈的泉水，一点干草就象悦目赏心的草坪一般，而牲畜的粪便也是很有用的东西，因为没有它我们就会吃不上饭。7月9日，我们越过了鞑靼人居住区的边界。这些鞑靼人是中国的臣民³³，关于他们我已说过了。他们养马，其中有些是作为贡品送往朝廷的，有些是出售的。³⁴ 中国这个国家如没有这些马匹将会感到十分不便，因为人们都习惯于骑马，而不习惯于汉人所十分向往的轿子。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个台吉³⁵。此人年事已高，有一套粗陋的排场。他不是这个帝国的臣民而是喀尔喀的臣民，关于喀尔喀部族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了。和他在一起

的是他的宗教大师称为喇嘛。这些乡下人对于喇嘛极为尊敬，如果没有一个喇嘛先作过祷告，他们就不吃饭。作祷告是十分严肃的，证明了这一种行为对人来说是多么自然的事。我们把疲乏的马匹和骆驼都留在这个地方，以便它们经过一番休息后可以恢复体力，供在我们的回程中使用。我们也留下了足够的人员来照料这些牲口。

7. 13日³⁶，我们排成了半圆的队形，以便在行进时在沙漠中打猎。当我们最后合拢成圈时，圈子里有很多黄羊，那就是说黄色的绵羊和山羊，因为在汉字中，这两种动物都是同一个“羊”字。这些黄羊跑得如此之快，甚至特别挑选出来的马无论跑得多快也赶不上它们。如我好多看到的情形，一只黄羊即使在被追逐时伤了一条腿，还是一样勇敢地跟着其他的黄羊跑，因为这个缺陷而致丧生的仅是偶有的事，那也只是因为巧被射中的缘故。被我们包围在直径达一里格多的圈子里的许多黄羊，只有几只被打死了。要捉住它们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一看到活的东西，就立即奔跑得无影无踪。我多次看到，黄羊是几千只成群地生活在一起。小黄羊从一出生就学跑，好象这是它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在我们的包围圈里，还有一些同我们的骡子类似的野骡子³⁷。在躯干大小、头、耳、颈、腿、脑壳以及尾巴、毛鬃方面都一样；我看到这一切都很欣赏。甚至它们的粪便也相似。唯一不同之处是野骡子的声音粗一些。我们只打死了一只不到一岁的小骡子，因为我们追不上较大的骡子，甚至要在靠近它们的地方去观察也办不到。如果说黄羊生来就会跑，那末，这些动物好象生来就会飞。它们都是一个颜色，既非白，也非黑，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灰色或煤碴色。在尾部周围，它们都有一个白点。即使是捉到——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的骡子所生下来的骡子，要驾驭它们也是不可能的。自然的安排

真可钦佩。鞑靼人吃野骡子的肉；我试过，但是这种肉太老了，除了他们的牙齿之外，任何人的牙齿都应付不了。14日，我们又抓到一只小骡子，这只骡子在前一天腿上曾中了一箭，因为跑不快，被马赶上了。因为这只骡子还能站得起来，我可更从容地来欣赏自然界的丰富多采，我观察到了上面所述的一切。

8. 7月16日，我们继续向北行进，到达了克鲁伦河。我们在北纬48度几分处渡过这条河。³⁸ 这条河大部分是自西向东流的，水流平静。但是，河的两岸没有树，这些未开垦的不毛之地的平原看来都是同样的倒霉情况，那就是空旷一片。这条河里有许多极好的鱼，这些鱼似乎是来自从这里往东下游约一日旅程的一个周围约六十“里格”的美丽湖泊³⁹。我们沿河旁扎营，捉到了大量的好鱼。这条河里可以航行象我们所带的两条小船那样的小船，这样的小船我从来还没见过呢。克鲁伦河从我所说的那个湖起以下的一段称为额尔古纳河。我们将看到在和约里提到了这条额尔古纳河流入黑河处。⁴⁰ 关于黑河——鞑靼话称为黑龙江，我们以后将有机会谈到。在来到黑河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平原和无树木的荒地。但是，在黑河地区，却有连绵不断的迷人的森林。在这一带附近所有地方，有好几天蚊子之多，令人难以相信。蚊子残酷地向牲畜进攻，我多次看见可怜的马儿满身尽是蚊子和蚊子轻易地吸出来的血。这些蚊子把我们折磨到这样的程度，我们之中凡是有能力的都被迫做了薄绸长衫，带有头罩，象网一样把头遮起来，戴着这些犹如织成的盔甲行路，以对付这种害虫。一位钦差大臣怜恤我们，为我们做了两副头罩，使我们得到保护。其他人员只得忍受着这些无孔不入地螫人的小虫的侵扰。这是对忍耐工夫的很好锻炼，对那些能真正经受得住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得到表现的机会。有过这一番经验，我要说，这个地区可以很合适地称为蚊子国。

9. 7月21日,⁴¹距离我们的目的地只有七、八天的行程了,我们的钦差大臣们,通过一些鞑靼人通知俄国人关于我们到达的消息。22日,自北京带着信前来的一名信使赶上了我们。第二天,我们来到了又一条河,称为波尔契河,在那里我们看见几棵柳树和灌木,很为高兴,因为这一路上树木很少,所以这些柳树和灌木看来就象美丽的森林一样。波尔契河自东向西流,经过两岸都是平坦和潮湿的地带;这条河水量虽不大,水流却很湍急。河水不涨时,有些地方可以骑马渡过。但是,由于在我们的全部旅程中常常下雨,雨水过多,当我们到达这条河流时,四周的地区都被水淹了。那一天,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有些人来到这条河,连人带马深陷在泥中,以致于象俗语说的不能动弹。其他的人在不远的一处高地上扎营,打算第二天渡河,这里的河水深可没顶。我们寻找一处可以渡过的地方,但是因为整个河岸被水淹没泥泞不堪,所以竟不能找到。于是,我们又向后转,只留下少数的探险者。他们赤裸着身子骑在马上到处游来游去,过了一会儿发现了几处危险性较少的地方,第二天我们可以在这些地方渡河。有些人甚至十分幸运地发现他们能够立即游水过去。第二天,我们在靠近河边的泥土上用柳枝铺了一条路,以便马匹和其他牲畜不致陷入泥中,但是这个灾难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许多牲畜在渡河时丧生,大量的物资损失了,大批财产和服装损坏了。服装的受损是因为有些高级人物为了体面决定(不都是有这样决心的)穿着衣服骑在马上游泳渡河。普通人就脱了衣服,游了过去。我们和钦差大臣们一起,乘小船渡河。马匹陷在泥中,深没过膝,许多马不能挣脱出来。除了在渡河中丧生的牲畜外,许多不会游泳或在渡河时骑在马上不会驾驭的人,落在水里,我们眼看着他们惨遭没顶,就这样由于无常的死而进入了天堂,而我竟不能给以救援。这件事使我十分痛苦。渡

河化费了这一天整天和第二天的一部分。⁴²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通过了密布着矮树丛的地区。

10. 24日，我们走过被水淹没的地带时，发现有大量的大黄。在这一带，我们的问题已不是没有水，而是水太多了。这里还有水獭。⁴³ 喀尔喀人和其他鞑靼人用水獭的皮做衣服，特别是做帽子。在这些平原上，除了无尽止的一连串的水獭洞外，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们的人这时捕杀水獭主要是为了吃它们的肉，而不是为了取得它们的皮，他们认为水獭的肉是很好吃的。在这同一天，我们遇见几个喀尔喀人⁴⁴。喀尔喀人生性是不诚实的；所以，我们并不相信我们问他们时他们所告诉我们的消息。然而，我们用了一些礼物诱使他们带领我们走一条好路，他们这样做了。我们来到了苏克台河⁴⁵，在岸上扎了营。从这儿起，我们开始看到遍布森林的山，感到很悦目。第二天，喀尔喀人离开了我们，因为他们是俄国人的死敌⁴⁶，他们不敢再往前走了。苏克台河同第二天我们所经过的图里格河(图尔格河)一样，是自东向西流的。不久，我们进入了密茂的松柏和其他树的森林。这些树是这样的高和这样的直，它们比欧洲最好的、培育得最好的森林，并无逊色。

11. 26日，我们渡过了称为波里河⁴⁷的又一条大河，没有遇到什么危险或受到生命的损失。但是，由于洪水的关系，这次渡河使我们所有的人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不让那些牲畜陷入泥里，我们不得不去割草，把草铺在泥路上粗略地铺成数层，这样我们在泥上行走就如人们在河里打鱼的木筏上行走一样。这一天，我们沿着波里河行走，在泥泞中踉跄地前进，一路上留下了一些骆驼、马匹和其他牲畜，它们深陷在泥里拔不出来。然后，我们来到这条河和温达河的汇合处。温达河同我们自从离开克鲁伦河所渡过的

所有其他河流一样，是差不多自东向西流的。但是，就连在这里，我们的运气也不好，这条河也因为这些日子的大雨，河水高涨。如果我们有小船的话，这条河里本来是可以航行小船的；但是，水流是很急的。在这里，许多牲畜丧了命，有些人由于不能克服洪水的急流，也在我们目睹之下，遭到灭顶。我们的物资给养大部被水浸湿，另一部分损失了。生命损失之惨重，使我凄然流泪。皇帝的舅舅为了鼓励其他的人而跳入水中，游泳渡过河去。我们仍照以前的办法，使用前面我已提到过的那些小船。这一天和第二天，我们都花在渡河上，各种损失都很大。从这里向北走不到半日的路程，温达河就流入黑河。关于黑河，我已经提到过，以后我还要说到。第二天，我们派到俄国人处去的人之中有一个人⁴⁸回来了。28日，同他一起去的其他人也回来了。

12. 29日，我们走过了在洪水之后所造成的沼地之间的连绵不断的森林。同一天，我们在一小块旷地上宿营。俄国总督派来了十个俄国人⁴⁹向钦差大臣致意问候。他们受到仁惠和有礼的招待，看来这使他们感到高兴。在我们钦差大臣的信使到达俄国人处之前不久，我们的九十只船来到了。它们溯黑河而上，载着一千名士兵和当时及将来的成功所需要的一批物资。这些船带有四十座炮，按照各船的容积，配置在各船的船首上⁵⁰。当这些船驶近俄国人所在的城镇时，总督问它们开往何处，去干什么。兵士们给他的回答很不委婉，他们以往常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回答说，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总督很稳重地对此不予理会，而且在收到我们的钦差大臣们通知他业已到达的彬彬有礼的信时，称誉他们是做事得体的大人物，并把这些船上的人们粗鲁无礼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回答说，总督对那些船上的人的话不必重视，因为他们是不参与和平谈判的。我们在这里停留了一天，先派

一大批兵士去查明沼地的分布情况，在这些森林中，沼地之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30日，我们在密茂的森林里走了五“里格”路，几乎连太阳都看不见。当我们从森林中走出来到了空旷的地方时，我们看见一排属于俄国人的房子，这些房子都是按照俄国式样用木材建造的。在这些房子附近，有一所小礼拜堂，也是用木材建造的，但是建造得更讲究更精细些。这座小礼拜堂有二腕尺*宽、四腕尺长，有四根木柱子，顶上有一个十字架。它的地板离地有三、四吋高，因为那个地方是泥泞不堪的。⁵¹在森林附近，俄国人开垦了几块地，种植冬麦和其他新奇的作物；他们不能收获麦子，因为这里的气候显然不适于种麦。

13. 31日，我们到达了尼布楚城。从我们的那些船上来的许多官员都来迎接，向钦差大臣们请安。⁵²尼布楚位于尼布楚河⁵³(尼布楚城由此得名)流入黑河所形成的一个角上。黑河自西向东流，稍稍偏北。由于黑河在这里深得多，较大的船也可以航行。河水流得非常湍急，水呈泥土色，而尼布楚河的水却是清澈的。两条河汇合后，水色的差别在很长的一段距离中仍能看得出。在这个地方，河宽约四分之一“里格”，但是水很深。河中有一些小岛。据鞑靼人所知，这条河在大约七百“里格”外最后流入东海。还有几条河带着巨大的水量也流入这条河，所以在这条河的入海三角洲处，河面宽达六个多“里格”。这条河里盛产各种各样珍贵的鱼类⁵⁴，但是由于水流湍急，捕鱼不易。在许多美味的大鱼中，有一些和我们的鲑鱼相似。围绕着这条河的令人喜悦的森林，更增添了这条河的美色。在这些森林里，猎物很多，有鹿⁵⁵、小羚羊、山羊和一种我曾经在手里抱过的兔子。这种兔子和我们的一般狗一样大，夏天里它的毛色和我们的兔子一样，到冬天毛色雪白。从它的

* 腕尺，古代长度单位，约等于18至22吋。——译者

体形来看,这种兔子是不很轻的,而是相当肥大的。还有另一类鞑靼人称为“堪达干”⁵⁶ (Kamdargan)的动物,和鹿相似;它的毛色略带灰色而更近于栗色;它的角和鹿角相似,但是角梁和角枝都是扁平的。在它们的颈旁肩头上,有瓜那样大的肉块,犹如印度和圣劳伦斯岛的牛身上所见到的。它们的肉、皮和角对鞑靼人都是极为有用的东西。黑河和许多其他流入黑河的河流,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在过去几年里都被俄国占领了。⁵⁷ 俄国人从这个地区的毛皮上面赚了巨额的利润,⁵⁸ 最贵重的毛皮产自一种和猫一般大小的动物身上,我们葡萄牙妇女称这种毛皮为“雷加洛”(“regallo”),俄国人称之为“塞不利纳”(“zebelina”)。⁵⁹ 这种毛皮非常细软;较好的是黑色的,价值较次的是栗色的,其价值按照人们对这些颜色的喜好而有高低。这里有很多黑狐、白狐和黄狐,以及其他贵重的兽类,俄国人把它们的毛皮卖给中国宫廷而获得厚利。⁶⁰ 俄国人还在东海的冰里发现一种大鱼,他们也把这种鱼捕来贩卖,赚了很多钱。这种鱼的牙齿长达一米,粗如胳膊,很坚硬,颜色纯白,十分象玉。中国宫廷的鞑靼人以极高的价格收买它来制造骨董。⁶¹

14. 尼布楚城位于大约北纬五十一度半的一块平原上⁶²,西面靠着尼布楚河的河岸,东面离黑河只有一段很短的距离,所以它既在平地上就受到洪水的威胁,常常是非涉水而过(正如我们所经历的那样),就无法进入该城。在尼布楚河的对岸西方,有一些高山⁶³。这些山的形势控制着尼布楚城,所以如果在这些山上没有防御工事,就不能防守这座城抵御欧洲的侵略者。在这些山中的一座山上,我们看到了有两个矗立着的朴素的木柱。当我们问鞑靼人这两根木柱作什么用处时,他们回答说,俄国人要拜他们的神像时,就到那里去磕头。当时,我对这种解释一笑置之,因为我不能相信这种说法。但是,稍后不久,我的同伴用望远镜了望后说

那两根木柱是两个漂亮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横木和我们的视线在一条线上，所以我们看不出。因此，我们断定，这个地方是俄国人的十字架地，两个十字架中较高的那一个是天主的十字架，较小的那个是善良的贼的十字架。在尼布楚河的东岸，约一哩半之遙，也有其他的山，但没有上述的那些山高。在这些山上，俄国人种了谷物。这些山越往北越矮，最后成为可以供作各种用途的平原。在这些平原上，俄国人和他们的藩属喀尔喀人畜养大批的马、牛和羊。他们也种各种蔬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品种是一种非常好的白菜，这种白菜产量很高，他们送了一些给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我没看见有任何欧洲品种或外国品种的水果，这或者因为他们不种植水果，或者因为这里的地不适于种植水果。我们在黑河正南方的平原上扎营，不久，这个地区的总督派了一些人来向我们的钦差大臣们致意问候⁶⁴。

15. 为了详细叙述此后接连发生的事情，为了要把我们要说的话弄明白，必须重溫一下过去的一些事。四十六年以前，在鞑靼人最初统治中国的年代里，⁶⁵当时已经逐渐逼近鞑靼地方⁶⁶的俄国人派了一位使臣⁶⁷到鞑靼皇帝处要在平等条件下谈判和平。但是，鞑靼人当时还是很不开化的，完全受中国习俗的影响，而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在它的帝国里从未接待过贡使以外的外国人。鞑靼人对于世界情况一无所知，又有着同中国人一样的自大感，把其他民族都看作象与他们相邻的民族一样的牧民。他们以为一切都是属于那个他们高傲地称为“天下”的中国的一部分，好象除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因此，那位不愿屈从的俄国使臣⁶⁸，由于大胆地对中国人说了以下的话，就被遣返了。他说：“你们的帝国是大的，但我们的帝国也不小。”⁶⁹数年之后，俄国人向东推进，征服了上述地区，最后到达了中國皇帝每年派人去打猎的那些地区⁷⁰。一

方向对方进攻了,结果双方都死了人,而双方都不愿让步。再过了几年,大约在十三年以前,那时我已在本朝⁷¹,俄国人又派了一位使臣来谈判他们所希望的和平⁷²。由于吴三桂的反叛,这位使臣受到很好的接待。鞑靼人以前曾因吴三桂帮助鞑靼人占领中国,擢升他任高级官职。后来,吴三桂不得不承认鞑靼人的主权(关于此事的历史已经很陈旧而为人所共知),因而心怀不满,于是造反并占领了当时相当于这个帝国的一半的疆土。但是,这位俄国使臣坚持要求平等地位,不愿顺从对这类事务毫无经验的中国人的习俗⁷³,因此他也被打发回去了。不过,中国人对他大胆回答他们的话的勇气很佩服,因此也不无稍减了他们的那种妄自尊大的心理。这位使臣总是认为自己是和他们平等的,他是一位极其坚决的人。虽然他熟谙经商,他却没带什么货物来⁷⁴。他对文学也深有了解,而且作为一个异教徒来说,对于哲学和教义之爭也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不愿进行任何关于天主教的讨论,甚至不愿听到人家提到天主教的名称⁷⁵。

16. 葡萄牙大使曼纽尔·德·萨尔丹哈⁷⁶对于在这一点上教导中国人也有贡献。广州城的中国官员曾上奏皇帝,指控萨尔丹哈在文书中拒不承认他的藩属地位⁷⁷。皇帝为萨尔丹哈的名声所动,回答说邀请他来朝,加以质询,并要他说明理由。但是,等到他到北京时,中国人对情况已有更好的了解,他们认为对此事装作不知,不提问题,更为明智。这位大使在朝廷中留下的名声很好,皇帝和其他大员们对萨尔丹哈都加以赞扬(我常听到这些话,不过他们说外国名字总说不好),而有些人企图以谣言诬蔑中伤⁷⁸,说萨尔丹哈顺从了中国习俗。但是,事情的真相是,如果其他欧洲人来了,我想,除非他们象荷兰人那样接受藩属地位的耻辱——我听说,他们极为丢脸地这样做了——否则就不会允许他们前来。荷

兰人甚至丢脸地答应每年进贡一次，以取得他们所十分希求的贸易的许可。⁷⁹ 但是，即令作了这样的屈服，他们仍未得到这种许可。⁸⁰ 在这些年代里，俄国人建造了一座城，在城的周围筑了一道城墙，把这座城叫做阿尔巴津⁸¹，这个名字来自这个地区的他们的一个臣民名叫阿尔巴金的一个游牧民的酋长。但是，鞑靼人把这个城叫作雅克萨。为了此事，本朝皇帝在约四、五年前，决定派一支军队包围俄国人，强迫他们放弃他们所侵占的地方。⁸² 就在这件事上，皇帝也表现了他的仁慈温和，下令不得伤害任何人，并应对老百姓优加体恤，予以遣散，告诉他们不要再回来。⁸³ 俄国人虽曾答应照办，但未遵守这些条件。五、六个月后，他们回来了，发现鞑靼人已离开这个地方（鞑靼人不愿居留此处，也不愿以这个地方供狩猎之外的其他用途），于是又占领了他们的城堡。⁸⁴ 皇帝再派军队围雅克萨城⁸⁵，因此，百姓们赶忙派一名信使前来本朝，请求停战，以待已在途中的他们的全权大使的到达。⁸⁶

17. 皇帝一本其向来的仁慈为怀，下令在如下的条件下停止围城：在他们的大使到达前，他们不得耕种土地，但在其他事项上，则听任他们自由。⁸⁷ 在这之前几天，皇帝经由欧洲寄出一封信⁸⁸的数份抄本，要查明大公爵是否知道他的臣民们在这些地方的作为。他还声明，只是因为相信大公爵不知道这些事情，他的臣民才免于遭到彻底的毁灭。他通知大公爵劝告这些人勿自取其咎而致生灵涂炭。过了一年半，俄国使臣⁸⁹派了一个信使来到本朝，通知中国方面，俄国使臣已经到达色楞格斯克城⁹⁰，该城在尼布楚以西约十五日的旅程，并邀请我们的钦差大臣去举行和平谈判⁹¹。最初，对这件事进行得很起劲⁹²，但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由于喀尔喀人和厄鲁特人之间发生了战争，对这件事的热情就消退了⁹³。厄鲁特人向喀尔喀人猛烈进攻，致使后者惊惶逃走，在沙漠中到处留下力

竭而死的马匹、骆驼和其他牲畜的尸体，甚至还有年老的和生病的人。真是一片凄惨的景象！⁹⁴ 我们在旅途中写了一封信，通知俄国使臣，由于战争原因不能继续前进，我们已折返。⁹⁵ 我们把俄国使臣的委婉的回信忠实地翻译出来，这封回信似乎对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的做法表示诧异。⁹⁶ 上一冬天，当地已冰冻，在沼地上行路不很困难的时候，俄国使臣派了一个信使来本朝，请指定一个举行和谈的新地点。⁹⁷ 皇帝选择了尼布楚。那个信使把他带来的毛皮卖了，获得厚利而归。⁹⁸ 此人曾请求皇帝允许他来参观我们的教堂。皇帝答应了这个请求，并照对前一年来此的信使的办法，将此事通知了我，要我对此人好好接待，招待他吃一些茶点。这一切似乎都使这个信使感到高兴。

18. 他坚持要赠送一些毛皮和钱以表示感谢。但是，我们拒绝了这些礼物。他看我们拒绝了，就拿教会来打动我们，说是献给上帝的。但是，他的翻译员是一个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俄国人，竟用了鞑靼话里的佛像那个字来表示“上帝”。我听到这句话，就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东西。虽然我我说的是中国话，但是那个信使看到了我说到上帝时的恭敬态度。为了避免误会，他说：“我是献给耶稣的。”我向他表示谢意，说耶稣对他的好意是感谢的，但是他并不需要毛皮做衣服。于是，我们的谈话便以欢快的笑声结束。⁹⁹ 我立即将经过情形向皇帝报告，他似乎很满意。我乘此时机（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中国人以为我们和俄国人是遵守同一法律的）向皇帝建议说，既然俄国人要向我们送礼，虽然我们拒绝接受了，似乎在礼节上我们也应该送一些东西给他们。皇帝想了一想，同意了，因为我们这一表示只会产生好的影响；这样将来我们到俄国人那里去的时候，此人当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我听到此话，就敢于再进一步询问，既然他已到我们的住处来过了，如果我

去拜访他是否得当。皇帝想了一想说：“不，你将随同我的大臣们去交涉重要事务，我以给予他们的尊荣同样地对待你。如果你去拜访他，我恐怕他会误解你的盛情，对你的尊重会减少。我不愿如此；因此，你去拜访他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你愿意，你可派你的一个同伴去看他。”¹⁰⁰ 皇帝的办法避免了任何危险。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办事必须具有的谨慎，而在目前这件事上，需要比在任何其他事情上更加谨慎。我们必须这样小心从事，其他的人也必须如此，在方式上要适应这种多变的事情。我所写的和将要写的，都是十分详细的，以便把我所要说的事情的真相，不加粉饰地说明白。

19. 这位使节回去带了一封回信，信中除指定和平谈判会议的地点外，没有言及其他。¹⁰¹ 他走之后两三天¹⁰²，我们的使团和随从人员¹⁰³也动身了，其结果如前面所说。这就是在七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到达时的情况，和议和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一天是我们的天父和创始者圣伊格那修斯的节日¹⁰⁴。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个看作是我们的事情会得到圆满的结局的征兆。

20. 8月1日，尼布楚总督以他的名义送来十五只羊，以大公爵的名义送来两头牛，作为送给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的礼物。¹⁰⁵ 2日，俄国使臣派来一位年轻人。俄国使臣这时还未到达，但已离此不远了。他向钦差大臣们致意问候，同时暗示在和谈时双方代表人数应相等。¹⁰⁶ 这个建议对于对国际事务没有经验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也派人去致意，向俄国使臣问候，并催他赶快来，因为冷天即将到来，不容耽延。中国人对这些他们不习惯的事情毫无经验，他们估计只要十天便可订约。俄使的答复总是很有分寸很有礼貌的，他说他将在情况所许可的限度内尽快地前来。¹⁰⁷ 在这个月17日以前的日子都花在人来人往上。¹⁰⁸ 在这

期间，这个地区的总督送了一些礼物给我们的钦差大臣们¹⁰⁹：奶牛、各种蔬菜和一种品种很好的白菜。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不懂得国际法上应有的信任，怕这些东西里下了毒药。他们并未明白地说出这种猜疑，但是从他们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我拿了一片萝卜，要了一些盐，就吃起来了，好象吃美味的黄瓜一样。他们看到了我这样吃，他们之中的一个，吐露了他们的顾虑说，“没有什么欺诈”，也跟着我一同吃起来。又一次，总督送来大量的一种粗肉和一些甜点心。钦差大臣们立刻邀请我们去，我一到就了解他们没有吃的原因。我立即尝了这些食物，以教育他们，并以我的榜样使他们懂得，一个人必须相信人们的本性是善良的，不该愚蠢地怀疑这一点。当我毫无畏惧地尝这些食物时，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愚蠢的大胆行为，他们之中的一人表达了他的思想：“神甫，他们从来不会毒害人吗？”这些人就是和我们一起办理这些重大事务的人，这一点读者必须记住，以便了解我们许多个月以来所要对付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受到一种满腹猜疑、缺乏外面世界知识的人的牵累，而另一方面，上帝在这件大有希望的事情上，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21.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头儿们觉得俄国使臣来得太慢了，他们写了一封信给他，要求他赶快些，理由有如上述。¹¹⁰ 他对此信作了一个直率的答复，对于他们带了这么多的人来谈判和约，表示惊讶。他说，他们离城太近与国际公法不符，因此他们绝对必须后撤少许。¹¹¹ 对此，他们不用信而作了口头答复，因为他们是在外国土地上，所以语气相应地是很客气的。他们说，他们由于必要而不得不住在该地，因为在周围的地区，既无可供饲养牲畜的草地，也没有可供他们居留的一处合宜的地方。如果他不相信，他可派人指定一个更适当的地方，那时他们当立即迁移。俄国使臣得到了这个答复，就说他将赶快到来，在一切事情上尽可能使钦差大臣们

满意并给予协助。¹¹²17日，俄国使臣派信使来通知我们的钦差大臣们说，靠近他要渡河的地方的我们的一些船只必须撤退。因此，那一天，不得不把那些架着炮的船只拉开，或者是因为这位俄国人不愿听到它们鸣放礼炮，或者更可能是因为他不愿在这些大炮旁走过时看到它们的威力。于是，第二天，他宣布不久即将到达。同一天，那些辛苦的、吃了许多苦头的人们所搭乘的几只打鱼木筏开始到达。¹¹³事实是，俄国使臣几天以前已由陆路到达，我们从吹奏喇叭和笛子声以及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所不了解的其他现象中就知道了。¹¹⁴他之拖延是要表示他的权威，或者是对抗他们的傲慢无知。在这同一天，又在19日，双方都派出了使者，但是除了说些好听的话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结果。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一再表示希望俄国使臣派他的拉丁文翻译来，因为那些被派来的粗野的人使他们感到麻烦和为难。但是，俄国使臣从未照办。他本人当然也极希望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派拉丁文翻译去，而他们也不敢照办，因为他们并未授有译员的职衔。¹¹⁵这样，有很多天就白花在翻译人员和他们的同伴们的乱哄哄的来来往往，他们试图确定将来会见的方法和方式。

22. 21日，双方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商定各带兵士三百人。¹¹⁶船上的兵士人数不得超过五百人，而这些船停泊在河上，其与开会地点之间的距离应同尼布楚城与开会地点之间的距离相等。22日，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心里猜疑害怕起来¹¹⁷，没有遵守前一天所规定的关于兵士的人数和部署的条件，而没有让我知道。全体兵士在船开到河岸后都上岸了。除非无法避免，我是不愿卷入这件事中去的。显然，这个事情是那些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的无知的人安排的。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要这样做，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中国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这个事实，或者是因为他们所用的翻

译粗陋糊涂而弄错了。俄国人提出了抗议，并废弃了那个协议。我们的钦差大臣们认识到，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我们就让他们这样做了，因为中国人的要求是比较公允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叫我们去劝俄国使臣同意他们所作的决定。于是，我们就去了。俄国使臣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我曾经自北京写过一封信给他（此信由他的信使¹¹⁸递交），劝他同意一些后来他所同意的事情。这位信使获知本朝皇帝的意向，应该说这是他的功绩，而皇帝的明白的愿望则是我所知晓的。这时，我们劝说他同意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的建议中的每一细节，即船要靠岸，兵士们要上岸，但将限在一个地方。¹¹⁹我们带了他的答复回来。我不知道，我们的钦差大臣们若不是害怕，则是怀了什么样的猜疑。除非能带更多得多的人，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渡河，虽然一切事情本来是已经解决和商定好了的。¹²⁰俄国使臣看到他们犹豫不定，也看出了他们出尔反尔、心怀猜疑的表现，不愿依从他们的愿望。他说，既然他们对他不给予一个人对别人应有的信任，他也开始有他自己的猜疑。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想为自己辩解，就说，俄国人之所以不让中国人带他们所要带的那么多的兵士，是因为俄国人意图欺骗他们，不打算订立和约。我使自己充当医治这种心病的医生，就回答说，他们应该相信俄国人，兵士人数的问题是一个守信的问题，而不是什么阴谋。¹²¹

23. 虽然我花了很大力气，花了很多时间，他们仍拒绝执行渡河的决定。我看到这件重要的事情由于他们对世事的无知而被弄糟了，尤其是当我看到在场的所有官员们都以各种表示鼓励我劝说钦差大臣们同意，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是，一切办法，甚至我对他们叫嚷，都没有用。他们似乎认为别人也都有象他们自己所怀有的那种鬼胎。最后，我说：“先生们，你们必须认清，俄国人是有理智的人，而不是野兽；他们不是那样的险诈，以致要借缔结和约为

名来伤害我们。如果花了这么多的钱，作了这么多的诺言，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我们竟没有打开我们所敲的门，到了俄国人的家竟没有和他们会面，这样就回去了，那将是对全世界的一种无礼行为，并使我们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将使皇帝感到奇怪，我想这丝毫不会使他满意的。考虑到这一切，我愿意在会议期间让俄国人的一杆枪顶在我的胸前，以保证没有任何危险；因为，假如他们有什么坏的打算，我的情况既然是最危险的，无疑地我将第一个死去。”¹²²他们默不作声地听着这个建议。最后，皇帝的舅舅¹²³（这个人稳重明达的）用下面的话作了回答：“徐日升（这是我的中文名字）是我们皇帝所熟悉的人，皇帝曾在一份公开文件中称他是一个足堪信任的忠贞之士¹²⁴，这是皇帝经过多年经验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位为公众所熟悉的人物，况且他的年事已高，又不是一个孩子，他说话是很有道理，很有决断的，因此我们不能不给他以皇帝对他的信任。所以，我将单独和他一起渡河。”其他的人看到这种讲理态度，都站起来了。我们就去渡河了。人人都称赞我们在这样一件重大事情上的切实的决心和对皇帝的忠诚，连钦差大臣们后来也承认如此。他们看到以前他们认为受到阻碍的事情又在进展了，他们曾经看到已经毁坏了的东西又被树立起来了。

24. 俄国使臣派人来问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是否要他准备一个共同的会议场所，还是双方各准备自己的会议场所。他们没有问我的意见，就作了回答；回答的内容，就他们来说，表现了他们是深通世故的，那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帐篷，俄国使臣应准备他自己的。俄国使臣于是搭了一个南北向的布置得很好的椭圆形的大帐篷¹²⁵，挂了许多画，还有铺着美丽的地毯的地板。在帐篷南面朝着我们的那一头，他放了一个大讲台，几乎占了全部面积，讲台上放了一张漂亮的、金色的欧洲式写字桌。除此之外，有一座钟，从钟上

可看到提议和答复的时间；还有两个精美的刻着浮雕的银制大容器。俄国使臣频频地饮着一种醋和冷水混合的酸饮料或糖蜜水，这些饮料就是从这两个容器中盛出来的。在桌子的上空从帐篷上吊着一个镶有宝石的精美的十字架，俄国人对这个十字架十分尊敬。在西面，有一个较小的、漆得很漂亮的帐篷，我想这个帐篷是供作以后我将说到的用途。¹²⁶ 有一把给大使坐的黄缎面的精美的椅子，椅上的钉子要不是金的，就是镀金的。另一把椅子是普通的鲜红色的，比较小一些，这把椅子是给这个地区的总督¹²⁷ 坐的。还有一条铺着毯子的长板凳，上面坐着另一个人，我们猜测是典礼官¹²⁸。此外就没有别的座位了，这一帮中的其余的人，包括许多高贵的军官、校官、尉官等，都一直站着，谁都不敢在使臣面前坐下。我们从这件事推测，他当是一位权力很大、地位很高的人。他签署自己的名字如下：奥多尔尼秀斯·罗西提能斯·布兰森西斯·西奥多鲁斯·阿列克秀斯·欧维埃兹·戈洛文 (OdoIncius Locitennens Brancensis Theodorus Alexius Oviez Golovin)¹²⁹。

25. 我们的钦差大臣们送去了他们自己的鞑靼式的黑帐篷，这些帐篷做得很好但比较朴素，就搭在俄国特使的帐篷之旁，使讲台能为双方所共用，但讲台的主人占着大部分。在这个帐篷的东面，他们搭了一个小帐篷，其用途和俄国人在西面所搭的那个帐篷的用途相同¹³⁰。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从北京朝廷出发，带了一支如上所说的军队，目中无人（为了要在我的报告中做到真实和诚实，为了对他们的自高自大不略而不提，我不能不一再重复这一点）。他们以人众而自豪，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真诚相信，没有别的国家君主能派出这样一支骑兵队，通过沙漠走四十天的路程（我们用骆驼和牛车运载一切必需的东西和物资，实际上走了四十九天），以九十只船全部用于运输大炮，带着一千名兵士和两千名服务人

员,这批人在尼布楚出现,使俄国人感到无止境的担心。¹³¹不过,他们的帐篷式样是平凡的、不精致的。他们没有地毯,只有一些粗的草席子来铺他们的朴素的帐篷的地板。他们得知俄国使臣有漂亮的椅子,而他们照他们的习俗坐在地板上是不用什么东西的,因此他们就命令木匠们通宵工作,在时间所允许的范围內制造出一些粗糙的长板凳,这些板凳狭窄得连他们的坐垫都放不下。他们的卫兵有十六支矛枪,当他们得知俄国人拥有的矛枪多得多,而且他们还有火绳钩枪和其他古罗马式的武器,他们认为不如把他们的十六支矛枪收起来还好些。

26. 我们过河的情况有如前面所述。人数众多的官员全都穿着他们的最好的绣着龙和其他兽类的服装,这些兽类都是他们各自职位的标志,衬着金黄色的底,看起来耀人眼目,但并没有多大价值。其余的士兵都穿斜纹布或其他类似的料子的服装。渡河之后,我们都骑上了马,马匹已先我们游水渡河。有四副马鞍很漂亮:我的马鞍是皇帝赐给我的,是金饰的,极为贵重;我的同伴的马鞍,还有皇帝的舅舅佟国纲¹³²和皇太子的舅舅索额图¹³³两位钦差大臣的马鞍。其他的马鞍都是很普通的中国式的,但也都很好。在俄国使臣走出他的住处之前,出来了两队士兵,排场很盛大,他们的队长和军官们都排着队,慢步行进,好象是在作行进式一般。队伍之前,有几队配合得很和谐的笛子和四个喇叭的乐队,这四个喇叭不时与笛子合奏,悠扬动听,很受称赞。他们的后面跟着几个架在马上鼓,在这之后排列着我前面所说的那些罗马式的武器和旗帜。然后,俄国使臣骑着马出来了,他的随从人员虽不太多,却是足够的。他的两侧有两个骑马的卫士。他的座鞍很小,象在赛马中所用的那种鞍子,而且由于过小而无法加以装饰。铺在整个马背上部的是一块米兰诺银色的、欧洲式的毯子。

27. 当他们走近帐篷时，双方都停步了。他们的笛子和喇叭继续吹奏，但是我们则静默无声。曾经决定，双方应同时下马，这很容易就做到了。双方走进了帐篷。除了我们以前提到的那三个人外¹³⁴，所有俄国人都站着。我们的钦差大臣们要仿效这种威严的气派，因此也要全体官员一直站着，这些官员为数超过一百，其中有些是官职很高的；只有四个最重要的官员有一条板凳坐。为了使他们的钦差大臣们显得尊贵，他们都同意这样做。我的同伴和我坐在两个代表团之间。¹³⁵ 俄国使臣的服装有一批缎面的精美的毛皮衣服，他每天更换一件同样引人注目的衣服。他还更换便帽(他们不用帽子)，其中有一顶连同上面的宝石，我想价值在一千克鲁萨多*之上。在他的右边，紧靠着他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根价值贵重的司令杖，这根杖棍至少是用镀金的银子做成的，上面装饰着许多宝石。他坐着，从物质上来说是用他的躯干塞满了那个坐椅，在气派上则用他讲话的那种老练直率的神气充满了他的座位。他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对谈判是精明老练的。虽然他懂拉丁文，但他总是用那位曾经作过他的拉丁文教师的翻译¹³⁶。他完全能控制自己，毫不卖弄自己的才华。总而言之他是胜任这个职务的。在我们这一群人中，有一些聪明、稳重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缺少对中国之外的世界的经验。不过，这位俄国使臣如果去中国，就决不会有这样有利的地位，因为在中国他们将会迫使他如同他们迫使以前到中国来的那些人一样，要么服从中国的习俗，否则就缔结不了和约而回国。由于他不愿去中国的朝廷，他就迫使他们离开本国，在假定的边界上谈判和平，从而使他获得了表面上的平等。¹³⁷

* 克鲁萨多(cruzado)是葡萄牙的一种金币名称。——译者

28. 当他们照上面所述的情况都坐下来之后，于是就中国人在过去几年的信内所提出的那些事项开始了谈判。¹³⁸ 长时间不息的无益的争辩开始了。¹³⁹ 我考虑到皇帝曾对这类情况授予我的责任，根据过去的经验，我认为应该插一插嘴。¹⁴⁰ 我对钦差大臣们说：“各位大人，我认为，翻旧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和我们都不愿意承认这些伤害对方的事情；没有一方愿意承担责任。当他们杀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手也不是束缚着的；我们的人无疑也进行了自卫，并非没有造成流血，我们的人也尽力杀戮。如果他们抢掠了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人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不加报复，而且我们的人对他们的盗窃行为是不会宽恕的。其他事情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也能诉说我们方面的这一类事情，甚至还能说得更多。他们可以提出一些事实来，而对这些事情我们要摆脱干系则是很困难的，并且要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假如是这样的话，在我看来不如来讨论新的题目，认真地来谈判划分土地和订立我们所要求的和平条约，因为我们和他们在花了很多时间争辩之后，谁也不愿认输的。”¹⁴¹ 大家看来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俄国使臣决定不咎既往，开始讨论划分土地和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29. 俄国使臣从他的高高的坐椅上不时地伸手取那些银器中的一件，堂而皇之地从其中饮水。而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安坐在光板凳上，按照他们的习惯频频地从那些只涂有薄薄一层漆的木杯子里饮茶。这些木杯子好象是瞅着那些美丽的银器而惊慌不安，因为当这些饮食有度的鞑靼人一刻钟不喝他们的奶都不行这一情况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它们担心它们的主人的处境将更加岌岌可危了。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来到这里并非为了争辩，而是为了来支配一切的，因此，他们对俄国使臣的好福气很为恼火。最初，我们

的钦差大臣们提出以尼布楚城为界线，城归俄国人。¹⁴²俄国使臣很豪爽地说：“我很感谢你们，我十分感谢你们让我今晚在这里过夜。”¹⁴³这句话的讽刺性使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很不高兴，他们感到难为情，不过他们当时至少部分地做到了装作若无其事。¹⁴⁴俄国使臣通过翻译人员说了这些或那些令人反感的话。他还要求钦差大臣们，在讨论地名或可能发生模棱两可意义的事物时，使用那些地区的当地人作翻译，因为这些人更熟练。他说没有必要用我作翻译，尽管我在讨论这一切时都在场。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对于他的讽刺向我表示不满，说俄国使臣是在取笑他们。对此，我作了我认为明智的而且是符合我对情况的了解的回答。这一天许多时间都白费了，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让步。每一方都提出了一些难题，而对方的回答则是托辞推诿，没有为促进了解开辟一条道路。俄国人要求退还他们一些炮和其他东西，这在鞑靼人看来是很不得体的。俄国使臣看到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就结束了当天的会议，并慎重地邀请我们的钦差大臣第二天来开会。

30. 23日，他们带了原班人马和以同样的排场聚会。但是，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双方都不愿从他们认为自己享有权利的领土上放弃任何东西。¹⁴⁵因此，对这类事情毫无经验的鞑靼人，就决定不订什么条约，要班师回朝了。¹⁴⁶我对此事并无所知。我想，他们天生的自高自大，又看到那些银器、黄椅子和其他他们所未曾料想到的东西的惊讶，使他们感到和这位他们原认为是野蛮人的俄国使臣在这样豪华的排场下会见是痛苦的事。这就使他们声称，俄国人并不要和平，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使事情拖延以获取他所要求的东西的阴谋。尽管当晚和第二天一直在下雨，俄国人的拉丁文翻译却来了。¹⁴⁷他什么事也没有办成，就被颇为草率地打发走了，这件事使我十分惊讶。但是，我却无法阻止这件事发生。第

二天夜里,我们的钦差大臣对和平已绝望了,通知在雅克萨的军队把俄国人当作敌人对待,因为没有和平的希望。¹⁴⁸这一切我都不知情,因为既然这些事情和我的教会无关,我就置身事外,不加干预;除非是迫不得已我才参与。谈判中断,几乎宣战,这已是第二次了。¹⁴⁹钦差大臣们因为没有将上述命令事先告诉我,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怕皇帝会不高兴的。¹⁵⁰因此,我虽然知道这些事情¹⁵¹,却装作惊讶,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以便乞求他们慈悲为怀勿使生灵涂炭,因为一方面看来皇帝的意图无疑不是这样,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俄国使臣显然希望订立和约,并不是在策划什么阴谋,而只是想以拖宕的政策(在这类情况下一种普通的方法)以取得他所要求的。鞑靼人和汉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办理过交涉。

31. 但是,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坚持说:“俄国人并不象你那样是真诚可靠的;别上他们的当。他们今天这样说,明天就失信。我们对他们已有许多经验,而你还没有。我们知道他们是骗子。”我听到此话,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虽然,就下层的人们来说,他们的这种观念似乎是有一些根据的)¹⁵²,而且这将会使预期的成功完全破灭,因此我决定起来为俄国人及共同的利益辩护。我希望俄国人为此将会对耶稣会表示他们的感谢,而大公爵也将不会不对我们表示应有的感谢。所以,我就说了下面的话:“大人们,小题目大作是不对的。你们不该把小事和大事混淆在一起,更不该把平民和大人物混为一谈。大人们对俄国人的观念所根据的是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经验¹⁵³,而这些人的目的时常是为了欺骗。在此以前,你们并没有机会和莫斯科人谈判和认识他们。你们所说的关于俄国人的话,也可用之于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之中也有无数的骗子。但是,从这一事实却不能得出结论说,对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该信任;相反,应该考量个别的人们。你们又说,俄国人饮酒很多;

难道不是有许多中国人也饮酒，而且在这方面决不亚于俄国人吗？在北京，天天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在街上行走或骑马——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话可说。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却不能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之中没有清醒的人，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根本不喝酒。对其他的事情，也可以这么说，所以，即令在下等人中有心术不良的，在老百姓之中有背信弃义的，我们却不应对这些人也都不信任。你们应该听取俄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不要盲目相信别人对他们的看法。”皇帝的舅舅¹⁵⁴是一位诚实的人，他对使团的其他参议人员提出如下的劝告，而且产生了一些效果：“诸位大人，你们知道，这些神甫是道德纯洁的人，他们什么人都不怕。你们知道，徐日升不奉承任何人，他对皇帝说话就如同对我们说话一样坚决。而且，你们知道，皇帝曾在一道重要而真诚的谕旨中公开表扬过他。¹⁵⁵皇帝一定会详细地垂询他一切事情；你们了解，他会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而不顾虑别人会怎么想的。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他的意见，因为在其他事情上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后来，他曾好几次向我重复说了同样的话。他的这些话说服了其他的人不应鲁莽行事。

32. 我这样肯定缔结和约仍有很大希望，就说服了他们不要灰心，而召回送信人。当晚，他们派人去叫送信人回来，但是空劳往返，因为已经不可能追赶上他了。这件事没有办到，造成了不小的损害。然而，这种看来已经绝望的情势由于上帝的帮助而得到挽救，已经是第二次了。¹⁵⁶人人都很称赞，他们不了解我怎么会谈判成功这样有把握。当我们深夜里从这次会议回到我们的帐篷里去的时候，皇帝的舅舅¹⁵⁷邀请我到他的帐篷里，他满怀忧郁地将一切经过情形，连同他的反对原因，对我说了。（神明使他认识到照他们的办法去做所犯的错误。）他建议，我们去见俄国使臣，查

明他的意图。看来,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我遵照我的教会指示尽可能地不参与这类事情,曾使自己置身局外,他们认为他们所讨论的事情可以无需我参加即作出安排。结果是,由于他们所雇用的翻译的无知,造成了我们的一切麻烦。¹⁵⁸ 25日是圣母升天节(因为俄国人使用旧历,比我们的日历晚十天),我和我的同伴去劝说俄国使臣。¹⁵⁹ 他十分和蔼有礼地接待我们,甚至当我们还在准备下马时,就走出来迎接我们。他倾听我们的意见,然后说,在研究了我们的建议¹⁶⁰后,他将派人送来他的回答。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其兴奋之情令人难以置信。他们都倾听着我们讲,说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要让我们参与谈判之事,这个谈判得到天主赐福这是很明显的。26日,俄国使臣派了他的拉丁文翻译来,传达他的一些疑问。这位翻译带来了一张这一带地方的地图¹⁶¹,问我们的钦差大臣的意图。过了一会儿,我们带着我们的答复过去¹⁶²,然后他又来了。这些来来往往迫使我们冒着很大的危险渡过那条大河,使我们疲惫不堪。我们带着我们的保留条件回去;俄国使臣也提出他的保留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喀尔喀人的问题不列入和约¹⁶³,如我前面所说,喀尔喀人是俄国人的死对头¹⁶⁴。

33. 27日,我们带着我们关于划分领土的最后方案去俄国人处。¹⁶⁵ 在我方才提到的保留条件面前,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对谈判的热情已经在消退中。¹⁶⁶ 这一次,俄国人说了一些他们不该说的话。他们这时不愿同意放弃雅克萨。我有充分理由对此表示不满。我说,从一开始我就已表明,雅克萨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必须收回¹⁶⁷,如果他们不想同意,谈别的问题都是没有用的。我说,如果对这个基本的一项不能接受的话,他们原来就不该进行其他的讨论和会商,他们已经引我们走入歧途。我们之所以诚恳地进行讨

论其他问题，是依据这个假定，即他们愿意没有任何争论地放弃雅克萨。不但如此，我还对他们说，中国皇帝对于他们必须放弃雅克萨是没有怀疑的，因为他已几次以武力占领该地。¹⁶⁸但是，因为他不愿通过武力而愿通过说理达成和平解决，每一次他都诚意地退出该地，相信暂时借给他们的地方终将归还给他。对于皇帝已经两次占领并且诚意地放弃的东西，要以交换条件去取得，或使之成为争论的问题，这是荒唐可笑的事。他之所以从未提到此事，是因为他不想去争论一件已经属于他的东西。尽管有这些理由和明显的事实，俄国使臣仍保持冷淡态度，并且说：“我们什么都不能让，因为你们要求太过分了。”那位总督也不错过这个机会来表示不满，他对我说：“你们是按照你们的利益办事。”但是，后来他了解到这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因为他认识到而且承认了这一点。这一回，我和我的同伴表现得略微强硬一些，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对他们的答复自然是感到恼火的。他们对这种答复确实也有悔意，这一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我含泪离别了俄国人，并告诉他们派别人去送致他们的答复，因为我本人无颜去宣布这个答复，我知道这将使那么许多好事情完全毁灭，而且他们以后会对这个草率的答复悔之莫及的。

34. 后来我们从一个诚实可靠的方面得悉，作出这个简短决断的答复的原因是，这一带地方的总督¹⁶⁹是一个莫斯科人，是一个极自私的冒险家，他和其他的人一起，看到他们的地区将被取消，他自认为属于他管辖的地域将要削减，因此劝说那位使臣不要作任何让步，用他们的话来说，要稍稍地探索一番，看看他能不能抓到什么东西。这位总督在我的面前，对我和我的同伴表现了怀疑的态度。我们对这种态度毫不自满地表示不满，当面告诉他说我们对他和他的大公帮过很多忙。俄国使臣对此并无怀疑，由于

证据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以致于后来这位总督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我们也公开表示了满意。当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听到了这个不让步的决定（他们不了解这是装腔作势），他们作了带领全军渡河的准备，因为在我们这一边，已没有可供饲养牲畜之用的草地。¹⁷⁰ 在我们的营地，骑兵队不断地在运动，准备在那天晚上渡河。俄国人不知道我们的目的何在，以为这一切骚动是由于我们在准备回北京去；但事实上我们的钦差大臣是要在这里等待皇帝决定是否发动战争。¹⁷¹ 俄国的哨兵看到了我们营地上的骚动，他们断定我们要走了。皇帝的舅舅¹⁷² 在去睡觉之前情绪很忧郁，他极为忧虑地同我谈话。我安慰他说，我仍怀有俄国人会派人来找我们的希望，因为他们不想空手回去，我告诉他，我这样说是充分有理由的。我又说，这是一桩大事，不会以一个草率的决定来结束的，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完成的。贵大臣应该有耐心，因为带着签订了的和约回去，比避免受到一点即将到来的寒冷气候的苦更为重要。¹⁷³ 而且，一个人应该着眼于主要的事情，我的衣服带得更少，受苦的可能更大，但我一点都不想仅仅为了躲避寒冷，就不订和约而回家。他说：“纵令我们须足足等待一个月，也不能不订和约就回去。”我回答说，我希望俄国人当晚就会派人来。

35. 这就是那天夜里我们很晚去睡觉时的思想状况。我刚要入睡，皇帝的舅舅¹⁷⁴ 就高声叫我说：“俄国人来了！”他是接到这个消息的人。我们十分兴奋地从床上起来，当我们到达会商的地点时，他们的拉丁文翻译¹⁷⁵ 说，他的使臣按照国际法——这是他的说法，要求举行第三次会议。按照国际法，第一次会议是为了行见面礼，第二次是提出建议，第三次是作结论。¹⁷⁶ 我们的钦差大臣们说，他们愿意等到早上，听候有一个更可令人接受的决定。我和我的同伴尽力劝告俄国人要带着较好的条件回来，暗示有几项可以

很方便做到的事情,并提示一些应予考虑的很重要的事项,以便他们能提出我们钦差大臣们所需要的而且又是他们可以同意的决定来。我对这位传信人说,当晚务必作出答复,因为第二天早上就会是已经太晚了。他对形势很了解,并认识到当时的情况。他临走时说:“尊敬的神甫们,请协助我们。”我高兴得不得了,第一,因为看到我的希望是多么有根据,第二,因为他象一个天主教徒那样讲话;在此以前,他从未表明他是天主教徒,而如果他是分裂派,他就不会这样地称呼我们。¹⁷⁷我回答他说:“我们一定将尽力为共同的利益效劳,但是你们也应该慎重行事;要留心你们自己,好好考虑你们所做的事。”他走后,我们进行了会商,以决定鉴于这种情况,如果按照那天晚上原来的决定渡河是否明智。钦差大臣们认为这是必要的,一则因为没有放牧的草地,二则由于那个他们认为很重要的荒唐计划,就是要去接应一些反抗俄国人并向我们投诚的喀尔喀人,这些人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渡河到我们这一边的河岸来。¹⁷⁸

36. 他们已经作出了决定;但是,因为他们以前在会商中曾经有过错误,有鉴于我有经验,他们问我是否认为渡河是有道理的。我说,我是一个教士,我的教会和我的职业不许我考虑这种事情,皇帝派我来也并非为了这个目的,因为他很了解我是一个教士,这行职业对这种事情是外行的。皇帝派我来只是为了议和,这与渡河是完全不相干的。(渡河是很危险的事,原因很多,关于这些原因,这些大人们不是不知道的。)¹⁷⁹我说,我既不能表示赞成,也不能表示反对;我又说,大人们有皇帝的训令,应按照训令办事。他们似乎觉得这样的答复太生硬了,他们竭力坚持要我向他们提供意见,并且承认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明智的。我本能很容易地阻止渡河,但是,两种意见都一样有危险,而且不符合我的教会要

求，所以我再三重复了同样的回答。¹⁸⁰ 这场辩论花了三刻钟或者还不止的时间。最后，我看出他们这些人是非得到满足不行的。我体会到，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怕他们会白费力气，而且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皇帝会向我垂询一切——我们以后将看到，皇帝确实是这样做的，这对我是很大的光荣。既然他们确实知道我一定会对他说实话，他们就要争取我和他们站在一边，以免出问题。当我无法逃避或则得罪他们——而这是我必须千方百计避免的事——或则同意他们带领全部军队去渡河的时候，永远在身旁帮助我们的上帝来救了我。我向他们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不是来密查或报告他们的行动的。¹⁸¹ 他们对这个回答满意了，于是就放了我。

37. 他们在紧靠着岸顺河流而下约三“里格”路的地方，发现有三座崎岖的山，其中之一看来是一个可让我们一些士兵上岸的适宜地点。钦差大臣们和他们的其余的随从人员留下来到早晨，以等待俄国人的答复。但是，因为这个答复没有来，而我们的武装士兵已在这些控制着尼布楚城的山头上出现了，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就决定跟着士兵们上山去。他们说，渡河之事无法保密，而俄国人的答复到这时也不能阻止此事。¹⁸² 所以，我们就走同一条路线，沿河而下。在这次渡河中，有一些人畜死亡，这是在这类行动中常有的损失。俄国答复迟迟不到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之中有意见分歧，而且因为，如我在前面所说，他们说服了他们的使臣，什么都不要答应我们，看我们怎么办——与一个自己所不了解的国家办交涉时，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俄国使臣认识到，如果他在这种场合行使全权代表的权力，不听那个总督¹⁸³和许多有偏见的人们的意见，他的慎重态度本可使这种局面不致发生；他认识到他被他的自己人引入了歧途。现在，他决定要做他以前就应该做的事，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把全部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责备那位总督¹⁸⁴，以前

的决定都是他搞出来的,并向他指出他所犯的错误。

38. 他派了他的翻译带了新的建议来。这位翻译发现我们已经走了,于是转过来到大约半“里格”之遙的尼布楚前的那座山的东边来会见我们。我看到了他,十分高兴,因为我知道我的期望是不错的,也因为我所预料到的成功。我极其兴奋地开始在那崎岖的山中羊肠小道上向他奔去。我的兴奋心情好象给了我素来没有过的奔跑的速度所需要的勇气和气力。我一下子就什么都问了他。我搀着他的手,带他到我们的钦差大臣那里去。钦差大臣们对于他的来到尤其高兴,因为这是没有料到的事。他奉命提出各种事情来问我们。我立刻了解到问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的顾虑。他装出一副无表情的面孔,问他们渡河的目的何在。我立即劝告我们的钦差大臣们说,如果他们不想使整个事情再陷于危殆,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回答。他们回答说,他们渡河的唯一原因是,河对岸已无草地,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给马和其他牲畜吃的饲料。他接着又问:“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么你们为什么全披上盔甲呢?”他们说,这是他们的习惯,是为了表示个人的威严,并无敌意。这位俄国人问道:“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你们为什么派骑兵队占领了山上的高地呢?”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回答说,因为他们不了解地形,因为他们在喀尔喀人猖獗的崎岖山区里不能感到安全,所以他们派兵士先去找一块他们可以居留的营地。这位俄国人对这个答复认为满意,于是要求派我和我的同伴同他一起回去,以澄清某些条件。¹⁸⁵ 我们的钦差大臣们自己是多疑的,在这些自己有过毛病的问题上,也不敢相信俄国人。他们由于自己的无知而猜疑俄国人,同时对他们自己那样渡河也感到亏心,于是设想俄国人也会象他们自己那样行事。由于他们的愚蠢的猜疑,一切事情似乎已陷于绝望,这是第三次了。¹⁸⁶

39. 我花了一个钟头的大部分时间,力图使钦差大臣们相信,答应俄国人所要求的事情是不会有什麼危险的。我说,俄国人根据他们已有的经验,有更多的理由不相信他们。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搞下去,争论应该不应该彼此信任,我们永远办不了任何更重要的事情。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在第二次回答中,吐露了他们的顾虑,这种顾虑使我大笑不已。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不敢派你们到俄国人那里去,因为我们怕他们会把你们作为人质扣留起来,不让你们回来,这样将迫使我们或则接受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条件,或则必须为你们向皇上作出交代而感到为难。”¹⁸⁷我心中感到既可笑又可恼,我回答说,没有这样的危险,因为,如果俄国人这样做的话,全世界将有充分的理由不承认他们是讲人道的、文明的民族,并把那些用欺诈手段把希望为他们和共同的利益效劳、诚心友好地来投到他们门下的人监禁起来的人认为是不配给予人道待遇的野蛮人。我提出了这些和许多其他理由,这里我不想重述那些理由了,因为人人都能猜得出那些理由是什麼。但是,我仍不能克服他们的顾虑和猜疑。甚至那位俄国人听到了我们所说的一切,虽然他不懂,也说:“看来他们对派你们两位大师去也有犹豫。”我说,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对世界事务十分外行,对他们不要过于介意。我继续发表我的议论,却毫无得到成功的希望。当我看到可能的谈判又被置于危险之中,我急躁起来了,达到了人人都看得出来的程度。当他们都听得厌烦了,我也叫嚷得累了,我想出一个折衷办法,于是说:“大人们也许可以同意至少让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去。”皇帝的舅舅对这个建议同意了,他说:“好吧!但是你们二人中哪个去呢?”我说,我们两人谁去都行,请他们决定。他说:“你的同伴那位神甫年纪较轻,叫他去吧,因为你跟了皇上多年,你是一位知名的人物。皇上在公开的谕旨中把你这个人推荐给我,所以我

你是负有责任的。¹⁸⁸但是，对你的同伴，你负有责任，你既不怕俄国人会扣押你们为质，那么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应为他向皇上交代，正如我要为你向皇上交代一样。”

40. 所有心怀猜疑的人都赞同这个可笑的决定，他们会对此表示满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管怎么样，在场的人们都钦佩我在成功地反对他们这一事上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因为他们第三次看到他们原来认为已经遭到毁灭的整个事情¹⁸⁹得到挽回。他们向我表示庆贺的那种情形使我受之有愧。当我的同伴带着办理这件事的必要指示走了之后，大家都等待着，看他会不会回来。我于是说：“诸位，不给予人家那种一切国家都应享有的信任，是不适当的。如果和约如我所希望的订立了，我们一定要依赖他们的信用来订立和约。这一天无疑终会到来的，那时我们将不得不信任他们；如其不然，当所有的条件都议定了，在作誓言的时候，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当他们在文件上署名的时候，我们对此将予以什么样的信任呢？当他们在条约上盖印时，条约是否要有他们的印章才有效呢？我们不给予他们甚至一个野蛮人都应享有的信任，而这一类人并不包括俄国人在内¹⁹⁰；即使这样也许不会使一切都陷入危局，但是，只有信任他们，我们才能相信他们的同意是可靠的。说真的，如果说魔鬼自己装扮成人的样子要想用谎言来欺骗我们的话，他也不能以象我们怀疑俄国人那样的诡诈来欺骗我们。”他们对这些话无言以对。当我们在等待着我的同伴带着消息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位钦差大臣、皇太子的舅舅索额图¹⁹¹叫我过去，提出要对订和约的事与我打一个赌。他是一位直到最后坚持不信任俄国人的人。如果和约订立了，他愿给我一匹好马；如果和约订不成，我给他一座钟。我说，我没有钟；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说等我有钟时，再交付也可以。我提出马必须是好马，才

配得上这样的赌和这样的人，要使听见打这个赌的人（有一百多人）不会说这位大人欺骗了我。他答应了，大家都拍手。然后他又说，他很乐意输；我说我很高兴能赢，因为所输掉的东西只不过是那匹马。

41. 当我的同伴带着回信，那就是各项条件的提纲回来的时候，我热情地拥抱了他。钦差大臣们既沉默不言，于是我们就听他说。这一次，我对我上回的发怒向他们作了实在无必要的解释：“诸位，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外国人。如果我说我是尊贵的，我的自状是无效的，因为同意与否还在听者。如果我说我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人，我知道一向很尊重我的大人们不会相信这话。因此，我没有理由那样叫嚷，向给了我这一切荣誉的你们发火。踢刺棒¹⁹²是愚蠢的事。我所要说的是，如果我不顾我们的不同地位，竟如此地叫嚷，我一定是有着充分理由的。我和你们结识这许多年来，我以前从来不敢对你们这样讲话，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当时的这些情况使我必须对你们那样讲话。大人们已经看到，将来还会看到，如果我在一些场合不讲话，我们的谈判就会归于毁灭。”他们同意这些话，并且说他们比我更应该表示歉意。他们确实表现了改进，他们更多地信任别人了，并且对任何事情未经先同我和我的同伴商量就不进行谈判。

42. 当我们大家快活地回到距离尼布楚约三“里格”路的我们的营地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大批的喀尔喀人，至少有六、七千人。他们已起义反抗俄国人，现在来向我们投诚。¹⁹³ 我们的那些没有经验而且怀有野心的人之中，有些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弄得昏头昏脑，要收留和帮助这些人。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恭敬而谨慎地回答说，皇上没有派我来找喀尔喀人，而是派我来订立一个和

约,如果我带了和约回去,他将感到满意,但是,如果我带了喀尔喀人而不是带了和约回去,他是一点也不会高兴的。而且,帮助喀尔喀人反抗俄国人,就一定会破坏和平。¹⁹⁴他们听了这话就对喀尔喀人作了一些好听的诺言,把他们打发走了,这些情况后来对于促成和约大有帮助。这些喀尔喀人是由一个喇嘛带领的。喇嘛是喀尔喀人非常尊敬的和尚,我已经提到过他们。这些喇嘛虽然在服装上和习惯上是极为醜陋的,但他们却自认为是在这些牧民中最清洁的。为了清洁之故,他们带着一个木杯子装在一个袋子里,他们从来就只用这个杯子来饮奶。他们喜欢生肉,但一般不惯于用木杯子吃东西,而只是用它来喝。他们象狗一样把舌头伸入杯内舐饮,当他们饮完了,就把杯子放回装杯子的袋子里。这些饮料的气味很难闻,甚至会使我们的乡下人闻了头痛;因此人们就可以设想这些认为喇嘛清洁的人的清洁状况了。但是,我不想对他们的情况多说什么,因为在许多书中,如阿里刚布神甫所写的我们教会的安得拉德神甫传中,对他们的生活习俗已有叙述。安得拉德神甫在一次西藏旅行中曾遇到他们。¹⁹⁵他们身体的清洁状况,我都不好意思来描述,不过他们倒是不害臊的。¹⁹⁶

43. 29日,那位拉丁文翻译带来了许多双方今后应遵守的关于各级官员礼节的建议¹⁹⁷。对此,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回答说,关于将这些事项列入和约内之事,他们没有接奉训令。但是,我相信,要不是因为受到喀尔喀人反叛的压力¹⁹⁸,他们是会力求促成这个决定的。即令如此,他们仍盼在把喀尔喀人的事情解决后,他们能和我们获致一个关于礼节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对于他们是有好处的。他们不怀疑我们终会让步。但是,在这期间,俄国人说,只要我们不平等对待他们的大公,他们也将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所以如果中国人不愿看到他们的皇帝受人轻侮,他们最好小心行事。

30日，双方将和平条件写成了书面的材料。鞑靼人不理他们前一天所说的话。31日，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条件；9月1日，俄国人表述了他们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诺兹山脉¹⁹⁹。这个山脉是在北纬75度，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北极。9月2日，俄国人说，他们不能让出诺兹山脉的土地。²⁰⁰给我们钦差大臣的书面抗议是诚恳的、慎重的，不卑不亢。在这个强硬坦白的照会中，对他们的反对提出有力的理由；照会充满了尊严和基督教义——可惜不是天主教义——而且没有虚伪的谦逊，也没有空想的威严。我想最好在这里照录该信的原文，让读者从原文中去了解我所说的话。俄国使臣发出这个照会，因为他以为鞑靼人坚决要诺兹山脉，而且因为他放弃了能订成和约的希望。因此，在一天一夜之内，他把他的城的防御工事加强得相当充实，考虑了他的军事人员和他们的作战方法。在差不多作好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发出了如下的抗议照会。

44. “在过去几天内，在我们之间，即沙皇陛下的全权使臣和你们全权钦差大臣之间关于双方边界的交涉中，你们的使臣对我们说明，你们要把格尔必齐和额尔古纳两条河，并从格尔必齐河沿着流入黑龙江的几条河流的发源处的山脉一直到海，作为两国的边界线。你们还希望，在雅克萨和格尔必齐河之间的地区，不得有来自任何一方的居民。所以，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使臣，同意这个提案，虽则我们认为这个提案对沙皇陛下的利益是有损害的，而且是逾越了我们所奉到的训令的。我们之所以同意，因为我们以为你们是希望我们两帝国间的和平和永久友好的。但是，现在拟定条约时和在你们所草拟的交给我们的条约的各项条件中，你们表示，边界是从格尔必齐河通过称为诺兹的山。这座山两边都控制着许多地区、河流和沙皇陛下的许多臣民。这座山把平原分在两边，而把沙皇陛下的帝国联成一体。所以，我们对你们，全

权使臣们，说老实话，这就是：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这些边界，我们沒有得到我们的大君主沙皇陛下的任何指示，我们对此不敢同意。即令我们被强迫同意了（你们决不会这样做的），这样缔结的和约，既是强加于我们的，就决不可能稳定持久。在你们的皇帝博第汗²⁰¹殿下（博第汗是一个西鞑鞑词，意思是神圣的。我很惊异，俄国人不懂这词的意思，竟用它作为中国皇帝的称号。我当然沒有向他们建议过——这是在我职权范围之外的事——因为这种行为可能产生严重的危险。因此，我就让“博第汗”这个词保留原样，不把它译成东鞑鞑文或汉字。我认为，俄国使臣所要表示的意思不可能是“神圣的”，因为否则他可以用拉丁字“sanctus”而不用一个外国字，我不能把它变成不是它的意思的一个拉丁字；而且，俄国人如果需要解释的话，他们自己能说明。但是，那时候，鞑鞑人不敢问，而只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了解）²⁰²写给沙皇陛下的信中说，为了缔结和约和规定边界线，我们应调查居住在黑龙江附近的两国臣民的那些越界事情。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应调查雅克萨四周的扰乱；双方应派出和平代表团不经过流血来决定所有这些问题。因为有这些许诺和平解决的信，所以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使臣毫无敌意地来到这里，我们满怀获致和平解决的愿望，这是你们可以为我们作证的。但是，现在你们似乎怀疑我们的和平意图，并且提出一些你们从来沒有在你们的信中或通过你们的使臣通知过我们的事情：那就是说诺兹山应成为我们的边界，而且你们说，如果我们对此不同意，你们将采取发动战争的强制行动。所以，我们，沙皇陛下的全权使臣们，再次极真诚地声明，我们对这个问题沒有奉到训令，不能同意这些界线。如果我们的这一声明不能使你们满意，我们把和平问题留待将来沙皇陛下和博第汗殿下都愿意的时候，通过具备全权的使臣不受干扰的谈判来解决。但是，对于为共同利益而致力的我们来说，使和平破裂和为了一些小矛盾（如果在这

短短时间内竟会发生一些这种小矛盾的话),而减少我们在划定边界任务上的努力,那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你们贵钦差大臣们把和平放在第二位(我并不认为你们如此),你们就可能根据这样的假定:以为你们负有消除争端的原因和建立边界线的使命就足以成为理由,而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在此次谈判中,我们也很努力,而且我们的努力也做到了家。我并不在乎在大事上或小事上,我是否占上风;我所关心的只是,我们不要对发动一场战争负有责任。我们不希望流血,我们不故意向你们挑衅。然而,如果你们起来反对我们,我们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相信我们的目的是正义的,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实行自卫。我们将吁请上帝,他是我们的希望的寄托者,作为我们对付那些作恶的人们的见证者和辩护人。他将打击和消灭那些害人的阴谋,并将惩罚任何要伤害那些想做好事的人们的人。我们希望从书面上知道你们的意图。我们请诸王之尊的上帝帮助你们。我们把你们当作我们的真诚的朋友,向你们致意。”

45. 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听我逐字宣读这份抗议书。我加上了我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个不妥协的文件是俄国使臣要想在俄国大公面前证明无论发生什么事他是无辜的一种方法。如果是由于我们的过错而并非象钦差大臣们所想像的是由于俄国人没有诚意,和约没有订成,我说,我们的中国皇帝如果听到这份抗议书的原文,一定很生气。因此,再次尽一切努力试图诚恳地进行谈判,是明智的。当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听到此话,他们颇有些担心;于是,他们要求我们到俄国人那里去劝告他们。俄国使臣一再发誓说,他已让步到了尽头,甚至让过了头。我坚持请他不要因为这样微不足道的理由,使这么重大的事情陷于危境;如果他能再作一些让步的话,说一句话就行了。他回答说:“我同你一样是一个基督

教徒，你已听到我多次发誓表明我的立场，你应该相信，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我是不会发假誓的。我觉得再同你们来谈这件事是可耻的。”我们听到此言，相信这是最后的决定，于是我们就回到营地去。我们回去时越过光秃秃的几座山。每次来往，不论是在下雨天或夜里，我们都必须骑着劣马在崎岖的路上走六“里格”的路。我们到达后，我向钦差大臣们报告，这是俄国使臣的最后决定。而且，我问他们对那些他们所要取得的地区是否有所了解。当我看到他们对这些地区并无所知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这些地区约有八百“里格”（我们是按经纬度计算出来的）。²⁰³他们听到这话，面面相觑，十分不安，因为由于他们的过错谈判已第四次陷于危局。²⁰⁴他们请求我们照以前的决定解决这件事，他们由于对世界事务的知识太少，以致陷入非常混乱的境地。

46. 9月3日，我们携带了最后的建议去俄国人处。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不敢再做任何不符合他们过去同俄国人取得的协议之事——这是我们过去屡次劝他们采取的政策，我们曾对背离这一政策的事加以纠正。他们表现了不愿使俄国人取得没有严重的危险而能破坏协议的借口。俄国人对于某些条款仍觉得有困难，但是最后对这些条款终于同意了。²⁰⁵我们在经过满布着我们的兵士的那些小山时，他们欢欣地向我们鼓掌，仿佛我们是和平天使一样。他们既不怕把这个成就完全归功于我们，而且也不对此感到惭愧。4日，我们带了经过少许修改后的条款再去俄国使臣处。我们回来后，他派了他的一些人来，提出了他的一些条件。²⁰⁶同日，俄国使臣送来一些皮子给我们作为礼物，附有一封信，对我们在这件事上为共同利益所作的特别努力表示赞扬和感谢。这时，双方对彼此的看法与以前不同了。他们把我和我的同伴看做和平天使（虽然说起来我感到惭愧，我要说这件事是为了赞美上帝）。双方

对我们的庆贺是我们受之有愧的。5日，我们又带了再经修改的条款回到俄国人处。²⁰⁷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彻夜不眠地不停地工作，和双方进行商谈。我和我的同伴接连四夜没有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休息，因为我们在夜里翻译白天所议定的事。6日，那位总是在场的拉丁文翻译²⁰⁸，带了又经过修改的条件来了。²⁰⁹这些条件我不想详细列举了，因为它们只是一些附带的条件。我们将最后的解决方案带给俄国人；这个方案就成为人们如此盼望的、又屡经陷于绝望的条约的基础，用来在9月7日由双方同样高兴地宣誓订立。

47. 最后，7日的早晨到来了，或者不如说6日就没有过夜晚，因为那一整夜营地上灯火辉煌地在狂欢中度过。在此之前，我和我的同伴又去解决了一些细节问题。我们带着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将要宣读的誓词。²¹⁰虽经我们保证，俄国使臣不愿接受这个誓词，因为他怕其中有些异教的话。他要求双方都按照一个规定严格义务的誓词来进行宣誓。最后，我们的钦差大臣们采用了俄国人的誓词。当我们到达尼布楚城的时候，俄国人对于条约应如何签署还未作出决定。由于这些他们不能解决的疑难，这一整天白白地过去了。鞑靼人要求两个条约文本都经双方签署，那就是说，由俄国使臣亲手写成的交给我们的条约文本和我们写好给他的条约文本，都将由双方签署。俄国人认为这种双重的签署是多余的，理由何在，我不知道。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劝告他们无效。我对于他们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感到有些恼火和惊讶，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前一天就已经决定了的。²¹¹而且，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已经到来，在小山上等候，这是俄国人可以亲眼看见的事。钦差大臣们正在那里仰望着即将下雨的天空。就在这个时候，雨对他们毫无顾忌地已在开始下了。俄国使臣知道了这种情况后，急忙地以他一向善于

表现的礼貌，送来给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一顶漂亮的帐篷，以便在恶劣的天气中保护他们。他想以这个行动作为一种止痛的药膏，去敷抹在钦差大臣们由于害怕上当而产生的不耐烦可能会使之重新裂开的伤口上。

48. 我的同伴和我提醒他，他是大使，甚至在那些有特殊利益的人²¹²反对和平的时候，他也曾要求和平。现在他必须解决的困难，正是他自己引出来的（在这类情况中，每每是如此）；而现在时间已经过了晌午。因为我从早上起一直在和他辩论，而未能说服他采取最后步骤，所以我也适度地向他表示生气，并且说同我们的钦差大臣开这个玩笑，只能证实他们对俄国人的猜疑。我站起来说，再等下去也没有用，因为既然他们一整天没有能作出结论，那末，再过十五分钟，也没有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的希望。大使和他的人在不远的地方进行了会商。在这类场合中，这种会商毋宁是一种妨碍，因为负责的人应该解决问题，而不让时间浪费掉。当他听到我所作出的决定（我若没有他会留我的把握，就不会作出这个决定），他立即派拉丁文翻译²¹³来留我。我也要以我的行动使满腹猜疑的钦差大臣们得到一些满足，因为纵令他们不会不信任我，他们至少会认为我要对这种耽搁承担责任。同我一起的一些比较缺乏经验的满人，表示了他们的顾虑，生怕我的沮丧的态度会破坏了谈判。他们要求我不要走，不要生气；他们忘记了，他们曾多少次使谈判陷于危局，而正是我不得不去解决那些困难问题。鞑靼人中较锐敏的观察者，了解过去和现在的策略，赞成我的决定，认为这是对付俄国人的拖延的适当办法。当他们看到甚至不用实行我的威胁便已达到的结果，他们感到更为得意。就在我向俄国使臣表示我的恼怒之后，正巧我们的钦差大臣派来的一个信使到达了。钦差大臣们在只有一“里格”之外的小山上已经等候了很久，他们

等得不耐烦了。这位信使带来的命令要我单独先回去，以便他们了解这种耽搁的原因。

49. 既然俄国使臣已经要求我留下，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说道：“你看，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多么不耐烦地来叫我了。但是，别为我的发火介意，因为我以后会小心，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急忙骑马回到我们的钦差大臣那里，当我气喘不已地到达的时候，发现那里已经有一个俄国人也是为了同样目的而来的。²¹⁴ 我们的一位钦差大臣，让我坐在这个俄国人面前的他自己的座椅上，这个光荣我是既不敢当也没有料到的。我开始以看来适合于这个目的理由来安慰他们。我对他们说，既然他们已经忍耐这许多天了，他们对今天还应予以宽容，以使他们的忍耐达到仁至义尽的地步。因为今天一定会订立和约的。我给他们留下这个希望之后，又跑了那一“里格”的路，但在到达俄国人那里之前，不得不休息一会儿来喘口气，以便能够说几句话。当全部事情差不多都已办好了，我再一次回到我们的钦差大臣那里，使我自己充当我实际上并不是的角色——两位病人的医生，一个是急躁，另一个是慢得令人可恼，我以忍耐来医治前者，而以必要的忿怒来刺激后者。我让我的同伴去翻译条约的各章，不浪费一点时间，就跑回到我们的钦差大臣那里，叫他们开始慢慢地出发前来，这样会使他们对这次等待容易忍受些，同时也可提供足够的时间来进行翻译。译文要写三遍，因为有一个字译错了。俄国人在这件事上十分认真，在提及他们的大公的文件中，谁要是弄错了一个字母，就会被判处死刑。

50. 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对于达成了解决方案，十分欢喜，他们立即上马，带了他们的全班随从人员出发。我告诉他们慢慢地走，然后赶忙回来，既为了让俄国使臣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准备，

同时也为了完成和约条款的翻译。我对俄国使臣也谈到俄国人和中国人座席的很大差别,这原是双方自愿商定的事。我知道,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的这个抉择的结果,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所以我请求俄国使臣,为了在一切方面取得一样,在那一天就坐在一条板凳上,并筹备一个签订条约的共同场所。我说,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不会带自己的板凳来的。他听到这个奇怪的建议笑了,并且说,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就曾提出这个问题问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当时他们说,双方应各带自己的帐篷;尽管如此,他还是愿意接受我的请求。他搭了一个公用的帐篷,把座席排成一个圆圈,中间安置一张桌子,桌椅都铺上了漂亮的毯子。我提出,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礼节,如果在他们到来时,他在帐篷外迎接他们,邀请他们进入帐篷,这会使他们非常高兴。这件事他做得很漂亮,博得许多赞扬。当他们进入帐篷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钟左右了。只有钦差大臣们、我们和五位较重要的官员有位子坐,其他的人,甚至他们之中有几名重要的官员,都一直站着,象俄国人围绕着他们的使臣那样,也围绕着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形成一个随员群。

51. 当一切照这样安排好了之后,又发生了另一项困难,这在中国人看来却不是件小事。他们事实上要求把那份为他们写好的和约的拉丁文本带回去,在这个条约文本中,中国皇帝的名字居于第一位,俄国大公的名字居于第二位,他们还希望这份文本由双方签署。这样,他们就无须把一份别人的皇帝的名字居于第一位的文件带回到中国去。俄国人也将带回去一份以他们的大公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中国皇帝的名字排在第二位的文件。关于此事,开始了一场大辩论。俄国使臣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正当的办法。他说,人人都知道,如果中国人把他们的皇帝名字排在首位,他们的大公对此是不会认为奇怪的。经过长时间争执和许多辩论,有人

出了个聪明的主意。这个人说：“我们为什么要争这个呢？在中国，没有人对我们的皇上居第一位这件事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在一个带到俄国去的文件中，他也是居于第一位，这是更大的光荣。即使在他们为我们制成的文件中，他排在第二位，在中国国内，谁也不会怀疑我们的皇上更伟大。”大家对这个提议都表示赞成。在此之后，高声宣读了一份条约文本，另一份文本则同时加以核对。这样做了之后，另一份文本也经高声宣读，前一份文本则由另一些审阅员加以核对。既然两份条约文本之间没有歧异，双方的使臣都按照同样的程序在有着两国皇帝名字的每一份条约文本上签了字；那就是说，在我们的钦差大臣所备就的条约文本上，他们先签字，俄国人署名于其后；在俄国人备就的条约文本上，俄国人先签字，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署名于其后。²¹⁵

52. 条约签字之后，双方使臣按同样的先后次序盖印。同时，俄国人命令将盛满(稍粗糙的)甜品的美丽的盘子端进来。这些甜品中，有从马德拉岛来的一块白糖，这是我们的钦差大臣从未见到过的东西，使他们极为赞赏。(中国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偷一些，带给在不远处的同大伙儿在一起的和在营地的他们的朋友看。俄国人还有用葡萄和谷物制成的酒，但是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不喜欢这种酒，认为太强烈了。在文件签字后，大家都站起来，每一位使臣手里拿着自己的一份。俄国使臣宣读了誓词，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也同样做了。因为夜已降临，就点燃了蜡烛。和约各章如下。

53. 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俄罗斯国……君主钦差²¹⁶，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

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定条款如下：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鞑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²¹⁷，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

四、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两国钦使各将缮定约文签押盖章，并各存正副二本。²¹⁸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

54. 俄国人所写的约本，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情况²¹⁹之外，是相同的。关于立碑纪念和约事的最后那部分，是这样改了：“中国皇帝……亦可任便办理。”我想，如果不是由于喀尔喀人造反而使局势紧张，俄国人会坚持要求更多的东西和更明确的条件——那就是中国皇帝不得在行动上、言语上和书面文件里把他们的大公看做是在他之下的²²⁰。喀尔喀人当时正在渡河，如果不加阻止，就将从俄国人那里逃走，带着他们的所有牲畜回到他们的老家去。这对俄国人来说将是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从喀尔喀人那里每年榨取贡物。要不是由于这种情况，他们本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来表明，世界上除中国人之外还有其他民族。当宣誓在进行中的时候，俄国人吹着喇叭和笛子，这种音乐在这些和平天使们听起来就象天上的乐曲一般。音乐停止了，我们的同伴们都觉得很可惜，因为他们自己虽不会唱歌，却爱听别人唱；即使他们不会唱一首新歌，他们在外国至少是欣赏外国歌曲的。这件事完毕之后，俄国使臣站起来，弯着身子和我们的钦差大臣逐一拥抱，并以真正友好的态度和他们谈话，大家看到这一景象都很高兴。在短短的交谈之后，他们就分别了。俄国人作为主人陪着我们走出，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对这一姿态极为赞许。我们乘船走了一段，在陆地上又走了一段后，在午夜时分疲惫不堪地回到了我们的帐篷。这一天里我所吃的唯一东西，我有充分的理由在这里不提了。如果说对遭遇不幸的人来说，有人作伴确是一种安慰的话，我们并非没注意到在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头上看起来很奇妙的花翎，在那深夜时光，这些花翎似乎可供钦差大臣们用来当做借以飞翔的翅膀。

55. 在我们离开之前，俄国使臣要求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第二天不要走，因为他要邀请他们作为朋友参加一次宴会；而由于受到天气寒冷的苦想第二天就走。经过再三挽留，他只做到使

他们同意再留一天。但是他们希望休息，而不接受他的赴宴的邀请。²²¹第二天，9月8日，我们就留在我们的营地上。俄国使臣送来给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的礼物，估计价值达四百六十两银子，约合葡币一千瑞斯*，准确的数字留待专家们去计算吧！礼物中有四只表，一架四个镜片的望远镜，一面中号的镜子，我前面曾提到俄国使臣用以饮水的那两只银杯，一些珍贵的毛皮和一些其他价值较小的东西。那位翻译在将礼物送给每个人时都用了适当的言词表示，这使我们的贵族大人们十分钦佩，他们都不禁对这位俄国人加以赞扬。我听到有些从别人处听到这件事的人，很高傲地转述此事，并且问道：“在外国人中竟也有这样的人吗？”这种话我听到过好几次了，我是以我们居住在外国必须具有的那种忍耐来听这种话的。因为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不在场，由于翻译在说明送给每个人的礼物时出了一个错误而发生了一点小麻烦。但是，等我来到时，大家都闭口不谈此事，正如过去对待这类事情一样。这时，俄国使臣邀请我和我的同伴到他的帐篷中去。他在以前就曾表示过要这样做，但实际上还没有这样做过。²²²

56. 我们立即去了。他和善有礼地接待我们，并同我们谈了许多过去的事情。在谈话中，我请他原谅，我在有些时候曾经表现出焦躁的情绪，在他的面前这样做似乎是一种不适当的行为。我说，因为我身处外国人之中，居住在中国多年，而且因为我是该国皇帝派来的，所以我不得不表现为他的忠实臣民，如果我不那样做，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是一个世故很深的人，笑着回答说：“这样你就表现得合乎你的身份；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倒是不应该的。你吃中国的饭，穿中国的衣服，因此你也必须成为一个新人，并与此相应地行事。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表现出你是真诚

* 瑞斯(reis)是葡萄牙的一种货币单位的名称。——译者

的。总而言之，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应该多么感谢你，你为了共同的利益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帮助。我要让你知道，我是知道你的帮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不久你将得到同样的报答，知道你的工作在莫斯科产生的结果。”他表示自己的感激。因为他的感谢不只是关系到我个人，所以我认为指出他的那种感激不尽的心情不是白费时间。但愿上帝的仁慈使他遵守他的诺言，让我们看到天主教义在那个伟大的帝国中有新的发扬。²²³当我们同俄国使臣谈话的时候，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派来送回礼的人到了。这些礼物比俄国使臣所送的礼物更为精美，其中有大批的华丽的十分贵重的锦缎、两只金杯，一副皇帝本人送给他舅舅在这次旅途中使用的马鞍。俄国使臣十分高兴，希望能再有几天的来往交际，但是，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急于离开，没有答应他。在这同一天，我请求他释放一些在一场正义战争中被俘的鞑靼俘虏，他对此事很文明，他说大约有一百名俘虏，他将把他们全部释放。由于他宽宏大量地释放了这些人，我对他更加尊敬了。我还请求他把一个父母双亡被俘的幼小孤儿交给我。我带了这孩子回到本朝，因为他的身体虽曾被俘，他的灵魂仍是自由的。我现在希望，由于上天的仁慈，他现在已经享受到命中注定的报应，因为在我们回到这里之后，他生了天花病（这种病在中国人中不是常见的）。我在对他进行了圣律的教训后，给他行了洗礼，他升了天堂。我感到很难过，但同时对上帝的安排很为钦佩，上帝永远是宽宏大量的，他把所选定的人置于幸福的宝库中。

57. 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看到我以怎样的善意要求释放那些俘虏，以及俄国使臣又以那种基督的仁慈把这些俘虏交给了我，他们要求我替一些也被俘虏的更重要的喀尔喀人说情。但是，我认识到这个请求由于所涉及的人不同，决定要谨慎行事。我先和那位

拉丁文翻译商量,看提出这个请求是否明智。他说,这些被俄国人以朋友相待的喀尔喀人,在这次旅程中,“以四万多人(我怀疑这个数目)之众凶恶地向我们进攻,并且偷盗了一千二百匹马,靠上帝的帮助,当我们打败了他们,把这些为首的人俘获后,我们把这些马匹收回了。后来,使臣大人将所发生的事情向大公报告,请示如何处理这些人。我想,使臣大人没有得到大公的答复,是不能处理他们的;不过,虽然如此,如果您要我向他说话,我愿立即照办”。鉴于这种情况,我就请他别管了。在这次谈话中,那位翻译告诉我,他们的使臣十分希望买一顶鞑鞑式的帐篷(鞑鞑人善于制造这种帐篷),以供他在旅程中使用,因为这种帐篷适于御寒。我立即告诉他说,这花不了多少钱。我回来后就告诉了皇太子的舅舅索额图。他生性慷慨,立即把他自己的精美的帐篷让出来,这顶帐篷价值三十万瑞斯以上。俄国使臣对此似乎并不觉得什么;他冷淡地接受了这顶帐篷,只说他对这顶帐篷很满意。他的这种行为,使我对他的尊敬受到了一点损害,因为他并不缺少可以表示他自己能报答这些厚礼的能力。²²⁴

58. 9日,我们很早就拔营了。第一天,俄国使臣派了一些他的部下人员伴随我们同行,他们一直到看见我们扎营后才离去。这些人之中有一个荷兰人,他到这儿来是为了发财的。10日,这些俄国人回尼布楚去了,我们则继续我们的旅程。这天,钦差大臣们派了两个人到朝廷去向皇帝报告,并为我们的成功请赏。钦差大臣们在一百名官员面前对派去朝见皇帝的人发出应如何奏报的指示,我和我的同伴当时都不在场。钦差大臣们说了些关于我和我的同伴的话,为了避免引起忌妒并且由于我对谦虚的重视,我应该不去重复这些话。但是,我是一个诚实的人,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不说。我将只重述他们的结论,而让善于体会的人们去揣测那些

前提。钦差大臣们命令说：“禀报皇上，所希望取得的成功乃是托皇上的洪福取得的，又说，皇上无上英明，因为他遴选了两位神甫。我们不无惭愧地承认，一切都应归功于他们。有许多次，全部事情似已归于无望，是他们拯救了一切。如果他们沒有和我们同来，我们会一无成就。把这些话说了，不要忘记了任何一点。”这次会后，许多官员都十分热情地向我祝贺。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缘故，但是他们说应该如此；而较下层的人们至今还是象他们当时那样一致地持有这种看法。

59. 当我最后发觉这些祝贺的原因时，我想我应该去见钦差大臣们，向他们致谢。他们正在一起谈话，我象鞑靼人那样稍稍俯首说，我对他们的好意表示感激。我说，我和我的同伴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给皇上效劳，如果皇上知道这一点，如果他们不象某些毁谤我们的先前的神甫的人那样恶意地缄默不说，这对我来说就是超过公允的报酬了。他们看到我低着头说，他们也低着头说：“我们应该前去表扬你们，而你却来向我们致谢？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就是剥夺了你们的名誉和光荣，因为人人知道一切功劳是属于你们的。”另一个人说：“我们所有的荣誉和面子都是你们给我们的，因为如果没有你们，我们将有何面目进入北京？”我多次听到人们在祝贺他们的成就时他们就这样说，他们转过身来对着我们，重复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话。有一次皇帝的舅舅还说：“虽然，我过去对你的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我从来没有认识到你为我们的皇上效劳是这样的赤胆忠心，勇敢无畏。”另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认识到，你们是这样的人。”又一次，他们要把和约的条件重新译成鞑靼文，当我说不必再译了，他们不肯听我要说给他们听的理由。他们说：“我们承认，这一切的功劳都是你们的；你说无此必要就够，何必再说许多理由来说服我们呢？”除了这些公开的谈论外，我

还有着皇太子的舅舅(他在旅途中奉皇帝之命,带了更详细的消息先我们而行)写给我们的信,表明他已亲自向皇帝奏报了上述各事。我将保存这封信,以备在有人要把所有这些事情说成不同的情况时作为证明。应该赞美天主,他使得在这样一根枯枝上在这样艰难危险的情况下长出果实来!当钦差大臣们到达了北京,向皇帝奏报时,皇帝说:“进行了二十多年来的谈判总算结束了。”由此可见,他对这件事多么记挂在心上,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多么高兴。又一次,他说:“在这件事上,事情做得合乎我的心愿。”²²⁵

60. 11日,我们渡过了温达河,在那里我们的人中有三个人命运注定在回程中要遭遇不幸,溺水毙命。我们渡波尔契河时又死了十四个人。十四人中有一个,直到他所骑的马空着鞍座出现时,才发现失踪。由于这个地区在其他方面虽然出产丰盛,但不产盐,以致许多马匹都倒在路旁,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景象。能使牲畜吃了长膘的最好的草,因为没有盐的调拌,却使我们的牲畜变得越来越瘦,一直等我们到达了一块有盐的不毛之地,这里饲料虽不好,但是那些还活着的牲畜的情况却有了改进。25日,当我们已在这个沙漠上扎了营时,来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皇帝的鞑靼人²²⁶。在那些东方人之中他的名声很大,而他的贫困却超过那个连朋友都背弃了他的卓布*。这些人的懒惰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甚至懒得不去为自己谋食。他们什么事也不做,唯一的例外是吃,但是他们所吃的东西或者是人家给的,或者是偶然找到的。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给了他三百辆大车的谷子,作为皇上赏给他们的救济品,他急忙很高兴地跪在地上接受。在这些沙漠地带,我们还有两三次遇到许多牧民,他们的谈话的唯一内容就是马、骆驼和羊。但是,在这里那是没有多大意思的。10月6日,我们来到达尔湖²²⁷,

* 卓布(Job),基督教的旧约故事中的一个古代族长的名字。——译者

由此转向东方沿着长白山²²⁸的小路，去和正在狩猎的皇帝会面，皇帝在离北京八天路程的一个地点等候着我们。12日，我们到达了皇帝所在的地方，虽然那时已是深夜，我们都去向皇帝请安，他很高兴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并且也问我们好。他对我们的成就十分满意；这时，他把从宫廷带来的酒和食物分赏给了士兵们。他表示高兴满意，而士兵方面更加高兴，因为在一个只有在表示友好时才请人饮酒的国家里，这种做法是不常有的事。

61. 后来，他在他居住的地方接见了我和我的同伴。在那里，我想向他请安，并想探问，我是否陪伴着他，还是先行回京。他以使人难以置信的满意的表示来接见我们，并令人高声宣读下面的话，使人人都能听到：“朕躬甚好，卿等好否？朕知尔等如何出力为朕效劳，力图使朕满意。朕知由于尔等之才干与努力而和约得以缔结。尔等为此事曾竭尽全力。尔等明日即随同朕舅返朝。”18日，我们回到家里，等待皇帝自狩猎之行归来。他回来后，我们去向他请安时，一位太监出来迎接我们说：“皇上对我说，因为你们今天一定会来，而且会找不到什么人向他转达你们的意思（我们那位姓赵的忠实朋友和传信人²²⁹生病了），他派我来，要你们把你们要说的话告诉我，因为他不把你们当做外人，而是当做内廷的人。所以，你们必须以内廷的人的身份讲话，把你们在和俄国人缔结和约时所做的一切事情详细地说出来，即令是谈你们自己的功劳和为你们自己说话也好，即令是他已知道的事也好，因为听你们亲口说，会使他感到高兴。”所有其他的神甫都在场，于是我们都跪下，这是这个国家的习俗。于是我说：

62. “首先，我感谢陛下，承蒙陛下想到我们并派人来接见我们，将我们的感想转达陛下。至于陛下说他把我们看做他的自己

人而不是外国人，而且尽管事情关系到我，他要听听我本人对和俄国人办理交涉的报告，我的回答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而能得到他的容忍，这已超过了我所能请求的。我是一个草芥无用之人，听到陛下令我讲话，受宠若惊。关于他命令我说出此行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我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因为我只是做了皇上命令我做的事。如果我按照他的愿望办事，我认为这样接待我就是我所能期望的对我的最好的奖赏。如果我做了错事，我请求陛下宽恕。”那位太监还问：“你对你的功绩没有别的话要说吗？”我说：“没有了，因为说到我自己的事情，我是无善可述的。即使我有些事可说，我也既没有那种能力也没有那种才智来说。”那位太监笑了，把我的答复回禀皇上去了。我们没有被允许觐见皇帝，因为皇后死了，皇帝正在服丧。²³⁰过了一会儿，太监回来了，说皇帝下令赐茶给我们全体。虽则茶本身是不值钱的，这种优待的表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的。既然皇帝觉得事情办得很好，很为满意，我们回来后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63.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出使的起源，经过情况和结局。这些事实，如果人们透彻地加以考虑，清楚地表明，上帝是多么要把我们的贡献和善良的意愿清楚地表现出来，虽则我自己的许多罪恶只能是对取得成功的障碍。任何人不抱偏见地来仔细考虑这次出使的经过，就会清楚地看到，即令我想这样来指导一切事情使得我们的努力和善意能表现出来，我也不能比似乎已不记我的罪恶的上帝的善良、仁慈、明达那样确定地、巧妙地把我们的使命导向良好的结局做得更好。分裂派的俄国人感谢我们，异教徒的中国人把一切都归功于我们，对我们非常感激和赞赏。连皇帝本人也承认我们的成就，这从以上的话和其他的声明里都可以看到。我把这次缔结和约的所有情况都详细地叙述了，把双方值得赞扬之处都提

到了,并以同样的诚实态度说出了一切有关双方的重要事情。为了表示我在写述中的真诚和为了表现我是在诚实地作出报道,对于任何一方都无偏倚,我很直率地谈出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对分裂派和对异教徒都无所偏袒。我力图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我的教会和我的职业的要求,为了上帝的更大的光荣,为了众生的幸福而为双方效劳。在上帝看来,分裂派与异教徒都是一样的。我知道,我在许多事情上可能做错了,但是我要声明,这不是有意的。如果我有玩忽之处,我和我的罪恶应该受到谴责;我本该会犯更大的错误的。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而认为我由于忠实地按照我的教会的要求行事,无愧于我的教会,那么我首先要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上帝,是他没有让我犯更大的错误;其次要归功于给了我以忠告的我的上司们的谨慎。我们这些教士们对于他们的谨慎指导(我自己在别的问题上得到过这个教训,对此是知道的),在这类事情上必须听从。我们不应参与这类事情,而应谦逊地避开,因为这些事与我们的教会是不相干的。只有众生的幸福和同样重要的共同利益,才使我们不得不去办这类事情,而这样做也只是在我们必须服从那些君王们的愿望的场合,为了上帝的爱,我们为他们无私地服务。最后,如果我对某些事情或某些情况由于遗忘而有疏漏之处,我请求大家原谅我。我还向所有的人表示,我这个人是一个愿意在北京供驱策的人。690年1月10日。一切仰仗天主。

徐日升

注 释

1 佟国纲是一位将军。他是辽东出名的佟氏家族佟图赖的长子,这个家族在1619年曾和满清结盟。顺治皇帝的妃子孝康章皇后就是佟图赖的女儿、佟国纲的姊妹。她是康熙皇帝的生母。所以,在耶稣会士的报告中,称佟国纲为舅舅,康熙帝也这样称呼他。佟国纲在1690年9月3日指挥炮兵团对噶尔丹作战时,在乌兰布通战役中阵亡。他是被敌人的滑膛枪打死的。参阅亨梅尔:《清代中国名人录》,第2卷,第794—

795页；第1卷，第327页。还可参阅《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03ff，172r—172v；日本—中国，104f.243r。

2 索额图是索尼的第三个儿子，因此也称索三，例如在耶稣会士的报告中即称他为索三。他属于满人正黄旗。他的祖父硕色曾参加努尔哈赤的军队。康熙帝次子一度曾是皇位继承人的胤祺的生母孝诚仁皇后，就是索额图长兄噶布拉的女儿，因此也是索额图的侄女。所以，在耶稣会士的报告中称索额图为太子的叔叔，索额图曾帮助年轻的康熙帝于1667年8月从摄政者手中接过大权以后赶走了鼐拜（康熙未成年时的四摄政之一）及他的一派。索额图曾担过各种官职，1688年被派为和俄国人谈判条约的首席代表之一。1689年后，他参与了征噶尔丹之役（1690年，1695年，1696年）。1701年托辞年迈退休，大概死于1703年。参阅亨梅尔：前书，第2卷，第663—669页；第1卷，第328页；《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04ff，203r，243r。

3 中国人称为尼布楚，俄国人称为涅尔琴斯克。这个城取名于同一名称的河流（中国人称为尼布楚河，俄国人称为涅尔查河）。据《平定罗刹方略》（载何秋涛编的《朔方备乘》。此书于1860年进呈给皇帝，1881年编就）第27—28页上载，1688年派往和俄国人订约的中国使团在一个奏章中说：“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尼布楚，及通黑龙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尼布楚城系由俄国的尼布楚城堡发展而成，这个城堡是彼得·别克托夫和阿法纳赛·巴什科夫在1654—1658年间建立的。在拉里昂·托尔布新和丹尼尔·阿尔钦斯基长官治理之下，尼布楚成为向黑龙江地区进行入侵和渗透的中心地。见克纳尔：《向海推进》（Kerner, *The Urge to the Sea*），第82页；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273，428页；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Ravenst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第3—44页。徐日升在日记中对该城及其周围地区有一段描写。还可参阅巴德雷：前书，第2卷，第276—428页。

4 这些人的名字，见注216。

5 徐日升所提供的条约的拉丁文本载于本日记中。关于拉丁文本以及其他文字的条约文本，详阅：福克斯：《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W. Fuchs, *Der Russisch-Chinesische Vertrag von Nerchinsk vom Jahre 1689*），载《中国大事记》（*Monumenta Serica*），第4期（1939—1940年），第546—593页；及刘选民：《尼布楚条约前的中俄关系》，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23期（1940年），第391—440页。

6 从他对这个报告的对象称呼“大师们”这一点来看，很清楚，报告是写给他的耶稣会的同事们的。

7 徐日升是托马斯·佩雷拉神甫的中国名字。

8 这一谕旨是在康熙27年3月13日（1688年4月14日）发到理藩院的。谕旨内容没有载入《东华录》或其他较出名的清朝文件集中。黄伯禄神甫：《正教奉褒》（1635—1829年中国历朝皇帝所颁布的公开文件、法令、谕旨汇编）第94页上载有这道谕旨的汉文，但未说明其出处。不但如此，黄神甫在他的书的绪言中说，他所抄录的有些文件是自外文译成汉文的。这个文件的日期说明，它就是这些例译的文件之一，因为中国官方文件的日期通常是用干支的。但是，虽然如此，这个谕旨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因为黄神甫一定有徐日升日记以外的来源（为徐日升所不知道的），而就有关

的各段话来看,它们是完全相同的。

9 指耶稣会士到中国后所受到的迫害而言。关于这类迫害事情,列举在费赖之:前书,第1073—1074页上,在“迫害”条目下的“按字母顺序表”。

10 赵昌是一个侍卫,参阅黄伯禄:前书,第85—86页。

11 关于张城的传略,见费赖之:前书,第443—451页。

12 这些通告中有一些见黄伯禄:前书,第94—95页。

13 费赖之:前书,第382页上有一段话,是根据冯秉正神甫:《中国史》(Father Joseph François Marie Anne de Moyrac de Mailla: *Histoire de la Chine*) (第11卷,第111页)。他说:“这一次,这两位教士收到的康熙的礼物中,有极华丽的锦缎长袍一袭,上面饰有龙,但不是织绣的,因为这是留给皇帝和皇室亲王的殊荣。皇帝还给了他们配以金钮子的短貂皮袍,里面是缎子的,这是皇帝御用的衣服。”

14 这是指佟国纲。参阅注1。

15 关于这些地区更详尽的描述,参阅荷尔德:《中国本部和蒙古……》,第4卷,第3—419页,其中有“关于蒙古地理的观察,摘自绘制蒙古地图的教士的报告”;“关于大蒙古历史的论述,摘自张诚神甫的报告”;及“张诚神甫的蒙古之行”。

16 这个城是由同名的俄国城堡发展起来的,该城堡于1665年在色楞格河岸上建立。参阅克纳尔:前书,第82页;巴德雷:前书,第1卷,第XCVI页。

17 关于这次战争,参阅荷尔德:《中国本部和蒙古……》,第46—50、40—41页。这是指厄鲁特人对喀尔喀蒙古人地区的入侵。

18 这位首领的称号是“汗”,这是蒙古部族首领最高的称号。成吉思汗将他的帝国分成四个艾玛克,其汗的后裔都拥有这个称号。布伦纳与哈杰斯特鲁姆:《现代中国的政治机构》(H. S. Brunnert and V. V. Hagelstrom,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第445页,注873;第442页,注870a。在当时的耶稣会士的报告中,把这个称号译为国王或皇帝。关于在这个时期前后喀尔喀部的领土,张诚说:“这个国家东起阿尔泰山,西至索伦省;由北至南自50度和51度到戈壁大沙漠的南端,戈壁大沙漠也算是属他们的……”这时候,喀尔喀地方分为三个艾玛克:“三位汗中最长的名扎萨克图,他拥有紧靠阿尔泰山以东之地。这些地区伸展到色楞格河、鄂勒昆河和图拉河。第二位汗叫土谢图,是所有喀尔喀诸王中最强的。他的国家沿着上述三条河流,一直伸展到肯特山(图拉河及克鲁伦河都发源于此山)。第三位汗名车臣,住在靠近克鲁伦河发源地。他的人民沿着克鲁伦河两岸散布至下游注入达赖湖处,并向前到索伦省的边境。”这段英文录自荷尔德:《中国通史》(Hald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的英文版(1736年),第4卷,第164—166页。他们所走过的喀尔喀地区是车臣汗的地区。如果我们想到这时候蒙古的昔日声威已荡然无存,徐日升对车臣汗称帝的抗议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我用了福克斯:《康熙时代的耶稣会士地图》(W.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shi-Zeit*)一书来查明本注中的地理名称。

自此以后,为了分别荷尔德的法文著作和英文译本,法文著作称为《详志》,英译本称为《中国通史》。

19 关于这个被打断的第一次旅行,现有三种当时的记载:《耶稣会士、法国在华教士张诚神甫入蒙记。1688年的第一次旅行》,载荷尔德:《中国通史》,第4卷,第214—

358 页。其他两种记述是中文的：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和钱良择：《出塞记略》。钱是作为索额图的私人秘书加入于 1688 年的议和代表团的。他的日记载于《昭代丛书》。张鹏翮和陈世安一起，由 1688 年代表之一都御史马齐保荐为中文秘书。张当时为兵部督捕理事官。他的日记载于《艺海珠尘丛书》。在一些其他文集中，他的日记称为《东使俄罗斯日记》，内容有所不同。参阅亨梅尔：前书，第 1 卷，第 49 页；第 2 卷，第 667 页。关于这两种中文日记，我用的是内藤虎次郎的《满蒙丛书》第 2 卷中所载的。徐日升所说的这次旅行中的艰难，在这些日记中都得到证实。只有在一点上，这些其他的作者和他不一致，那就是他把钦差大臣们折返的决定称为“不适当的决定”；而这两位作者对此似乎都很满意。关于这次旅行的各种概略报道，参阅巴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Pavlovsky,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第 16—18 页；亨梅尔：前书，第 2 卷，第 665 页。

20 这是指的罗马殉教史中巴图亚的圣安东尼的节日——6 月 13 日。对于作为葡萄牙人的徐日升来说，这一天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位圣人也是葡萄牙人。

21 根据张诚神甫所记，6 月 13 日至 6 月 26 日使团所走的路线如下：从北京 14 日过密云县，15 日过古北口，16 日过鞍匠屯，自 17 日至 20 日沿滦河河道走，20 日到达库儿奇勒河。他们顺这条河行进，于 22 日来到衣扎儿河，在称为图儿良衣扎儿的地方扎营。他们从这里向北—西北行，于 24 日到达乌苏图(呼苏塔)，然后于 26 日来到了徐日升所描写的地方。参阅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63—166 页。靠了福克斯：《耶稣会地图》第七图的帮助，初步查明了这些地方。又参阅注 19 中所说的那两种中文日记。

22 台吉是第七级也是最低一级的世袭贵族，分四等。参阅布伦纳与哈杰斯特鲁姆：前书，第 445 页，注 873。

23 这里所说的西鞑靼人是指的蒙古人，以别于满洲人；在耶稣会士的记载中，满洲人被称为东鞑靼人。例：“中华帝国除组成它的十五省外，这在本书第一编中已论及，还包括长城以外臣服于满洲鞑靼人的所有国家。满洲鞑靼人的老家就是东鞑靼地方。”荷尔德：《中国通史》，第 4 卷，第 86 页；又参阅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 页。“鞑靼地方一向是最大的、人口最多的第二个民族，就是蒙古族。中国人称他们为‘西鞑子’，有时嘲之为‘臭鞑子’，因为他们身上常有臭味。这个民族中包括喀尔木克人、厄鲁特人、喀尔喀人和就称为蒙古人的那些人。”参阅荷尔德：《通史》，第 4 卷，第 150 页。

24 指元朝(1260—1367 年)时。

25 明朝(1368—1644 年)。

26 张诚神甫说，他们在一个称为达汉诺尔的池塘附近扎营，从这里他们去看产鱼极丰的达尔湖。参阅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67 页。

27 张诚神甫告诉我们，库儿奇勒河发源于此山。

28 参阅费赖之：前书，第 382 页。

29 关于张诚神甫对达尔湖的描写，参阅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67—168 页。

30 这四条河中的两条是公古儿河和盔屯河。其余两条就不知道了。福克斯：《耶稣会地图》，第 154 页，注 535；第 168 页，注 919 及地图 7。

31 据张诚神甫说，大理石上刊刻的文字说，在蒙古人统治时期，闾老院的一位学

士(学士仅次于阁老)建立此塔。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67页。蒙古人统治时期指的是元朝。参阅注23和24。这位不知名的官员似乎是一个内閣学士,大学士一般称为阁老。参阅布伦纳—哈杰斯特鲁姆:前书,第44页,注132,133。所以,张诚称这位官员为阁老院学士,而徐日升译这个官衔,则称他为内閣官员。但是,内閣是在明朝时才成立的,因此,这个人怎么可能是内閣学士呢?两位耶稣会士似乎都没有说出他的确实官衔,只说了相当于明朝时的什么官衔。

32 宗教的热诚胜过考古的兴趣。

33 自达尔湖起,就不容易精确地查明他们所走的路线了,因为大多数地名不见于耶稣会地图。据张诚说,8日他们已越过臣服于中国皇帝而不隶属于喀尔喀部的那一部分鞑靼地方的境界,这是一块在两个帝国之间无人居住的地方。9日,他们屯于一个称为卓诺(Tchono)的小地方,这里已经是喀尔喀的领土。要了解这一段话,必须记住耶稣会士当时对鞑靼地方的概念:“在‘大鞑靼’这个名称下,我把我们这个大陆上所有位在日本以北的东洋、冰海、俄国、里海、波斯、蒙兀儿和朝鲜王国之间的那些地方都包括在内。”参阅荷尔德:《通史》,第4卷,第142页;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33页。在这个“大鞑靼”之内,当时耶稣会士的报告大约地区分了四种民族:满洲人“他们的老家是东鞑靼”(荷尔德:《通史》,第4卷,第86页;《详志》,第4卷,第35页);“西鞑靼人,这个民族包括喀尔木克人、厄鲁特人、喀尔喀人和就称为蒙古人的那些人(内蒙的蒙古人)”(荷尔德:《通史》,第4卷,第150页;《详志》,第4卷,第37—38页);“鞑靼地方的第三种民族就是回教鞑靼人,他们自西至东从波斯和里海一直分布到厄鲁特地区,在南面差不多一直到中国……”(荷尔德:《通史》,第4卷,第179页;《详志》,第4卷,第53页);“鞑靼地方的第四种民族是在莫斯科人统治下的那个民族。”(荷尔德:《通史》,第4卷,第181页;《详志》,第4卷,第54页)。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到,要了解耶稣会士的报告必须想到的另一个区别各种鞑靼人的原则,那就是,他们是否隶属于中国或俄国,或者他们是否独立。在隶属于中国的那些地区中,我们又必须区别,直隶于中国皇帝的,由他派官员来治理,如同对帝国的其他省份一样的那些地区,和由当地民族自己的王公治理,他们是他们的领土的主权者,但是代表中国皇帝而拥有这些领土的那些地区(荷尔德:《通史》,第4卷,第88页;《详志》,第4卷,第2页)。把这个原则用之于“大鞑靼”的前三种民族(第四种民族这里可以不管),我们看到,第一种民族东鞑靼人是直隶于中国,分为三省(东三省);第二种民族在1689年其隶属和独立的程度不等;“蒙古人”(即内蒙古的蒙古人)已经承认了中国的主权,也就是中国皇帝的统治权,组成了四十九个旗,由他们自己的王公治理(除察哈尔是直属外)(荷尔德:《通史》,第191—196页;《详志》,第4卷,第160—163页);被噶尔丹所领导的厄鲁特人打败后的喀尔喀人接受了中国的保护,但还未组成旗;厄鲁特和回教鞑靼人仍保持独立。所以,中国议和代表团在走过了内蒙古蒙古各部族的地区之后,已进入喀尔喀部车臣汗的领土。参阅附录中的蒙古各部落表。

34 关于这种马匹的贸易和马的价格,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47页。

35 见注22

36 从9日到13日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在耶稣会地图上都查不到。他们走了约一百二十九华里,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71—173页。

37 虽然徐日升发现野骡子和家骡子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据另一个耶稣会士的报告中说,它们很不相同。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28页。

38 渡河地点在经度112—116度之间。

39 据张诚说,这个湖名枯轮鄂模,俄国人称之为达赖湖。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75页。又参阅注18。

40 参阅本日记第27节。

41 从渡克鲁伦河那天起到21日,他们走过这个“蚊子国”,朝着北偏东北方向走了约三百里路。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74—177页。

42 这次渡河情况,还可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77页上张诚的叙述。

43 在“从绘制地图的教士们的报告中摘录的关于鞑靼地方地理情况”中,有以下的話:“喀尔喀人那里黑貂很少,所多的只是松鼠皮、狐皮和一种称为獭皮(Taelpi)的小动物的皮……这些动物是一种地鼠,在喀尔喀所属的某些地方很常见。它们住在地下,在地下挖了一长排的小洞,它们之中有多少雄的就有多少个小洞。”关于这些动物的生活情况,和怎样去捕捉它们,也有描述。参阅荷尔德:《通史》,第4卷,第138—139页。这种描述跟蒙古人称为 tarbagha 的那种动物的情况一样。Tarbagha 意思是土拔鼠。参阅科瓦留斯基:蒙俄法字典(J. E. Kowalewski, *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第3卷,第1679 a-b 页。这种动物似乎和美洲的草原狗属于同一类。徐日升是从属类上称之为水獭,这是不确切的。

44 关于这一天所遇到的喀尔喀人,张诚说,他们由一位中国官员带到钦差大臣之前。这些喀尔喀人曾经对俄国领土进行了一次袭击。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78页。喀尔喀人这一次对俄国地方的袭击,就是采取(上文第三章中所说的)当时的典型方式。1688年前数年,当中国代表打算和俄国人在色楞格斯克举行会谈时,中国在黑龙江上已打败了俄国人,并和喀尔喀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喀尔喀人取得了中国人所供应的武器,接着就对俄国地方进行了袭击,甚至进攻了戈洛文。因此,中国代表在赴色楞格斯克途中,料想戈洛文处境必很困难。但是,没有预见到的事情发生了。噶尔丹侵入并打败了喀尔喀人。喀尔喀人向南逃奔进入内蒙古,向北逃到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逃到外贝加尔地区的喀尔喀人,不知道在尼布楚即将举行谈判,又对到达色楞格斯克的俄国代表戈洛文进行攻击。这是他们对俄国人多年来对蒙古人和西伯利亚当地诸部族如布里亚特人的残暴敌对行为的自发的报复。喀尔喀人和布里亚特人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都有密切的联系。戈洛文终于把喀尔喀人打败了,迫使他们投降(1689年3月)。但是,喀尔喀人对俄境的袭击仍然不断。加恩:《彼得大帝时期俄华关系史》(法文版),第42—45页;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16页;沙比尔:《黑龙江》,第18页。

45 苏克台这条小河,据张诚说,是流入黑龙江的。这条河不见于耶稣会的地图。

46 见注44。

47 波里河的名字,张诚没有提到。徐日升和张诚都说这条河是流入温达河的。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79页。

48 这个人是7月21日(见上文)派到俄国人处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据张诚说,此人报告说,他和他的同伴于25日到达尼布楚,第二天受到该城总督(伊凡·符拉索夫)

很好的接待。他还报告说，俄国全权大臣(费要多罗·阿列克塞维奇·戈洛文)尚未到达，但护军营的护军统领玛老爷(玛喇)已自璦琿带领军队和给养到达尼布楚以南。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80页；又参阅注4。

49 参阅注48和216，并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81页上张诚这一天的日记。

50 关于康熙帝派遣这样一支强大舰队所作的陆海军方面的准备，参阅上文第三章。

51 据张诚说，这块俄人居留地的名称是阿耶贡(Ayergon)，取名于一条同名的小河。他还说，这个地方似乎已被舍弃。有人告诉他们说，居民听说中国代表团即将到来，都到尼布楚去了。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82页。

52 据张诚说，来欢迎他们的招待小组，除玛喇(见注48)外，还有统带璦琿及黑龙江以北所有地区的清军的将军和其他官员。当时这位将军就是萨布素。最后到达尼布楚时，他们发现自黑龙江和璦琿调来的士兵和给养早已到达。乘船而来的士兵约一千五百人。他们的骄横举止使俄国总督(符拉索夫)颇为吃惊。因此，他对由陆路而来的那些人的有纪律的表现，颇为满意。中国钦差大臣下令乘船前来的军队从他们的宿营地撤退。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86页。

53 参阅注3。

54 这些鱼之中，有大量的鲑鱼和另一种欧洲所没有的其形状和身长约和金枪鱼相仿的鱼。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1页。

55 关于鹿和捕鹿的情况，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29—30页。

56 据另一个耶稣会士报告说，“堪达干很象大角鹿……我们看见过一些打死了的，比最壮的牛还要重。”参阅荷尔德：《通史》，第4卷，第135页。

57 关于俄国人探查和占领黑龙江流域事，参阅本书叙述历史背景的第一章和第三章。

58 关于毛皮在俄国占领西伯利亚中所起的作用，参阅本书上文第一章。

59 关于黑貂的重要性，参阅上文第一章。

60 关于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中占有一定地位的那些产皮动物，在上文第一章中和克兰：前书，第7—32页上，有详尽的名单。

61 这指的是海象，尼古赖的报告中也曾提到过。巴德雷：前书，第2卷，第239—240, 308页。

62 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56—57页。

63 这些山可能是雅布洛诺夫山脉的山麓。

64 张诚没有提到这个礼节性的代表团。

65 1644年是清朝在中国正式开始之年。

66 参阅注57。

67 这就是巴伊科夫使团(1653—1658年)。详见上文第三章。

68 巴伊科夫不遵从中国的宫廷礼节，因为他奉到训令：“不得将沙皇信件只交给中国的长官，甚至也不得交给中国的大臣……他不得对皇宫或任何门楣跪拜……在觐见时，决不可吻博克达汗(当时俄国人对中国皇帝的称呼)的脚……”巴德雷：前书，第

2卷,第134页。

69 在载有巴伊科夫的正式报告的任何史料中,都丝毫没有他曾说过这样的话的记载。

70 在1656年(巴伊科夫使团)和1676年(尼古赖出使)之间,发生了一些重要事情。1658年春,奥弗弗赖·斯捷帕诺夫的军队被清军歼灭,俄国人在一段时期内放弃了黑龙江下游。但是,到1665年,他们已经巩固了尼布楚,并且建立了雅克萨,这样又重新在黑龙江下游定居下来。接着,在1666—1667年发生了根特木尔事件和随之而来的争议,结果而有米洛瓦诺夫的出使。从1670年康熙交给米洛瓦诺夫转递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些地区被认为是中国统治之下的。详见上文第一章和第三章。

71 徐日升于1673年1月到达北京。

72 这位俄国使臣是尼古赖(1675—1676年是他的出使年代)。详见上文第三章。

73 尼古赖于1676年5月15日到达北京后,拒绝将国书交给理藩院官员,并且不肯在觐见时叩头。所以,这些规定就未执行。但是,在他拒绝跪着代表沙皇接受皇帝的礼物后,康熙就在8月29日的一道上谕中宣布因为尼古赖不服从命令,他对沙皇来信将不予答复。

74 虽然尼古赖最初给理藩院的报告中有关于贸易商务的问题,而且且则他的随从人员中有商人,但是他作为大使,地位是在以前俄国派来的使节之上的。以前的俄国使节多数是商务人员。这或可解释徐日升那句话:“他却没带什么货物来”。

75 尼古赖不愿进行宗教争论的谨慎态度,也许是由于他需要南怀仁和其他耶稣会士的帮助,因此不愿得罪他们。

76 这就是1667年新任印度总督佐奥·阿斯·达·孔哈派来的使节。萨尔丹哈被派为“皇家大使”,来谈判商务关系并取得传布基督教的自由。参阅费赖之:前书,第506—507,376—377页;Boxer and J. M. Braga: *Breve Relação da Jornada que fez à Corte de Pekim o Senhor Manoel de Saldanha 1667—1670, escrita pelo Padre Francisco Pimentel S. J., e Documentos Contemporâneos* (Macao, 1942)。裴台区:《关于康熙朝葡萄牙历次遣使来华的一些评论》(Petech: *Some Remarks on the Portuguese Embassies to China in the K'ang-hsi Period*),载《通报》(T'oung Pao),第44期(1956年,莱顿)第227—244页。

77 《东华录》上说萨尔丹哈前来朝贡,就等于承认他的藩属地位。费赖之:前书:第377页。

78 费赖之前书根据蒙塔尔多的《澳门史》(Montalto: *Historic Macao*) (第2版,第121页)说:“在路上,他已经做到了使他的旗上不照例写‘进贡’字样”。虽则如此,但《东华录》仍说他是来朝贡的。

79 尼古赖说:“……荷兰人看到了葡萄牙人获得厚利,所以三次由海道派大使到北京来,为了要达到在他们和中国人间建立贸易关系的目的。”巴德雷:前书,第2卷,第223页。这三位荷兰大使是:1655年“荷兰公司派到顺治皇帝处的比艾尔·德·哥耶和夏克斯·德·凯塞”,166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来顺治朝廷的康本和诺贝尔”和1664年“东印度公司派来顺治朝廷的比艾尔·德·贺恩”。费赖之:前书,第505页,注1。贺恩使团不可能是在1664年派到顺治朝廷的,因为顺治在1661年已经死了,除非

是荷兰人派这个使团来时，还不知道他已死去。下一次的荷兰使节是在 1670 年左右到来的。

80 关于他们失败的原因，参阅巴德雷：前书，第 2 卷，第 155—159、223 页；鲍斯曼：前书，第 203—204、209 页。

81 关于阿尔巴津（即雅克萨）的建城，参阅上文第一章。

82 关于这些军事上的准备之前发生的事情和军事准备情况，详见上文第一、三章。在尼古赖出使失败、三藩平定和军事准备完成之后，康熙帝仍希望不须进行全面战争来解决争端。由于中国人对俄国人的居留地进行了有计划的袭击，到 1683 年俄国在黑龙江下游占领的痕迹已消失殆尽。只有加强了防备、给养充足的雅克萨硕果仅存。1683 年，康熙遣俄俘二人带了一道谕旨到雅克萨。他未得到答复，于是即发动了征讨。1685 年 6 月 13 日，中国军队来到了雅克萨城下。

83 这一点在送到雅克萨的谕旨中说得很清楚。在康熙于 1686 年 9 月 4 日给各大臣关于他托荷兰使节带给沙皇的信之事的训令中，也说得很清楚。参阅上文第一、三章及刘选民：前文，第 410—411 页。

84 刘选民：前文，第 402 页。

85 关于在 1686 年 7 月开始的对雅克萨的二次围攻，参阅上文第三章。

86 这里徐日升把接连发生的事情说得很简略。详见上文第三章。

87 康熙下令围攻的中国军队放松对雅克萨的包围圈，向后撤三俄里——在俄国全权代表到达之后，才完全解围。参阅上文第三章。

88 这就是康熙交给荷兰使团转交莫斯科的那封信。闵明我也带了这封信的几份副本去莫斯科。鲍斯曼：《南怀仁和俄国宫廷的关系问题》（*Bosmans, Le problème* ……），第 207—213 页。

89 这里，必须把前后所发生的事情补叙完整。魏牛高和法佛罗瓦在 1686 年 10 月 31 日到达北京，在那儿一直呆到 11 月 14 日。他们立即通知戈洛文他们已经到达，并且告诉他，中国皇帝愿意解除对雅克萨的封锁。戈洛文于 1687 年 2 月 18 日收到他们的信；他们自己在 1687 年 3 月 14 日在回到莫斯科的途中在戈洛文那里走过。他们从北京带回来两封信：一封是用蒙文写的，只说收到了他们所带去的信；另一封是用拉丁文写的，日期是 1686 年 11 月 21 日，列举中国人对俄国人所不满之事。这封信的原文见巴德雷：前书，第 2 卷，第 425—427 页。在此期间，戈洛文已于 1686 年 1 月 26 日带着训令从莫斯科出发。他派了科罗文为先遣代表到北京去。科罗文于 1688 年 3 月 14 日到达北京，在那里一直呆到 4 月 17 日。参阅上文第三章。

90 见注 16

91 科罗文从北京带回来的 1688 年 4 月 17 日康熙帝的信，确定以色列格斯克为会议地点。这就是俄国人所提出的地点。加恩：前书，第 41 页。

92 中国代表团于 1688 年 5 月 30 日离开北京。

93 参阅《日记》第 3 节。

94 更详细的情况，可参阅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87—162 页上张诚对这第一次旅行的叙述。

95 这封信见荷尔德：同上书，第 120—122 页。

96 关于从7月22日(中国代表致函戈洛文的那一天)到9月8日(戈洛文的回信到达的那一天)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戈洛文的信的内容,详见荷尔德:同上书,第123—136页。

97 这位信使是伊凡·洛吉诺夫。他于1689年5月23日到达北京,一直待到6月7日。和他同来的有七十人。他带来的戈洛文的信是写给皇帝的大臣的,信中要求指定新的谈判地点。加恩:前书,第44—45页;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60页。

98 同上书。

99 关于洛吉诺夫前来的更详细情况,参阅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61页。

100 白晋神甫和约瑟夫·苏尔斯神甫去答访了那位俄国人。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62页;费赖之:前书,第399—402、433—439页。

101 加恩:前书,第44—45页;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60页。

102 实际上,中国代表团是在6月13日洛吉诺夫离去后六天,出发前往尼布楚的。参阅《日记》第4节。

103 关于随从人员的人数,见刘选民:前文,第416页;陈复光:前文,第500页。

104 天主教教会在7月31日庆祝张诚和徐日升所属的耶稣会的创办人圣伊格那修斯的节日。

105 张诚告诉我们说,这一天中国钦差大臣们写了一封信给俄国使臣,由徐日升和他译成拉丁文,在信中他们对俄国使臣还未到达尼布楚表示诧异。他们还通知他说,他们为了避免引起猜疑没有渡河;但是,如果他不迅速前来,那么为了寻找更好的饲料,他们就不不得不渡河了。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84—185页。

106 张诚说,这位俄国使者还提出了另外一些令人为难的问题。他要知道(1)中国代表团带了这么多的兵,是否来作战的;他还对乘船来的那些人的行为表示不满;(2)为什么他们前次派往北京的使臣(伊凡·洛吉诺夫)还未回来,而他还是在中国代表团之前就离开北京的。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83页。

107 戈洛文的这封信,中国钦差大臣们于10日收到。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87页。

108 17日以前所发生的主要事情是:7日,戈洛文派了一位信使来通知中国人说,他还要耽擱九天。他又问到他的代表洛吉诺夫迟迟未见返来之事。中国人派了两位官员去向他致意。10日,对1日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由另一位信使送来了。戈洛文对他的耽擱表示歉意,答应比他原来预料的日期提前到达。他请求中国人从他们已扎营之处后撤,因为那个地方太靠近堡垒。中国钦差大臣们对这个请求很不高兴。12日,又派了三个官员去见俄国使臣。尼布楚总督符拉索夫送来了礼物。15日,总督通知中国人,戈洛文在几天之内即将到达。16日,12日派去的三个官员回来了,对他们所得到的招待十分满意。戈洛文只要求中国人撤退到离开堡垒稍远一些。但是,中国官员对他说,没有别的合适地方可以屯扎,如果他来了以后能找到别的一个合适地方,他们愿意听从他的请求。戈洛文对他的蒙文翻译表示不满,建议今后应使用拉丁文(这是要求派耶稣会士来的一种巧妙的暗示)。有一些俄国人前来自答中国官员的访问。他们询问关于将来参加谈判的人数。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使中国人很不高兴,他们决定要求戈洛文不要再派这样的人来。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87—188页。

109 这是发生在 12 日的事。参阅注 108。

110 参阅注 108。

111 参阅注 108。

112 参阅注 108。

113 俄国人所使用的这些船艇的名称是平底小木船，平底木船，大船。克纳尔：前书，第 165、167、171 页；巴德雷：前书，第 2 卷，第 246 页，注 4，第 48 页，注 1, 2, 3；拉文斯坦：前书，第 21 页。

114 张诚说，俄国全权代表通知中国钦差大臣们说，会议在两三天内还不能开始，因为他的随从人员还未到达。一些中国官员被派去答访。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88 页。

115 参阅注 108。

116 张诚说，在 20 日商定了会议应在 22 日开幕，同时也商定了举行会议的方式。两位耶稣会士力图使首次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的中国钦差大臣们相信，俄国人所制造的麻烦是由于中国代表团带了这么多的人和兵士前来。两位耶稣会士还极力向中国钦差大臣们保证，所有这些安排都是符合“国际法”的。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88—189 页。

117 张诚告诉我们说，中国钦差大臣们的这种猜疑，是由驻鞑靼东部的清军将军所引起的。这位将军曾经一再上过俄国人的当。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90 页。这是指萨布素。他自 1683 年任黑龙江将军，因此和俄国人常打交道。参阅注 51 和 216。

118 这位使者大概是科罗文，他于 1688 年来到北京。戈洛文 1689 年派去的使者洛吉诺夫还没有回来，因为三天之前，戈洛文还未接到关于他的消息。参阅注 108。徐日升的这封信现还未发现。

119 据张诚说，说服戈洛文同意的原因是，他们（两位耶稣会士）向他指出，中国人在这类事务上是十分缺乏经验的。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90 页。

120 参阅注 117。

121 参阅注 116。

122 这一番话和后来的另一些话，以及讲这些话时的情况，证实了徐日升所说的，他和张诚“并未授有译员的职衔”，而他们的地位是超越译员之上的。

123 佟国纲。参阅注 1。

124 参阅《日记》开首第 1 节。

125 关于对帐篷的描写，参阅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90 页。

126 徐日升没有说明这个帐篷的用途。这大概是作为双方代表团在等候对方代表到达时的休息处。

127 符拉索夫当时是尼布楚长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到 1690 年 2 月戈洛文根据他的权力任命了他的军队的一个上校西奥多·伊萨维奇·斯克瑞皮琴接任尼布楚长官时为止。符拉索夫的一个儿子，彼得·伊凡诺维奇被派参加 1725 年萨瓦·弗拉迪斯拉维奇的赴华使团。加恩：前书，第 78 页，注 1，第 198 页，注 5。

128 这个人的姓名和头衔，在条约的英译本中是“正教教会的执事西蒙·科尔尼

茨基”。

129 拉丁文约本中“Oviez”和徐日升文本中一样,都是要把 Alexeevich 一名拉丁化的结果,这样就把这个字分为“Alexius”和“Oviez”两个字。戈洛文的出生年代不明。他是托波尔斯克长官彼得大帝党羽阿列克塞·彼得罗维奇·戈洛文的儿子。他之所以被在彼得大帝未成年时以使节部(相当于今外交部——译者)首领(1682—1689年)而掌有大权的葛利青亲王任命为托波尔斯克长官,大概是由于葛利青要以官职把彼得大帝的人拉到自己方面去,以加强他的地位。戈洛文本来已是一个御前官,被任命为布良斯克总督。加恩:前书,第35页,注4。关于尼布楚条约后戈洛文的活动,参阅同上书,第52页。

130 参阅注126。

131 参阅注103。

132 参阅注1。

133 参阅注2。

134 戈洛文,符拉索夫和科尔尼次柯伊。参阅注129、127、128。

135 这件事又证实了徐日升所说,他和张诚不只是译员。如果他们只有那样的地位,就不会在这种场合这样尊敬他们。

136 据俄国使团的官方报告,他的名字是安德列·贝洛波茨基(加恩:前书,第Ⅶ—Ⅷ页)。他是一位“波兰绅士,拉丁文翻译家”(加恩:前书,第37页,注2)。张诚说:“俄国人通过他们使团中一位先生来说明他们的见解,这位先生是波兰籍人,曾在克拉科夫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的拉丁文说得十分清楚流利。”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1页。我们以后将看到,徐日升以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137 我们前面已看到,戈洛文的出使是由莫斯科收到了康熙给沙皇的两封信而引起的。这两封信大概和康熙给雅克萨守军的谕旨一齐经雅克萨发出(加恩:前书,第33—35页;刘选民:前文,第411页,注99、103)。这两封信于1685年11月到达莫斯科。戈洛文在1686年年初接到最初的训令(加恩:同上书,第36页,注3;37页;第Ⅰ—Ⅳ页)。甚至在被派赴北京宣布戈洛文来使事的魏牛高和法沃罗夫回到莫斯科带来了康熙的信件(1687年7月)之前,俄国宫廷已决定作进一步的让步,并且向戈洛文发出了新的训令。俄国宫廷对这一切犹认为不足,于1687年年底魏牛高和法沃罗夫回来后,认为中国皇帝可能坚持要在中国举行未来的外交会议,于是又发出一套新的训令给戈洛文,以便应付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又令戈洛文派传达这些最新训令的伊凡·洛吉诺夫,带着抄录了这些最新训令中所说的安排的信件前往北京。1688年7月,戈洛文接到这些训令时,他早已在那一年2月里派科罗文前往北京。科罗文于1688年3月到达中国首都,于4月中离开北京,携带了康熙指定色楞格斯克为会议地点的信件。中国代表团在1688年5月30日启程前往色楞格斯克,但是在7月22日被迫折返,并用一封信把此事通知了戈洛文,这封信在8月1日或2日到达。于是,戈洛文按照伊凡·洛吉诺夫从莫斯科带来给他的训令,于1689年1月派洛吉诺夫到北京去。洛吉诺夫于5月到达北京。康熙丝毫没有不想举行外交会谈的表示,并且指定了尼布楚为谈判地点。(加恩:前书,第37—47页)。因此,徐日升说中国人被迫离开他们的本国,是不完全对的。尽管俄国人愿意在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地点举行谈判,

康熙却选择了尼布楚为会议地点。我们以后看到了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138 在1675年尼古赖出使之前，中国人曾向莫斯科发出过几封信，这从他给理藩院提出的十二点中第一点里看得很清楚：“所有中国人以前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写给俄国宫廷的信，应予译出。今后写信和证明文件，应商定使用一种文字。”（刘选民：前文，第407页）。尼古赖所指的信有一些可能是1670年尼布楚长官阿钦斯基所收到的宁古塔将军的信，抗议哥萨克人的侵扰，要求交出根特木尔。这件事导致了米洛瓦诺夫的出使。（刘选民：前文，第405—407页）。米洛瓦诺夫带回了康熙的又一封信。莫斯科收到了这封信后，又派出了尼古赖使团。甚至在尼古赖出使失败后，中国人仍继续发出信件。1683年，康熙对雅克萨（俄国）守军发出了一道谕旨。（参阅注137）。1686年，当中国在黑龙江上的第二次战役正在全力进行中的时候，康熙通过荷兰使节和闵明我神甫发出致俄国宫廷的又一封信（参阅注88）。在魏牛高和法沃罗夫来中国时，中国皇帝又发出了一些信（参阅注89）。所有这些信中都包括了中国所不满的事项和对俄国侵略黑龙江上的中国领土及对根特木尔事件的抗议。

139 指关于那些不满事项发生了长时间的无益的争辩。

140 这些责任和指示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徐日升从来没有详细吐露过，大概因为那是机密性的。然而，这似乎又证实了这个假定：张诚和徐日升的地位是超出单纯的译员之上的。

141 参阅注139。

142 对于22日和23日所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徐日升和张诚的报道之间稍有出入。张诚在叙述了他和徐日升去见俄国使臣之事后，接着就叙述第一次会议。据他说，俄国人通过他们的拉丁文翻译说明了他们的任务和目的，并要求中国钦差大臣们也说明他们的任务和目的，然后提出他们的第一个提案。中国人拒绝了，要俄国人先提他们的提案。俄国人于是向中国钦差大臣问及他们的全权证书，并愿意把他们自己的全权证书拿出来。这件事中国人也拒绝了，说他们应该相信他的话。俄国人于是把过去的仇怨和争执问题搁起，提出以黑龙江为两国边界。中国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他们说因为在黑龙江彼岸有很多地方是属于中国之地，特别是盛产毛皮的森林。他们提出（超出他们所希望取得的）以色楞格河为分界线，因为他们说自从元朝统治中国时候起，这些地方的居民即向中国纳贡。俄国人也拒绝这个方案。由于天色已晚，会议即休会。照张诚说，中国以尼布楚为界的替代方案是23日提出的。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89—192页。

143 要了解情况，看一看两国代表团所奉到的它们本国君主的训令，是有帮助的。戈洛文所奉的最初训令是1686年年初拟订的，规定边界在黑龙江，或在它的左岸支流比斯特拉河和结雅河，或在雅克萨（加恩：前书，第9、36页，注3；第37页；Ⅱ—V页）。1687年6月发出，戈洛文在9月中收到的第二套训令，授权他可让出雅克萨。1687年10月发出，戈洛文于1688年7月中收到的第三套训令，没有包含领土方面的新让步（加恩：前书，第37—47页）。中国方面的训令载在中国代表团1688年5月离开北京前上皇帝的奏章中，这个奏章经皇帝批准，其一部分内容如下：“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又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

与之画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平定罗刹方略》四，第1页）。1689年6月，第二次使团出发前夕，康熙发出如下训令：“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鄂罗斯则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见《平定罗刹方略》，载《中华边防舆地丛书》，第28—29页。

144 中国钦差大臣因俄国大使的讽刺而生气，关于此事张诚也有记载。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2页。

145 据张诚说，中国代表在这一天提出了以尼布楚为分界线的建议。参阅注142。

146 张诚告诉我们说，中国代表甚至将他们的帐篷拆了，好象他们不愿再和俄国人开会。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2页。

147 这指的是安德列·贝洛波茨基。

148 以敌人对待，包括了要把俄国人在雅克萨周围种的谷物割下。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5页。

149 谈判第一次陷于危局是在21日。参阅《日记》，第23节。

150 这似乎又证明了这个假定：徐日升是以一种比译员身份更为重要虽则是非正式的身份而来的。参阅注135和140。

151 张诚提到在另一件事上中国钦差大臣们也未与两位耶稣会士商量。他报道说，24日，中国钦差大臣们未经和他们商量，提出放弃色楞格斯克和尼布楚，不过徐日升和他都知道这个提案。

152 这一段话似乎证实了巴夫洛夫斯基对于称为“罗刹”的黑龙江上的不法之徒和称为“鄂罗斯”的沙皇的正当臣民所作的区别。这种区别，据他说，是俄国人提出而为中国人所信以为然的。巴夫洛夫斯基：前书，第134—136页。

153 参阅注152。

154 修国纲。参阅注1。

155 参阅《日记》的第1节。

156 参阅注149。

157 即修国纲。参阅注1。

158 关于这场误会，张诚提供了一些详细情况。他说，他和徐日升都知道，中国钦差大臣们没和他们商量，通过了蒙古翻译直接向俄国人提出一些建议。这样做的原因是：（1）中国钦差大臣们不信任两位耶稣会士，因为戈洛文对他们十分友好；（2）他们（中国钦差大臣们）不懂拉丁文（而戈洛文却懂得拉丁文），不知道在耶稣会士和俄国人之间说些什么。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2页。

159 张诚告诉我们说，在他和徐日升去见俄国使臣之前，来了一个俄国信使，要求中国人，如果他们不愿继续举行会议，应写一封信交给他，说明迄今为止曾经做了些什么事情。他说，他愿意也给他们写这样一封信。但是，中国钦差大臣们拒绝了，因为前一天他们自己曾作过同样建议，他们要俄国人先照办。于是，戈洛文建议再开一次会，如果这次会议仍无结果，他们应相互给对方这个信件。中国人拒绝了再开一次会议的建议。应该指出，巴伊科夫和尼古赖也曾要求这样的信件。巴伊科夫由于未能从中国人那里取得这封信，就请求当时在北京的荷兰使团写一封信，证明他到了中国。巴德

雷：前书，第2卷，第156页。尼古赖请求康熙给他这样一封信，他说没有这样一封信，他就不敢回去。在被拒绝之后。他从南怀仁神甫那里取得一封信。鲍斯曼：前书，第196—203页；巴德雷：前书，第404页。

160 据张诚说，康熙曾有训令，交出雅克萨是达成协议的条件。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3页。

161 这张地图大概就是尼古赖的地图的翻版，或者至少是根据那张图制成的。正当戈洛文被任命为全权大使的前后，阿夫瑞尔在莫斯科获得了一份这个地图的复制品。巴德雷：前书，第2卷，第214—215页。

162 张诚说，中国人所提的边界线，在北面是外兴安岭山脉，这个山脉从格尔必齐河发源地向东到达海边；在西面是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不但如此，俄国人不得推进到喀尔喀人的地区，因为中国人认为喀尔喀人是中国的臣民。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3—194页。

163 据张诚说，俄国人反对把喀尔喀人的问题列入和约条款中。他们说，在喀尔喀人的领土被厄鲁特人占领的情况下，不能认为喀尔喀人是中国的臣民。喀尔喀人是俄国人的对头，俄国人要不受中国人的干涉来清算这笔帐。两位耶稣会士回到中国营地后，中国钦差大臣们同意，喀尔喀人的问题可以暂不解决，因为关于此事他们也未奉有训令，但是他们坚持，等到喀尔喀人和厄鲁特人之间恢复和平后，这个问题应予解决。当耶稣会士把这个答复带给俄国人时，俄国人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不愿放弃额尔古纳河以东的所有领土，他们指出中国钦差大臣们最初只要求雅克萨。这个问题不先解决，俄国人就不愿作一个肯定的答复。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4页。

164 加恩：前书，第44页。

165 详见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4—195页。

166 参阅注163，164。

167 参阅注160。

168 参阅注82，85。

169 伊凡·符拉索夫。参阅注48，127，216。

170 据张诚说，中国人渡河是为了部署他们的军队，以便对尼布楚进行封锁。他们还派了军队去封锁雅克萨。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4—195页。据徐日升说，这一决定是在24日作出的。

171 这似乎证实了张诚所说的他们渡河的目的。参阅注168。

172 佟国纲。参阅注1。

173 参阅《日记》，第18节。

174 佟国纲。参阅注1。

175 安德列·贝洛波茨基。参阅注136。

176 据张诚说，俄国使臣派他的翻译来，托名抗议，以恢复谈判。这位翻译暗示，他的长官愿意让出雅克萨，但是因为对他提出的要求太多了，他就采取了什么都不答应的态度。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5页。

177 这又是指安德列·贝洛波茨基。

178 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7页。

179 主要原因是，俄国人可能把渡河之事看作一种敌对行为，因而会影响以后的谈判。

180 徐日升的为难处在于，一方面中国钦差大臣们已经决定要渡河（我们在上文中已看到），他如极力阻止他们这样做，会使他们怀疑他在帮俄国人的忙（关于这种猜疑，参阅注 158）；另一方面，他又不愿赞同他们的决定，那样做就要对渡河及其可能的后果担负责任。参阅注 179。

181 这似乎又证明徐日升不只是一个译员之说。参阅注 135、150。

182 据张诚日记 28 日所记，这一天俄国代表回来说，他们的长官愿意接受以额尔古纳河为边界线，但要保留他们在东岸的居住地。他们还要求派两位耶稣会士到俄国营地去。但是，这个请求被拒绝了。中国钦差大臣们答允等一小时，如果在这个时间之内俄国答复没有送到，他们就要渡河。由于两小时之后，答复未到，他们即开始渡河。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96 页。

183 伊凡·符拉索夫。参阅注 48，127，216。

184 参阅注 183。

185 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96—197 页。

186 关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参阅注 149。

187 参阅注 181。

188 参阅《日记》第 1 节。

189 参阅注 186。

190 对于俄国人竟有这样奇怪的相反看法。徐日升一个为中国办事的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在中国代表团面前，替俄国人辩护说他们是文明的民族，而过去一位俄国派来中国大使尼古赖，则赞扬中国人。乔治·大维神父向他的总会长泰尔苏斯·冈萨雷斯报告 1689 年和尼古赖的一次会谈曾说：“这位先生（尼古赖）相信和约即将订成。如果俄国人象中国人那样文明，和约早已订成。他对中国人称颂备至。”鲍斯曼：前书，第 220 页。

191 参阅注 2。

192 引喻圣经上《使徒行传》26，14。

193 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97 页。

194 同上书。第 194 页。

195 *Novo Descobrimento do gram Cathayo, ou Reinos de Tibet, pello Padre Antonio de Andrade da Companhia de Iesu, Portuguez, no Anno de 1624* (Lisboa 1626). Sommervogel, *Bibliothèque*..., I, 329.

196 关于蒙古人对喇嘛和达赖喇嘛的尊敬，更详细的情况可参阅汤若望：*Historica Relatio*..., 载《汤若望函牍和回忆录集》(Lettres et Memoires d'Adam Schall, S.J.)，第 220—221 页。

197 据张诚说，俄国人的提案是：(1) 在今后所有信件中，(俄国)大公爵的名号须全写出来或加以简缩，应和中国皇帝平等；(2) 今后对俄国大使应尊敬相待，不得轻侮，允许他们向皇帝呈递国书，并在他们的住所和朝廷上享有自由；(3) 两国之间应自由贸易，不受限制。荷尔德：《详志》，第 4 卷，第 197—198 页。

198 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4、197页。

199 诺兹(Noz)山，在张诚日记中称为 Tschuktchoi (Jugjur) Noss，为外兴安岭的东北山脉。据张诚说，俄国人曾遣人来问，两段山脉中是以南段还是以北段为界。这些山都称为“诺兹山”。中国钦差大臣们说是北段。在这两个山脉之间有一块平原(乌得河河谷)，在那里可捕得最好的黑貂和品种优良的鱼。俄国代表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全权大臣对此是不会同意的。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8页。又参阅地图。

200 据张诚说，2日所发生的事情如下：起初俄国人没有派人来，这使得中国钦差大臣们很窘，并产生了顾虑，怕因为要求过分，致使谈判前途发生危险。他们召开一个会议商讨，在会上两位耶稣会士对他们说，他们认为俄国人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中国钦差大臣们要派两位耶稣会士到俄营去，提议将所争的两山脉之间之地，即乌得河河谷，由两国平分。中国人仍认为这些地方是属于他们的国家的。在两位耶稣会士出发去俄营之前，俄方的代表带着一份用拉丁文写的抗议书来了。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198—199页。

201 在条约的俄文本中，这个名词一再出现，中文本中把它译为“大圣皇帝”。福克斯：《中俄条约…》，第592—595。

202 注意一下徐日升在这件事上谨小慎微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他(与其耶稣会士一道)却毫不犹豫地“神圣的”尊号加给分裂派的俄国沙皇。

203 所争的领土不仅是乌得河河谷(虽则这是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且还有沿海长达八百葡萄牙“里格”的平原，往北一直到北纬75度。

204 关于曾陷于危局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谈判，参阅注149、186。

205 据张诚说，经商定，所争之地(乌得河河谷等)留待以后再解决。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200页。

206 这个提案中主要之点是关于雅克萨的。俄国人要在条约中规定，雅克萨永远不得重建。中国人拒绝同意，虽则他们并无重建雅克萨之意。荷尔德：同上书。

207 张诚说，俄国人要在他们这一天拿给他看的草案中改几个字。荷尔德：同上书。

208 安德列·贝洛波茨基。参阅注136。

209 张诚说，6日他和贝洛波茨基将最后草案完成，并且商定了条约应如何签字、盖印和宣誓的方式。荷尔德：同上书。

210 据张诚说，康熙曾令中国钦差大臣们按照天主教的誓词宣誓。他们已准备好了誓词。但是，俄国人对此提出异议。荷尔德：同上书，第203页。

211 参阅注209。

212 伊凡·符拉索夫。

213 安德列·贝洛波茨基。

214 要求中国钦差大臣们再稍忍耐一些时候。

215 关于签字情况，参阅荷尔德：前书，第202—203页。

216 签约人的姓名头衔最好可从条约序言部分中看到：“中国大皇帝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内大臣一等公都统舅舅佟国纲，都统郎谈，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马喇，理藩院侍郎温达；俄罗斯国统治大俄

小俄白俄暨东、西、北各方疆土世袭独裁天祐君主约翰·阿列克歇耶维奇及彼得·阿列克歇耶维奇钦差勃良斯克总督御前大臣费岳多·阿列克歇耶维奇·柯罗文(即戈洛文——译者),伊拉脱穆斯克总督约翰·鄂斯塔斐耶维奇·乌拉索夫,总主教谢门·克尔尼次克”。(以上录自《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见《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译者)。

217 据琴勒说,这里所指的房舍是1655年建立的阿根斯克(Argunsk)城堡的房舍。

218 俄国人交给中国人的两份约本,一份是拉丁文的,另一份是俄文的;中国人交给俄国人的两份约本,一份是汉文的,另一份则是满文的。刘选民:前文,第422、438—440页;福克斯:前书,第548页;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203页。

219 指双方君主和签约人的签字次序。

220 参阅注198。

221 据张诚说,7日即派了一个代表团去雅克萨将条约公布,因为那个地方须拆毁。戈洛文应耶稣会士的请求释放了两名索伦俘虏。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204页。

222 参阅注108。

223 张诚也提到这些事。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205—206页。

224 据张诚说,两位耶稣会士在拜访戈洛文时也和他互赠礼物。他们还拜访了格拉索夫,还有一位德国上校,他是一个好天主教徒,正在患病,希望作忏悔。但是,由于两位耶稣会士不懂德文,他们就给他行了忏悔式。荷尔德:同上书。

225 在1690年阴历新年,康熙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陈复光:《1689年以来的中俄外交关系》,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4期,第508页。这些信使极可能把张诚关于订约的中国事务信件带到了在北京的耶稣会士。《耶稣会罗马档案》,日本—中国164, f. 178。

226 张诚告诉我们,这个人 是车臣汗。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208页。

227 参阅注29。

228 参阅注27。

229 参阅注10。

230 这是在10月22日。荷尔德:《详志》,第4卷,第215—216页。

附录一 十七世纪乌拉尔—阿 尔泰区的诸民族

(这个表中所列的民族、部族,除满族和蒙古族的诸部族外,大部分在汉文中都无一定译名,或有习惯译名,但限于译者知识,无法查考,只能姑从音译。下表中,各民族、部族译名,除属满族和蒙古族系统者外,都加注原文,以便读者查考。——译者)

(一) 芬兰—尤格利亚系(The Finno-Ugrian Division)

A. 芬兰族(The Finns)

a. 西芬兰人或波罗的海芬兰人

- a. 卡累利人(Karelians)
- b. 其他西芬兰人
 1. 维斯巴人(Vespas)
 2. 伏特人(Votes)
 3. 爱沙尼亚人(Esthonians)
 4. 利沃尼亚人(Livonians)

c. 拉普人(Lapps)

b. 东芬兰人或卡玛(Kama)芬兰人

- a. 佩里亚克人(Peryaks)
- b. 季里亚人(Zirians)
- c. 伏特雅克人(Votjaks)
- d. 伏尔加族或布尔加族(Bulgar group)
 1. 莫尔德文人(Mordvins)
 2. 切雷米斯人(Cheremisses)
 3. 楚瓦什人(Chuvashes)

居 住 地

B. 尤格利亚人(或称尤格拉斯人) (Ugrians, Yugras 或 Iougras)

在鄂毕河下游和额尔齐斯河流域,其北为萨摩吉人(Samojeds),南面是鞑靼人,西面是乌拉尔山脉,东面是纳第姆(Nadim)河。

a. 尤格利亚—奥斯第雅克人 (Ugrian Ostiaks)

在托波尔斯克和托木斯克地区,沿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康达河和弗秀干(Vsyugan)河。

b. 伏格爾人(Voguls)

烏拉爾山的兩邊，但大部分在烏拉爾山和鄂畢河，額爾齊斯河和塔夫達河之間

c. 馬扎爾人(匈牙利人)
(Magyars)

(二) 薩摩吉系(Samojed)

a. 尤拉克人(Yuraks)

歐洲俄國和亞洲俄國的北部沿海一帶，自白海至哈坦加(Khatanga)河；和北自北冰洋、南至薩彥嶺。他們的主要居住地是苔原地帶(The Tundra)。

b. 塔夫吉斯人(Tavghis)

自白海沿岸至葉尼塞河。他們的主要中心在奧布多爾斯克(Obdorsk)附近。在太梅爾半島尤拉克人之東，從葉尼塞河直到哈坦加河。

c. 奧斯第雅克—薩摩吉人
(Ostiak Samoeds)

在前二者之南，托波爾斯克和葉尼塞斯克森林地帶(北緯60度，東經80度和90度之間)。

d. 南薩摩吉人的分支部族
(鬆散了的)

1. 蘇約特人(Soyotes 或 Soyones)

阿爾泰山脈和薩彥嶺之間，自科布多至科索果爾湖(Lake Kossogol)

2. 卡拉加斯人(Karagases)

沿薩彥嶺北坡

3. 摩他人(Mortars)

在卡拉加斯人之北。

4. 卡馬辛人(Kamassins)

在葉尼塞斯克的坎斯克地區的摩他人之北。

5. 科伊巴爾人(Khoibals)

葉尼塞河上游沿岸。

6. 貝爾特人(Beltirs)

阿巴根草原。

(三) 通古斯系(Tungus)

A. 北支或西伯利亞支

a. 察波吉爾人(Chapogir)

下通古斯卡河和中通古斯卡河之間的地區

b. 拉穆特人(Lamut)

斯塔諾夫山脈以北，查翁灣和阿納得爾河之間，及科累馬和維爾霍揚斯克地區。

c. 俄樂春人(Orochon)

自貝加爾湖之北，向東至奧爾多(Oldoi)河和結雅河(黑龍江的兩條向北的支流)之間的黑龍江流域地帶。他們沒有分布到黑龍江。

d. 馬尼吉爾人(Manegir)

在奧爾多河和結雅河之間的黑龍江右岸的俄樂春人之北。他們是畢喇兒人的一個部族。

- | | |
|-------------------|---|
| e. 毕喇儿人(Birar) | 布列亚河及其支流的流域直到大约北纬52度。 |
| f. 基尔人(Kile) | 在毕喇儿人以东, 乌尔米(Urmi)河和库尔(Kur)河(黑龙江的两条向北的支流)之间。他们没有分布到黑龙江。 |
| g. 聂格达人(Negda) | 沿阿姆贡河到该河与黑龙江汇合处。 |
| h. 萨纳吉尔人(Sanagir) | 沿果临(Gorin)河上游和中游, 向西北延伸到欧伏容(Ovoron)湖。 |
| i. 欧尔察人(Olcha) | 在萨纳吉尔人以东, 自果临河到海岸的黑龙江的两岸。 |
| j. 欧罗克人(Oroke) | 库页岛北半部。 |
- B. 南支或满洲支
- | | |
|-----------------|---------------------------|
| a. 达呼尔人 | 沿黑龙江向东直达结雅河。 |
| b. 女真人(Ducher)* | 自结雅河口沿黑龙江至乌苏里江以东约四日旅程的地方。 |
| c. 阿枪人 | 沿黑龙江下游, 在女真人以东。 |
| d. 奇勒尔人 | 黑龙江三角洲附近。 |
| e. 索伦人 | 沿齐齐哈尔以北的嫩江。 |
| f. 满人 | 东北地区。 |
| g. 古尔第人(Goldi) | 沿松花江和乌苏里江。 |
| h. 鄂伦春人 | 乌苏里江以东 |

(四) 蒙古系

A. 东蒙古人

1. 察哈尔人
2. 蒙古人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和苏木*

- a. 哲里木盟: 十旗二百零四苏木

(1) 科尔沁
六旗

(2) 扎赉特
一旗

(3) 杜尔伯特
一旗

这四种部族住在西喇木伦河(鄂尔罗斯), 归勒里河(科尔沁), 嫩江(扎赉特), 哈达汉河(杜尔伯特)沿岸。

* “Ducher”一名是俄国哥萨克人文书里对满洲的称谓, 不过是“女真”一名的音变。……耶稣会士旅行家之一的布朗尔指出“俄国人称满洲人为Ducher”。见扎尔金特:《契丹及其族属》, 载《民族史译文集》,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62页。

* 苏木(Sumum)为行政单位, 等于“区”, 也可作为军事单位, 等于“连”。——译者

- (4) 郭尔罗斯
二旗
- b. 卓索图盟:
五旗,二百二十三苏木
- (1) 喀喇沁
三旗
喀喇沁部居喜峰口外,他们的主要城市为察罕苏巴尔汉城。
- (2) 土默特
二旗
土默特部居于喀喇沁部之东,在长城和柳条边之间。
- c. 昭乌达盟:
十一旗,二百九十八苏木
- (1) 敖汉
一旗
在土默特部的东北,纳拉第(Narat-i)河沿岸。主要地方为察罕郭尔村。
- (2) 奈曼
一旗
在敖汉部之北,西喇木伦河南岸多碧尔塔拉一带。
- (3) 翁牛特
二旗
古北口以北,英金河沿岸。
- (4) 巴林
二旗
在翁牛特部之北,西喇木伦河北岸,喀喇木伦河沿岸。
- (5) 克什克腾
一旗
在巴林部之东南。
- (6) 扎噜特
在老哈河流入西喇木伦河处附近。
- (7) 阿鲁喀沁
在扎噜特之北,阿鲁昆杜伦河沿岸。
- (8) 喀尔喀左翼
- d. 锡林郭勒盟:
十旗,一百一十一苏木
- (1) 乌珠穆沁
二旗
在巴林部的西北,主要在和鲁尔河沿岸。
- (2) 阿巴哈纳尔
二旗
在乌珠穆沁部的西南,主要在达尔湖沿岸。
- (3) 浩齐特
在阿巴哈纳尔部之北,乌珠穆沁部之西,鸡林河沿岸。
- (4) 苏尼特
二旗
在阿巴哈纳尔部的西北,库尔察罕湖一带。
- (5) 阿巴噶
二旗
在苏尼特之西和西南一些湖泊、池沼的周围,其中最南的湖泊是盍苏湖。
- e. 乌兰察布盟:
六旗,六十二苏木
- (1) 四子部落
一旗
在锡林郭勒盟之西和西南,翁衮山(Onggon alin)一带。

- (2) 茂明安
一旗
- (3) 乌喇特
三旗
- (4) 喀尔喀
(1653年自土谢图汗分出)
一旗
- f. 依克昭盟:
七旗,二百七十四苏木
- (1) 鄂尔多斯
七旗
3. 喀尔喀蒙古人
这些喀尔喀蒙古人分为四个爱玛克和八十七旗。
- a. 扎萨克图汗的爱玛克
阿尔泰山以东,色楞格河,鄂勒昆河和土拉河沿岸。
- b. 土谢图汗的爱玛克
在扎萨克图汗之东,直到肯特山。
- c. 车臣汗的爱玛克
在土谢图汗领土之东,沿克鲁伦河到该河流入达尔湖处,再过去到索伦河。
- d. 三音诺颜汗的爱玛克
1725年由土谢图汗爱玛克的一些部分所建立。
4. 布里亚特蒙古人
- a. 西布里亚特人
贝加尔湖以西。他们分成四支小部族。
- b. 东布里亚特人
贝加尔湖以东,大部分在乌达河和敖嫩河沿岸。
- c. 巴尔和布里亚特人
在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之间的巴尔和地区。
- B. 西蒙古人
(即厄鲁特、喀尔木克人)
1. 和硕特
阿尔泰山脉以西。
2. 土尔扈特
在顾实汗(死于1656年)和他的后继者统治下,他们曾帮助达赖喇嘛,并在青海地区定居下来。
3. 绰罗斯
在准噶尔的压迫下,移居到伏尔加河,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
- a. 准噶尔
他们逐渐统治了其他部族。居住在阿尔泰山脉以西的科布多和东土耳其斯坦,以及天山东部和戈壁的南疆。

b. 杜尔伯特

c. 辉特

和硕特、土尔扈特、准噶尔和杜尔伯特的联盟称为卫拉特或四卫拉特，明朝时中国人称之为瓦喇或卫喇，都是卫拉特的变音。

(五) 土耳其系

A. 西伯利亚土耳其人

a. 东支

雅库特人(Iakut)

b. 中支或阿尔泰支

1. 阿尔泰人(Altaians)

2. 黑森林鞑靼人(Black Forest Tartars)

3. 库曼德人(Kumandins)

4. 雷贝德鞑靼人(Lebed Tartars)

5. 肖尔人(Shors)

6. 台柳特人(Teleuts)

7. 萨盖人(Sagais)

8. 卡钦人(Kachins)

9. 基济尔人(Kyzyls)

10. 丘利姆鞑靼人(Tartars of the Chulim)

c. 西支

1. 巴拉巴鞑靼人(Baraba Tartars)

2. 塔拉鞑靼人(Tara Tartars)

3. 托波尔鞑靼人(Tobol Tartars)

4. 秋明鞑靼人(Tiumen Tartars)

B. 中亚土耳其人

a. 东支

达兰其人(Taranchis)

b. 西支

1. 哈萨克人(Qazaq)

2. 吉尔吉斯人(Qirghiz)

3. 卡拉-吉尔吉斯人(Qara-Qirghiz)

4. 卡拉-卡尔帕克人(Qara-Kalpaks)

5. 土克曼人(Turkmen)

6. 塔吉克人(Tadjiks)

7. 萨尔特人(Sarts)

8. 吉普察克人(Kipchaks)

9. 库拉马人(Kuramas)

10. 乌兹别克人(Uzbeks)

C. 伏尔加土耳其人(Volga Turks)

1. 喀山土耳其人(Kazan Turks)
2. 阿斯特拉罕土耳其人(Astrahan Turks)
3. 巴什基尔人(Bashkirs)
4. 楚瓦什人(Chuvashes)
5. 梅施切尔人(Meschchers)
6. 台普特人(Tepters)

D. 黑海土耳其人

- a. 诺盖人(Nogais)
- b. 高加索土耳其人(Caucasian Turks)
 1. 库木克人(Kumuks)
 2. 卡拉柴人(Karachais)
- c. 克里木土耳其人(Crimean Turks)

E. 西土耳其人

- a. 波斯土耳其人(Persian Turks)
- b. 奥托曼或奥斯曼利土耳其人(Ottoman or Osmanli Turks)

附录二 汉英人名译名对照表

(按姓氏第一字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A

阿巴哈 Abaya
阿巴斯 Abbas
阿布林, 塞特库尔 Ablin, Setkul
阿克特 Akhte
阿尔巴扎 Albaza
阿尔巴金 Albaju
阿尔比切夫, 彼得 Albitchev, Peter
阿夫瑞尔, 菲利普 Avril, Philip
阿玉奇 Ayuki
阿塞林 Ascillin
阿鲁台 Aruytai
阿尚博 Archambaud
阿尔钦斯基, 丹尼尔 Archinsky, Daniel
阿尔布奎克, 阿尔芳斯·德 Albuquerque, Alfonso de
阿鲁浑 Aryun
阿尔楚—博洛德 Alcü-Bolod
阿里刚布 Alegambe
阿勒坦 Altyn
阿德尔撒纳 Amursana
安德拉德, 安东尼奥·德 Andrade, Antonio de
安德拉德, 佩雷兹·德 Andrade, Perez de
安德鲁 Andrew
安尼卡 Anika
安东尼·托马斯 Anthony Thomas

俺达汗 Altan (Anda) Qan
奥利伐, 约翰·保罗 Oliva, John Paul
奥金斯基, 马丁 Oginski, Martin
奥斯特曼 Osterman
奥柯尔科夫, 伊凡 Okolkov, Ivan
奥列宁, 瓦西里·季莫费维奇 Olenin, Vasili Timofievich
奥格洛布林 Ogloblin
奥布科夫, 拉弗兰提 Obukov, Lavrenti
艾尔贝克 Elbek
艾杰斯, 埃弗拉德·伊斯布兰德 Ides, Everard Ysbrand
艾尔杰吉台 Eljigidei
艾莱茨基, 安德列 Eletsky, Andrei
艾狄杰 Ediger (Yadigar)
艾斯特里克斯, 吉尔斯 Estrix, Gilles

B

巴宁 Panin
巴多明 Parrenin
巴什可夫, 阿法纳赛 Pashkov, Afanasei
巴夫洛夫斯基 Pavlovsky
巴德雷, 约翰 Baddeley, John
巴伊科夫, 西奥多·伊萨可维奇 Baikov, Theodore Isakovich
巴赫鲁欣 Bakhrushin
巴图尔琿台吉 Batur qung-tayiji
巴纳比, 路易斯 Barnabe, Louis

巴西尔 Basil
别克托夫,彼得 Beketov, Peter
彼得一世 Peter I
彼特里洛夫斯基, 阿提美·菲利波维奇
Petrilovsky, Artemei Philippovich
彼特罗夫,伊凡 Petrov, Ivan
彼特罗夫,托米尔科 Peirov, Tomilko
贝洛波茨基,安德列 Belobotskii, André
波利亚可夫 Polyakov
波哈博夫 Pokhabov
波萨特里 Posateri
波达波夫 Potapov
波雅科夫,瓦西里 Poyarkov, Vasili
波菲利耶夫,马克西木 Perfiliev, Maxim
波菲利耶夫,伊凡 Perfiliev, Ivan
波菲利耶夫,瓦西里 Perfiliev, Vasili
布列夫登特 Brevedent
布卡诺夫 Bukanov
布尔朔弗斯科伊,西密昂 Bolshovskoy, Simeon

拔都汗 Batu Qan
博狄拉赫可汗 Bodialay Qayan
薄贤士 Beauvossier
白晋 Bouvet, Joachim
班涅狄克特 Benedict
本雅失里 Bunašri (Oljei-Tëmur)
拜顿 Beiton

C

成吉思汗 Činggis Qan
车尼哥夫斯基, 尼基福·罗曼诺夫
Chernigovskiy, Nikifor Romanov
车臣汗 Sečen Qan
策旺阿拉布坦 Tsewang Araptan

D

达鲁廷 Tarutin

达赖汗 Dalai Qan
达纳耶夫 Danayev
达尔扎 Dalja
达瓦齐 Davatsi
达延汗 Dayan Qan
答里巴 Delbek
德·伽马,瓦斯科 de Gama, Vasco
戴维,乔治 David, George
德·罗德,亚历山大 de Rhodes, Alexander
德·贝宰 de Bèze
德·诺耶尔 de Noyelle
狄亚斯·巴索洛缪夫 Diaz, Batholomew
迪斯台尔,伯纳德 Diestel, Bernard
多维尔叶 d'Orville
铎罗,查理·梅拉德 Tournon, Charles Maillardde
杜本斯基,安德列 Dubensky, Andrei
杜因,劳伦斯·凡 Duyne, Lawrence van

F

法沃罗夫,伊凡 Favorov, Ivan
伏林斯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Volinsky, Vasili Vasilievich
伏龙可夫 Voronkov
伏塔,查理·毛里斯 Vota, Charles Maurice
伏伊可夫,费多尔·德美谢维奇 Voikov, Fedor Demesevich
符拉索夫,伊凡 Vlasov, Ivan
菲奥多 Fiodor
菲尔索夫,迪米特里 Firsov, Dimitri
菲利普 Philip
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菲利普齐,弗朗西斯十世 Filippucci, Francis X
斐迪南三世 Ferdinand III

福克斯, 瓦尔特 Fuchs, Walter

G

格雷察宁 Grechanin

格雷戈里 Gregory

格老秀斯, 雨果 Grotius, Hugo

格鲁白, 约翰 Grueber, John

噶尔丹策零 Galdan Tsereng

哥斯达-佩雷拉 Costa-Pereira

顾实汗 Guši Qan

根特木尔 Ghantimur

戈斯, 本多·德 Goes, Bento de

戈洛文, 费要多罗·阿列克塞维奇 Golovin, Theodore Alexeevich

戈洛文, 彼得·彼特罗维奇 Golovin, Peter Petrovich

冈萨雷斯, 泰尔苏斯 Gonzalez, Thyrsus

鬼力赤 Ügechi (Ökächi)

究弼里克 Gün-bilig-mergen-Jinong

H

呼图克图 Quturytu

赫利普诺夫, 雅可夫 Khripunov, Yakov

荷尔德, 迪 Halde, J. B. du

J

加尔金, 伊凡 Galkin, Ivan

加恩, 加斯頓 Cahen, Gaston

加比亚尼, 多明尼克 Gabiani, Dominic

加利斯齐尼 Galistsine

K

克里桑尼奇 Krizanich

克卢白 Kluber

克拉维约 Clavijo

克莱门特 Clement

科罗文, 斯蒂芬 Korovin, Stephen

科列斯尼可夫 Kolesnikov

科尔萨科夫 Korsakov

科尔尼次柯伊, 西蒙 Kornitskoy, Simeon

科罗斯托维茨 (旧译: 廓索维慈) Korostovets

科斯马斯 Cosmas

科林斯 Collins

库程汗 Kuchun Qan

库尼津, 伊凡 Kunitsin, Ivan

库拉金, 伊凡·西蒙诺维奇 Kurakin, Ivan Semonovich

库尔布斯基, 塞密昂 Kurbsky, Semyon

库普累 Couplet

凯马其 Qaimaqit

孔哈, 佐奥·衣斯·达 Cunha, D. João Nones da

喀德琳二世 Catherine II

卡布拉尔 Cabral

L

拉夫开 Lavkai

林丹汗 Legdan Qan

莱布尼次 Leibnitz

利奥波德一世 Leopold I

利玛窦 Matthew Ricci

列昂捷夫 Leontiev

里高第 Rigordi

李维叶 Rivier

洛布德桑 Lobdzan

洛吉诺夫, 伊凡 Loginov, Ivan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 Lobanov-Rostovsky

罗曼诺夫, 帕特里阿奇·菲拉雷 Romanov, Patriarch Philaret

罗曼诺夫, 迈克尔 Romanov, Michael

罗斯 Roth

骆入禄 Rodrigues, Francisco

兰格,洛伦茨 Lange, Lorenz

拉古辛斯基, 萨瓦·符拉迪斯拉维奇
Ragushinsky, Sava Vladislavich

莱许卫尔特, 杰拉德·阿诺德 Ryche-
waert, Gerald Arnold

鲁洛, 弗兰西斯 Rouleau, Francis

陆卡 Luka

雷施辛斯基 Leszczynski

M

马哈木 Ma-ha-mu

马梅路克 Mameluck

马梅特库尔 Mametkul

马里努斯 Marinus

马克 Mark

马毛斯, 尼古拉 Marmunth, Nicolas

马提尼, 马丁 Martini, Martin

马丁, 西苗 Martins, Simão

马西努瓦 Masinoi

马沙, 艾萨克 Massa, Issac

马修 Matthew

马克西木 Maxim

马克西莫夫 Maximov

马亚尔 Mayar

米哈伊洛维奇, 阿列克赛 Michai-
lovich, Alexei

米登道夫 Middendorf

米亚特列夫 Miatlev

米洛瓦诺夫, 伊格纳提 Milovanov,
Ignati

穆拉维约夫 Muraviev

莫斯科维丁 Moskvitin

缪勒 Muller

蒙多夫, 昂德鲁什卡 Mundov, On-
drushka

曼苏罗夫, 伊凡 Mansurov, Ivan

冈明我 Philip Grimaldi

N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纳盖-帖木尔 Nagai-Tëmür

纳吉巴 Nagibar

涅维尔斯科依 Nevelskoy

尼古赖 Spathar, Nicolai Gavrilovich

尼克尔, 戈斯文 Nickel, Goswin

尼塞尔罗德 Nisselrod

聂伐 Nivard

聂韦罗夫, 斯蒂芬 Nevierov, Stephen

诺格拉伊拉, 弗朗西斯科 Nogueira,
Francisco

诺瓦叶, 查理·德 Noyelle, Charles de

努尔哈赤 Nurxaci

努斯鲍姆, 阿瑟 Nussbaum, Arthur

P

裴来斯特罗, 拉斐尔 Parestello, Ra-
phael

佩雷斯, 托美 Peres, Tomé

佩特林, 伊凡 Petlin, Ivan

普什金, 费奥多 Pushkin, Feodor

Q

切列梅捷夫, 博里斯 Cheremetev, Bo-
ris

切齐金, 特列提亚克·叶莫拉耶维奇

Chechigin, Tretiak Yermolaevich

齐哥尔斯基, 康士坦丁·苏来曼·叙里

Zigorski, Constantine Suleiman
Syri

S

斯克瑞皮琴, 西奥多·伊萨维奇 Skry-
pitsyn, Theodore Isavich

斯文赫定 Sven Hedin

斯塔可夫, 瓦西里 Starkov, Vasili

斯捷帕诺夫, 奥努弗赖 Stepanov,

Onufrei

斯蒂芬 Stephen
 斯多勒 Storer
 斯特罗哥诺夫 Strogonov
 斯皮里迪昂 Spiridion
 施保, 托马斯·伊格内修斯·杜宁
 Szpot, Thomas Ignatius Dunin
 苏阿瑞兹 Suarez
 索尔斯, 约瑟夫 Soares, Joseph
 索别斯基, 约翰 Sobiesky, John
 沙尔虎达 Sarhuda
 萨尔丹哈, 曼纽尔·德 Saldanha,
 Manuel de
 萨扎诺夫 Sazanov
 萨韦列夫 Saveliev
 术赤 Joči
 舒赫 Schuch
 舒金, 瓦西里 Shchukin, Vasili
 骚马, 拉班 Sauma, Rabban
 圣伊格内修斯 St. Ignatius
 僧格 Senga

T

特尔皮洛斯基 Terpilowski
 特兰斯别可夫, 迪米特里·安德列维奇
 Transbekov, Dimitri Andrevich
 妥欢贴睦尔 Toyon-Temür
 脱脱不花 Tai-ssong
 托勒密 Ptolemy
 托尔布辛, 拉里昂 Tolbuzin, Larion
 图美涅次, 瓦西里 Tumeneis, Vasili
 图哈切夫斯基, 雅可夫 Tukhachevsky,
 Yakov
 帖木儿 Tamerlane
 汤若望 Bell, Adam Schall von
 唐·卡洛斯 Don Carlos

W

维提塞夫, 瓦西里 Vitisev, Vasili

维多利亚 Victoria
 维达尔 Vidal
 维洛特 Villote
 维瑙尔特 Venault
 威特 Witte
 魏牛高 Venyukov, Nikefor
 瓦西里耶夫 Vasiliev
 完泽笃汗(完者都) Öljeitü
 斡朵里 Odoric
 窝阔台 Ögödei

X

西普里安 Cyprian
 西奥多 Theodore
 西蒙 Simon
 西莫非奥夫, 迪米特里·伊凡诺维奇
 Simofiov, Dimitri Ivanovich
 喜大教 Giampriamo
 希波利托, 狄西德里 Hippolito, De-
 sideri
 昔班 Šiban
 谢兹 Chaize, la
 谢佐 Chezaud
 徐日升 Thomas Pereira
 叙里 Syri

Y

雅可比 Jacobi
 雅卡 Jaka
 雅可布 Jakob
 雅可夫列娃, 普拉斯科维亚·提卓诺夫
 娜 Yakovleva, Praskovia Ticho-
 novna
 亚历克西斯 Alexis
 亚里什金·彼得 Yarishkin, Peter
 伊丽莎白 Elisabeth
 伊兹玛依洛夫, 列昂·瓦西里耶维奇
 Ismailov, Leon Vasilievich
 伊凡诺维奇 Ivanovich

伊凡诺夫 Ivanov
也先 Esen
耶尔马克 Yermak
叶赫诺拉 Yehonola
英诺森 Innocent

Z

扎萨克图汗 Jasaytu Qan
扎巴洛茨基 Zabalotsky
扎波尔斯基 Zapolski
张诚 Francis Gerbillon

附录三 汉英地名译名对照表

(按地名第一字汉语拼音顺序排列。译名一般以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地名手册》和《世界地图集》为依据,并参考了原著附录的译名表及其他有关书籍。凡无法查考暂从音译的,都在译名前加注*号。)

A

阿巴根山脉 Abakan Mts.
 阿巴次基 Abatskii
 *阿枪斯克 Achansk
 阿克 Acre
 阿格拉 Agra
 阿尔丹河 Aldan R.
 阿勒颇 Allepo
 阿姆贡河 Amgun R.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阿穆尔河(黑龙江) Amur R. (Sagalien ula)
 阿纳得尔河 Anadyr R.
 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昌吉) Archangelsk
 阿斯特拉罕 Astrahan
 安加拉河 Angara R.
 埃尔祖鲁姆 Erzerum
 埃里温 Eriwan
 *艾立特河 Islet R.
 *奥布萨湖 Obsa-nurr
 奥卡河 Oka R.
 *奥尔多河 Oldoi R.
 奥廖克马河 Olekma R.
 奥廖尔 Orel
 *奥斯特罗诺夫耶 Ostronovje
 敖嫩河(斡难河) Onon R.

B

巴格达 Bagdad
 巴拉甘斯克 Balagansk
 巴尔喀什湖 Balkhash, Lake
 巴拉巴 Baraba
 巴图亚 Padua
 巴尔加 Barga
 巴斯拉 Basra
 *巴尔古津 Barguzin
 白海 White Sea
 布哈拉 Bokhara
 布腊加 Braga
 布拉次克 Bratsk
 *布里安达河 Brianda R.
 布列亚河 Bureya R.
 布列亚山脉 Bureya Mts.
 布良斯克 Briansk
 *贝雷佐夫 Berezov
 贝加尔湖 Baikal, Lake
 彼尔姆 Perm
 伯朝拉河 Pechora R.
 *波里河 Pori R.
 波尔德诺内 Pordenone
 波尔塔瓦 Poltava
 波多利亚 Podolia
 波的尼亚湾 Bothnia, Gulf of
 *拜朱 Baiju

本德阿巴斯 Bander-Abbas

*比斯马河 Pisma R.

比斯特拉河 Bistra R.

冰海 Frozen Sea

C

查翁湾 Chaun Bay

楚索瓦亚河 Chussovaya R.

D

大不里士 Tabriz

*达法 Dafar

达赖湖 Dalai Lake

达累斯萨拉姆 Dares Salaam

道里亚 Dauria

第乌 Diu

*多隆斯克 Dolonsk

多隆萨河 Dolonsa R.

顿河 Don R.

德维纳河 Dvina R.

E

额尔古纳河 Argun R.

额尔齐斯河(也儿的石河) Irtysh R.

鄂勒昆河 Orhon R.

鄂努和 Onuhu

鄂霍次克海 Okhotsk, Sea of

鄂毕河 Ob R.

*鄂毕多斯克(今萨列哈尔德) Obdorsk
(今 Salekhard)

厄姆巴河 Emba R.

F

弗里敦 Freetown

*弗秀干河 Vsyugan R.

弗兰德尔 Flanders

伏尔加河 Volga R.

G

*戈诺马河 Gonoma R.

格尔必齐河 Gorbitza R.

格罗德诺 Grodno

*格齐木尔托斯基 Grzymultowsky

*果临河 Gorin R.

*古阿里桑卡 Guari Sankar

H

哈坦加河 Khatanga R.

哈勒姆 Haarlem

汉萨 Hansa

霍木兹海峡 Ormuz (Hormuz),
Straits of

J

加德满都 Katmandu

加拉兹 Galate (Galatz)

结雅河(精奇里河) Zeya R.

捷烈克 Terek

基发 Khiva

金帐汗国 Golden Horde

K

开普敦 Capetown

坎斯克 Kansk

卡马河 Kama R.

卡拉奇 Karachi

卡希河 Kas R.

克鲁伦河 Kerülen R.

克特河 Ket R.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Krasnoiarsk

克拉科夫 Cracovic (Cracow)

喀喇和林 Qara Qorum (Kara ko-
rum)

喀山 Kazan

堪察加 Kamchaka

科因布拉 Coimbra

科布多 Khobdo
科累马 Kolyma
科索吉尔斯基 Kossogirski
康达河 Konda R.
*康多马河 Kondoma R.
库马拉河(呼马尔河) Kumara R.
*库马斯克 Kumarsk
库页岛(萨哈林岛) Shakhalin
*库尔河 Kur R.
库苏泊 Lake Kossogol
库兹涅次克 Kuznetsk
肯特山 Kenter, Mount

L

拉合尔 Lahore
勒拿河 Lena R.
兰柏克(利沃夫) Lemberg (Lwow,
Lvov)
*卢布鲁克 Rubruck
卢昂 Rouen
卢布林 Lublin
*郎久莫 Longjumeau
*雷本斯科耶(雷勃诺耶) Rybenskoi
(Rybnoi)

M

马德拉 Madeira
*马加塞亚 Magaseia
马拉巴尔 Malabar
马六甲 Malacca
马里格诺利 Marignolli
马萨瓦 Massava (Massawa)
毛里塔尼亚 Mauretania
墨西拿 Messina
*米坦 Mitán
*蒙得可维诺 Montecorvino

N

南锡 Nancy

纳雷姆 Narym
纳得姆河 Nadim R.
*瑙恩河 Naun R.
*涅尔查河 Nercha R.
涅尔琴斯克(尼布楚) Nerchinsk
诺夫哥罗德 Novgorod
诺沃塞斯克 Novo Zeisk
*尼斯塔德(乌西考蓬基) Nystad(Uu-
sikuupunki)

O

*欧伏容湖 Ovoron, Lake

P

*佩利姆 Pelym

Q

秋明 Tiumen
琴斯克 Chinsk
启儿活河 Khilok R.

S

撒马尔罕 Samarkhand
沙莱 Saray
萨彦岭 Sayan Mts.
*色扎得萨克 Sedjadsak
*色楞巴河 Selemba R.
*色楞宾斯克 Selebinsk
色楞格河 Selenga R.
色楞格斯克 Selenginsk
色耶尔希山 Seyelhi Mts.
舍拉子 Shiratz
石勒喀河 Shilka R.
士麦拿(伊斯密尔) Smyrna (Izmir)
索科特拉岛 Socotra
*索耳维切戈德斯克 Solvychegodsk
索斯瓦河 Sosva R.
苏瓦金 Suakin
*苏克台河 Suctei R.

苏拉特 Surat
苏尔古特 Surgot
圣马丁 San Martinho do Valle
圣多美 San Thome (São Tomé)
上通古斯卡河 Upper Tunguska R.
上安加尔斯克 Verkhe Angarsk
斯塔诺夫山脉 Stanovoi Mts.
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塞斯克 Zeisk

T

塔尔巴哈台 Tarbagatai
塔吉尔河 Tagil R.
塔拉 Tara
塔塔 Tattah
塔夫达河 Tavda R.
塔兹河 Taz R.
特拉布松 Trebizond
特纳底岛 Ternate Is.
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土吉尔斯克 Tugirsk
*土吉尔河 Tugir R.
图腊河 Tura R.
土尔内 Tournai
图拉河 Tula R.
图里格河(图尔格河) Tuihen R.
托波尔河 Tobol R.
托波尔斯克 Tobolsk
托姆河 Tom R.
托木斯克 Tomsk
托得西拉斯 Tordessillas
太梅尔半岛 Taimir Peninsula
*唐得拉河 Taundra R.

W

*乌乔拉河 Uchora R.
乌第河 Ud (Udi Udd) R.
*乌尔米河 Urmi R.
乌达河 Uda R.

乌兰布通 Ulan-Butung
乌丁斯克 Udinsk (Udsk)
*乌利亚河 Ulya R.
*乌尔卡河 Urka R.
乌斯特-库特 Ust-Kut
乌斯提卢格 Ustilug
乌苏图(呼苏克图) Oustoukoure
温契斯特 Winchester
温达河(温多河) Unda (Umdu) R.
*瓦盖河 Vagai R.
维尔霍棱斯克 Verkholsk
*维乔雷夫卡河 Vichorefka R.
维提姆河 Vytim R.
维斯特法利亚 Westphalia
维尔那(今维尔纽斯) Wilna (Vilna)
维尔霍扬斯克 Verkhoiansk
威切格达河 Vycheгда R.
威姆河 Vym R.

X

西喇木伦河 Sira-murem R.
西比尔 Sibir
*西里班卡河 Serebenka R.
*锡姆河 Sym R.
锡尔伐河 Silva R.
休达 Ceuta
香槟 Champagne

Y

亚丁 Aden
亚速海 Azov, Sea of
亚速尔 Azores
*伊艾克河 Iaik R.
伊利姆斯克 Ilimsk
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伊尔比特 Irbit
*伊尔根湖 Irgen, Lake
*伊尔根斯克 Irgensk
伊尔库次克 Irkutsk

*伊塞次基 Isetskii
伊施姆 Ishim
*伊斯克尔 Isker
伊斯法罕 Isphahen
雅克萨(阿尔巴津) Albazin
雅默斯 Yarmouth
*雅什诺耶 Yarshnoi
雅西 Jassy (Iasi)
*雅缪谢夫斯基 Jamuishevsky
雅布洛诺夫山脉(外兴安岭) Yablonoi

Mts.
雅库特 Yakut
叶尼塞河 Enisei R.
叶尼塞斯克 Eniseisk
印度河 Indus R.
音果达河 Ingoda R.
尤格拉斯 Yugras

Z

斋桑湖 Zaizan-nurr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耶苏会士徐日升 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作者=约瑟夫·塞比斯

页数=250

SS号=10284642

DX号=

出版日期=1973年12月第1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